

Hujucz kaj
Esperanto

胡愈之与世界语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内容提要

胡愈之不仅是我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革命新闻出版事业的开拓者,知名的语言学者和文字改革的先驱,而且是闻名世界的世界语学者,他一生热情地宣传、推广世界语,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语的宣传家、组织家、理论家和实践家。

本书收集了胡愈之有关世界语的论文、谈话、书信以及我国部分知名人士和世界语者怀念他的文章,并附录了胡愈之与世界语的记事。

Hujucz kaj Esperanto

胡愈之与世界语

侯志平编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责任编辑:殷 秦

装帧设计:徐婉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愈之与世界语/侯志平编. - 北京: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1999

ISBN 7-5052-0421-1

I. 胡... II. 侯... III. ①胡愈之 - 纪念文集 ②世界语 - 语言史 - 中国 - 文集 IV. H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第 06090 号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河北小学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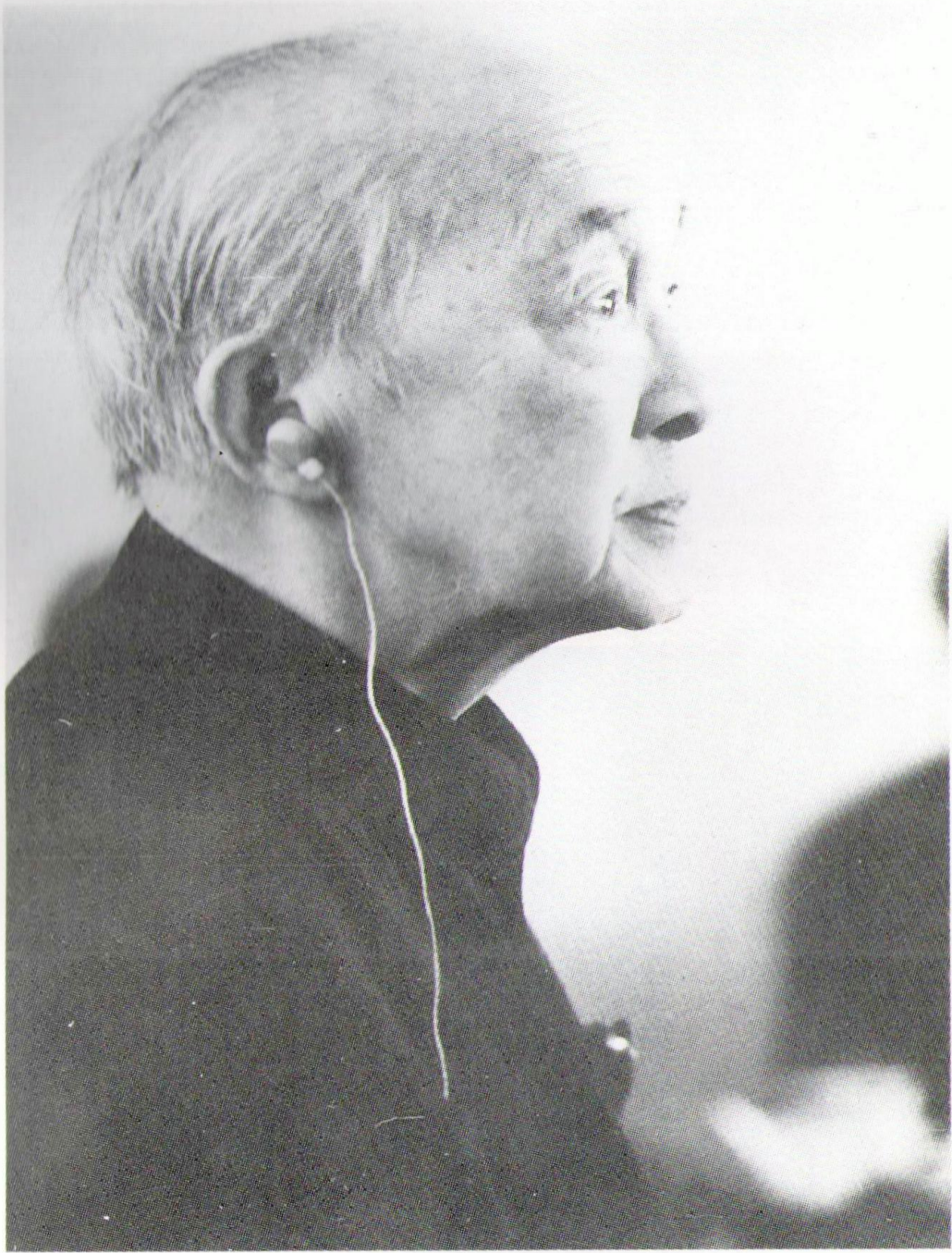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99 年 8 月第一版 1999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850 × 1168 毫米 1/32 12.875 印张 301 千字

印数 0001-1000 册 定价:28.00 元

ISBN 7-5052-0421-1/G·129



胡愈之在世界语之友会成立大会上。



胡愈之与夫人沈兹九。



1931年1月，胡愈之途经德国柏林时，访问世界语杂志《国际主义者》编辑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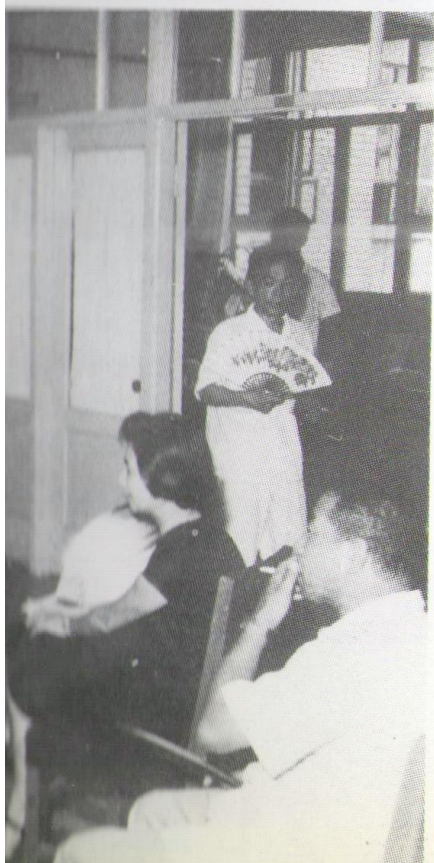


1931 年 1 月，胡愈之在德国多特蒙德市与当地世界语者合影。

1947 年 7 月，胡愈之在新加坡为青年世界语者吕咪和梁丹凤主持婚礼。







(左上图) 1957 年 10 月，胡愈之在欢迎苏联专家、世界语者阿尔曼德的会议上。

(右上图) 1959 年，胡愈之、叶籁士（二排左起第 5 人）、陈原（左一）会见日本朋友土歧善磨、高杉一郎。

(左图) 1963 年，胡愈之（左二）、陈毅（右三）、张茜（右二）在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上与全国世协负责人亲切交谈。



1979 年，胡愈之、廖井丹（右七）、李琦（右五）
接见出席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的全体代表。



1980 年，胡愈之出席《中国报道》创刊 30 周年纪念会。





1980年，胡愈之、叶籁士（右二）、张企程（左一）、戈宝权（左三）、邱及（右一）参观《世界语书刊广播展览》。

1980年，胡愈之与楚图南（右一）、邱及（左一）参观《世界语书刊广播展览》时亲切交谈。





1985 年，胡愈之接见前来参加《中国报道》创刊 35 周年纪念活动的南斯拉夫客人米诺耶维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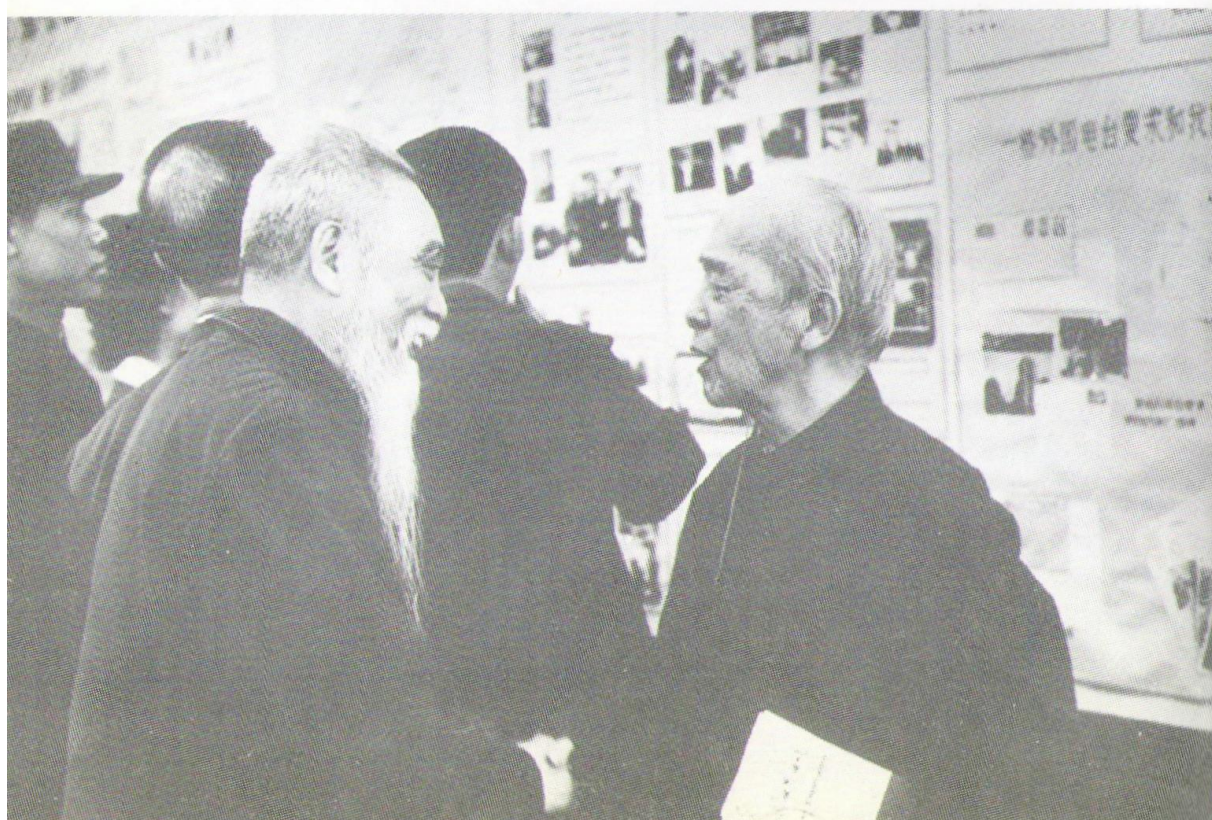
1984 年，胡愈之接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部的记者采访。





1985年5月，胡愈之与姚依林（左二）、黄华（左三）共同出席《中国报道》创刊35周年庆祝会。

胡愈之与著名世界语活动家方善境在一起亲切交谈。





1985年12月，胡愈之在家中听取全国世协和中国报道社负责人关于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筹备工作情况的汇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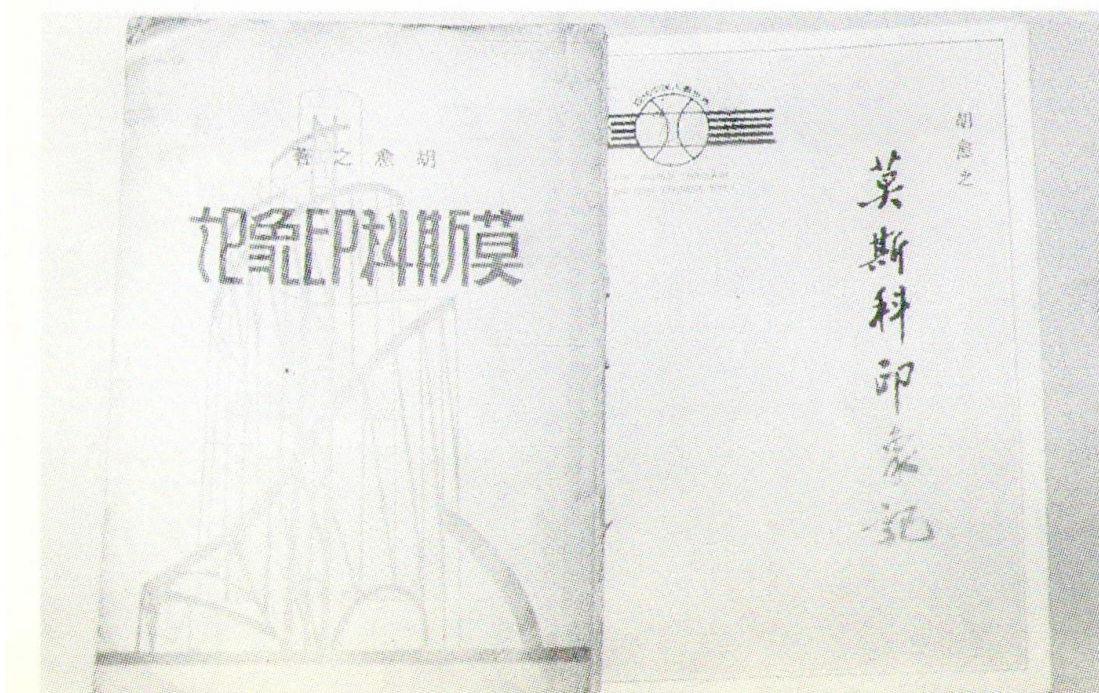
胡愈之、叶籁士（左二）、陈原（右一）同日本世界语代表团亲切交谈。





胡愈之与本书的编者（右一）亲切交谈。

《莫斯科印象记》1931年版和1984年版封面。



目 录

景仰与怀念.....	7
世界语在学术上之地位.....	11
世界语之新势力.....	13
世界语发达之现势.....	14
一 世界语发生史.....	14
二 世界语之优点.....	15
三 世界语之普及运动.....	17
四 世界语之出版事业.....	19
五 世界语与社会事业.....	20
六 战后之世界语.....	21
介绍盲诗人爱罗先珂.....	23
《为跌下而造的塔》译者后记.....	26
国际语的理想与现实.....	27
一 国际语的目的和理想.....	27
二 国际语问题的解决.....	29
三 Esperanto 与 Esperantismo	31
四 国际语运动.....	34
世界语在普通教育上的价值及我国学校加入课程的准备.....	36
人造国际语的成功.....	36
世界语在教育上的价值.....	41
各国学校加入世界语的实况.....	45
国际联盟的重要决议.....	49
我国学校加入课程的办法.....	51
国际语的过去现在及将来.....	54
为什么要有国际语?	54

国际语创造的历史.....	56
一个眼科医生的发明.....	58
三十五年的世界语运动.....	60
最近和将来的发展.....	61
国际语的理想和主义.....	63
亡友胡天月传.....	66
Esperanto 以外的国际语方案.....	72
世界语通信方法.....	78
世界语学习法.....	80
一 学习世界语的目的.....	81
二 怎样使发音准确.....	82
三 怎样练习文法.....	84
四 单字的熟记.....	85
五 国际文体.....	86
六 世界语生活.....	88
Antaŭparolo al "La Ĝemo de Unu Soleca Animo".....	91
《一个孤独灵魂的呻吟》序言.....	92
Ni Organizu, Kunlaboru!.....	94
《枯叶杂记》译者后记.....	96
关于 Ĉinio 与 Ĉinujo 之我见	98
CIVILA MILITO EN ĤINUJO.....	100
国内战争在中国.....	102
五卅事件与世界语界.....	105
告国语运动者.....	108
世界语普及概况.....	114
世界语四十年.....	119
文网与文学.....	123
世界语文学.....	128
上海世界语学会的现在与将来.....	136

《星火》后记	139
盎凡尔之万国世界语大会.....	141
我的旅行记.....	146
同车的波兰苦学生.....	146
莱茵河畔.....	147
道特芒.....	148
世界语同志的集会.....	150
工人家庭.....	150
失业登记所.....	151
汉诺威.....	152
Kelkaj Impresoj de Mia Lasta Vojaĝo.....	153
莫斯科印象记（节选）	162
序.....	162
跨进普罗之国.....	164
莫斯科车站.....	165
莫斯科苏维埃.....	167
D 同志的家庭.....	168
寝室内的欢迎会.....	170
盲诗人的消息.....	171
R 女同志的历史.....	172
列宁墓.....	174
世界语者的招待会.....	175
大戏院的跳舞剧.....	176
重印本后记.....	181
巴比塞与《世界》	182
世界语与中国文字的改革	184
纪念国际语理论家柴门霍夫.....	187
语言和社会进步.....	189
郭后觉先生与我.....	191

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大会开幕词.....	194
在北京全国世协会员大会上的开会词.....	197
希望正在变成现实.....	199
人类的美梦将要实现.....	203
在第一次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6
在《人民中国报道》第三次编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209
迎接新年.....	212
在第二次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15
在庆祝《中国报道》创刊三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18
成立“世界语之友会”倡议书	223
在第三次全国世界语工作.....	226
座谈会开幕式上的致词.....	226
我的回忆（节选）	227
一 走向革命.....	227
二 入党前后.....	236
Mia Vojaĝo tra la Esperantujo 欧 游 通 信.....	243
给汉口世界语学会的信.....	249
贺世界语五十周年纪念庆祝会.....	251
致日本 Keio 大学生世界语俱乐部	253
贺北京电台世界语广播开播十五周年	254
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广播开播二十周年	255
贺《中国报道》创刊三十五周年.....	256
给北京青年世界语者的信（节选）	257
给文化部党组的信	258
给孙国璋的信.....	259
给罗俊的信	260
给李奈西的信	261
给侯志平的复信	262
给侯志平的复信.....	263

给张企程的信.....	264
附录一：	
胡愈之生平.....	265
附录二：	
胡愈之生平与世界语活动记事.....	270
附录三：	
胡愈之逝世后有关纪念文章及活动记事.....	312
附录四：怀念篇	
无私无畏 鞠躬尽瘁.....	318
中华民族的脊梁——胡愈之.....	324
与人照肝胆，见义轻风浪.....	331
四个长处.....	338
埋头实干的工作精神.....	341
从《莫斯科印象记》谈起.....	346
半个世纪的秘密共产党员胡愈之.....	351
一、走向革命.....	351
二、入党之前.....	352
三、特别党员.....	354
四、向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汇报.....	354
五、潘汉年让胡愈之只管救国会的事.....	355
六、帮助重建上海党组织.....	356
七、主持鲁迅丧事.....	357
八、组织营救“七君子”.....	358
九、抗日初期在上海的工作.....	358
十、首次组织出版发行《鲁迅全集》.....	359
十一、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	360
十二、周恩来派胡愈之到桂林从事统一战线工作.....	361
十三、撤离桂林，飞抵香港，接受新任务.....	362
十四、主编《南洋商报》，发起组织星洲华侨.....	363

十五、隐姓埋名三年八个月.....	364
十六、创办报刊，领导南洋地区民盟组织.....	365
十七、党中央称赞胡愈之在南洋的工作.....	365
十八、周恩来要胡愈之继续作民主党派工作.....	366
十九、党员身份正式公开.....	367
胡愈之与爱罗先珂.....	369
胡愈之和世界语.....	381
心香一瓣悼胡愈老，回忆往事寄哀思.....	386
痛悼引路明灯的熄灭.....	393
忆胡愈老二三事.....	398
怀念胡愈老.....	400
胡愈之和翻译工作.....	403
一、把被压迫民族的声音传到中国.....	403
二、胡愈之、爱罗先珂和鲁迅.....	405
三、“媒婆”.....	406
四、注重译作的社会意义和战斗作用.....	407
痛悼胡愈老.....	410
国际世界语协会主席的唁电.....	412
国际世界语协会秘书长的唁电.....	413
日本世界语协会理事长的唁电.....	414
日本名古屋世界语中心的唁电.....	415
胡愈之逝世.....	416
U. Lins	416
编 后 记.....	420

景仰与怀念

（前言）

三年前，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先后编印了《巴金与世界语》和《叶籁士文集》；现今它又准备推出这一系列的第三种《胡愈之与世界语》。这三本书，不仅向读书界提供了世人不那么熟悉但很有意义的论述和资料，而且真实地、生动地描绘了当代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壮丽画面。

胡愈之（1896—1986），巴金（1904— ），叶籁士（1911—1994）——这三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这三个思想文化界的先驱，怀着崇高的理想和信念，用超乎寻常的热情、毅力和实际行动，奠定了当代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设若没有这三老，世界语运动在中国就很难有如今的局面。这是中国世界语界所公认的，也是国际世界语界所认同的。胡愈之、巴金、叶籁士，这三个知识界的良心，确实是中国世界语界的骄傲！而在这三个奠基者当中，胡愈之占有特殊地位。世人称他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夏衍语），是“终身为人民民主、民族解放、社会改革事业而英勇奋斗”的革命家和思想家（胡乔木语）；与此同时，我们世界语界称他们是世界语的化身。

胡愈之毕生从事并推进中国世界语运动。自从他在第1次世界大战前夜学会世界语（1913—14），直到他以90高龄离开人间（1986），在这风风雨雨的70多年里，胡愈之没有一刻忘记做世界语工作。最难能可贵的是，

他巧妙地将世界语的活动紧密地结合着时代的需要，坚定地跟上时代的步伐。他写的第一篇介绍世界语的论文发表于1915年，经过几年的研究和实践，在五四运动后第三年（1922）发表的长篇著论《国际语的理想与现实》，即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显示出他的超前意识和先驱精神。无怪乎经过18年的社会实践，到民族危机最严重的时刻（1933），他提出了“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Per Esperanto por la Liberigo de Ĉinio*）的口号。这个切合实际同时富有魅力的口号，曾激励过千千万万世界语者和世界语同情者，走上民族解放斗争的道路。如果把 *liberigo*（解放）一词作广义的理解，则这个口号甚至可以运用到更广阔的时空，例如思想解放，自由思考和开放政策的场面。

亲爱的读者将从本集收录的胡愈之关于世界语的论述中，从他的同时代人写的回忆文字中，从他在这方面的活动年表中，可以确切地认识到：

——胡愈之是世界语作为国际辅助语最好的理论家和宣传家；

——胡愈之是世界语运动最好的组织家；

——胡愈之是世界语运动最好的实践家。

12年前（1986），当我在八宝山向这位时代的巨人告别归来时，我写过一篇怀念文章，我就是这样提出命题的。我曾经写道：胡愈之对这种被目为“乌托邦”主义的人工语言，对这被雅人讥笑过、被好心人看不起的交际工具，从未失去过信心。人世间只有那些伟大、淳朴、有着崇高理想而又勤奋工作的思想家，才能看到这种人工语言的理想和现实——在欧洲，有莱本涅兹、托尔斯泰、高尔基、罗曼·罗兰、爱因斯坦；在亚洲，有蔡元培、

鲁迅、毛泽东。胡愈之步着这些先驱者的后尘，看到了世界语对于社会革命，思想交流，文化建设和国民外交所能起的作用（哪怕暂时还只是微薄的作用）。我现在仍然这样认为。

我有幸从 1949 年起就在这位文化界的先驱领导下和指导下工作。在编辑出版方面，在出版行政方面，在国际问题研究方面，在国民外交方面，在文字改革方面，特别是在世界语活动方面，我都直接受到胡愈老的教益，甚至可以说，我每时每刻都受到他那伟大人格的熏陶。在我景仰和怀念的先行者中，胡愈之是排名最初的一个。90 年代初，当我从最后一班岗退下来时，我应一个杂志之约，要写一篇怀念这位先行者的文章，不料一动手，便不能自己地写了 34 篇散文，汇成《记胡愈之》一书。我在此书的《开篇》中写过，要追述或评论作为一个“人”的胡愈之，作为一个文化人的胡愈之，作为一个伟大爱国者和国际主义者的胡愈之，如果不从世界语开始，那就表明这样的记述并没有深入到这位智者的内心世界。我说，世界语——这是他的希望，他的理想，他的武器，他的高尚的精神境界。我现在还是这样认为。我钦佩许多胡愈之传记的作者，但是我不能不觉得有点遗憾，即大部分传记没有深入到这位智者的内心世界，因为他们没有理解更没有窥见世界语在胡愈之心中所起的作用。

此刻，我依循《胡愈之与世界语》书稿的编目，翻阅它所收的文章，对照六卷本《胡愈之文集》有关的其他论述，好像我就坐在这位智者的身边，听他不紧不慢地细细讲述他对世界语的见闻和见解。我脑海中不断泛起这个伟大灵魂的音容笑貌，我仿佛觉得他其实没有走。是的，他其实哪

里走了呢，他永远活着，活在我心中，活在我们的心中，活在万千世界语者的心中。

陈 原

1998 年 7 月

* 此文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出版家、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我国世界语运动领导人、国际世界语协会荣誉监护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荣誉会长陈原同志专门为本书撰写的。

世界语在学术上之地位

自世界语传入中国以来，国中明达之士，多以习世界语为先务之急。然间有多数学者，犹且踟躇不前。叩其所以，则曰吾侪习外国语，为其书籍报章之丰富，足以供吾人取持他国学术之用也。若世界语则徒为一种国际通用之语言，非用为传播学术之利器。故在今日，尚无研究之必要也。呜呼，何其所见之狭也。夫世界语之在今日，其学术上之地位，已在各国国语之上，学愚不揣浅陋，敢表而出之，以为我国学者告：我学者诸君，盖亦废然知之返乎。

夫学术者，世界之公产，而非一人又所可私有者也，在闭关时代，为个人之学术，为国家之学术。在开明时代，则为人类之学术，为世界之学术。然私人之学术，为世界所公认，则传播讲解，非世界语不为功，盖以世界语从事著述，为各国学者所共晓，既省移译之劳，而尤可免文字上种种之误会也。故世界语出世以来，西国科学家、亟事研究，近今以世界语著书立说，冀传播其思想学术于全世界者，尤指不胜屈。曩者吾国留法学生，发刊世界语报于巴黎（该报系中国语《世界语月刊》杂志，注重科学文学，中华世界语学会发刊）。一时操笔政者，多为法国理化算学医科博士，及飞艇发明家，诸君试讲谈之，当知其非妄。至记载学术之世界语杂志，尤为丰富，举其大要，如奥国之《大学生之兴趣》，俄国之《医师》，

作者在这里指的是《科学文学中国语世界语杂志》（*China-Esperanta Scienca Literatura Revuo*），总编辑为华南圭。——编者注

比利时之《万国教授杂志》，法国之《精神学杂志》、《科学新报》等。皆当世硕学宏儒所主撰，即此二端，世界语在科学上之地位，可想见矣。

至世界语在文学界，尤有莫大之势力，盖以人造语之富丽明晓，固有胜于天然语万万者也。且以世界语文法之精密明确，故虽各国至玄奥难通之文辞，亦不难译为世界语，托尔斯泰之著作，学者无不知其文字之富妙，然在世界语，则译本独多，俄国某书肆，至汇刊世界语托氏丛书以行世。我国学者，有竭慕托氏学说，而以读俄文为苦者，曷亦自世界语入手乎。

今日之学术，既为人类与世界的学术，故各国学者，多互相联合，为一致之研究，而以世界语为交通之具，如英国之世界语万国种子改良会，德国之世界语博食卫生会，法国之世界语铁道协会，世界语万国法律协会及万国科学会，比国之世界语万国精神学会及万国药剂师会等。国际公共之团体凡数百所，即此足以见今日世界语学术思想之渐趋统一，而世界语实为其联络之环索也。

由是言之，我国学者，苟欲急起直追，应世界之潮流，以冀灌输新思想新科学于我中国，则研究世界语，实为先务之急。何者，以世界语之在学术上，已占无上之地位故也。至读世界语，中华世界语会的函授讲义，实为唯一之读本，此尤为学愚之所愿为学者诸君介绍者也。

——原载《时事新报》，1915年9月4日

世界语之新势力

当大战争之初起也，世人以为世界语之厄运至矣，此其言定无足疑。盖战争主义者，国家主义之变相，实与担任神圣调和之世界语（引柴氏^①世界语颂句），绝不相容也。然按其事实，则适得其反，以世界语而于战争上有多种之适用。此诚匪夷所思者矣，如德国用世界语发行官报半月战报及白皮书，颇获其效。其后，协约方面，亦亟谋有以抵制之。他如中立国世界语同志，创一世界语社团于意大利，为各国俘虏与其家族通信之机关。然则吾人谓世界语之新势力，已发见于大战争不亦可乎。而今而后，吾人益信世界语真有成成为国际公语之能力，而吾神圣事业之奏凯。如柴氏《勉同胞》诗中所预期者，其见诸事实，将不远也。虽然，吾侪于此，殊不足喜。凡我同志，挟此新势力，更当努力奋进，务使世界以有神圣之爱情，而趋于和平。于人间世见好梦之实现。祝永福兮无疆。则今日之事，正佳果之初胎也（引柴氏诗中句）。敬祝世界语万岁，同志万岁。

——原载《时事新报》，1915年9月29日

^① 柴门霍夫。

世界语发达之现势

一 世界语发生史

旧约圣经言人类始祖，当数千年前，遭洪水之祸，漂流无依。水患既平，乃共筹善后之策，议建塔于欧发利次河之滨。上接云霄，与天庭相通，俾遇洪水淹至时，得以上跻天国。既鸠工兴筑，工程及半，塔上之人，与塔下之人，语言忽不相通。上者索砖，下者则与之以石，上者索斧，下者则与之以燧，由是塔卒不成。建塔之人，散居各地，各操方言，永不复合云。此虽杳渺无稽之谈，然天之降罚于斯民，使其语言纷歧，以自相残杀，于此亦可得其微旨矣。语言之不统一，往往引起种族之恶感，阻碍意志之沟通，其为害不可胜计。方今之世，文明大进，人类思想，已有渐趋统一之势。而用以代表思想之语言文字，转不能一致，不可谓非进化之障。故世界语之发生，犹之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之勃兴于近世，皆非出于偶然者也。

世界语之发明人，为一眼科医生，名柴门霍夫氏（Dro L. L. Zamenhof）。柴氏于 1859 年，生于俄属波兰，幼年身受亡国之痛，知种族间残杀之惨，实由于语言之不统一，由是遂发倡造国际语之奇想。当氏入中学时，笃志研读希腊拉丁古文，及各国方言。初拟采择现存方言中之一种，作为国际语。既以此类方言，大率体格凌杂，文字繁富，他国之人习之，非四五年不为功，乃遂着手于人造语之倡制。1878 年，柴氏尚在中学，而所倡之新

语，已略具规模。然其时人多视为儿童游戏之作，甚且加以讪笑，氏则矢志益坚。后入莫斯科大学，专修医学，课暇更研究新语，力求美备。1885年，毕业大学，受医生文凭。氏家贫，自后悬壶市间，勤劳职务，更无暇旁及他事。然其倡造国际语之初志，则始终不懈。1887年，氏得友人之赞助，乃始以其惨淡经营之新语，梓行于世。其后复与二三同志，力事推广，今则世界语已大行于世，而柴氏犹家贫如故，日惟操业以自贍，晚间则从事于著述。吾人对此造福人类而不图报施之功臣，其感想为何如耶。夫世界语之发生，至今未及30年，以一私人之倡作，其传播之速，乃甚于置邮而传命。试推其故，盖有三端。一则国际语之发生，实应时势之需求。二则世界语之文字优美，实可推为唯一之人造语。三则30年来世界语同志传导之力，不为不多是也。

二 世界语之优点

国际语之设施，盖不自世界语始。当17世纪之顷，已有人建议倡造人造语，以供国际之通用。厥后各国语言学家所倡之人造语，计不下百五十余种，其最占势力者，则为1881年发生之华拉普克语（Volapük）。迨后柴氏之世界语，世界学者，遂公认为唯一之国际语言。盖柴氏所创之世界语，乃集欧洲各国国语而熔为一炉者也。其文字之富丽工整，实自沿用数千年之天然语，脱胎而出。至如文法之琐细，变例之繁多，字义之模棱，

Volapük: 在世界语之前的人造国际语之一，德国人 Schleyer 创制，随后此语即归失败。失败之主因有二：（一）该语的语汇都系凭空创造，与各民族语失其联系，故极难记忆，不合实用；（二）创制人无视了语言创造中的集体主义原则，把语言上的一切权利收归己有。

凡为天然语所病者，在世界语则皆无之。举其优点，则有三端。一曰简单。人造语恒视天然语为简单。盖天然语经历史的沿革，文法则新奇迭出，单字则孳乳浸多，故古今文体，截然不同。承学之士，淹贯为难。而世界语则无此弊。计现世界最占势力之各种国语。其含有字数如下：

英语	260000 字
德语	80000 字
法语	30000 字
俄语	40000 字（此系最少之数，实数犹不止此）
西班牙语	20000 字
意大利语	45000 字
华语	49000 字

世界语之字数，虽无完全之辞典可以核计，然其通用之字根，不过二千，已无不足用之患。则比英语少 130 倍，比德语少 40 倍，比法语少 15 倍，比华语少 24 倍有奇也。至其文字之结构，亦极简单，其基本文法仅 16 条，无变例，无成语。故习英德法文四五年，往往未能读科学书，而习世界语，则可以三月之力速成之。其难易相差，奚啻十数倍也。二曰明确。凡察一国之国语，最足觐其人民之思想。我国文字，最不合于逻辑的法则，数千年来思想之闭塞，学术之退化，未始不由于此。（我国文字违反逻辑法则之点甚伙，而陷于歧义盲词者为尤多。如“阴”“阳”“道”“气”等字，其所指之义，绝无限制。而欲定其界说，则万万不能。如此者最为学术进化之障碍）西洋文字，比较的稍有规则，惟世界语则全属逻辑的组织。故其明确谨严，迥非天然语所能及。近世科学发达，一日千里，以不合逻辑法则之天然语，

传述精深微妙之学理，殆已不称其职，惟世界语乃得尽其能事。故世界语之发生，关系于科学之发达，非浅鲜也。三曰富丽。或谓世界语既有简单明确之长，其文字必枯索恬淡，无美术之价值。然按其实际，则适得其反，顺理成章之谓文，若世界语，则最能举其顺理成章之实。世界语之文字，有接头语，有接尾语，有活用，有合成语，其九品词，可任意变换，（如动词可变为名词。亦可变为静词助词分词。名词静词助词亦然。）其句法可任意颠倒，不如天然语之拘滞呆板，故其文字出神入化，备极藻扬华之能事。凡世界各国最高深之文学著作，译为世界语，无不能探奥抉微，曲尽其妙，即此可见其文字之优美矣。有此三长，此世界语之所以足为惟一之国际语也。

某日人谓东西文字，语脉不同。世界语诚足为西洋文字之模范，然与东洋文字，则迥不相同，若用为国际补助语，恐未能也，此其说与老学究之诋新法为用夷变夏，同一见解。盖中西文字之孰优孰劣，今日文学家，虽未论定，然拼音文字较为适用，则为世界文学者之所同认。东洋文字，既非拼音字，则其无采为国际语之价值，亦显而易见也。

三 世界语之普及运动

方柴氏之初倡世界语也，世人多斥其谬妄，氏又贫无立锥地，故传导新语，颇为困难。其后俄国虚无党利用之，藉当秘密通信之用，以是大遭俄政府之嫌忌，进行益困难。厥后各国学者，稍稍知世界语构造之完美，乃相率提倡。1889年，柴氏发表第1次之世界语学者题名录，已有千人熟习新语，其中以俄人波兰人为多，德法次之。由是经多数学者之热心传播，

欧美各国无不有传播世界语之机关，出版事业，亦日益发达，世界语之价值，遂大明于世。至 1905 年，开万国世界语大会 于法境，与会者 352 人，定以后每岁开大会一次，于是世界语之发达，遂有一日千里之势。第 2 次大会开于瑞士，第 3 次开于英国，第 4 次开于德国，第 5 次开于西班牙，第 6 次开于美国，第 7 次开于比利时，第 8 次开于奥大利 ，第 9 次开于瑞士，第 10 次开于巴黎，会员达 3500 人。适欧战发生，因而中辍。1915 年第 11 次大会开于巴拿马博览会中 ，议决战后要求各国政府将世界语加入学校。1914 年之夏，世界语社团，总计已有 2293 处。又据 1910 年匈牙利绿星社（绿星为世界语之徽帜）之统计，谓全球世界语学者，已有 855 万人。由此以推，则在今日，当达千万以上。此十余年中发达之速，诚有出于意外者。此皆出于私人传播之力，未尝得在上者之提倡也。

提倡世界语者，以德法奥为最多。自 1905 年以后，竭力从事普及运动，不遗余力，而后乃有今日之盛。传播机关，今已遍于全球。提倡世界语之报纸，无地不有，其风靡世界之力，可谓大矣。中国之传入世界语，为时尚早，1891 年海参崴首倡世界语会，其后中华世界语会成立，设中央事务所于上海，于内地遍设代理员，并附设函授部，函授世界语，（讲义为盛君国成所著，盛君国成精通世界语，于国际文学界，声名藉甚。其所著函授讲义，经柴氏评阅，推为世界第一善本。）事业颇称发达。民国元年，蔡元培氏长教育部，有以世界语加入小学校教科之主张。后蔡氏去职，其议遂废。今日全国通世界语人数，虽不易统计，然世界语会附设之函授部，

万国世界语大会，即 *Universala Kongreso de Esperanto*，现译作国际世界语大会。——编者注

原文如此。第 8 次国际世界语大会会址应为波兰克拉科夫城。——编者注

第 11 次国际世界语大会会址应为英国的旧金山。——编者注

近已有学员七八千人，则全数当在数万人以上也。

四 世界语之出版事业

世界语出版事业，自 1905 年以后，始渐发达，每年出版书籍，平均约二三百种。至 1914 年之夏，计共有 2500 种左右。中以世界语读本教科为最多，文学次之，历史地理科学宗教又次之。又自国语中译出之文学小说等，计共 6 千种，以自法俄英德波兰文译出者为最多云。

世界语杂志，时增时减，统计前后不下七八百种。据 1914 年之报告，现存者共百六十七种。其在德国发行者，凡 38 种，法国发行者凡 32 种。至其销数之广，亦迥非意料所及，如法国世界语报，几销及 10 万份，德国世界语报，约销 6 万份。中国发行之世界语杂志，前后共计六七种，现存者则为《华星》（为世界语月刊。主任即盛君国成）。《民声》之二种云。

世界语出版事业之发达，有一日千里之势，此虽世界语前途之乐观，然实则伏有非常之危险。盖世界语既易于学习，粗忽之学者，往往略窥语学门径，即以著作家自命，其所著等于闭门造车。甚且以国语体搀入其间，谬种流传，世界语文体，遂永无统一之望，其结果必使人造语陷于天然语之覆辙而后已。世界语学者有鉴于此，故由万国世界语大会，组织一语言委员会，专以扶助语言之安全进行，防止文字之国语化，为其职务。该会曾力劝世界语著作家，少用新字，行文时尤须严于格律。盖新字日多，则歧义迭出，格律不严，则文体旁落。在此二者，则世界语之灭亡，可立而待也。

五 世界语与社会事业

欲谋国际语之发达，必使世人咸知国际语之实效，此世界语学者之所以竭力从事于社会事业也。世界语既为国际间交换利益沟通思想之利器，故各国专门业者，均有联合之组织。如万国银行家协会、万国药剂师会、铁道协会、教师协会、全球医会、万国印刷工人团、万国警会、邮务人员联合会、商工学会、工团联合会、全球禁酒会等，皆利用世界语互相联结者也。然其最大之事业，厥为环球世界语会之组织。该会之创设，其目的在使分居全球各种语言不同之人民，易于联络，而造成坚固之团体。其中央事务所，设于瑞士之竟南汇，世界各大埠，均设有代理员，入会者但缴会费一元，即可得年鉴一本。此年鉴中，于该会之一切组织，及办事人驻在之地点，记载甚详。会员但携此年鉴，赴各地游历，则可得该会代理员之招待引导。又世界各大商店之曾入该会者，均得由该会分送广告，介绍职工，传递商品，并收集各种之报告。其分居各地之会员，欲通信问答者，亦得要求该会，为之介绍。该会又附设商业部、旅行部、航海部、学生部、妇人部、工人部、交换部等，经理各种交通事务。论其所营事业之宏富，洵不愧为世界惟一之国际团体矣。

世界语与商业，亦至有关系。各国用世界语之商店，现已有数百家。中以告白公司、书店、食物店、化妆品店、印刷所等为最多。1913 年之冬，调查巴黎一市，用世界语为商标或印目录告白者，已有 37 处，即此亦可见一斑矣。至各国世界语旅馆（能操世界语者），据 1914 年之统计，共有 649 所，德法英俄为最多，瑞士奥意次之。世界语汇理银行者，为欧洲世界语家所倡，其总行设于伦敦，该行行用世界语币制（以司丕 Speso 为本位）。

据前年统计，其存款凡 730 户，分居上 43 国，320 市，存户所操之国语，凡 35 种云。

欧洲肇兴，环球世界语会创一俘虏交通社，一切事务，均由会员热心担任。集得俘虏名单，分居英德法三国者，计 100 万人。每日送出信件答复者，自 1000 至 1500 件。转交俘虏之金钱，每日平均万五千法郎。此外送回各国难民，计数万人。其成绩不可谓不著。又战时伤兵病院收容之兵士，国籍不同，医生治疗，每以言语不通，救护甚为困难。于是世界语家，乃辑一红十字世界语指南书，分法英德意俄西丹瑞葡九种对译本。自开战后，两三月间，此种指南书，为法国伤兵病院购去者，计共一万余本。即此可见世界语于大战争中效用之巨矣。

六 战后之世界语

世界语于近 10 余年来，发达之速，迥非意料之所及。然此皆出于个人传播之结果，未尝得各国政府之援助。盖大战以前，欧洲列强，方迷溺于风靡世界之国家主义，朝夕皇皇，惟军备是务。彼惟恐其人民之醉心大同主义，而忘爱国之本原，欲冀其提倡国际语，不亦难乎。虽然，天道好还，剥极则复，欧洲之战，杀人盈野，流血漂杵。各国政府，昔以厉行国家主义为事者，今皆自食其报。大战以后，天或悔祸于斯民，使欧洲政府，翻然变计，改图平和之事业，谋沟通国际感情之方法。世界语发达一线之望，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此次战争中，世界语已显其实效。环球世界语所营之事业，已见上文。又德政府曾用世界语刊行战时半月报，法意相继效之，亦以世界语刊印蓝皮白皮书，此不可谓非战后世界语发达之朕兆也。）

曩年有某波斯名人，遨游英兰，颇受三岛学子之欢迎，其所演说，颇足发挥世界语之价值，今摘译如次，以当结论。

凡世界所有之事业，可分为普遍的与特别的之二种。普遍的事业，恒为天然的，故其所造就，殆无涯。特别的事业，恒为人为的，故其结果，极有限制。日月之光，无所不照，故为天然的，为普遍的。室内之灯，所照不过寻丈，故为人为的，为特别的。大凡人力所成之事业，多限于局部，而不能普遍。惟世界语则不然，世界语虽成于人力，然其效力，则能普遍于世界。故虽谓为人类莫大之创造，亦无不可也。文明之进化，思想之发达，由于问学。问学之传递，由于语言。故语言之不统一，实为世界文化之大障。吾东方国家，与西方政治不同，宗教不同，社会不同，思想不同。欲谋沟通东西，非国际语不为功。（中略）夫吾人类因语言不统一，而发生种种种族国界之恶感，以自相残杀，自相攻伐，亦既数千余年于兹矣。今者天牖斯民，假手于柴氏，使创造人类未有之大事业，以弭国际之争端。吾人类可不仰体上帝好生之至德，而亟事传播乎。（下略）

1917年1月

——原载《东方杂志》，第14卷第1号

介绍盲诗人爱罗先珂

被日本政府驱逐的盲诗人华西里·爱罗先珂，已到了上海了。在数月前这《觉悟》的晋青君通信里，曾把盲诗人在日本被逐的消息告知我们。有许多人也许把他当作一个“宣传家”，当作一个怎么样的“暴烈分子”。或者因此又要烦劳探侦先生的注目。但爱罗先珂先生现在很愿意和中国朋友交谈，我们只要和他见过一面，想起这一种无谓的推测，怕就要哑然失笑了。本来爱罗先珂先生不过是一个儿歌童话的作家，他所有的，只是儿童的天真的心，真如鲁迅先生所说，“他是梦幻，纯白，而有大心”的。我们挟着政治、社会……的种种成见，去猜测他，固然不对。便是我们拘囚在各种“墙壁”里边的人们，到了这一位“世界的”“人的”诗人的面前，实然也只好羞死！

这一位盲诗人的生平，我们从前知道的不多。到了前晚，爱罗先珂先生才自己告知我们。据他说，他是生在莫斯科南部，四五岁时就送到莫斯科盲童学校去念书。他很有音乐的天才，从学校里出来后，他便在酒馆、跳舞场、富人的家里弹唱。那时他攒下了许多钱，他便设法到英国去，在伦敦盲童学校里又学习了一年。后来盲童学校里校长，和他不睦，不得已复回俄国。住俄国不久，便到暹罗去，在盲童学校里当教员。那边盲童学校是西洋教会里办的，所以他们要他入基督教。他不愿意加入有一定形式的宗教，所以不久便离了暹罗，到缅甸印度去。在印度的时候，他和印度回教、基督教的孩子一块儿居住。平常日子他和印度教的孩子去参拜他们的寺庙，有时也和回教的孩子到回教的礼拜堂里去玩。到了礼拜日他却又

跟着基督教孩子们去做祷告，可是他对于各种宗教却始终没有成见。那时欧战发生，印度国内又起民族运动，英政府当他是革命党，或是德国的间谍。后来又说他是俄国共产党，把他拘禁起来。他经过许多困难，才离开印度，到了日本，在日本某大学旁听，因此结识了许多日本的朋友。不久那些朋友们发起晓民会，宣传社会主义。他在那时因为和他们亲近，所以日政府说他是布尔什维克，驱逐出境。其实他离开俄国，还在欧战未起之前。他和布尔什维克的关系，也不过和平常在报纸里见过布尔什维克的人一样罢了。

今年他离了日本后，便到海参崴，从海参崴到了赤塔。他那时想回莫斯科去在盲人学校干一名音乐教员，请求赤塔发一张护照，可是正值俄国闹饥荒，除共产党及外交专使，一概不准入境。爱罗先珂因为不能证明自己是共产党，所以竟不能回到俄国去，不得已便到了上海来。幸亏他在日本的时候，学会了一种按摩医术，所以现在得在上海日本人所设的医院干一名按摩医生，赚他的生活费。

最后爱罗先珂先生有几句有趣的话说：“我在日本和印度的时候，因为我是共产党，不许我住下。我待要回俄国去呢，却又因为不是共产党，不许我回去。我竟不知道要怎样才好了！”

我差不多世界都走遍了，现在到了上海，不知能容得我住下不能，要不然我真不知再要到什么地方去了呵。”

但我们看起来，这是莫怪的，爱罗先珂先生是世界的人，是人类的人，现在却只有国、省、畛域……没有“世界”。只有党人、教徒……没有“人类”。所以偌大一个地球，却没有盲诗人容身之地了。

爱罗先珂先生通英德日语及世界语。他自己说，他虽生于俄罗斯，但他能讲世界语比俄语更好。他的著作却都用日文。最近他正在着手写一篇话剧，标题是叫《普施太子》。爱罗先珂先生在日本文坛上所放的光彩，是我们所熟知的。我们更希望他在中国的一块荒瘠的土地上放出一些灿烂的艺术之花。

——原载《民国日报》，1921年10月14日

《为跌下而造的塔》译者后记

这是盲诗人为了中国读者，特地写下的世界语童话的一种。最初所定的标题是叫《南和北的故事》（La Rakonto de Sudo kaj Nordo），后来经译者和作者几次的斟酌，才改成现在所用的标题。

据作者自说这一篇是一种 Hint，内容不过是讽刺罢了。他的大意在未了的几行中，大约已说得很明白了。至于所用的文体，是作者所特创的一种“诗体的童话”。文中包含许多的诗句，便说全篇是散文诗，也是很确当的呢。音节的和谐，是他的童话的一大美点，可惜这种美点经过我的粗劣的翻译，便全都失却了。

译了爱罗先珂君的几篇作品之后，使我对于世界语更得了坚信。如果他用了别种国语来作，思想和情绪自然——也像他的日文著作一般——也能够一样的表现出来的，可是文章的音节可再不会像这样的华美了。但是还有人说，世界语结构太简单不能造成高尚的文学作品，这未免太诬妄了罢。

1922 年 1 月 5 日

——原载《东方杂志》，第 19 卷第 1 号

意为“暗示”。——编者注

国际语的理想与现实

一 国际语的目的和理想

本篇里所要讲的是：（1）国际语的目的和理想是什么？（2）国际语如何产生？（3）国际语的理想如何实现？

国际语的目的是什么？国际语有没有设置的必要？这两个问题是无待于说明的。因为国际语不过和邮政电报一般，是沟通各民族思想情感的工具，是文明人类的社会生活上所不可缺少的东西。凡人无论怎样蠢，总不会疑心到邮政电报有无设置的必要的，所以也决不会疑心到国际语有无设置的必要的。

但在事实上，根本的反对国际语的却多着哩。他们以为国际语非必要的，国际语是有害的，国际语是足以伤害民族精神的。抱最后一种见解的最多。这是因为他们对于国际语的理想未曾明白了解的缘故。平常人都以为国际语的最后理想是在使一切国语和民族语都完全消灭，使全地球的人类都操同一的语言，都用同一的文字。这是对于国际语的最普通的见解。其实国际语的理想决不至于这样夸大，国际语决不想侵犯一切的国语和民族语，不但并不侵犯国语而且是补助国语的。人类的思想能够相互交通是全赖语言文字的，但是在语言不同的人民互相交际时，还是和哑子一般，什么都不能了解，国际语的目的就只是弥补这一个缺点，除此以外国际语决不想干涉人民内部的生活。所以说国际语足以伤害民族的精神和特质，

这譬如说邮政寄信足以伤害一般人谈话的能力，这是多么可笑啊！

国际语的最后理想，是在供给各国人民以一种中立补助语。因为国际语是中立的，所以不干涉一切内部的事情，因为是补助的，所以更不至侵害国语或民族语。

在近世，国际语决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东西。国际语运动的发生，和现代的一切新的运动——如民主政治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等——一般，是应时代的需要而起的。自从汽机发明以来，人类交通范围扩大，各民族接触的机会众多。在工商业，教育，旅行，社交及外交谈判上因为各国语文不同的缘故，发生无数的困难。现代人的国际关系，非常复杂，差不多不论是谁，都有学习一二种外国语的必要。各国普通学校里，外国语都成为一种主要的科目。各国的国语都是本着各国的特殊情形而发展的，所以甲国的人去学乙国的语文实在是非常困难，而且即使学会了乙国的语文，还有丙国，学会了丙国的语文还有丁国。平常人虽然不必尽通全世界各国的国语，但凡是要受专门教育的，或者要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商业上活动的，却至少也要通四五种国语——就是把几个主要国家的语文学会才好。学习一种外国语已经不容易，要学会四五种外国语，不用说，在平常的人是办不到的了。甲国的人费了许多年月去学乙丙丁国的语文，乙国的人费了许多年月去学甲丙丁国的语文，丙国或丁国的人又费了许多年月去学甲乙丙丁国的语文，单从时间经济上看来，这是何等虚费的事情。近代人发明了机械以节减劳力，发明了铁道轮船以缩短旅程，独对于语言的虚费，却不曾想过一个救济的方法。国际语的理想就是应这一类的需要而发生的。换句话说：国际语是现代生活所必需的一种工具，是节省时间和效率的一种新发明的机器。

但如果国际语的目的是专为物质的利益的，那是真不值得这样的倡导了。国际语运动所以有重要的价值，全因为他有更大的理想的缘故。这所谓更大的理想就是人类国际心理（internacia koro）的养成和民族偏见的消灭。现代的国家组织是一种阻挡人类文化的障碍物，未来的理想社会，必须建筑在非国家主义的基础之上，这是大家知道的。但在实际上国家主义的打破却非常困难。所谓国际的平和与协调，不过在外交家嘴边说说，事实上全不是这样。这是什么缘故呢？我们可以说，一大半是由于人类思想感情之未能融合。人类自从几千年来就被拘囚在人种和国家的笼子里，所以要打破国家主义的偏见，决不是容易的事情。现在第一先要使各民族养成一种“国际心理”，灭除人种和国家的臭味才好。所以最要紧的是各民族思想情感的沟通。民族思想情感隔阂的原因，虽有许多，而最大的原因却在于语言。因为语言不通，所以各民族不能相互了解，因不能了解而引起猜疑忌嫉，这是民族冲突的主因。国际语的最后理想就是想从语言的统一，以求得人类的安宁与平和。国际语运动者同时也便是平和和非战主义的战斗者。

这样看来，国际语决不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是一种伟大的改造理想。他的目的不单是谋旅行及工商业上的应用而已，也在于使各民族相互了解，以促进人类理想社会的实现。从这一点看来，国际语的产生实在和近代一切的社会理想的发生有同样的重大的意味而不可漠视的了。

二 国际语问题的解决

作者 1985 年 12 月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说，他后来知道这种看法不对，民族冲突主要不是因为语言不同，而是由于其他的社会因素。——编者注

国际语的理想既然是这样：现在所要讲的便是（一）国际语能成立不能？（二）哪一种语文当作国际语？

其实这两个问题只是一个。因为如果已有一种适宜的语文可以当作国际语，那么国际语能不能成立，是不成问题的了。但是哪一种语文配当作国际语呢？这是几十年来各国学者久经讨论的问题，而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现在详细说一说。

第一，如果我们采取一种现成的国语来当作国际语，这个能办到不能？如果是办得到的，那自然是最方便不过的事情。但是国语的种类很多，应该采用哪一种呢？照最公平的办法，应该统计全世界各种语言，哪一种语言应用的人数最多，就公认为国际语。这样计算起来，只有中国语才能合格，因为全世界操中国语的共有四万万万人，无论英语西班牙语势力都没有这样大。但是中国语是最难学的语言，欧洲人学习中国语至少也要七八年才能成功，所以充作国际公用语是万难办到的。若求其次，便是英语、法语、俄语和西班牙语。于是又生出一个问题，语言和国力是有关系的，如果用了任一种强国的国语当作国际语，那个国家便得在世界文化上占较优的位置，在目前国家主义未消灭的时候，这样的事情是别的国家所不能容忍的。如用了甲国的语文当作国际语，乙国就要出来反抗，用了乙国的，甲国和丙丁等国又要不答应。而且无论用何国国语当作国际语，在别国人学起来总觉到非常困难。所以用现在的国语当作国际语是不可能。

此外也有人主张用已死的拉丁文来当作国际语。这也是一样的困难。因为拉丁文欧洲人学习起来也很觉困难，更不用说是东方人了。国际语的

第一个条件，是要简单易学。因为如果是不易学的，那决没有普及全世界的可能。一切国语都是根据习惯而造成的，都是不规则的，都是不易学的。简单易学的文字是只有人造语。所以也只有人造语，配作国际公用语。

第二个问题就是国际语应该采用何种人造语？现在所曾经创出的人造语，哪一种是值得采用的？这个问题的解决倒是容易的很。因为人造语能否通用，只看有无普及的能力。我们只要选择一种行用最广的人造语，公认作国际语就是了。这几十年来的国际语（参看《Esperanto 以外的国际语方案》）虽然有好多种，但是有一大半是从来没人使用过的，有一部分是经过一时间的使用便即消灭的。有了 40 年的历史而且经数百万人民实地使用的，却只有一种 Esperanto。所以 Esperanto 是唯一合宜的国际语，采用 Esperanto 是解决国际语问题的唯一的方法。

三 Esperanto 与 Esperantismo

现在先从言语学的立点上讲 Esperanto。

Esperanto（以下称世界语）所以能够战胜同时代的各种人造语（参看下篇），全因为构造完善的缘故。有许多人都以为世界语的创出，是近代的一大灵迹。世界语的创造者柴门霍夫不过是个眼科医生，并不是什么语言学专家。但是他凭了语学天才居然创出一种极完备的世界语，这是一般人所不及料的。世界语构造的优点，就在于合理，易学而又适于实用。他的结构有下列的几个特征。

Esperanto 是 1887 年波兰人柴门霍夫创造的国际补助语，中文译名叫“世界语”。——编者注

- (一) 发音容易且无变化；
- (二) 重音 (**akcento**) 有一定位置；
- (三) 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都有一定语尾；
- (四) 名词无性的区别；
- (五) 目的格有一定语尾；
- (六) 数词组织法和汉文同；
- (七) 疑问句均加一定之疑问词；
- (八) 因为有许多接头，接尾字，所以字之构造极简便，且单字数目亦减少许多；
- (九) 文法只有 16 条而无例外；
- (十) 相关词与前置词之构造非常便利；
- (十一) 文句中字之配置非常自由。

有了这几个优点，世界语可以算得最完备的人造文字。严密的批评起来，柴门霍夫语的构造，也有数处为语言学家所不满，但是从全体的优点看来，却算不得什么了。

世界语的简单易学，直是出于想象之外。不论是谁，只消费一年以内的时间就能把全部文字学会。如果是欧洲人，或东方人已学过欧洲文字的，那只需五六个月，就可以作文讲话了。最出于意外的，如此简易的文字在实用上传达思想和表现情感，便是最精深微妙的也毫无困难。凡学过世界语的都承认世界语能用了创作高深的美文。各国文学名著译成世界语的也颇不少，非但没有困难，而且比别种国语的译本都好。因此世界语的产出，不能不说是语学上的一大成功了。

上面是讲世界语的语学上的价值。但是世界语所以能成为一种活文字，世界语运动所能成为具体的事实，全因为除了文字以外，又有世界语的独立的理想和精神缘故。这种理想和精神就是所谓 **Esperantismo**——世界语主义。1905 年在法国波洛业开第 1 次万国世界语大会的时候，曾通过著名的《世界语主义宣言》（**Deklaracio pri Esperantismo**），在这宣言里所说的世界语主义，大概是下列的六条：

（一）世界语主义是绝对中立的。绝不干涉人民的内部生活，也决不想排斥现在的各种国语。世界语学者无论抱何种别的理想，信何种别的主义，都是私人的行动，与世界语主义无关。

（二）现在国际语运动已不在理论的争辩，而在于实际的宣传。世界语既为最适宜的现存的人造语，故国际语的同志当合力宣传而不复有所疑虑。

（三）世界语原始家既已声明对于此语不愿享有专利权。故世界语为全世界的公物，非任何人的私产，不论是谁都可以自由使用他。

（四）柴门霍夫最初所著的《世界语基础》（**Fundamento de Esperanto**），不能加以增删改削，此为世界语学者唯一的约束。此外文字上的增订及扩充，则学者不必受一定的约束。

（五）凡能了解及使用世界语者均为 **Esperantisto**（世界语学者），此外世界语学者虽亦宜加入各种世界语团体，但非为必要的。

所谓世界语主义——世界语学者所信守的理想和规则就只是这几条。所以世界语主义并不是什么艰深的理想，实在是谁都能做得到的事情，但是有一部分的世界语学者，为柴门霍夫自己的人格所感动，把世界语的事业，

认为一种高尚的理想，认为一种爱世界爱人类的普泛的教义。这一派的人，可以说，是从 **Esperantisto**（世界语学者）更进一层成为 **Homaranisto**，就是“人类一分子主义”——此系柴门霍夫所首创——的信仰者了。

四 国际语运动

自从 **Esperanto** 出世之后，国际语的一个大问题总算已经解决了。但是国际语怎样能够普遍于全世界呢？那就要注意于国际语运动了。

我们应该知道：国际语 **Esperanto** 在现在所以能造成大部分的势力，虽然由于 **Esperanto** 结构完善的缘故，但是最大的原因，却由于国际语运动的尽力。当柴门霍夫最初造成 **Esperanto** 的时候，正是人造国际语 **Volapük** 破灭的当儿。因此一举，世人对于国际语的信仰，冷去了一大半。但是世界语却能够乘这时机，收揽已失的人心，最初传授于俄德法诸国，不上十年，世界语的同志就遍布于全世界。至今世界语产生不过 35 年，差不多已成为公认的国际语，可见传授力的广大了。

世界语的传授，照原始家柴门霍夫的初志，是主张绝不依赖各国政府的势力的。所以国际语运动，可以说，完全是国际民众的运动。国际语的运动，大概可分为下列的几种方式：

(1) 国际世界语学者的集中的组织就是：

(甲) 万国世界语大会 (**La Universalaj Kongresoj de Esperanto**) 每年开会一次，在世界各大都市轮流举行。

(乙) 大会常设委员会，(**Konstanta Komitato de la Kongresoj**) 专门筹

也有译作“人类一员主义”的。——编者注

备每年大会事务。

(丙) 世界语文字委员会 (Esperantista Lingva Komitato) 以谋世界语基本原则之保存及文字之进化为目的。

(丁) 世界语中央事务所 (Esperantista Centra Oficejo) 设于巴黎，办理及辅助一般的世界语运动，作成世界语运动之统计，及保管一切文牒。

(2) 世界语的实地使用。这一类的组织颇多，最大的就要算 U.E.A ——万国世界语协会。此会专以谋世界语在工商业旅行上的应用，及使各国世界语学者交通联络为目的。事业非常发达。

(3) 世界语的教育价值的确认，这是大战后新起的一种运动，就是主张把世界语加入欧洲公立学校课程，以代从前的拉丁文课程。

以上三种不过是国际语运动方法的大概，至于国际语普及的情势，可以参看下列各篇。现在再引国际语运动名人 Adam Zakrzewski 的一句话来当作结束，就是：

Nun en Esperantujo la suno neniam subiras !

现在在世界语的领域内太阳是永不会落下了！

1922 年 1 月

——原载《东方杂志》，第 19 卷第 15 号

U. E. A 是 Universala Esperanto-Asocio 的缩写，20 年代译作寰球世界语会，现译作国际世界语协会。该会成立于 1908 年。现总部设在荷兰鹿特丹。据《世界语年鉴》1997 年统计，该会在 117 个国家中拥有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出版会刊《世界语》，每年 11 期。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于 1980 年被接受为该会团体会员。——编者注

Adam Zakrzewski (1856—1921)，波兰科学家、著名世界语者，著有《世界语史》(1887—1912)。

世界语在普通教育上的价值及

我国学校加入课程的准备

去年第7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广州开会，通过议案决议将世界语一科正式加入全国师范学校并依次加入于一般学校。这是我国学校正式采用国际补助语的发端，也是十几年来我国世界语运动所得的一个小小的成绩。但是在实际上各省师范学校实施这一条决议案的还是不多，教育界对于世界语加入学校课程的问题似乎都很冷淡，这大概是因为一般人对于世界语的性质、目的、效用还不大明白的缘故。数年前国语运动开始的时候，教育界也大多抱观望的态度，但是后来幸亏有许多人尽力倡导，到了现在已没有人疑及国语教育的价值了。现在我们对于世界语运动，也抱同样的希望。所以我趁着《教育杂志》发刊学制课程号的机会，把世界语的性质、历史，及其在教育上的价值，大略叙述一下，希望因此引起全国教育家的讨论和注意。

人造国际语的成功

第一要问的就是世界语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个问题本来已没有提出的必要，因为世界语产出后已有35年的历史，在欧美到处可以找到了世界语学者，国际补助语的目的和性质，差不多是谁也知道的。但是在我国直到如今却还有许多患近视的先生们，说世界语是“私造符号”，是“垂死的假文

字”。咳，倡这种可笑的论调的，比三四年前反对白话文的，实在并不更少呢！因为这样，所以我不能不先在这里把世界语的本质重复地申述一番了。

世界语的原名叫 **Esperanto**，乃是一种人造的国际辅助语。为什么要有这一种人造的国际辅助语呢？因为自从人类文化发展以后，各民族语言非常分歧，在各民族间相互传达思想的时候生出许多障碍，于是便不能不有一种公用语文（**universala lingvo**），以谋人类相互交通的便利。例如欧洲自从中世纪以后，各国国语虽都已成立，但是当公众演说和著作的时候，却一律用拉丁语文，所以拉丁文在当时恍惚是欧洲的公用语文了。

但是到了近代，民族主义发达，国语的势力膨胀，各国学者已不再用拉丁文著书立说了。同时物质进步，东西沟通，人类各民族的接触，日益繁复，所以国际公用语也比从前更需要得多了。但是我们用哪一种语文来当作国际公用语呢？很有许多人讨论过这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能够从现存的各国国语中挑选一种当作国际公用语，那自然也很好。有许多人主张用法语来作国际语，也有许多人主张用英语来作国际语，但是这个在实际上都办不到。因为如果用英语或法语当作了国际语，那么不是英美便是法国可以在世界文化上占较优的地位了，英美人和法国人自然喜之不尽，但是其余的民族，怎能降心相从呢？除非英美或法国征服了全世界，这种企图是决不会成功的。但是这个倒还没什么困难，因为我们不必一定要去选那强国的国语，却不妨拿一个小国的国语来当作国际的公用语文，就像挪威的语文，据说构造最为简单，而且挪威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不会有征服全世界的野心，也决不会有人气不过他的。这自然不错，但是实际上也是同样的办不到。因为挪威语虽然简单，和挪威邻近的瑞典人学起来非常容易，

而其余的欧洲人学习起来，却比较的烦难一点了；进一步说，欧洲人学习起来似乎容易，而印度人、埃及人、中国人、暹罗人学习起来非常艰难了。挪威语是经过许多变化而成的自然语文，读音和文法都是繁复而且不规则的；所以别国的人民至少也要五六年才能学成，这自然也是办不到的事情了。

这样看来，现在生存的各国国语，是谁也不配来当作国际公用语的。因此也曾有人提议把已死的拉丁语文回复过来，当作国际公用语，但是拉丁语文犹之我国“粤若稽古”一类的老古董，欧洲人学起来，已觉得头痛，在我们东方人，以及非洲人是更不用说了。因此我们所得结论是：国际公用语不能用过去或现在生存的一切语文来替代，只有人造语文才有充作国际语的价值。^①

人造国际语的历史已经很久，17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莱本兹（Leibnitz）可以说是开山老祖了。莱本兹在1666年发表一篇论文，主张创出一种符号，大概和代数学上的符号相似，不论哪一个民族，只消学会了这几个符号，便能和语文绝不相同的民族，相互交通，这种符号是叫“pazigrafio”。后来莱本兹死了，他的理想到底没有实现。但是却有许多人继他的遗志，想创造一种完备的 pazigrafio，有想用数目字来替代文字的，也有想用简单的符号表明意义的，有许多的计划还未成熟，却早已夭折了，有许多虽然造成了一定的方式，但因为没人理会他，不久便也无形消灭了。从莱本兹到19世纪中叶，这200年当中，所创造的国际公用语文大概在150种以上，其余仅有一种理想而无实际计划的更是不计其数。他们都和烟云一般地消失了。

^① 参看 Stead 公司出版的 International Language: Problem and Solution。

直到了 1880 年德国的牧师 T.M.Schleyer 创造出一种 Volapük，这才开了人造国际语的新纪元。

Volapük 是一种根据欧洲各国国语所造成的语文，他的单字，大多是从英文改变成的，此外从法德拉丁文采取的也不少。文法也从欧文模仿而成，只是没有变例，没有不规则的变化，所以简便易学。起初这种语文在德国南方传播，后来逐渐侵入欧洲各国，在当时非常发达，全世界学 Volapük 的多至 100 万人，国际语的理想差不多已实现了。但是到了 1893 年俄国人 M. Rosenberger 创出了一种“中立语”（Idiom Neutral），构造比 Volapük 更为简单，他的单语在欧语中更为普遍，因此到了 1902 年 Volapük 的国际学会（Akadmi Internasional de Lingu Universal）竟宣布把 Volapük 废止，改用中立语。于是已有些少成绩的 Volapük，便这样地寿终正寝了。

中立语的产生，已在世界语产生之后，在 20 年前和世界语竞争甚烈，那时世界语的势力还不及中立语的广大。但是到了后来，中立语势力一天减似一天，世界语却一天盛似一天，到了欧战的时候差不多已没有中立语的踪迹了。这大概是因为中立语构造不及世界语那样简单而又合理的缘故。同时后于世界语的又有一种 Ido，在当时也有一部分人信仰他，但因为构造太偏于理想而不切实用，所以不久，也被淘汰而成为死文字了。

世界语——就是 Esperanto，是最后生存的唯一的人造国际语。创造这新语的是波兰的一个医生柴门霍夫（Dro L.L. Zamenhof），他因为目击就地居住的俄国人、德国人、波兰人、犹太人因为语言不通时相仇杀，所以耗了数十年心血，立意要创造一种国际语文，来救世界和人类。柴门霍夫虽然不是个语言学专家，但对于欧洲各种主要语言都费过多日的研究。他所创

的新语，大体和 Volapük 相同，而能够矫正 Volapük 的许多缺点。他的单字也是大半从欧洲主要的几种国语转变而成的。文法有一部分独创的，一部分取之于欧文，一共只有 16 条，具有普通语言学知识的，一看就非常明白。因为利用接头语，接尾语，所以单字减到最少数，在柴门霍夫最初所作的字典《Universala Vortaro》里只有 2642 字，作文讲话差不多已很够用了。因此从前各种人造语文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在世界语里，却什么都解决了。便是对于世界语反对最烈的英国语言学者 Henry Sweet，他也不能不承认“世界语是一切曾经有过当中最合理而且最切于实用的语文”。^①这便是世界语能战胜一切人造语而最后生存的原因了。

我们自然不能说世界语是尽善尽美的人造语文，我们只能说他是尚在进化中的语文。世界语的组织自然也有许多缺点，就像他的音母，就不能令人十分满意。吴稚晖先生也说将来“欧母终必变化，别有一种良好之面目，拼切将来的世界语”^②。但是这个其实全没有什么干系的，因为人类文化的进展是没有止境的，如果我们要等到了有尽善尽美的国际语出现，才去宣传他，研究他，那便是到了几千百年后也是一样地办不到的。反正现在并没有比世界语更好的人造语出现，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传导世界语呢？在没有汽船的时候，难道不用帆船不成，在电灯没有发明之前，煤油灯终究是黑夜里唯一的光明，这还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还有许多人根本上反对世界语的。他们以为要使全世界人类都弃去了自幼相习的“母舌”而操一种人造的公共语言，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根据这种

20 年代译作《万国字汇》，现译作《通用词典》。——编者注

^① 见《大英百科全书》的“Esperanto”条下。

^② 《新青年》第 5 卷 496 页。

理由来反对世界语的，大概都没有把世界语的目的弄清楚。我也相信全人类语言统一的梦想，在将来，至少在最近的将来也许不会——但不是绝对的不会——有实现的希望，但是世界语的目的，也并不全在于谋这种梦想的实现，一般人对于“世界语”这名词，不免都有点误解（世界语的原文 **Esperanto** 只是说“希望者”的意思，后来日本人译作“世界语”，本不确当，我国也有人主张译作“爱世语”，但是“世界语”的名称流行已广，已成为一个专名，我不主张再加更改，但希望普通人不要照着字面误会出别的意思来就好了），以为世界语的目的是在征服世界一切国语，替代世界一切国语的。其实柴门霍夫创造 **Esperanto**，是要想把这种人造语，当作国际补助语，因为在各民族相互接触的现时代，只是一种国语不能和别的民族交换思想和情感，而一个人要学会一切民族或几种主要民族的国语，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因此就要有一种人造的公共语言来辅助国语的不及。世界语便是因此产生的。总之，柴门霍夫并没有患着夸大狂，想废灭一切国语而叫世界人类都用他个人的“私造符号”，便是各国的世界语学者也都没有这样的野心。虽然我国有人主张用世界语来代汉文，但这是另一个问题，与世界语运动的本身无涉。世界语运动不但没有想废灭汉文的意思，而且对于国语是绝对中立不加干涉的。为免除误会起见，这层实在也有说明的必要。

世界语在教育上的价值

上面把世界语的性质及历史已说得太多了，以下要把世界语的实用及其在教育上的价值再说一说。

现在有许多人都说，“世界语是很好的，但是现在我们学了没有什么用处”。说这一句话的可以分成两派，有一派是存着物质的欲望的；他们以为学会了英语，可以做刚白度或外交官，学了世界语却不能，能说几句“洋泾浜”话，不论哪里都可以混一碗吃，要是只懂得世界语，便只配饿死，这种人我们自然不必同他们讲人话。至于还有一派，他们的目的是在于求知识，他们以为学一种语文，是为了阅报看书，但是现在世界语的报纸书籍还不甚多，除了几种文学书和几册小本的杂志以外，就没有别的出版物了，那么学这种无谓的人造文字，岂不是白费脑力吗？这种人大概没有明白世界语在现时尚在草创的时代，传播的时代，譬如在国语运动发生的时候，国语的书籍报纸不也是一样的缺少吗？但我们总不能因此便说国语是没有学习的价值的。况且为求知识的目的世界语也不是全没有用处呢！所以以下我要把世界语在教育上的效用细说一说。

向来以为国际语的效用是只限于商业和国际交通上的，直到了近年，大家才都承认世界语在普通教育上也有重要的价值。因此欧洲的许多国家都把世界语正式加入学校课程，国际联盟也提出请各国将世界语加入校课的议案。把世界语加入中小学校课程的第一个目的当然是在于促成民族相互了解，打破偏狭的国家主义。法国大思想家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曾经说过：“世界语应该在欧洲各小学校里正式教授并作为必修科。要是不然，认真而又恒久的国际联合，是万难办到的。”世界语的最后目的，在于造成国际和平，这自然不错。但是除了这个目的之外，在教育的本质上世界语也自有相当的价值。大概世界语在学校教育上有三种效用：

（1）养成儿童的世界观念，在还未脱去部落思想的中国，这似乎比别

国尤为重要。虽然现在我国的教育方针，颇不易论定，但是我们应该使儿童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使他们明白人在世界的位置和对于世界的责任，总之该使他成为“世界的人”，这大概谁也不会否认吧。现在的教育制度，儿童被圈禁在生长地之内，对于世界其余部分的接触是很少的。在学校里教授世界地理，令儿童强记生硬的国名都会名，于儿童绝不发生些少的兴趣，因此他对于世界的情势，外国的政治风土都觉得非常隔膜。大概中小学校的教师教授外国地理的时候都感受同样的困难。现在如果把世界语加入课程，儿童用了世界语，就很多和世界接触的机会。便在世界的尽头，南美、埃及、澳大利亚也都有世界语报纸，可使儿童直接阅读。此外更可利用国际通信，使儿童与各国的小朋友们，时时通问，或交换书报、恩物、邮票、美丽的明信片等。这样不单在教授世界地理的时候因有实物指示容易引起儿童研读的兴趣，而且对于世界政治，国际事情也不难使儿童用心留意了。瑞士的寰球世界语会（Universala Esperanto-Asocio）专设学生部，介绍各国学校学生通信或交换书报。此外各国也有儿童的通信机关，所以学校儿童实用世界语的机会是很多的。法国著名的孟德斯鸠学校报告学生实用世界语的结果，说“有许多的儿童时时和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奥国、西伯利亚的儿童通讯，接到的各国信件，差不多比平常外交官还多”。这样看来，增进儿童的世界知识，养成国际思想，世界语实在是唯一利器，而向来固闭自守的中国更是何等地需要啊！

（2）当作学习欧语的阶梯 在这里我先带便声明一下，为了研究西方学术而学世界语，是决不至于白费脑力的，因为世界语的书报，现在虽还不多，但是学会了世界语，再去学别种欧语，却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世

世界语是从欧洲主要的几种国语采集而成的，他的单字和文法构造大多和英德法语相同，且又简单易学，所以学会了世界语再去学欧语，合计所费时间仍然相等，有时还可以更为减少。譬如学英语大概要五年才能自由阅书作文，现在如果先学会了世界语，只费得一年工夫，然后再去学英语，因为世界语的构造和英语相近，所以只消三年半或四年便可以学会，那么合计所费时间至多仍不过四年，而所学的语文却有了两种了。在未读过世界语的决不相信有这样便宜的事，而以为是“卖药者自夸其药的灵验”，但在实际上却确是如此，下节所举的几个实例可以证明，现在暂且不说。总之世界语是学习欧语的阶梯。英国剑桥大学拉丁文教授梅友（J.E.B.Mayor）曾说：“在学习外国语的第一步，像世界语那样单纯，划一，而又富丽的文字，实在很有学习的价值，所以我主张儿童应该先学世界语，然后再学法文、拉丁文、德文和希腊文。”苏格兰的总视学员施考格尔博士（Dro A. E. Scougal）也说：如果我教授古代或近代不论哪种的外国语，我——完全根据教育的理由，一定先教学生学会了世界语当作一种预备科。他又说，学会了世界语，再去学别种外国语，不但不会枉废时间，而且可以节省时间哩！英语和德、法、拉丁语尚属相近，但是英国人学别种欧语，尚且主张用了世界语来作阶梯，我国的语文和欧文差得很远，那么自然更非用这一条阶梯不可了。所以我们主张学校中先把世界语列入课程，当作教授别种外国语的准备，这才是最经济的办法呢。

（3）促成本国语文的改善 这在表面看来恍惚是荒唐的话了。但从实际上考察一下，现在我国国语的组织有许多缺点是谁也承认的，国语里的缺点不能不借用了外国语来想法弥补，这也是谁也不能否认的。现在不是有

所谓语体文欧化的要求吗？所谓语体文欧化决不是无中生有的事情，只因为在翻译外国文和传达高深思想的时候发现国语文里有许多不适用的地方，实在干不下去，所以主张尽量采取了欧语的组织来补正他。但是所谓欧化，应该采取哪一种欧文呢？英化呢，德化呢，法化呢？我们倒不如直截了当的说世界语化。因为国语的最大的缺点，是在于文法的不完备，组织的不合理，单字的不够用，而世界语却是最合于逻辑的文字，他的文法最完密，单字的变化也最丰富，所以世界语实在是我国国语的唯一补充物了。钱玄同先生从前曾主张把中国文字中向从来没有的事物都写成世界语原文，彙入国语文里去；^①我更主张把世界语的文法组织也尽量地彙和到国文里去，这就成为语体文的世界语化了。语体文欧化很难，因为欧洲国语都不易学，要叫一般人都能通一种欧语是办不到的，而不通欧语的对于欧化的语体文——至少在目前——总觉得格格不入。现在如果从小学校起都加入世界语，那么国语文的世界语化倒不会有困难了。如果学校里加入世界语，对于国语教授必有许多便利，儿童对于文法的观念可以弄得很清楚，国语里单字的解释也因为互相对照的缘故，不至于弄成含混两可。国语因此必能在无形中大大的改善了。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吗？这个问题在这里不及细说，我打算再做一篇《国语运动与世界语运动》以就正于国内学者。

各国学校加入世界语的实况

以上我已把世界语在教育上的价值说得许多了。但恐怕有些人还以为

^① 《新青年》第5卷542—3页。

这不过是些空想，不生实际的效力，所以我再把英国学校加入世界语后所得的实验成绩举出几个实例来，以供国内教育界的参考。^①

英国小学校教授世界语成绩最好的要算兰甲喜尔州（Lancashire）卜德立克洛甫（Patricroft）地方的葛林伦市立学校（Green Land Council School）。那个学校为实验的目的，在 1916-17 年的一学年内，开始把世界语加入课程，学童共有 200 名。在实行教授三个月之后，适值英国政府所派的视学员柏金生（C. L. J. M. Parkinson）前往视察，据他的视察报告如下：

“该校实行教授世界语后获得可惊的进步，经过三个月的授课之后，儿童已能非常自由非常准确地和教师及同学用世界语谈话了。他们有时也和许多外国的儿童通信。总之他们对于这语言已有了把握。不单是这样。而且他们显见得比从前更有一种难以解释的奋勉的精神。因为时时和别国的儿童通信，使他们扩大了对于人生的观念。那些儿童很想知道他们的外国朋友所居的地位和情形，因此便鼓动了研究地理学的兴趣。世界语的语根大半是从拉丁文变化成的，意义都非常准确，所以儿童学习这一种语文，和在第二级学校里学习古文有同一的效用。儿童的作文课卷中已没有拖塌不整洁的语句了。作文章法的明白清晰大有进步，这显见得是学习世界语后所得的好影响。而且儿童运用单字也颇能精密选择——能够自己去找适当的单字，而弃去不适当的。此外对于字的意义也比从前更能充分了解了……”

同校的校长散徒生（R. T. S. Santerson）发表实验所得的结果，说有两种

^① 参见 B. E. A. 出版的 Esperanto in Education

。参见 B. E. A. 出版的 Esperanto in Education

最显著的成绩：其一，使儿童能做更好的英文；其二，能增长儿童的地理知识。他说：“单从教育的意义而论，凡小学校实在应该一律用世界语来教授儿童。……教授世界语与教授拉丁文有同一的功效。”又同校的教员霍格女士（Miss E. Hogg）后来所作的实验报告说：

“经过两个月的教导后儿童便能和外国儿童通信了，现在他们还不时和美洲、澳洲、法国、荷兰、丹麦、俄国、意大利、西班牙、西伯利亚、波斯、中国，以及他国的朋友们通着书信哩。他们因了通信学得许多外国的事情——思想，情感，礼节，风俗，和一切外国的有趣的事实。”

“他们现在已能读各国文学上的模范作品的外国译本了。”

“自从学会了世界语，他们的英文程度已增进了不少。他们思想，讲话，作文都比从前更为准确：因为他们懂得怎样地修饰辞句了。他们所识的生字也比从前加多，他们能用了世界语去解释英文，字义。”

自从葛林伦市立学校教授世界语获得优良的成绩后，英国各地小学校接着把世界语加入课程，都得到满意的结果。1918年英国学务局因为要研究世界语对于教授近代语的价值，特地提出英金50镑，津贴毕旭奥兰（Bishop Auckland）的市立女子学校，充作实验的费用。实验的方法是这样：第一年先在该校开一世界语班，令一部分的儿童学习，到了第二年再令曾经学过世界语的儿童，学习一种外国语，同时令未学过世界语的儿童也学习外国语，然后看结果怎样，在教授上，学过世界语的能否比未学过世界语的更为便利。

到了1921年正月，英国教育会联合会在伦敦大学院（University College）开会，该校校长费羞博士（Dr.Alexander Fisher）报告实验所得的

结果，这一段著名的报告，曾刊载大会的正式纪录中。据他的报告里说，该校女学生入学的时候，大概尚无文法的知识，甚至不解什么是名词，所以教外国语很觉困难。但是先教了一年的世界语后，教起法文和德文来，竟是非常容易，过了两三年，便能通过剑桥大学的入学试验了。他又说：

“在这次实验中，我们把学过一年世界语的女孩子分成两班，一班教法语，一班教德语。结果学法语的一班，对于文法上的术语都能了解，法文里的否定格和联续现在格的用法本来是不大弄得清楚的，现在一经指点就完全明白了。平常儿童初学法文的时候，总是用一个助字和现在分词联起来造成联续现在格，但是学过世界语的却不会有这种错误了。他们对于动字的无定格用法也能够心领意会。……那些学德文的呢，据他们自己说，记忆单字，和学习文法上的‘位’的用法时，都仗着世界语的帮助。他们更承认无定格的用法也是从世界语里学会的。”

“在小学校里教英文法，实在不如先教世界语，因为如果有了一年的世界语程度，学英文法就很容易了。……世界语实在是教儿童怎样思考的唯一的方法呢。”

这样看来，世界语在实际教育上的三种效用——增进儿童的世界知识，辅助国语文的教授，当作学习外国语的阶梯——不是都已有了事实的证明吗？其实世界语的教育价值，差不多已经各国教育家一致承认，各国几乎都有把国际语加入学校课程的倾向，以下再把各国加入的情形略略说一说，但是只能就我个人所知的为限，此外便不能一一列举了。

法国 已有许多小学校加入世界语。去年2月巴黎总商会议决将世界语加入各商业学校做为随意科，并表示希望法国境内和在海外的各商校都

能够一律实行。

瑞士 政府决定将世界语作为全国初级学校最高年级的必修科目，从 1921-22 年的学年起开始实行。小学校教员均准其补习世界语科而由政府补助之。

芬兰 国会于 1921 年 3 月通过决议案，以 2.5 万马克津贴芬兰世界语会作为教授世界语的费用。现在国内已有数处正开始教授。

德国 1921 年初头 Chemnitz 地方学校儿童学习世界语的有 1000 人，Breslau 则有 1800 人。

意国 米兰（Milan）从 10 岁到 15 岁的儿童学习世界语的共有 25 级。

保加利亚 29 处学校内已正式加入世界语作为必修科目。

俄国 学校教授世界语的几居多数。最近消息劳农政府人民教育委员，在 Kherson、Cherepevee、Serpukhov 等省内，命各学校加入世界语科目，政府拨款 20 万卢布作为补助经费。

南斯拉夫 柴格列勃大学（Zagreb University）从去年 11 月 21 日起开办世界语专科。斯魄列德（Split）的公立僧院学校亦正式教授世界语。

此外实行把世界语加入学校课程的有荷兰、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立陶宛、巴西等国。

国际联盟的重要决议

除上面所说的各国之外，其余的国家虽然未曾把世界语加入学校课程，但这不过是时期迟早的问题罢了。世界语到了现时几乎已成为公认的国际

语文。自从上次欧洲大战，人类得了一番教训，觉得要谋国际和平，不可不先使各民族能相互了解，而各国语文的不统一，实在是民族了解的最大障碍物。所以全世界一律采用世界语，实已成为必然的趋势，几乎大家都以为非如此不可了。只看那国际联盟，是各国保守的政治家所组成的，但是去年第2次联盟大会，居然也提出采用世界语的议案，这就可以想见世界语发展的现状了。这一回国际联盟的决议关系颇为重大，所以我再把经过的情形，报告一下。^①

自从国际联盟成立以后，对于采用国际语公用语的问题曾经讨论过多次。西班牙和南美洲的代表提议用西班牙语作为国际语，而英法却又各主张用本国语来当作国际语，各国代表对于这问题都怀着自私的成见，所以竟没有结果。到了去年9月第2次国际联盟大会才提出采用世界语的议案。说也奇怪，提出这议案的，不是弱小国家的代表，而是英国南非殖民地代表薛西尔（Robert Cecil），此外副署的有日本、波斯、罗马尼亚、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哥伦比亚、中国、芬兰、阿尔巴尼亚、委内瑞拉、印度、波兰等国的代表。提案的大意是说，为谋全世界人民间直接理解的便利起见，应将国际补助语 **Esperanto** 加入各国公立学校内正式教授。这议案提出后，议场辩论非常剧烈。那时刚值第13次万国世界语大会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开会，国际联盟事务局派遣事务次长日本新渡户博士为代表赴大会参观。参观回来后新渡户氏在联盟大会提出极长的报告，略谓布拉格大会，有40国派代表参加，代表总数3000人，都能用世界语谈话演说，因此可以证明世界语已有当作国际语的价值，希望联盟大会速即通过决议

^① 参看日内瓦第2次国际问题同盟大会公报。

案，请各国政府将世界语实行加入小学校课程。新渡户博士的报告使联盟大会中的许多反对派改变主张。最后的结果，是经大会议决，委托联盟理事会先行详细调查，在今年的第 3 次国际联盟大会中，再行提出讨论。决议案的原文如下：

本问题对于世界语多数国家有重大的利害关系，所以经大会讨论一致认为有从事根本调查的必要。

本问题编入于明年第 3 次国际联盟大会讨论事项中。

国际联盟常设事务局应调查情形，作成完全而且精细的报告，供下次大会的参考。

去年联盟大会第二委员会关于国际语 Esperanto 的报告及事务次长新渡户博士代表联盟出席于世界语大会后所提出的报告均应分送于各联盟国家。

我国学校加入课程的办法

照以上情形看来，全世界采用世界语的时机，差不多早已成熟。如果今年的国际联盟大会把决议案正式通过，各国在最近时期内，便都是要把世界语加入学校课程的。我国的全国教育会却抢前一步，通过议案，把世界语正式加入师范学校课程，并以次加入于一般学校，这是何等的见识啊！我很盼望国内教育界对于这决议案立时实行，不要再犹疑观望罢！

至于把世界语加入学校课程的实际办法，应该由国内教育家共同商定，我对于教育本来没有研究，而且在这里也来不及详细讨论。现在只能把我

个人所主张的办法提出来请读者指正。

我主张把世界语作为普通学校的必修科，拟定的办法如下：

- 1、全国师范学校应立时将世界语加入课程。
- 2、全国高等小学校应将世界语作为必修科，在两年内一律实行。
- 3、在五年之内全国中等学校应将世界语加入课程。

打算把世界语加入普通学校，第一必须造成相当的师资，那么师范学校加入课程自然是入手的第一步办法了。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通过的议案也主张先从师范学校入手，不过没有把详细的办法说出来。师范学校的修业年限是五年，课程当中本来是有外国语的，现在可把外国语的教授时间减少了。第一学年专授世界语，从第二学年起除世界语外再加上一种外国语，至第四五学年完全教授外国语。在教授外国语时可以得世界语的辅助，教授世界语时，也可以得外国语的辅助，所以现在师范学校的外国语钟点不必加多，而同时可以学得两种语文，这是最经济的办法了。高等师范学校的英文科，也应该兼修世界语。此外最好能在各都市各地方，设立世界语传习所，由地方教育经费内拨支，使现任小学教员也都有补习世界语的机会。

把世界语加入普通学校课程，最好是从高等小学起，从前吴稚晖先生也曾经这样的主张的。现在高等小学本来是有外国语的，但因为钟点甚少，小学生对于艰难的英语又总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虽经过三年的授课，大概没有多大的成绩。现在如果改教世界语，因为世界语的文法简明，单字较少，且又容易引起儿童兴趣，经过三年的教导后，至少总也会得看书，作文和自由谈话了。这样不但于高等小学生的地理知识和国文作文，可以得

到许多帮助，而且因为世界语与英语的组织相近，儿童升入中学后学习英语自然也不至于感受困难了。将来我国义务教育的年限总是要扩展的。如果高等小学定为义务教育，那么将来全国男女便谁都成了 *Esperantisto* 了。世界语作为第二国语的话，到了这时不是完全实现了吗？

但全国高等小学校一律加入课程，因为缺乏师资和其他原因，恐怕在两三年内，未必能完全办到，所以我主张在最近时期内先在中学校加入课程，以期普及。等到各地高等小学一律加入后，中学校却没有加入世界语的必要了。但也不妨把世界语当作随意科，教授较深的文学作品，使那些在高等小学里学过世界语的，进中学校后有继续研究的机会。

以上是我个人的理论的主张，或者未必是切于实际的，希望全国教育家商量一下。此外世界语实行加入学校课程后，为督促和辅导计，编辑教科书，组织研究机关，发行书报等事，国内教育界和世界语学者都应该分负一部分责任，总之大家对于这事都不要放松才好呢！

1922 年 4 月 5 日于上海

——原载《教育杂志》号外，1922 年 4 月

这是 31 年以前的著作，曾载 1922 年 4 月出版的《教育杂志》号外。由于最近朋友们谈起世界语与语文教学问题，所以从北京图书馆借出旧杂志，重行打印若干份。这篇文章的有些观点，现在看来是错误的，甚至是荒唐可笑的。其中材料也不完全准确。但是世界语可以用作学习语文的工具，特别是可以帮助中国人学习外国语，这一点我现在仍然认为是正确的。为此，本文还有一点资料价值足供关心语文教学问题的同志们的参考。

1963 年 8 月 17 日

国际语的过去现在及将来

为什么要有国际语？

这个问题是很明白易解的。因为人类的社会组织的进化，总是向扩大的方向走的。

在野蛮时代人除了家族没有别的社会组织；后来由家族扩大而成部落；再由部落扩大而成国家。但是现在的国家，究竟还不是人类社会组织发达的最后止境。所以人类将来还是要再进一步，把国家的界限打破，把全世界的人类都结成一个团体。现代许多的著名学者都相信这样的人类大结合，不是不可能，而且是不久就会得实现的。英国文学家威尔士（H.G.Wells）在最近出版的《历史大纲》（*Outline of History*）里也说世界大联邦国的造成，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最高点。自从前次欧洲大战之后，种种国际的组织，像什么国际联盟呀，国际法庭呀，国际劳动局呀，和雨后春笋一般的一齐生出。可见人类不满于现在的国家组织，正在谋最后的扩大哩！

但在社会组织扩大之先，一定先得把各个分子间的思想情感联结起来才好，所以就要先有一种联结情感的工具——这就是公共的语言文字了。我们从历史上看来，人类从部落的组织变到国家的组织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创立国语。因为没有国语，便不能把散沙般的民族联结起来造成统一的国家。罗马帝国造成的时候，用拉丁语统一各处的文言，近代的德意志帝国也是先用了普鲁士语当作国语，后来才建成了大联邦国。人类现在既然要想扩大国家的组织，造成世界的大联邦国，那么自然也必得先有一种公

共语言，来替代国语，随后才能把全人类的思想情感熔为一炉，不至再有什么此疆彼界了。这种全人类通用的公共语文在现在就称作国际语（internacia lingvo）。

现代的人类，如果没有一种公共的国际语文，真是不得了！试想现在世界的交通多少便利，各民族的关系多少密切！仗着电报、电话、汽车、飞机种种神奇的发明，使各国人民天天互相接触，恍惚如同一家。但是在他方面，各民族即依旧和从前一样，各操本国的语言，各用本国的文字。在人类相互交际的时候，因为语言文字不同，往往生出许多麻烦，惹起许多误会。现代人都要耗费了大部分的生活去学习一种或两种的外国语。就像我们中国人学习一种英语要四五年，学习一种德语和法语又要四五年，此外又有俄语、意语、日语、西班牙语，以及其他 100 多种国语，你想多么麻烦！但因为要研究他国学术，要和他国人民交际，却又不能不学。如果人类不能把语言统一，那么将来交通无论怎样发达，人类还是要费许多气力去学他国语言的，在国际会议开会或在两国代表谈判的时候，还是要用那不完全的翻译的。如果永远是这样，人类才真是大笨伯呢！

但是交际不便，究竟还是小事。我们再看人类因为语言不通闹出的多少乱子。人类都是爱和平的，但是战争却为什么不能消灭呢？这多半是因为各民族思想感情不能融合的缘故，而语言不通，却是最大的原因。因为各国的语文不同，所以各民族不能互相了解，因为不能了解而生误会，因误会而生仇恨，再加了野心家的鼓动，于是国际的战祸才发作了。现在大家都知道国家主义是平和的害敌，但要是各国的语文统一，国家主义便失了立足地，人们大家都是弟兄，还会有什么战争呢？

所以如果战争是万恶的，国家主义是不可不打破的，那么，国际语的建立，真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了。其实人类语言统一的理想，决不是到现时才发生，在几百年前早就有人注意到这一个问题了。现在让我们再讲。

国际语创造的历史

用一种公共语言，来当作全世界人类交换思想的工具，这在距今二千多年前，巴比伦的先知 **Zefaniah** 早就有了这一种计划，因为古时巴比伦各民族的语言，非常纷歧，非常不便，所以非有一种公共语言不可。到了近代，人类交通发达，国际语更比从前需要万倍。如果我们能拿一种天然语——现成的国语——来当作国际公语，那自然也没有什么不好。可是一则人类的国家观念不能消灭，如果用了甲国的语文，来充作公用语，乙国和丙国可不答应，用了乙国或丙国的，甲国可不答应。二则天然语都是经过历史的变迁的，所以文法及单字不免有许多不规则的地方，学习非常困难。这样看来，可以充作国际语的自然只有人造的简单的语言。在近古的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这种理想的，就要算德国的哲学家莱本兹（**Leibnitz**）了。在 16 世纪的时候，这位大思想家，就想创出一种记号文字，用每一个记号表示一个思想，使全人类见了都能完全了解。但这不过是一个动议，他自己终究没有创造出这一种文字。在莱本兹之后，才有许多人造出了许多种的记号。1797 年有一位圣彼得堡大学的教授华尔凯（**C.H.Wolke**）创出了一种文字，恍惚和我国的电报码一般。他是把人类的思想编成号码，如 1、2、3……每个号码，就表示一个思想，各国人民只消用了本国文字编成一本号码簿，

无论哪一国人民所写的，只要在这簿上查对，就能懂得意义，这种办法自然是幼稚而且可笑得很。后来有一位筵勃仑兹男爵（Barono de Gablenz）用了欧文字母造出了一种简单的单音文字，如 **ba**、**ca**、**de**、**fo** 等。可是因为单音不易记忆，所以也不能有所成就。最有趣的，是在 1864 年有一个塞尔维亚人叫贝克（**Moses Paic**）也造了一种新文字，用数目字和加减号来表示思想，就像 3243 是说“买”， $3243+10$ 便是说买主， $3243+101$ 便是表示买主的多数。据语言学家的调查，诸如此类的人造文字在最近的 200 多年中，至少有 60 多种。这 60 多种的人造语，一半是因为结构尚欠完善，一半是因为在当时还没有人注意到国际语的问题，所以都不过是一种提议，全然没有推广和行用的能力。

真实的国际语运动，是到了 18 世纪末年才发生的。在 1880 年，有一位南德意志的牧师史莱友（**J.M. Schleyer**）创造了一种“**Volapük**”，就是“世界语”的意思，但这不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世界语。这种新语的构造法和从前一切的人造语有根本的异点，就是他是根据于天然语而不是完全创造的。**Volapük** 的语根，大半是从拉丁文和罗马语（即现在英法各国语的总称）里采取来的，不过把拼音都改作单音，就像 **Volapük** 一字便是根源于英语的 **World** 和 **Speak** 两字。他的文法，也是这样，有一半根据欧文，有一半却是创造的。这种新语出世后，起初在德国南方传授，后来又传入法国，不上十年，他的势力就遍布全世界了。1889 年第 3 次 **Volapük** 大会在巴黎开会时，全世界已有 **Volapük** 的协会 283 所，通 **Volapük** 语的据说有一百万人。但是，正合一句古话，叫做“其进锐者其退速”，自从那年以后，因为有一部分学者，要把文法修改，引起内部分裂，**Volapük** 不久便即消失，这是出

于意料的事情。但自从有 Volapük 以后，至少可以得到两种验证：第一，使全人类都采用一种国际语是可能的；第二，用一种人造语来充作国际语，实在比用任何国语，更为简单易学。

继 Volapük 之后有候补国际语的资格的，更有一种中立语（Idiom Neutral）。创造中立语的大多是从 Volapük 的信徒当中分裂出来的。这种新语的语根和文法，竟和 Volapük 差得不多，不过根据于欧语的多些，创造的分子更少些，所坏的就是有许多语根句含两种不同的意义，使用的时候，容易含糊，此外也有许多不完全的地方，所以不久也就没有人注意了。

在中立语之后，又有一种 Ido 在一时间也颇流行，不过势力不及 Volapük 和中立语那样大。到了近年，也早被淘汰了。自从 20 世纪初头到现在，经一般人所公认的国际语，却只有一种 Esperanto。Esperanto 在我国最早是译作“万国新语”，后来有译作“爱斯语”的，也有译作“世界语”的，以“世界语”的译名为最通行。近十多年来，世界语把同时的许多人造语——中立语，Volapük，Ido——的势力都一齐打破，在现时却成为唯一的公认的国际语文了。所最可注意的，就是这种最新的最有势力的人造语却是

一个眼科医生的发明

他——世界语的原始家——的名字，是叫柴门霍夫（Ludoviko Lazaro Zamenhof），在 1859 年生于俄属波兰的比亚里斯托克市（Bialystok）。在他的故乡俄属波兰一带，居民最为复杂，有奉天主教的波兰人，有奉正教和希腊教的俄罗斯人，有奉犹太教的犹太人，又有奉新教的日耳曼人。一

处地方的人，不但种族和信仰不同，就是语言也完全不通，因此时常互相仇视，互相残杀。有时为了一点细小的事情，便会闹出悲惨的流血案件。柴门霍夫是一个软心肠的人，他从小眼见了许多惨酷的民族斗争，便立意要想法补救。他想，如果能够创出一种不至损害民族主义的感情的中立语文，那么各民族互相惨杀的事情，定要减少许多了。他在学校里的時候，就立意打这一条路走去。他虽为生计所迫，不能不去学医术，但是在一方面，他却拼命地研究语言学及各种国语。在大学的时候，他开始创造一种新语，经过几次的修改，几次的尝试，才达于最后的成功。

1887 年的 7 月 26 日在波兰首都华沙出版了一本 40 页的小册子，标题是叫：*Dro Esperanto. Lingvo Internacia*。（国际语 Esperanto 博士著，）这就是世界语出世的第一声。Esperanto 是“希望者”的意思，柴门霍夫那时不愿意把真名显露，所以用了这个假名，后来学者就把这个字当作新语的名称，表示柴门霍夫创造世界语的动机是在希望人类的友爱与和平。

柴门霍夫所创造的新语，出世不久，便经许多学者承认为最完善的人造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只因为他能够采取前人所创造的各种言语的特长，而避去其所短。世界语的语根和 Volapük 相似，是从现在最通行的几种欧文里采集的。所以只要学过一种欧文的人，便可于二三个月内速成。他又创造了许多接头语，接尾语，使需要的语根大为减少。在他种国语里，所用单字至少也有五六万，而在世界语里只消熟记一二千个语根，就可以自由运用了。文法更是非常逻辑的，有规则的，而且灵活的，所以传达思想没有什么困难。总之，清晰，正确，构造敏活，而又易于学习，这是别种人造语之所不及，而也是世界语成功的主要原因了。

但是保守派的语言学者，也有拘执了语言学的迂曲的理论，来反对世界语的。自然，世界语的构造，就算十二分的完美，也未必是毫无缺陷的。因为人为的进化是无穷尽的，国际语当然也正在进化的道途中。不过在现在，世界语只有逐渐修改的余地，至于他的基础任凭是谁，也休想推翻他，因为世界语到了现在，已不只是一种理想，而成为已定的事实了。

三十五年的世界语运动

已使这人造语变为活语言活文字，和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都发生深切的关系了。在柴门霍夫初次把他的新语公表的时候，在各地所得的回响，就只是嘲笑和冷漠。但是不到几年，同志便遍布于全世界。等到 Volapük 失败以后，世界语取而代之。1905 年，第 1 次万国世界语大会在法国开会，会员有三四百人，聚处一堂，用世界语讲话演说。以后每年开国际大会一次。第 2 次在瑞士开会，第 3 次在英国开会，第 4 次在法国开会，第 5 次在西班牙开会，第 6 次在美国开会，第 7 次在比利时开会，第 8 次在奥地利开会，第 9 次又在瑞士开会，第 10 次本来定在法国巴黎开会，会员报到的有千五百人，适逢欧洲大战发生，因此停顿。在大战进行的时候，（1915 年）又在英国爱丁堡开过第 11 次大会。大战后的第 12 次大会是在荷兰海牙召开的（1920 年）。到了去年第 13 次大会又在欧洲新国捷克斯洛伐克的京城布拉格开会，这一次到会的有 6 千多人。至于各国传播世界语的机关，据战前的统计，共有 3000 多所，全世界通这一种人造语的有 500 万人。你们想，有 500 万国籍不同的人民，在口里讲着，在纸上写着，还能说他是死

文字吗？

自从世界语的势力扩大之后，各国人民的交通不知道增添了多少便利！商家可以用了向外国推广商品的销路；学问家可以用了和全世界的研究者交换知识；社会运动家可以用了向全人类宣传他们的理想和主义；劳动阶级可以用了去联结全世界的无产者；甚至于搜藏邮票和古物的，征求昆虫或花草种子的，也利用了这一种新语，去罗致全地球的珍奇。各民族从前是固闭自守，老死不相往来的，现在便是小学校的学生也得用了世界语和各国的小朋友互通信件了。不必出国门，可以同时和黄种白种黑种棕种的民族交换意见了；不必渡重洋，可以从欧洲、美洲、亚洲、非洲接到许多有趣的报告了。这种新语，不仅给我们许多物质的便利，而且也能使我们的生活，变为充实而且富裕，使我们的心胸，变为广大而又活泼。

再从文学方面看来，世界语的新闻杂志已经到处都有，世界语出版的文学著作，也不知道有多少。凡是各国著名的文学杰作，多半已有世界语的译本。从前要学一种艰难的外国语，才能阅读外国名家的著作，现在却只消学会一种简易的国际语，就有阅读全世界名著的机会，这是多少便利的事情呵！

以上所讲的，是过去的世界语运动所得的一点成绩，但是国际语在——

最近和将来的发展

却比以前更有希望得多了。在上次的欧洲大战，人类着实受了一顿教训，国家主义和褊狭的爱国主义大家已都知道是骗人的东西了，人类都知

道要使将来不至再有这样的惨祸，那便不能不先把各国民各民族联结起来，而公用语言的采用自然是第一要事。所以在大战后国际语运动有可惊的进步。在战时欧洲许多的宣传机关，因为受了军事的妨碍，不能不暂时停顿，现在却又重整旗鼓起来。就像世界语的新闻杂志，在大战前有 1000 多种，战时减少至二三十种，但在休战后不到一年，便又增至 200 多种，现在的杂志数目，虽没有准确的统计，但比战前却已有增无减。最可注目的，就是最近的世界语运动在教育方面已发生极大的影响。世界语加入学校课程有许多直接间接的效益，差不多已经各国教育家的一致承认。欧洲新国捷克斯洛伐克的首相贝奈斯 **Bénes** 对于国际语运动非常热心，在该国的公立学校里，已把世界语作为必修科，此外国有铁路的办事员，也一律要学习世界语。保加利亚、意大利、瑞士诸国现在已把世界语作为普通学校的必修科。英法德各大国，从小学校起，一直到中学校，女子学校，专门学校，也都把世界语当作随意科。去年我国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曾经议决把世界语列入师范学校课程。此外国际团体，如去年秋间在比国开会的国际协会联合世界大会，如去年夏间在瑞士开会的第 10 次产业组合国际会议，也都有同样的决议。去年国际同盟第 2 次大会，提出“以全世界人民间的直接理解的容易为目的，请将世界语加入各国公立学校实行教授”的议案，定在今年的大会里讨论。国际联盟的事务局，为供给大会讨论的资料起见，于本年 4 月在日内瓦召集各国世界语学者开一会议，结果非常满意，各国代表一致承认世界语在小学教育上的价值，且主张在各国学校内一律加入（按这一次会议我国有区声白、黄涓生二君代表到会，详细纪事可参看本期新闻栏及本年 13 号《东方杂志》）。所以将来世界语在各国的普及，差不多

已是已定的事实了。

国际语在过去和将来的情势，现在大略已都说过了。本月刊里面从这一期起已特辟“学生世界语”一栏，我很希望我们的可爱的青年读者都研究一下，好在学世界语并不是难事，平常人至多一年就够，读过英文或法文德文的更容易，只要三四个月就会得看书作文了。但对于已学过世界语或愿意学世界语的人，我却另外要说几句话，就是——

国际语的理想和主义

我们应该知道：如果世界语只是因为谋商业上交通上的便利而创造的，那么我们真不值得这样的宣传倡导了。柴门霍夫创造世界语，是含有一种神圣的使命，就是全人类的友爱的结合，和平和理想世界的实现。人类本来是联合为一体的，大家都是“人类的一分子”（homarano），但是后来却被国家的疆域所分划了，被种族的成见所割裂了，被传统的思想拘缚了，所以在现在的世界，是只有省民，国民，种民，党员而没有“人类的分子”，省和省互相排斥，国和国互相战争，种和种互相残杀，党和党互相倾轧，此外更无所谓友爱，无所谓互助，无所谓容忍，这真是可痛心的事呢！国际语是中立的，他是不属于任何势力之下的，他所要打破的就是界限，畛域，和一切的隔膜。使人都变成了人类的一分子，使人都除去一切的偏利和成见，赤裸裸的相见，使属于一切种族的人都通力合作，使现代的人都呼吸国际主义的空气，以逐渐养成未来的新生活，这是国际语运动的最后理想，就是所谓世界语主义（Esperantismo）了。深望学世界语的同志，不要忘了

这主义，更不要轻看了这最后的理想！

诸君，我们的乡土，不是还没有脱离了部落时代吗？除掉县界，省界，北洋派，南洋派，更不知道有人类，有世界；除掉残杀，仇恨，忌嫉，更不知道有正当的人的生活。而在这被咒诅的环境里，以友爱人道主义为出发点的世界语运动，实在是唯一的福音，唯一的光明啊！可敬爱的青年，要是你们是觉悟者，你们是人道主义者，快投到绿星旗下（绿星为世界语之徽帜），尽一点力吧！苦难中的人类正等待你们的解救呢！

以下再把柴门霍夫的诗的一节录下当作本篇的结束：

Forte staras muroj de miljaroj
Inter la popoloj dividitaj;
Sed dissaltos la obstinaj baroj,
Per la sankta amo disbatitaj.
Sur neŭtrala lingva fundamento,
Komprenante unu la alian,
La popoloj faros en konsento
Unu grandan rondon familian.
Nia diligenta kolegaro
En laboro paca ne laciĝos
Ĝis la bela sonĝo de l' homaro
Por eterna ben' efektiviĝos.

La Espero

千年的墙壁坚固的立着
在被分隔的民族中间；
但这顽强的障碍即将消散，
为神圣的爱所打破了。

在中立言语的基础之上，
彼此互相理解了，
各民族都同意的，
建设起一个大的家族似的团体。

我们的勤劳的同事
在平和的工作里将不厌倦，
直到那人类的美丽的梦
为[人们]的永久幸福而实现了。

——录周作人君译文

1922 年 5 月

——原载《学生杂志》，第 9 卷第 8 号

亡友胡天月传

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曾经说：“人的一生充满着痛苦和无尽期的悲哀。”哲学家叔本华也说人生是繁重的劳役。如果这话是对的，那么天月不是已脱离了苦难，卸去了生活的重担吗？我们被监禁在人生的牢狱里的未满刑期的罪犯，该怎样的替他欢喜替他祝福呢！

我们自然还不至于是厌世主义者。我们的希望还是在燃烧，我们自问对于未来的命运还有些少决战的勇气。现在却又怎样呢？天月是一个勇于奋斗的，可是后来却成为人生的战败者了；天月未尝没有明析的理知和坚定的信仰，可是也不免颓丧而死了。想不到人生是这样短促而且脆弱的！见了天月一生的悲剧，使我们不由得不失却自信力而屈服于现实势力之下了。我们未来的希望，也变成昙花泡影了。那么我们怎能自己欢喜，又怎样替天月欢喜呢！

以下所写的，是天月生平的些少的事实。天月的生平事实本就不多，我所知的自然是更少了。但天月所处的境遇，正是我们的境遇，天月一生所经历的，也正是我们的经历。前辈老先生看来诚然会说他是一个纵欲丧身的小孩子，但在多感的青年不知也能替他流一滴同情之泪不？

胡天月本名是叫胡锺育，别号最多——东方、笳声、迦身等都是。1891年生于江苏常熟城内。他的家世我不十分知道。他是两房兼祧子。

天月在十六七岁时进苏州府中学校，那时他是一个热烈的民族主义者。1911年——清宣统3年——他在苏州中学校修业完毕，那时学校的毕业文凭

里照例刊着清帝的上谕，天月考毕后声明不愿意领那刊着清帝上谕的毕业文凭，因此他不能在学校毕业。在当时就很有许多人因了这事情称他作怪人。

脱离苏州中学后，他就没有进学校去——第一是因为他的家庭生活困难，第二也是因为他不愿意受那种铸型式的学校教育的缘故。他在以后的11年中的生活，是一大串的小学教师和新闻记者的生活。出学校后在常熟淑琴女学校里，当教员，后来又当孝友高小学校的教员。1912年天月的义父沈朱轼在苏州创办《新苏州报》，招他去担任总编辑。但是不久他又回到常熟任学务委员，后来又任谢桥乡第一校的校长，虹桥乡第一校，归感乡第九校的教员。从1917年到1918年，天月住在家里，与同志蒋爱真等组织绿帜社，发刊《绿帜》杂志，传授世界语。中间并任上海及地方报的记者。到死时他还任着《常熟新报》的文艺栏编辑。

天月的文学生涯，大概是从在中学的时候起，那时他做了许多旧体诗词，可惜除在《东社集》里的三四十首之外，我都没有见过。他的旧诗全没有“遗少派”的萎靡颓唐的臭味，总之不是没有头脑的人所能做得出来的。如《赠曾泣花》的一首：

泉在山清出山浊；男儿愿死不愿辱。

前程事业大可为，与君同坐阿鼻狱！

匣剑光芒如练长，乘风须聚二年粮。

眼底世界如斗大，中有弱者中有强；

强者食兮弱者肉，竞争场里金钱逐。

人类至今太不平：东家呼号西家哭。

如今世事乱如麻，铜驼影里走龙蛇。

挽得狂澜于既倒，头颅血染自由花。

这诗虽然平常，但是一个勇壮的少年人的心胸，却活泼地写出了。他的词实比诗更好，现在也录两三首出来：

渔家傲

江上清风江水碧，年年夕照非如昔；深院思人秋水隔。秋声穹，
黄昏月落虫唧唧。 遍地飞红飞满额，雁阵咄咄衡阳笛，栖宿双双双
鸂鶒。铜龙滴，绿窗犹忆长途客。

浪淘沙

转上五更钟，醒梦惺忪；罗衾各抱恨相同。怅望蓬山多少远？一
万余重。 啾唧恼寒虫，南北西东，一天明月笼窗风。羁旅伤心凭谁
诉？剩有孤鸿？

蝶恋花（易水忆荆卿）

匕首芒寒牢里束，将军头颅，断去应难续。年少舞阳非碌碌，伤
心督亢图成幅。 易水寒兮聊击筑；壮士车中，不顾君臣哭。祖道白
衣私自祝，何人怕听阳光曲？

近两三年来天月也做了好些语体诗，而且在报纸上发表了好些论诗文的著作。他时常写信给我，说要努力于诗歌的创作，但因为境遇和年寿的关系，使他不能成就一个诗人，这是何等伤心的事啊！

1912-13 年间是国内思想改革的启蒙时期，天月也是受那时思想的影响的。他起初是无政府主义者，他发表过许多论文，反对军备，反对祖国，反对家庭，反对婚姻。1913 年（？）出版的《良心》上，曾有他的一篇《无政府主义之研究》。过后他又渐渐的坠入虚无主义的隧道中去。这个当然不是好现象。有人说，中国的虚无主义者都是颓废派，天月自然也免不了要受同样的嘲笑的，但在偏僻的常熟乡间，能够像天月那样的奋发，也总算是难得了。

如果问起天月的一生到底作出什么事情来，我便要说：他的唯一的贡献，便是在于中国的世界语运动了。所谓世界语运动的实际，本来就只是平和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运动，但在人类的部落思想还未消失，国际心理（internacia koro）还未创立之前，谁都要说这种运动是空虚而且迂远的。真在那里疯癫的干的，恐怕只有像天月那样的傻子罢了。（我有一次写信给天月说：在现在传授世界语的都是傻子。因为谁相信这些劳而无功的事情呢？但世界如果都只是聪明人，世界也将不成世界罢。）

国内的世界语运动在 1913 年以前，随着那时的启蒙思潮而起，很有隆盛的气象，过后便烟消雾灭了。一直到 1919 年，才又有些声气。这中间隔断了五六年，那时已没人说起这事了，只有天月在常熟创立绿帜社，发行《绿帜》杂志，始终如一的在那里干着。大家都在辩论“揪之好歹”而天月却

尽自“尽力挖自己的沟”^① 这样看来，说天月没有一定的理想和信仰只知盲从盲动，不是侮蔑了他吗？

对于世界语文艺的介绍，天月在中国要算是一个独创者。他把一百余篇的世界语诗歌和长短篇小说译成中文，使国内的读者都知道世界语里也有这么丰富的文艺作品；他更把现代作家——如冰心女士、落华生、叶绍钧君等——的作品，译成世界语，投稿国外文艺杂志，使国内的新文学运动也有和世界文坛接触的机会：这或者也可说是天月生平的一点小小的功绩了。

天月生平的恋爱事件很多。他也是旧式婚姻制度的被牺牲者，所以他平时对于婚姻和家族制度反对甚烈。听说在离校之后，天月就发生许多的恋爱关系。在《新苏州报》担任总编辑的时候，因为在报上发表了几首赠恋人的诗，给那女子的哥哥发觉，便向法庭起诉，后来罚了三四百元才算了事。1920年天月寄一首诗给我，题目是叫《伊自杀了》，这里面说的是一件惨酷的恋爱悲剧，天月自己也是剧中的主角。那个自杀的女子，是第四阶级的妇女，是“讲不到‘鸿毛’‘泰山’的道理”的，但是她却因为恋爱而死了！天月为了这事情，受着非常重大的刺激，他屡次写信来，说起想自杀的话。可见从那时起，他是更加颓唐的不堪了。

天月是一个酒徒。他把大部分的家产都浪费在酒里。后来终于因饮酒过度，得了肺病，但他还是拚命的喝着，他对于生命好像看得很轻的样子，这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我可不知道，总之说他是颓废就是了。

今年春间天月病转剧，他来的信说：“我的病大概是不能好的了。我有十分的热诚传播世界语，如今是只有希望在我的朋友了。”以后我去了两信，

^① 原作如此。——编者

都没有来信，大概他是不能写了。过了两三月，天月的友人文哀侬先生来信，说：“老友胡天月先生已于5月15号去世。他的病，据美医卜医生说，肺、胃、心、三个脏腑都已全坏，所以是不能医治了。”读者试想：坏了三个脏腑的死，虽然是病死，却不能说是平常的死了。

天月死后有一子一女，女10岁，子7岁，都在国民学校里念书。我和天月虽然通过三四年的信，却是从未谋面的，如今是休想见他一面了。我和他的关系不过从照片上认识他的面貌，从信札和诗文里，领略他的性情的思想，此外是一无所知。上面的事实，却有一大部分是天月的好友蒋爱真先生告我的。我觉得像天月那样的 *melancholy* 的生活，至少总也得留下些少模糊的痕迹，所以冒昧地写下了这一篇短传。唉！我辈能不深感人生之空虚，和命运之不可抗！

1922年5月3日于上海

——原载《文学旬刊》，1922年5月

Esperanto 以外的国际语方案

国际语不是一时间所产出的，国际语的理想也不是到了近代才发生的。

在几千年前就有人感觉到人类公用语文的必要，在几百年前就有人着手于公用语文的创造。但因为那时国际语创立的时机还未成熟，所以虽有了许多理想，不久也便消灭，虽有了几种方案，也不能成为事实。直到了 19 世纪的末期，柴门霍夫创出 **Esperanto**，于是才收获国际语的理想的最佳果。

但是世界语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学得从前许多失败的经验的缘故。研究国际语成功的事实，自然不可忘却失败的历史。时代离得太远的且不说，单说最近 200 年来，各国学者所提出的国际语方案，至少也有 150 种，其中拟就具体计划，而能引起一时的注意的，当有 60 种。虽然他们忽起忽落，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但因此可见历来学者对于国际语所费的研究，所耗的心力，着实是不少啊。可惜这里为篇幅所限，单就过去 10 多种的最有价值的国际语方案，略说几句，也就算了罢。

平常大概都称莱本兹 (Leibnitz) 为“世界语的理想”之父。莱本兹于 1666 年发表一篇拉丁文的论文，提议创造出一种“标记文字” (pazigrafio)， “使全地球各民族，无论采何种言语，只要学会这几个符号，就能相互了解”。莱本兹这一种理想是从研究中国文字得来的。在中国各地的方言都不相同，但用了文字却都能相互了解，不但是中国人，便是日本人、朝鲜人、安南人，也都能用汉文读书作文。莱本兹因此就想把人类的思想分成部类，另造出一种万国通用的标记文字。这一种理想，一直到这位大思想家临终的

时候，还没有抛弃。虽然莱本兹的计划并没有得到什么具体的结果，可是后来的影响却是很大。在德、法、英、西班牙、匈牙利、俄罗斯、丹麦诸国，有许多语言学者，努力着想创出一种完备的标记文字，其中最著名的是佛尔更斯（John Wilkins）、贝羞（Dro Joh. Joach. Becher）、达尔格诺（Dalgrano）、慕勒（Andreas Müller）等许多人的方案。

上面所述的各种方案，都归于失败，到了 1796 年，才有法国人薛卡特（Sicard）用法德两国文字刊印一种标记文字的新方案。他把一切的文字，思想和助动字，分作三大类，每类又分出许多小类，此外又加上许多点线及特别标号。各国人民都可用本国文字，做成一部标记文字的字典以供应用。这个方案，在标记文字的许多方案中，要算最为精密而且完备了。所坏的就只在于思想标记的门类太多，学习和记忆都觉得非常困难。

随后又有彼圣得堡大学的教授伏尔奇（C. H. Wolke）于 1797 年发明一种新字。这种新字完全是用数目字构成的。他先编成一部字典，字典里每页的字，都照着 1234.....编列号码，随后又将页数也照 1234.....编成号码。这种文字写出来时，就用页码和字码结合而成，无论何国人只消检阅字典，便知道所代表的是何事。这种文字和我国所特有的电报电码很有些相像，不便于实际应用，自然可想而知，所以徒然成为一种理论罢了。

到了 19 世纪前半，也有许多创造标记文字的专家，中间要算高勃伦兹男爵（Baron von Gablenz）的计划最值得注目。高勃伦兹从 33 种国语中，寻出最通行的字母，再从这字母造成单拼音的字，如 ba、be、bi、bo、bu 等。他的新字，在语学上是很有价值的，所缺者就是不适于实用，许多单音的字不但不便记忆，而且讲起话来，也很难听清。所以他虽著成了许多

文法和字典，可是后来终归于失败。

在高勃伦兹男爵发表他的新字的一年后，有一个塞尔维亚人，叫配茨（**Moses Paic**）的，发表一种新字，是完全用数字来代表思想的。每一个数目就表示一个字。从 10 到 999 是表示文法上的语尾变化。从 1000 起是表示各种的思想。每个字的文法上的变化，就用这字的数目和文法数目联结，中间加一十或一号而成。譬如 3243 是表示“买”字，3243+10 就是表示“买者”或“买主”；3243+13 就是表示“那个买主”；3243+101 就是表示“那几个买主”（复数）。但因为数目字形式不好看而且难于记忆，所以他又用了字母代替数目字，又用了 m 代十，n 代一，上面的“买”字写下来就变成这样：

3243+10=fegimanos（买主）

3243+20=fegimenos（女买主）

3243+40=fegimonos（买货之事）

据配茨的计算，平常应用的语文，只消学会一千个数目的标记，加以语尾变化，就可造成一万个单字，作文会话便决无困难了。这种新字在当时受许多人的赞赏。势力颇为伟大，不过他的语尾变化太多，字的定义和解释易于含混，这是一大缺点。

后来德国门兴（**München**）的大商人拔许梅耶（**Anton Bachmaier**）根据了配茨的方案，另造成一种新字，也用数目字来表示思想，不过更为简单些。拔许梅耶曾把这种新语编成 18 国语文的字典，且在门占创立标记文字的中央协会，有许多著名的语言学家都加入。德国政府也非常注意。关于这种新字的第 1 次万国大会已预定在巴黎开会，但是这种计划也归于消灭，这是什么缘故呢？第一是因为他的新语只适于纸上书写，而不适于口头谈

话。而且编成国语的字典就不很容易，这大概是失败的原因。但是拔许梅耶的新语到底是很有价值，这种语言的简单易学，为从来各种 *pazigrafio* 之冠。至少用作电报号码是很适宜的。因为不但清晰明确，而且可省电报费百分之四十。

拔许梅耶发表新语是在 1852 年，过了 28 年，南德意志的牧师史莱友 (J.M.Schleyer) 创出一种 *Volapük* 语才获得从来人造语所未能达到的成功。*Volap-ük* 所以成功的原因虽然是由于结构完密。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却是因为从前一切的人造语都是演绎的 (*a priori*)，就是完全是独创的，和自然语绝没有关系，而 *Volapk* 和以后的几种人造语——*Esperanto* 也在其内——却是归纳的 (*a posteriori*) 就是以现存的自然语为基础而建立的。演绎的人造语虽然简单合理，但于实用上总觉不大适宜，因为人类语文的进化是循自然的途径而进化的，凭空创造一种记号，以使记诵，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后来一切的人造语，都舍演绎而重归纳。*Volapük* 就是从现代拉丁系罗马系的各种语文归纳而成的，不过单字大都变成单拼音。文法也是从自然语中归纳而成，而从英德文规中采取更多，在理论上 *Volapük* 语可算是最成功的人造语了，所缺的就只是单音字太不易记忆，而且有许多字是一个字含两个意义的。因为这样，所以后来又有“中立语” (*Idiom Neutral*) 产生，根据 *Volapük* 而加以改造。“中立语”虽比 *Volapük* 略为完备，但是终不及 *Esperanto* 的切于实用，所以也归于失败。(关于 *Volapük* 及中立语的构造及历史，《新青年》凌霜君所作文及《教育杂志》学制课程号，愈之君所作“世界语在普通教育上的价值及我国学校加入课程的准备”文内论述颇详，兹不再复述。)

Esperanto 是 1887 年产生的。自从这一种最后成功的国际语产出后，同时有许多学者也提出国际语的方案，总共至少共有 50 种。这里不及一一叙述，只得把最重要的几种，列一个表如下——

1888 S. Bernhard: *Lidgua Franca Nuova*. (意大利语改造)

1888 A. Landa: *Kosmos*. (拉丁语改造)

1888 M. Henderson: *Lingua*.

1889 P. Hoinix: *Anglo-Franca*. (英法语混成)

1889 T. Stempli: *Myrana*. (拉丁语改造)

1890 A. Liptay: *Langue Catholique*.

1890 J. Lott: *Mundlingue*.

1893 F. Mill: *Antivolapük*.

1893 E. Heintzeler: *Universale*.

1894 T. Stamfi: *Communia*. (拉丁语改造)

1894 J. Braakmann: *Mundolinco*.

1895 E. Beerman: *Novilatin*.

1897 J. Puchner: *Nuove-Roman*. (西意法英语之混成)

1900 Fr. Kerschner: *Lingua Komun*.

1901 M. Henderson: *Latinese*.

1901 E. Isly: *Lingvum Islanum*.

1902 K. Frohlich: *Reform-Latin*.

1902 E. Molee: *Tutionian*. (条顿民族间共通语)

1903 Peano: *Latino Sine Flexione*.

- 1903 Molenaar: Universal (Pan-Roman) (罗马民族间共通语)
- 1904 Humler: Mundlingua. (拉丁语改造)
- 1905 Zakrzewski: Lingva International.
- 1906 Trisehen: Ekselesiora.
- 1907 Trisehen: Ulla. (英语改造)
- 1907 Baufront: Ido.
- 1907 Spitzer: Pala.
- 1907 De la Grasserie: Apolema. (希腊语改造)
- 1907 Thaut: Langue semprifié.
- 1907 Houghton: Master Language.
- 1907 Darde: Logo.
- 1910 R. de Saussure: Antido.
- 1919 R. de Saussure: Esperantido.

以上各种国际语方案中，在现时还在倡导的只有中立语 Ido 和 Esperantido。(Esperantido 是调和 Esperanto 和 Ido 而成的)但是这三种人造语，势力都和 Esperanto 差得很远。现在经过三四十年的自然发展，在全世界有 500 万的学者，有充作唯一的国际语的价值，是只有 Esperanto 罢了。

1922 年 8 月

——原载《东方杂志》，第 19 卷第 15 号

世界语通信方法

无论何种文字都要经过实用，才能学会。学世界语自然也必须实用才好。实用世界语最好的法子，是和各国同志通信，因为通信不但可以练习文字，而且可以周知各国情况和国外世界语进行的消息。至于交换画片邮票等件以供赏玩，实犹其余事。前几年有一个北欧的世界语同志和西班牙的女同志用世界语通信。两人当初未曾晤面，但后来因通信而发生恋爱，因恋爱而结婚，至今犹传为国际佳话哩。

通信可以分作数种目的：（1）交换绘画明信片；（2）长篇通信；（3）指定某种同志，通信讨论特殊事项。

第一种最简单，初学可先试行。只要购风景明信片（须印有中国风景者，此种明信片，商务印书馆及各大书店均有出售）一枚或数枚，在背面用世界语写上几句请求交换或通信的话，另外在各种世界语报上找寻同志地址（登在“**Korespondado**”栏）录就寄去。那同志如愿意交换，那一定会把他本国的风景片寄来。交换的多，可以把各国的名胜古迹都收集起来，却也是一桩有趣的玩意儿。不过交换画片，须注意下列各项：（1）自己的通信地址须缮写清楚；（2）邮票最好粘贴在印图的一面，因为外国同志大都欢喜这样的；（3）风景片如择其最足代表东方色彩者，如万里长城、天坛、运河等为最佳；（4）每片寄至欧美，须贴邮票六分。

交换明信片以后，便可试行通信。外国同志愿意和中国同志通信的很

多，因为中国是东方的古国，西方人都很注意。在初次通信的时候，可先述自己的年龄职业等，随后谈些关于世界语的以及一般的事情。信内最好附风景片、中国画片，以及其余艺术品，则彼邦同志收到必甚悦意也。

如为研究及调查的目的，则可择定某种同志而与之通信。如研究文学者可与作家，新闻记者通信。如研究工业者可与工业家通信，铁路职员可与欧美铁路人员通信，信仰社会主义者可与各国社会主义者通信。世界语杂志报章所登“Korespondado”中有时可觅得专门职业之外国同志，而以 U. E. A 的 Jarlibro 登载最多。

如欲征求各国同志通信，可在《绿光》或国外世界语杂志刊载通信广告“Korespondado”。惟一登广告以后，国外来信要求交换或通信者，必纷至沓来，势将无暇应付，如置而不复，则转失信用。故不如在杂志或年鉴中觉得合于通信之同志，与之通信，比较的好些。

除通信外，各国同志喜交换物品的也很多，如旧邮票、书籍、报纸、花草种子、画片、美术品、小件工艺品，都可以和别国同志交换，可随各人的好尚，分别选择。

总之通信是最有益而且最有趣味的事情。本篇暂止于此，从下期起我想再写出些信件范式，给初学的人做个通信的榜样。

1923 年 3 月

——原载《学生杂志》，第 10 卷第 3 号

世界语学习法

近年来栩栩复活的世界语运动，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副产物。十年前世界语在中国虽也曾经一时间的流行，可是不久便烟消雾灭了。在五六年前国内已没有人知道 **Esperanto** 这一个字，偶然有人道及，也不过说这是“无政府党”和“过激党”骗人的东西，再不然便是“无聊人所弄出的玩意儿”，谁耐烦去学他呢。不料两三年之后，有许多人都明白过来：世界语是国际平和的先锋队，是联络人类感情的利器。同时世界语的教育价值，也经确认。全国教育会居然通过师范学校加入世界语的议案了。接着国际联盟大会也通过议案，劝令各国将世界语加入学校课程。但在国内，因为专门人才缺乏，教育当局又多加漠视，所以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决议案至今未见实行。除了北京的北京大学、上海的中国公学、广州的高等师范及其他数处的中小学校将世界语正式加入课程外，大多数的学校都还未加入。各处学生虽多自动的设班研究，但因为无人指导所以学习非常困难。而且国内出版的世界语教科及自修用书太少，这也是困难的一个主因。其实世界语是最易学的文字，学习外国语自修决难成功，而世界语除了读音须口头教授，此外文法及单字，都可于短时间内自修完成，要是略读过一二年西文的，便更容易的多了。近来时常有人问及自修世界语的方法，适值《学生杂志》发刊学习法号，要求撰文，所以把我自己学习世界语的一些经验写出来，以就正于我们的 **karaj gesamideanoj**^①。

^① “亲爱的同志们”。——编者注

一 学习世界语的目的

我们要懂得某种课程的学习方法，必须先懂得学习这种课程的目的，这是一定的。学习体育的目的是锻炼身体；学习自然科的目的，是为明白自然现象，及利用自然的方法。学习世界语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扩大人生观，培养人类的爱的心情。但这是大题目，学世界语的终极目的虽然是在这一着，但除此以外，我们学世界语还有其他重要的目的，即：

（1）增进世界知识。在现在人类开放，交通频繁的时代，世界知识是非常必要的。向来幽闭在东方，不大见世面的中国人民，要免除被称为“拳匪的民族”的耻辱，对于国际事件及世界情形，实更不可不有充分的研究。学校中教授世界知识虽有地理一科，但是从地理科所得的只是些干燥无味的书本知识，单记了些面积、人口、山脉、水道，对于外国的情况未必能得真确的印象。要是学了世界语后便可和全世界四五十国的同志通信，交换报告本地的政教风俗，使从地理科所学的东西，可以得到许多实证。遇外国同志来游中国，或自己有旅行国外的机会时，更可与不论哪一国人当面接触不生困难。这样可以逐渐免除乡曲心理，培养世界观念，造成胸襟扩大想像丰富的人格。比硬记书本上的地理名字收效自然多得多了。

（2）当作研究他种学科的媒介。这在研究文艺科的为尤然。因为世界语已有丰富的文学书籍可供阅读。几乎每本世界的大文豪的杰作，每个小国的著名文家的作品，都已有了世界语的译本。学会了一种世界语，不必尽学各国语文，便能阅读各国的文学名著，这是何等的便利！至对于研究

自然科学的人，世界语关于自然科学的书籍目前自然比较的少些，但懂了世界语后可以从国外去找研究不论那种科学的学者，通信交换报告，或询问一切，不用说，这于有志研究学术的人是极有利益的了。

(3) 当作学习外国语的阶梯。这一层我在《教育杂志》学制课程号和去年本志“世界语的过去现在及未来”里已详细说过。在现在世界语还未十分普及，我们——不必是研究文学和语言学的专门家——还有学习他种重要外国语的必要，这是不必讳言的。但学习艰难的西文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世界语得到极有效的帮助。世界语是集合近代欧洲重要国语的要素而成的。所以我们学了世界语后再学外国语，可以在时间上得莫大的经济。便是已学过外国语的，再费短时间学会了世界语，同时也一定能使他所学的外国语程度大为增高。这是经过几次实验真确的事实。

二 怎样使发音准确

为要达到上述目的起见，我们学习世界语必使能得到下列的结果：

- 1、发音准确；
- 2、能通信谈话；
- 3、能自由阅读书报；
- 4、能自由作文，而不背世界语文体；
- 5、了解世界语主义及世界语运动的历史。

我们在读不论哪种外国语的时候，求发音准确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情。大概我们读了三四年的英文，几个普通字的拼音，恐怕还未必能弄清楚。

世界语可就不然。只要有人口授，便能在三四点钟内完全辨正读音，以后无论哪个单字，只须照着几条简单的拼音规则读出，便决不至错误了。但是自修世界语的人，如果没有人指导，在初步学习发音时自然不免发生困难。不过这也并不是绝对没有办法，（在自修他种外国语时，如读音无人指示，却真是绝对没有办法）。如果那个自修世界语的人曾经读过了一年半载的欧洲文字，那只消把世界语字母和他国字母的发音对照表（普通的初级读本上都有）翻开对照读着，一大半的字母便都能读出了。世界语28个字母当中，5个韵母的读法是非常简单的，无论何人都能对照读出；其余的23个声母，倒有15个和英文里的发音完全相同。其余不同的8个字母当中，c、ĉ、ĝ、ĵ、ŝ、ŭ 6个和英文里 ts、ch、j、y、sh、w 的发音相等，所以读过英文的决不难辨正。只有 ĥ、ĵ 两个声母发音略困难一点，但初学的人如无人人口授，只消把 ĥ 读成英文 h 与 k 中间的声音，把 ĵ 读成英文 sh 与 z 中间的声音，那就差得不多了。好在这两个声母在世界语里用处很少，初学读的差一点，也没有什么要紧。

完全未读过西文的人自修世界语时，于读音自然难以准确。但如果那人不能找得一个世界语学者替他矫正读音，他却不妨找一个学过英文的朋友——学过英文的人恐怕在国内到处都容易找到吧——拿出世界语读音的英文对照表，请他读出，也就可以从间接学会了。不过在这里有一件事情不可不注意：照注音字母对照表读世界语字母的发音，是不易准确的。因为世界语的发音根据于欧文，而我国单音字的发音原素究和欧文发音差得太远；所以许多世界语的读本，虽有用注音字母^① 注释读音的，但大多非常

^① 罗马注音字母。——编者注

牵强。初学如无人矫正读音，总以从西文字母对照读出，比较的更准确些。

三 怎样练习文法

但是练习读音是学习世界语最容易的一步工夫。现在国内各大都市几乎都已有Esperantisto^②的踪迹，学者如嫌自修读音不能准确，可以随便找到一个Esperantisto，请他正音，不过费却一二小时的时间，就可把读音都弄清楚，以后决不生问题了。学世界语比较烦难而更重要的一步工夫，却还是在文法上头。因为世界语的gramatiko^③虽只有16条，但是于句的结构，词类的分别，语尾的变化世界语却最为精细完密，在向无文法观念的我国人，更非用心学习不可。

据我个人的经验，学习世界语，在文法方面最应该注意的，是句的构造，就是主语、谓语、补足语的辨别等。世界语为最柔性的文字，每句中主语谓语的位置可以任意颠倒，而不失其本旨。初学要不是把句子时常分析，辨明词类方位，于读书作文时必发生许多困难。在这一点，盛国成先生所编的《自修适用世界语讲义》是最适当的。在他的书中，在讨论各种词类之先，把句的分析方法，再三解释，不嫌繁复，初学如能用了这种方法学习，后来的进步就很有把握了。

其次我们学文法时应该注意的是9个小字的用法，前置字的用法，复杂时的用法，动向格的用法等。所谓9个小字就是 io、ia、iu、ies、ie、iel、ial、iam、iom 等字，亦称为相关词。相关词为世界语构造最出色的特点之一，

^② 世界语者。——编者注

^③ 语法。——编者注

某语言学家曾叹为奇迹。这9个字的运用非常灵活奇妙，为他种语言所未有。初学不可不先把这几个字的变化及用法详加练习，因为这几个字用途是非常广大的。前置词的用法，为中国人学西文最困难的一端。好在世界语的前置词是非常逻辑的，并没有那种不合理的习惯用法，学者只要把各个前置词的异同辨别清楚就是了。复杂时的用法也极应该注意。各种语文中复杂时的构造以世界语为最完全而合理，学会了世界语的复杂时，于学他种文字的动词时一定能得到许多帮助。动向格（就是在语尾加 n）在世界语中最不易弄清楚，也是初学所应注意的一端。

四 单字的熟记

世界语所以能在极短的时期内学会，是因为单字数目较少的缘故。我们学语言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硬记生字上。而世界语因为有接头接尾语的效用，所以字典里的字数减少到极少量。世界语的字数实只有各国国语中字数的十分之一乃至数十分之一。大概只消记熟了一二千个生字，普通会话，作文，阅书已很够用了。记一二千个生字自然是极易的。不过我们同时必须把各个字义都辨别清晰。我们必须注意：在世界语里同字异义，同义异字（sinomino）的事情是绝对没有的。就是偶然有之，也是不足为法的。所以我们读生字时必须辨清这字的正确的涵义，同时更必须辨明此字与同类的字的用法的区别。例如regno, ŝtato, lando, nacio 4个字看去似乎是同一意义的，其实意义各不同，不可不分别清楚。

世界语单字以柴门霍夫手订的《万国字汇》（Universala Vortaro）为基

础。《万国字汇》里所有的字不过2600，后来因为字数不够用，经国际世界语最高机关言语委员会（Lingva Komitato）增补过数次，增入新字1000余，这些新字和《万国字汇》里所有的字都是所谓法定的（oficiala）。此外实际上行用的字大约有10000多，其中除一部分学术名词外，大多未经言语委员会正式承认，所以不足为法。这些新字能否成立还是个疑问，所以我们于会话作文时可不用则以不用为妙。

初学于接头接尾语的用法应该加意练习，原始家柴门霍夫的练习课（Ekzercaro），更不可不熟读，因为练习课里所含有的大多是练习接头接尾语用法的范句。接尾语如 ig、iĝ、ind、ul、an、um 最容易用错，不可不再三注意。有许多用接头接尾语变成的常用的字，——flugilo（翼）、propraĵo（私产）、perilo（媒介）、malbeni（咒诅）等——最好也和单字一般的——熟记，以免临时捉摸不到。

合成字在世界语虽用途很大，但却不可随意创造，除了极通用的几个合成字外以少用为妙。因为作文时如滥造合成字，不免晦涩，读者将不易明白其涵义。

五 国际文体

“国际语和一切国语相同，只有在大家划一的使用着没有参差不齐的弊病时，才能达到国际语的目的”。这是柴门霍夫在《基础文选》（Fundamenta Krestomatio）的序文里说的。划一的使用这一句话应该非常注意。世界语学者不但应该采用法定的单字，法定的文规，而且尤应该懂得法定的文体。

所谓法定文体便是国际文体（Internacia stilo）。因为如果各国的世界语学者都采用本国语文里惯用的stilo，那末结果甲国人所作的，乙国人仍难充分了解，国际语因此不免失其效用了。原始家柴门霍夫曾劝初学不可轻易发刊世界语著作，也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在初学未熟谙国际文体之先，把方言式的世界语文乱发表出去，结果不免和那些自命为英文大家所作的Chinese English，一样的闹笑话。发表“中国式的英国文”虽然可笑，但还不至有什么恶影响，至若把“中国式的世界语”发表了出去，结果不免使幼稚的世界语受其打击，国际文体不能发展。所以初学练习作文必须细心揣摩那种国际文体，使不至变为“蓝青世界语”，而在发表世界语文字的时候，更应该特别慎重才好。

怎样去学习国际文体呢？第一步自然是应该熟读《基础文选》。《基础文选》是原始家手自编定的。里边有短段故事，又有长篇论文，有文学名作，又有科学著述，有散文，又有叶韵的诗歌。其中大部分是原始家自己著译的，小部分是世界语名家所作经柴门霍夫鉴定的。初学于读毕初级读本文法后，最好便读此书。此外世界语名家如Privat、Kabe、Marie、Hankel等人的作品，也不妨尽量选读。学世界语到能谈话，通信，阅书，自然很容易，但要能用国际文体自由发表著作，那非经过两三年以上的研究，熟读数十种文学书籍，决不能有所成就。我很希望有志学习世界语的人能够努力到底。

Marie, Hankel（1844—1929），德国著名女世界语者，曾任世界语者文学协会主席，著有《爱的象征》、《沙粒》等诗、论文集，是第一位世界语女诗人。——编者注

六 世界语生活

上文所述都是从书本上学习世界语的方法。但是无论什么事情，如果不去实地练习，单研究了些书本上的知识，总是不济事的。学世界语自然也是这样。世界语是极易学的文字，但学会了如不去实用，却不能熟练。我遇见过许多人，在起初都很热心学习世界语，但对于文法及读音略有了些门径之后，便弃去了，以后和世界语竟不再发生关系。过了许多时候从前所学习过的便也都忘了。所以初学应该特别注意，时常想法去实地使用这种新学会的文字。实用是学习一切学科的最有效的方法。

但有许多人都说世界语没有地方去实用。这是因为他们不肯去用，所以找不到用的地方。其实应用世界语的地方多着呢。初学世界语的人除了有在全世界40余国出版的数百种杂志周刊以及数千种的新刊书籍可供阅读，此外随时随地都有应用世界语的机会。最方便也最有兴味的方法是和外国同志通信。学世界语三四个月后大概都能写简短的信和明信片。通信无论是为游戏的目的，或是为研求学术的目的，都是极有益的。初学读书力及修词学都可以从通信逐渐养成。此外会见来中国的外国同志，参加本地的世界语团体及宣传会，都是练习会话演说的极好机会。

世界语学者不可不对于世界语产生的历史和世界语运动的现况有过充分的研究。对于世界语运动的理论的方面，就是Esperantismo^①更应该细心研究，学者自身应该加入宣传运动，随时随地为神圣的世界语事业效力。不是这样，便不能算为完全的Esperantisto。

^① 世界语主义。——编者注

我现在再总括一下：学习世界语除从书本上练习外，更必须从事于实际的练习，就是从事于世界语生活（Esperanta vivo）。所谓世界语生活包含下列各端：——

- 1、确信世界语主义；
- 2、向群众宣传世界语；
- 3、加入国内的及国际的世界语团体；
- 4、在教育、商业、旅行及日常生活方面尽量使用世界语。

国际语运动的成就，是人类文化向上发展的一大关键，所以虽牺牲全生命以从事于此种运动也是值得的。所以不学世界语也罢，如学世界语，必须立志造成一个热心勇敢的Esperantisto！

（附录）学习世界语的初级用书：

- 1、《自修适用世界语讲义》，盛国成编，民智书局出版，定价一元五角。此书编制极完备。末附应用文范，及字典、字汇等，自修最合宜。
- 2、《自修适用世界语讲义练习题答案》，民智书局出版，定价二角。
- 3、《世界语高等新读本》，孙国璋编，商务印书馆出版，定价三角。均系短文，用中文译注，初学习过文法后，可读此册。
- 4、《世界语高等文典》，孙国璋编，商务印书馆出版，定价四角五分。作教科书用，较合宜。
- 5、《爱世语会话》，疾侵著，民智书局出版。
- 6、《世界语汉文新辞典》，无等编，民智书局出版，定价一元。内容极丰富。

7、《绿光》月刊，世界语杂志，上海敏体尼荫路双十医院内绿光社出版，每册定价六分，全年六角。内容有世界语论文、读本、文法、世界语消息等，为初学参考之所必需。

8、《爱罗先珂世界语诗文集》，近刊。

以上均系国内出版之书籍，至国外出版之世界语书籍及高级用书，种类太多，不及枚举。学者可参看《自修适用世界语讲义》附录中之书报摘要。

1923年6月5日

——原载《学生杂志》，第10卷第6号

Antaŭparolo al "La Ĝemo de Unu Soleca Animo"

Se neniu amas nin, neniu kompatas nian malbenitan popolon, la aŭtoro de La Ĝemo de Unu Soleca Animo estas nia sola fidela amiko. Kiel apostolo de la homaranismo li revis pri la libera mondo, kraĉis je la imperiista kaj militista kulturo, ploris, sopiris kaj indignis por la popolo ofendata, indultata kaj maljuste vivanta. Oni nomas lin revisto, aliaj diras ke li estas anarĥiisto, aliaj timas ke li estas 'danĝerulo'; ili ĉiuj lin malkomprenas. Li estas homaranisto, nur homaranisto.

Naskiĝinte en unu malgranda vilaĝo en Kurskaja Gubernio, Rusujo, en 1890, nia blinda samideano Vasilij Eroŝenko pasigis sian vivon grandparte en la Oriento. Li estas la tria filo de siaj malriĉaj gepatroj. Li blindiĝis de morbilo, kiam li estis infano, kaj poste li estis sendita al la blindula lernejo en Moskvo, tie ekkreskis lia genio el la studado de muziko kaj literaturo.

Elirinte el la lernejo kiel juna muzikisto, nia blinda aŭtoro vojaĝis tra la ĉefaj urboj de Eŭropa Rusujo. En 1912 S-ro Eroŝenko iris Londonon por studi en la Normala Reĝa Kolegio por Blinduloj, sed li revenis hejmen post kelkaj monatoj. Li vizitis Japanujon unuafoje en 1914. Dum la Granda Milito S-ro Eroŝenko vojaĝis Siamon, Birmon kaj Hindujon, kaj poste reiris Tokion, kie li loĝis kvar jarojn. Li vivis en la vivo de tiu lando, studis ĝian lingvon kaj literaturon kaj mem skribis per japanlingvo multajn poemojn, rakontojn, fabelojn

kaj dramojn. La orienta vivo kaj ideo impresis lin tre multe. Liaj verkaĵoj estis ekdonitaj en japanlingvo en tri libroj, el kiuj estas parte senkulpaj fabeloj por knabo kaj parte sociaj satiroj. En 1921 la japana imperia registaro elpelis lin el sia lando pretekstante ke li estas 'danĝerulo'. Poste li venis Ĉinujojn kaj instruis Esperanton en la Nacia Universitato en Pekino.

Kvankam S-ro Eroŝenko estas delonge fama verkisto en Japanujo kaj Ĉinujo, tamen tre malmultaj eŭropanoj scias lian nomon. Per tiu ĉi malgranda libro ni povus antaŭvidi ke la eleganta genio de la blinda poeto estos rekonata en la Okcidento same kiel en la Oriento.

Hujucz

Ŝanhajo, Junio 1923

附译文：

《一个孤独灵魂的呻吟》序言

如果没有人爱我们，没有人同情我们受难的人民，那么《一个孤独灵魂的呻吟》的作者就是我们唯一忠诚的朋友。作为人类一员主义的热心宣传者，他幻想自由的世界，唾弃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文化，为被侮辱的、不公平地生活着的人民而哭泣、而叹息、而愤怒。人们称他为空想主义者，有人说他是无政府主义者，有人担心他是危险分子。所有的人都不理解他。他是人类一员主义者，只是一个人类一员主义者。

我们的盲同志瓦西里·爱罗先珂于1890年出生在俄罗斯库尔斯卡县的一个小村庄里，他在东方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他是他贫穷父母的第3个儿子。他在孩童时，由于患天花而失明，后来他被送到莫斯科的盲人学校，在那里他开始展示出了学习音乐和文学的天才。

从学校出来后，我们的盲作者作为年轻音乐家游历了俄罗斯西部的主要城市。1912年，爱罗先珂先生来到伦敦皇家盲人师范学校学习，但几个月后他又返回家乡。1914年他首次访问日本。在第1次世界大战期间，爱罗先珂先生到过暹罗、缅甸和印度，后来又回到东京。在这里他居住了4年。他过日本式的生活，学习她的语言和文学，并用日文创作了许多诗歌、故事、童话和剧本。东方的生活和思想对他影响很大。用日文出版了他的3本书，其中有童话、社会讽刺诗。1921年日本帝国政府说他是“危险分子”，把他驱逐出境。后来他来到中国，在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

虽然爱罗先珂先生在日本和中国是久已闻名的作家，但许多欧洲人却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可以预见，这本小册子将使这位优秀的天才的盲诗人像在东方一样地闻名于西方。

胡愈之

1923年6月于上海

（肖平译）

*肖平，即本书编者侯志平，下同。

Ni Organizu, Kunlaboru!

La unuafojon nia samlandano estis elektita en la supera gvidada institucio: S-ron W. Kenn elektis interkonsente la K. R. kaj UEA kiel anon de la Centra Komitato, en kiu kun 5 aliaj komitatanoj S-ro Kenn gvidos la ĝeneralajn interesojn de la Esperanta movado tutmonda. Ni devas danki la instituciojn cititajn, ĉar tio ja signifas, ke ili aprobas la longtempan laboron de niaj ĉinaj samideanoj. Vere, ni devu ĝojiĝi, ke nun en nia lando nia movado jam kreskas kaj neniam mortos. Sed ankoraŭ ne estu tro optimismaj, ĉar nia ĉina esperantistaro estas ankoraŭ tiel malforta kaj senorda, ke ĝi neniel povas egali kun tio de la Eŭropaj landoj.

Ĝis nun ni havas nek la nacian asocion nek firmajn lokajn grupojn. Niaj samideanoj ĉiam kaj ĉie kuraĝe laboradas, sed neniam interorganizas kaj kunlaboras. Oni propagandas en sia propra loko kaj neniam kunligiĝas kun siaj kolegoj en aliaj lokoj. Eĉ interŝanĝadi informojn estas ofte tre malfacile. Armeo senorda kaj malbone organizita neniam venkos. En la batalo paca sencentreco kaj senorganizo almenaŭ ĝin malfortigas kaj malefikigas.

De nun la organiza demando estas tre grava, pri kio ni atendas la diskutadon de niaj samideanoj. Ni ankaŭ esperas, ke ni havos en venontaj jaroj la

K. R. 是 Konstanta Reprezentantaro de (Naciaj Societoj) 的缩写，意为“各国协会常设代表团”。——编者注

国际世界语协会。——编者注

Nacian Asocion kaj la Unuan Tutĉinuĵan Kongreson de Esperanto.

Hujucz

——原载《绿光》，第3卷第1号

附译文：

让我们组织起来，共同工作吧！

我们的同志首次在最高领导机构当选：黄尊生先生经各国协会常设代表团和国际世界语协会协商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他将和其他5位委员一起，解决全世界世界语运动中普遍关注的问题。我们应该感谢这些机构，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对中国同志的长期工作给予了认可。是的，我们应该高兴，因为在我国世界语运动已经发展起来，而且，将永远不会消亡。但是我们还不能太乐观，因为我们世界语界还这样弱小，还这样混乱，它无论如何都不能和欧洲国家的世界语运动相提并论。

至今我们既没有国家的协会，也没有坚实的地方组织。我们的同志无论何时何地都在勇敢地工作，但却从来不曾共同组织和合作。他们在各自地区努力地宣传，但却不与其他地区的同志们联系，甚至交换信息都很困难。无组织、无纪律的军队永远不会胜利。在和平的斗争中，没有核心和没有组织至少会削弱军队，使之丧失战斗力。

从现在起，组织问题至关重要，关于这一问题有待于同志们讨论。我们还希望，将来我们要建立国家协会和召开第1次全中国世界语大会。

胡愈之

——原载《绿光》，第3卷第1号

（肖平译）

《枯叶杂记》译者后记

这一篇还在著者未离上海之前所录下的，中间因为译者略有事情，所以耽搁下来，直到现在才翻译完毕，已隔了三四月之久，这对于著者和读者都觉得非常抱歉的。

在译完这篇之后，让我再说几句废话，补满这一段空白。

从他的一切著作里，可以看出盲诗人的先后一贯的思想——就是反抗的人道主义。他的人道主义是广义的，是纯粹俄国式的。对于“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同情，是极普遍的，对于一切特权制度的否定，是很大胆的，只看“非得全人类都可乘的幸福的船，我宁愿不乘”的一类的话，就是一个完全俄国式的利他主义者的告白了。

但是这位童心的诗人并不仅是一个悲观厌世醉心憧憬的人道主义者。在近代俄国艺术家中虽然不容易找出一个和他相同的，但从反抗的精神看来，他便是柯格涟科、高尔基这一流的作家了。他所心爱的英雄虽然也和陀斯妥也夫斯基的英雄一样，是被损害者，是被压迫者，但却不是病态心理者，而是有健全的勇猛的“雕的心”的人们。在他的著作中，处处充满着热烈的血，处处充满着反抗和报复的精神。有时他也是死的赞美者，也就因为死对于不平和侮辱的最后报复哩。

鲁迅先生批评爱罗先珂的作品说，他“所要叫彻人间的是无所不爱而不得所爱的悲哀”，而在我看来，盲诗人的悲哀，是在不得所爱的英雄。诗人所要找寻的是“山的英雄”，是有“雕的心”的人，而在世界上却“到处是奴隶”，

到处是“下流的奴性的动物”，这大概是这诗人的切肤的痛苦了。

《枯叶杂记》的体裁，可以说是完全独创的，在近代文学上很难找到相同的形式。从大体看来，竟可以说是长篇的散文诗，——他的别的童话体作品，也都可以当作散文诗看的。这几篇小品，虽都不过有些 *hints*，但在这里面有梦幻的憧憬，有美妙的抒情文，而最可宝贵的，便是富于刺激性的文字，这些是赐给我们的起死回生的良药呵。作者的本旨在序文里，大概已说得很明白。在六篇笔记中，第二篇是描写作者的改造理想的，他用了美妙的文字，指给我们一条平坦的道途。第三篇是很好的抒情小说，据作者自己说，这一段悲剧的故事乃是在哈尔滨的一家人家的实事。“人马”写出作者的愤懑和憎恨。那个人力车夫受尽了人类的蹂躏，但是到了死的时候，心脏碎裂的时候，从全人类所受的损害和侮辱也终于报复了。在第五篇里所听得也是反抗的声调，末了的一篇的思想，和第一篇一样的明了，更不必絮括了。

近来国内的创作界太多慈善主义的作品了，我觉得艺术家如果对于人类没有深刻的爱和憎，那么浅薄的“悲天悯人”的东西，就不做也罢。但若我们青年的心还没有停止跳跃，青年的灵魂还没有碎裂，那么这《枯叶杂记》，倒是不妨一读的啊。

译者 4月23日

——原载《东方杂志》，第19卷第6号

关于 Ĉinio 与 Ĉinujo 之我见

案 -io 和 -ujo 已经 Lingva Komitato 于去年投票表决，仍主张用 -uj 当作国名语尾，反对以 -i 代 -uj。但因为 L. K. 在实际上已等虚设，他的判断不生效力，所以近来各国世界语杂志仍旧沿用 -io（也有一二家已改用 -ujo）。而革命派反对 L. K. 更烈。他们的主张也不无理由：他们以为在“一个民族有一个国土”的理想未实现前，在民族名的后面加 -ujo 造成国名，这种办法是不可通的。例如：朝鲜是 Japanujo 的一部分，但朝鲜所住的，都是 Japano 吗？Hebreo 布满于全世界，但 Hebreujo 又在哪里？所以这个问题实不易解决。我们为忠于 Fundamento 起见，自然以用 -ujo 为是，但觉得不便时，-io 却也是不妨用的。

至于改 ĥino 或 Ĉino 为 Ĉun-Huo，这个意见我不敢赞同。ĥino 与 Ĉino 均已有国际性，Ĥ 与 Ĉ 不过音略不同，实则出于同一根源，在国际流行已久。民族名及国名本系固有名词，只求行用便利，不必追求其意义。所以德人虽自称其国曰 Deutschland，但在世界语中则不曰 Deuclando 而曰 Germanujo；芬兰人自称其国曰 Suomi，而在世界语则曰 Finnlando。从未闻德人与芬兰人提议改正，正亦因 Germanujo 与 Finnlando 均为国际惯用之名，改之则反不便也；依据同一理由，我觉得我国国名也无更改的必要。从前听说有许多日本留学生闻日人呼之曰支那人则怒，呼之曰中华人则喜，此种可笑的偏狭观念，当为吾 Esp-isto 所勿取。至 Ĉino 与 ĥino，我以为

用前者较为利便，而且亦较有国际性，不知质诸盛先生及读者以为然否。

愈之

——原载《绿光》，第3卷第1号

CIVILA MILITO EN ĤINUJO

Alia tertremego!

Alia fratbuĉado terurega!

Alia sangmakulo en historio tuthomara!

Je la 3a de septembro 1924 pafalegoj ektondris apud la Ŝanhaj-Nankina Fervojo proksime de Ŝanhajo. Komuniko ekinterrompiĝis, bomboj falis kiel pluvgutoj, bajonetoj renkontis bajonetojn, fratoj mortigis fratojn. Post du semajnoj alia batalo eksplodis en norda Ĥinujo. Preskaŭ kvarona miliono da homoj estis mobilizitaj. La batalo, kiu daŭriĝis pli ol du monatojn, estis eĉ pli terura ol la milito en suda Ĥinujo.

Dum tiu ĉi milito miloj da soldatoj kaj civilanoj perdiĝis. Milionoj da loĝantoj en militarenoj restis sen domo kaj manĝaĵo. Kadavroj kovris la kamparojn, sur kiuj greno, rizo kaj kotono estis apenaŭ rikoltitaj. Lastan someron milionoj da popolo malsatis pro la superakvego en multaj provincoj de Ĥinujo, kio decas eltiri simpatio de tuta mondo. Tamen, komparante kun la perdo de la milito, oni sentas la lastan superakvegon esti ja bagatelo.

Kies krimo? Kiu ja volas?

Ĥina popolo neniam volas militon. La Ĥinoj estas ĉiuokaze la pacifisto aŭ laŭ sia morala tradicio aŭ laŭ sia rasa karaktero. Konfucio, nia plej fama filozofo, diris ke estas kondamnindaj ĉiuj militoj en historio, ĉu atakmilito ĉu

defendmilito. Jen estas la Ĥina proverbo: "Bona fero neniam fariĝos najlo, kaj nenia bona viro fariĝos soldato." La Ĥinoj ĉiam rigardas militiston kiel personon malhonoran kaj sentaŭgan, malgraŭ ke ili ankaŭ admiras bravecon kaj adoras heroon, kiu sinoferas por komuna bono.

Sed jen estas la alia afero deposed la malfermiĝo de Ĥinujo. Kiel la okcidenta industriismo kaj scienco transiris al Ĥinujo iom post iom, tiel la eŭropa militismo baldaŭ sekvis sen ia ajn kontraŭstaro. La Ĥinaj militistoj, kies titoloj ne plu estas "Caroj" aŭ "Kaiseroj", sed estas "Tuĉunoj", per la mono liverita de fremdaj registaroj, per armilo kaj municio fabrikita en okcidentaj fabrikoj, sub la gvidado de eŭropaj aŭ amerikaj oficiroj, komencas interbatali kaj interbataladi por akiri siajn personajn dignon kaj riĉecon.

Tiuj, kiuj vizitas la batalkampojn de nuna milito, ŝajne sin trovas en la ruinigita kampo de Marne aŭ Somme. La lasta civila milito en Ĥinujo estas ja la terurega reflektado de la Monda Milito 1914-18a. Preskaŭ ĉiuj fieraj bataliloj elpensitaj dum la Monda Milito estis uzitaj en la lasta interna konflikto. Maŝinpafilo, damdambombo (达姆弹——编者注), pafilego kun la plej larĝa diametro, elektra reto, armaŭtomobilo k.a., per kiuj la eŭropaj militistoj forbuĉadis siajn samrasanojn, estis de nun sperte uzataj de la Ĥinaj militistoj por la sama celo. Oni diras, ke dum la lasta interna milito la unuan fojon la Ĥinoj batalas per la plej modernaj armiloj kaj laŭ la plej scienca taktiko. Se la scienco kaj moderna civilizacio estas por detrui la amon kaj feliĉon de popolo, estu malbenataj ili!

La regantoj de eŭropaj kaj amerikaj nacioj ĉiam anoncas ke ili neniam volas almeti al internaj aferoj de Ĥina Respubliko. En Waŝintona Konferenco ili ja subskribis sur la traktato por malpermesi transporton de armilo al Ĥinujo. Bedaŭrinde ili forgesis tro frue. La prusismo, carismo, imperiismo kaj reakciismo, kiuj en Eŭropo jam estis renversitaj de la popola revolucio, de nun komencas transplantigi al oriento. Tio estas la ĉefa kaŭzo de la nuna maltrankvileco en Ĥinujo.

La militismo estas la plej danĝera malamiko de homaro, miloble pli danĝera ol ĥolero aŭ pesto. Estas kredita, ke oni povas venki la infektajn malsanojn nur per kunlaborado de la internaciaj sciencistoj. Do, la homaro neniam estus savita, se ne kunligiĝus ĉiuj popoloj, ĉiuj gentoj en unu grandan rondon familian por batali fratbuĉantan militismon tutmondan. Post la katastrofo la popolo ekvekiĝos kaj ekkonscios pri sia destino. Jam proksimiĝas la nova tempo! Almenaŭ laŭ la vidpunkto de esperantismo, ni ne devu malesperiĝi.

Hujucz

——原载《绿光》，第3卷第4号

附译文：

国内战争在中国

又一次大地震！

又一次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人类历史上又一次斑斑血迹！

1924年9月3日，在上海附近的沪宁铁路旁响起了大炮声。通讯中断了，炸弹像雨点般地落下来，刺刀对着刺刀，兄弟残杀兄弟。两周后，另一场战斗在中国北方打响了。约25万人被动员起来了。这次战斗比中国南方的战斗更残酷，持续了2个多月。

这场战争夺走了数千名士兵和平民的生命。战区内数百万居民没有房住，没有粮食吃。田野的谷物、水稻、棉花还没有收割，却铺满了尸体。去年夏天中国许多省份发生水灾，数百万人民挨饿，理应引起全世界的同情。然而与这次战争的损失相比，去年水灾就算不了什么了。

谁的罪过？谁愿意这样？

中国人民从来就不要战争。无论是从道德传统或种族特点来讲，中国人都是和平主义者。中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孔子曾说过，历史上的一切战争，不管是攻的，还是守的，都应受到谴责。正如中国有句谚语所说：“好铁不打钉，好男儿不当兵。”中国人一贯把当兵打仗的看作是不光彩的、无用的人，尽管他们也赞美英勇的精神，崇尚那些为公共利益而献身的英雄。

但是在中国开放以后，出现了另一种的情况。正如西方的工业和科学逐渐传入了中国一样，欧洲的军阀也很快地随之而入，而且未受到任何反抗。中国的军阀不再冠以“皇帝”、“君主”名称，而是“督军”。他们用外国政府提供的钱、西方工厂制造的武器和军火，在欧美军官的指挥下，为了获得个人的尊严和富有，开始了自相残杀。

那些参观现代战争战场的人，犹如置身于马恩河或索姆河被破坏的田

原文的意思是“沙皇”，“凯撒大帝”，这里是根据上下文的意思转译的。——译者注

野。中国最近一次内战正是1914至1918年世界大战最可怕的反映。在最近一次的内部冲突中，世界大战时发明的所有值得自豪的武器几乎都用上了。机关枪、炸弹、大口径大炮、电网、军车等——欧洲的军人曾用这些武器屠杀自己的同胞——从现在起中国的军阀，为了同一目的，已经熟练地使用它们了。据说，在最近的一次内战中，中国人第1次用最现代的武器，最科学的战术打仗。如果这些科学和现代文明被用来摧毁人民的爱和幸福，那么就让它们受到诅咒吧！

欧美各国政府一贯宣称，他们永远不想干预中华民国的内政。在华盛顿会议上，他们签署了禁止向中国运输武器的协议。遗憾的是，他们这么快就忘记了。普鲁士主义、沙皇主义、帝国主义和复古主义在欧洲已经被人民革命推翻了，而现在却开始传入了东方。这是现在中国不安定的主要原因。

军国主义是人类最危险的敌人，它比霍乱和鼠疫还要危险一千倍。只要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合作，相信人们能够战胜传染病。如果各国人民、各民族不组成一个大家庭般的团体来同兄弟间相残杀的世界军国主义进行斗争，那么人类永远不会得救。这次灾难过后，人民将会觉醒，将会意识到自己的命运。新时期已经到来。至少根据世界语主义的观点，我们不应该失望。

胡愈之

——原载《绿光》，第3卷第4号

（肖平译）

五卅事件与世界语界

五卅事件发生后，上海方面的世界语同志开会商议，大家都以为世界语主义对于一切政治活动，虽主张绝对中立，不加干涉，但此次英捕惨杀市民，实为人道上之一大污点，与平常政治事件性质不同。世界语学者虽反对侵略的国家主义，但对于民族自身的地位被侵害时，亦应起而奋呼。开会的结果，议决拟一抗议书，由上海各世界语团体（上海世界语学会，东方世界语传播社，绿光编辑部，U.E.A 上海会员，SAT 上海会员，大华公学世界语班）署名，分致国际联盟，各国世界语会，各国世界语杂志报章，详述此次南京路惨杀的真相，及事变发生的原因，此项抗议书原文载东方杂志五卅事件临时增刊内，在此处不复复载。

此抗议书于 6 月初分寄各国，欧洲及日本同志多将原文译成本国文，在各本国的报纸上发表。SAT 的机关报 *Sennaciulo* 除登载原文外，又刊载了许多关于五卅事件的文字。大多表同情于我国的民众运动。此外上海世界语学会接得的各国世界语同志对于抗议书的覆书，共有十余起，大多对于此次事变表示十二分的同情，现在把最重要的几封覆信，摘录内容如下：

1、瑞典工人世界语会会长 **Adamson** 君来信，说已把抗议书译登瑞典报纸，且尽力向该本国人宣传。他是瑞典几家报纸的主笔，极愿和中国同志通信，最后并祝中国人民得从帝国主义解放成功。他的地址是 **S-ro Einar Adamson, Sveda Laborista Esperanta Asocio, Goteberg I, Svedio**。国内同志可直接寄信与他。

2、瑞士 Herisan 地方 U. E. A 副代理员 Hermann Metter 君来信大旨说：我把你们的抗议书细读了一遍，而且在此间世界语会中，当众宣布，不但我读了印象很深，就是我以外的人也都非常惊怖。.....在我们本国，所得关于中国的消息，都是从英国电报社传来，把这次北京、汉口、天津、上海的骚扰事件，都归之赤化，说是俄国在暗中鼓动，因俄国在欧洲方面煽动世界革命不成，所以又在中国煽动。我们却相信你们的报告是真实的，从英国传来的消息全是说谎。但是别的国家以及国际联盟何以竟默不作声呢？他们是不敢。大国作错了事，便没人敢来说一句公道话。这真是糟糕！我们的力量只能抗议，当竭尽我们的能力来抗议。我想你们最好是用了世界语使全世界知道那大国的荒谬行为，欧洲人对于中国，常被一种虚伪的报告所蛊惑，使他们明白真相，实是必要的。因此我极愿意依照你们的请求，把你们的抗议译成德文，载入本国报纸。最后，我敢代表此间的世界语同志对于这次惨杀案提出抗议，对于你们表示十分的同情。我以为诚如你们的抗议书中所说，英人是没有理由可以解辩的了。

3、日本，东京 Jukio Ueda 来信说：.....读到你们的抗议书，我实不禁愤激流泪，愈想当时的情景，我的愤怒愈不能遏制。中国人实是真正的人类一分子主义者，是真正的大同主义者，中国人的习性，反对一切的国界人种的制限，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许多人所公认的。因此我平常极崇拜中国人。但现在是什么世界呢？强权就是公理，弱者无所谓正义。.....在真理正义下面，我们应得联合才好啊！

4、日本北海道世界语会接得抗议书后由 Tagami 君寄来覆书，说他们对于五卅事变表示惋惜，极赞成我们的抗议，并视我国人努力抗争，俾贯

彻世界主义之最后理想，使人类同处于平等友爱之地位。

5、日本京都大本教的世界语宣传部亦来一信说：……我们不仅仇恨英国巡捕与日本厂主，我们更以为我们应反对一切的暴力与利己主义。警察和资本家都不是十分坏的，只要他们能信仰人类爱主义。但我们见了这次事变，却不能不表惋惜。警察的职务本在保护生命财产，资本家本以替人类生产为其天责，乃竟为利己欲所驱使，而有此暴横的行为，其罪实不能饶恕。因此我们亦不能不表示彻底的抗议。

6、德国 Breur 君来信，除对于此次事变表示十分同情外，又劝我们用消极方法抵制，坚持到底，必可得最后胜利，他希望我们用世界语宣传，使欧洲人明白中国的真实情形。

此外接得的覆信还多，措辞大率如上述，现在不及一一备载。总之从这次事件我们有两种感想：（1）五卅惨杀一事，在世界语界（Esperantujo），已引起了普遍的同情，可见公道自在人心。（2）爱国运动必须注意对外宣传，而对外宣传不可忘了一件紧要的工具——世界语！

化鲁

——原载《绿光》，第4卷第1号

告国语运动者

热心于国语运动的诸君！我在这里想和诸君说几句诚恳的话。这几年来，每次我遇到研究国语的朋友，都说了这样的话。现在我对于我的数年来主张，更加坚信，觉得有再三申说的必要。希望读者郑重地读了这一篇！

我的意思是希望从事国语运动的诸君，把世界语这一个问题细细地考虑一下！或者有许多人要以为国语和世界语是牛头不对马面的，是不必牵连在一起的。甚至又有人以为世界语运动是反对国语运动的，世界语与国语如水火之不相容。但凡是明白事理的人，或者略知道世界语的历史的人，大概总不至于有这种绝大的误会罢。因为你要不是耳聋眼花的，你一定听到过世界语学者曾经再三申说：“Esperanto 的创造人，并没有想把世界语来替代一切的国语。”他的目的不过想用 Esperanto 来当作一种国际补助语，以补国语之所不及，至于各民族所因有的国语，不但不应破坏，而且更应绝对尊重。语言与民族个性及传统历史有深切的关系，所以有特殊文化的民族，必须有特殊的语文。但两个语文不同的民族互相交际的时候，则必须用一种共通的国际语。虽然也有人主张世界语可以当作中国国语，但我们要看清楚，这不过是少数人的理想，（主张的对不对，还在其次）决不是世界语运动者的全体的主张。正统的世界语运动者只承认世界语是一种补助语，是补助国语的，决不是想代替国语或并吞国语的。

这种浅近的道理，凡是从事国语运动的人们，大概都能明白，不必再

来详细的剖辩。世界语运动与国语运动，中间并无冲突，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我所要说的，并不是这个问题。我所要说的是世界语对于中国国语的本身有极大的效用，这一层为向来热心于国语运动的人们所不曾觉察，所以我要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

我的意思是说，把世界语本身的效用丢开不说，对于国语本身，世界语也是极大的帮手，单为中国国语的发展计，也有提倡世界语的必要。这话似乎有许多人要以为过于夸张，但我却非常坚信，以为是十分诚实，决不帶一点宣传色彩的。我十二分地相信世界语对于中国国语有两大功用——

(1) 世界语足以辅助中国国语的进化；

(2) 世界语足以保持中国国语的独立。

怎么说世界语足以辅助中国国语的进化呢？这一节恐怕向没有人注意到。我久想对于这层有详细的发挥，贡献给热心国语运动的人们，可惜在这里篇幅太少，只能说一个大概。凡热心于这个问题的，我很欢迎他们和我通信讨论。

大凡研究国语的人，都知道国语运动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竭力谋国语普及于全民众，一方面是谋国语本身的改良与充实。关于前者已得到一部分的成功，关于后者成效还是很少。因为我国国语的，就目前的情形而论，基础究竟太嫌简陋。至少只能成为口语至国语文则实际上还在草创时代。我国国语至少有三大缺点：（1）非拼音字；（2）字义不确定；（3）文法太不精密。第一个缺点，已因注音字母运动而获得解决了，至于第二第三个缺点却依旧存在着。就第二个缺点而论，我国国语的单字感受两种苦痛：一、太缺少，尤其是科学名词在国语中不够用；二、同字异义，同义异字

太多，字义极易混同，在学习时最感困难。就第三缺点而论，中国语文语法的分化太简单，句的组织不完备。西洋语法学的讲求，已有二三千年的历史，所以分化非常完密，我国国语，向来不曾有过语法的研究，因此不免相形见绌。我国用国语表情达意，常觉不如西洋语文的称职，凡是稍有语言学知识的恐怕都承认罢。实际上中国语是最硬性最单纯的语言，不适于表现精深的思想情感，这是难以讳饰的。但是我不敢菲薄中国国语，我的意思不过是说，中国国语就现在的情形，却有待于改善，有待于进化。

怎样改善国语，怎样使国语进化呢？那不单是采用注音字母，统一全国读音，就算了事。那不过是解决了一部分的问题，还有重要的部分。——怎样使国语的内容丰富，怎样使国语的组织精密，怎样使国语的分化完备。——这些问题都不曾得到解决。现在的国语运动者虽努力想解决这些问题，但可以说还没有找得一条进行的道路。但我敢大胆的说一句：“在你们的眼前，就放着一条大路——世界语可以辅助并促成国语的进化。”

第一点，我们就单字方面而论，国语文缺乏科学用的单语，许多人就主张用世界语中的单语来补充，像钱玄同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个，因为 *Esperanto* 的单字都具有国际性的，尤其是科学名词，与现代几种主要国语里所用的大都相同，所以我们拿世界语中的单语来补充国语，实比勉强的音译和胡闹的意译都强的多。此外因世界语的造语法比各种语言更为准确巧妙，所以学过了世界语后，对于国语的用字法也更加容易明白。据英国小学校教授世界语的结果报告，凡儿童学过世界语的，英文作文时用字便格外切当，在这方面世界语有与拉丁文同等的效用。向来英国小学校中必须教授拉丁文，就因为可以使学生明白字源，并懂得字的用法，和我国学

校教授说文古文一样，但现在发现世界语有同样的效用。而学拉丁文比学世界语，所费时间却要相差好多倍，因此英国许多学校都已把世界语来替代拉丁文了。

其次中国国语的大缺点，是文法结构的过于单纯，因此不易表现高深的理论。为补救此种缺点起见，一般人主张国语文欧化。国语文欧化的意思就是在国语中尽量容纳欧文的语法，使语言的调子更加变化错综，语法的欧化是国语进化的必经的阶段，已为一般人公认的事实。但欧化必先使一般人都具欧洲语文的一点粗浅知识，然后能够运用自如，否则必不免于“欧而不化”，近来一般人都以欧化的国语为艰涩不易索解，就因为一般人都缺乏欧文的知识的缘故。但要使一般人都学过欧洲语言，那是很难的，因为欧文中，最易学的要算英文，而英文非三四年的时间不易入门，在事实上是断难使一般人都学英语。现在有了世界语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世界语是从现代各种欧语的结晶体，它的语法最完密而又最合理，中国语是最硬性的语言，而世界语却是最软性的语言。不但如此，世界语只消有一年不断的练习，就能完全学会，在高级小学两年的时期中，就能完全教会世界语。所以世界语的普及于一般人是极可能的。世界语普及后，一般人对于欧文的语法，都有了根底，那时国语文的欧化，再不会有什么困难。那时国语的语法结构，自然也容易走上进化的道途了。

所以世界语足以补充国语，使其内容更加丰富，使其结构更加繁复，使其应用更加软性，使其日益进化，与一切的近代语处同等地位，而不致成为语言的前任者。所以凡是拥护国语运动的，主张国语进化的，实有竭力拥护世界语的必要。不过上面的两个理由，系关于语言学的，不是这一

短篇所能说明，在这里不及一一举例伸说。但读者只要亲自试验一下，把世界语研究一下，就会相信上面的话不是毫无根据。

现在再讲世界语足以保持中国国语的独立。

凡是中国人，有一大半都是拥护中国国语，尊崇中国国语的。国语的尊严与民族本身的地位相关，只有屈辱的民族，他们的国语才受人轻蔑，现代各小民族独立后，如爱尔兰，捷克斯洛伐克，芬兰，立陶宛等都恢复其本来的国语，就是这个意思。中国在名义上还算是个独立国家，但中国国语是独立的不是呢？这个就很怀疑。从处处地方，尤其是在通商口岸，我们都可以看出英语的势力有压倒国语之势。在教会学校中学生可不念国语，而英语则非念不可，在中学大学用的教本大多是英文的，时髦的教师更必须用英语讲解。在一般社会，不会讲国语，不算是一件可耻的事，不会说英语，那就不容易骗一碗饭吃了。在上海的中国法庭中，法官用英语问话，律师用英语辩护，更不待说。在上海马路上打架，捉到巡捕房里去，哪方面能讲流利的英语，哪方面就占了便宜，则又是谁都知道的事实。华洋商业习惯，一切契约都以英文本为准，外交条约亦然。所以从这些看来，中国的国语早已失去了独立的地位，被英语征服了。

抱国家主义的见解的人们，应该知道这是我们民族的一大耻辱，因为没有一个人独立国家的国语，是屈辱到这步田地的。从事国语运动的人们，更应该知道这是国语前途的一个重大问题，因为国语运动不单是使国语普及而已，还有保护国语尊严的必要。总之为维持民族尊严起见，我们必须筑一道防御线，以免国语受外国语的缦云。这防御线我以为就是世界语。

因为我们要保护国语的独立，在事实上有许多困难。在这 20 世纪的新

时代，我们断不能闭关自守不和“蛮夷”交口，不和“蛮夷”通信。中外的交际是万难避免的，而在这当儿，就发生一个问题，中外人交际的时候，用国语呢，用外国语呢？在我国国境内，如用外国语来做商业政治的正式用语，那便是对于我国国语所加的一种侮辱，我们当然是不愿的。但如处处用国语，那又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外国人学习中国国语要比中国人学习外国语艰难的多，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我们不能强人所难，又况我们是个弱国，所以结果我们的国语，不由的不处于屈辱的地位了。但要是世界语普及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世界语是国际公用的文字，谁也不能据为私有。世界语不但比中国语易学，而且比一切的国语都易学，所以我们和外国人交际时用这种公语，即不伤失任何方面的体面，又不是强人所难。世界语普及全世界的时候，强国语言征服弱国语言的事实就不致发生，那时国语才获得真正的独立。我说世界语是保护国语独立的防御线，就是这个意思。

根据上面的两大理由，我相信国语运动与世界语运动，两者是互相依赖的。中国国语运动的最后胜利，中国国语的进化与独立，都必在世界语普及以后。所以我希望国语运动者不可忽略了世界语运动。在这一篇里我所已说的话不过是我所要说的话的千百分之一。我希望国语运动者继起和我讨论。至少我希望大家对于我所提出的问题得切地注意一下。这问题的意义在我以为是决不细小。无论赞成的与反对的，我都极愿倾听读者的意见！

——原载《绿光》，第4卷第2号

世界语普及概况

“世界语在世界各国已经通行了吗？”这是现在许多人怀疑的问题。我们现在把全世界各国世界语发达的概况，分别叙述如下：由此可以明白 **Esperanto** 已成现代文化中的一个要素，各国都已把它当作国语以外的第二种主要文字了。

现在凡是开明国家的国民，大概都有许多人能用世界语读书、作文、谈话，并且用它当作国际间的通用语文。除以下列举的公立学校以外，全地球各处的私立学校及私人开班教授世界语的，多至不可胜数。除了中国以外，各国几乎都有一个全国世界语学会，各城镇都市都有分会支会互相联络。此种世界语团体，都刊有世界语报章杂志，或全用世界语，或用本国文及世界语合刊。此外全世界最大的世界语团体要算 **Universala Esperanto-Asocio**，即寰球世界语学会，在全世界各地都设有代理员，其性质与各国政府所派的公使领事同，专代会员调查报告及招待各国旅客。各国的世界语同志，每年在各国大都市轮流举行万国大会，此系国际间世界语运动的概况，本报已经屡有记述，现在再分述世界语在各国普及的情形（次序系照各国国名字母之先后）：

英国 学校中多有教授世界语。**Lancashire** 之 **Eccles** 公立小学经实地考验后，承认世界语在教育上之公效，现已作为必修科目。目前正式将世界语列入科程者有公立初级学校 12 所，高级学校 3 所，此外私立学校不计其数。**Burnley**、**Bath**、**Plymouth** 商会已决议采用世界语为国际商业用语。伦敦总商会举行世界语考试，合格给予证书。英国商店公司均用世界语与国外通信，如著名全世界之通济隆旅行公司亦采用世界语。又无线电台亦多用世界语放音。

澳大利亚 澳洲各大城镇均有世界语团体。新金山之两无线电台常用世界语传播新闻及演说。

奥国 全国高等工商学校四所均已正式教授世界语。奥京维也纳亦有警察及铁路人员之世界语班，学者甚多。市教育会承认世界语为学校中之正式科目，并设立委员会考试市立学校之世界语教员。维也纳无线电台放声教授无线电，每星期二次。维也纳国际定期市场用世界语公布市况及通告等。

比利时 王太子 Leopold 为比国世界语会之保护人，Verviers 各初级小学及 Antwerpen 之夜学校均教世界语。又 Antwerpen 之金刚石工人及汽车厂工人均组有世界语团体，警察亦有世界语团体之设立。Ghent 之商业市场亦用世界语交易。

巴西 京城 Rio de Janiero 地方各初高级小学校均以世界语为选修科，在 Sergipe 州师范大学及初级学校工艺学校则均列为必修科。巴西国会承认世界语会为公益机关。全国电局已通用世界语。1922 年交通部令全国邮局将已通世界语之邮员列表呈报。巴西各界要人 225 人，联名呈请国际联盟采用世界语，呈文署名者有前大总统、内阁阁员、参众议员、文学会员、科学及医学会员、大学主任、教授、校长、地理学及医学会会长、总商会会长及其他著名文学家著作家。

保加利亚 世界语在该国传播极广，全国一百余大城均有世界语同志。数年前有美国商会代表列游保国各大城，用世界语演说。最近颁布之教育规程内有一修列世界语为公立学校课程之一。全国高级学校四百所，及沙菲业工科大学，陆军大学均已正式教授世界语。第 4 次全国世界语大会曾由政府拨款补助。最近出版之保加利亚文学名著选辑，系用世界语刊印。

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为战后之新国，世界语运动尤甚发展。教育部通令各校列世界语为选修科，并由政府考试世界语教师。全国初高级小学校、职业学校、商业学校均已加入世界语。历届万国世界语大会，捷克政府均派代表列席。国务总理俾尼斯博士正式宣称，谓政府承认世界语为文化要素。邮务及铁路人员之谙习世界语者，政府特加优奖。各处之国际商场用世界语通信及交易。商业部用世界语印成广告吸引各国游客。Kbely 无线电

站则放声教授世界语。至该国出版之世界语书籍课本，尤不胜数。

但泽 此为战前德国领土，现改为自由市，由国际联盟管理。其地面积虽小，世界语亦颇发达。高等商业学校及高级小学均教授世界语。又警官学校中亦有世界语班。警察之谙世界语者，经考试合格后，得在制服上加佩绿星章。各地国际商场亦用世界语。

丹麦 全国许多大城市，均有世界语团体及世界语班。**Odense** 的商业学校教授世界语。**Elsinore** 之国际平民大学将世界语列为课程之一。哥本海琴无线电台每星期一次放音教授半小时的世界语科。

爱沙尼亚 在此波罗的海岸之小国中，世界语亦甚为普及，而尤以在劳动界及教育界为尤然。**Reval** 之初级小学及夜学，又 **Dorpat** 大学均教世界语。爱沙尼亚文学名著多有世界语译本。

芬兰 数年前芬兰国会通过拨款补助该国世界语会之常年办事费。第 14 次万国大会在京城 **Helsinki** 开会。该地国际商场亦用世界语通信及散布广告。

法国 巴黎总商会于 1921 年派员考查世界语在商业上之实际效用，结果决议将世界语加入法国各商业学校，并劝告各国商会一律照办。内地商会 30 所及在伦敦之法商会亦有同样之决议。法国学士会会员 36 人联名赞助世界语，认为国际科学用语，并要求加入工科学校。法国著名科学家赞助世界语者尤多。法国世界语促进会之名誉会员多为政治学术界名人，如现总理班乐卫、内阁阁员、巴黎大学教授等。最近巴黎举行世界语万国商业科学会议，国务总理及商业总长均派代表列席。政府已承认世界语为国内电报之明码文字。法国两无线电台每星期放送世界语教课。

德国 德国政府拨款设立国立世界语学院，并由教育部会同举行世界语考试。全国学校儿童之学习世界语者当达数万人。全国大无线电台，均定期教授世界语。各大国际商场皆已采用世界语。《柏林日报》（德国著名大报纸）常年披露关于世界语之文字，且预备出一世界语星期增刊。利俾瑟大书肆 **Ferdinand Hirt & Sohn** 公司特设世界语部，发行世界语书籍杂志甚多。在德国出版之世界语定期刊物，最大者为《**Heroldo de Esperanto**》，

《世界语先驱报》，国际世界语运动报道性刊物。1920 年创刊。目前仍坚持出版。——编者注

每周出版二次，销行全世界各国。

西班牙 西班牙王亚尔丰琐极同情于世界语，曾为万国世界语大会之名誉会长。巴色洛尼及佛朗西亚大学均教授世界语。京城马德里之警官学校亦教授世界语。加塔洛尼省人民常用世界语刊印书报，介绍加塔洛尼固有之文化于全世界，以谋其民族之独立。巴色洛尼及佛朗西国际商场均已采用世界语。

荷兰 京城及 **Bergen op Zoom** 之公立学校中均已教授世界语，海牙女子学校则定世界语为必修科。政府鼓励警察及邮员学世界语。海牙街车夫之学会世界语者可领奖金。历届万国大会荷兰政府均派正式代表。从事世界语运动者以天主教徒为多。天主教设立之学校均授世界语。

匈牙利 教育部下令正式许可学校教授世界语。商部亦表示赞助世界语。外交部用世界语发刊小册子，报告匈国之经济状况。匈京国际市场及信用放款银行，均用世界语通信及分送广告。匈京警察总署用世界语通信。警局附设之旅行部亦用世界语。在匈国发行世界语月刊文艺杂志，名曰《文学世界》，内容极为优美。著名世界语诗人 **Kalocsay** 亦匈牙利人也。

意大利 全意商会赞成以世界语为国际语。国际商业文字会议于 1923 年在意大利 **Venice** 开会，意国商会派代表列席者 19 家。罗马无线电台每星期一次发布世界语讲课。

日本 学校加入世界语者已甚多。各大学学生多自动组织世界语班。东京市长及驻日芬兰公使鼓吹世界语尤力，日本世界语协会有会员 2000 人。世界语杂志在日本出版者有五六种，其中有医学杂志二种。

南斯拉夫 京城平民大学及其他各地学校多已采用世界语。国际市场亦实用世界语。

拉脱维亚 总统同情于世界语运动。工人、警察、邮员多学习世界语，国际市场亦用世界语。

立陶宛 哥甫诺大学特设世界语专科。小学校内亦多开始教授。立陶宛国情素为世间所未明了，赖世界语得以宣传于国外。

波兰 波兰为世界语发祥地，世界语尤为发达，产出著名研究家甚多。华沙大学及克拉戈大学均设世界语科。**Roznan** 市场及 **Lemberg** 商会均采用

世界语。全世界著名之世界语医士协会，有波兰会员一百余人。波兰文学中有许多杰作都已译成世界语。

葡萄牙 教育部附设一世界语考试委员会。海陆军颁布法规，凡海陆军人之已学世界语者得佩一特异肩章。里士本商品陈列馆以世界语与国语并用。学校中教授世界语者尤不可胜数。

罗马尼亚 京城警察学校教授世界语。政府代表在 **Venice** 商业会议中承认世界语之需要。国内天主教徒传导尤力。

俄国 SAT 会员在俄国极为发达。喀仁大学已设一世界语科。莫斯科中央无线电台每星期发送世界语讲课一次。政府发行之邮政明信片，上用世界语，与俄文并列，又发行邮票一种，上列世界语。

瑞典 国会常提出讨论世界语问题。学校中授世界语者颇多。**Malmo** 市场采用世界语。京城出世界语盲人杂志一种，销行于各国。

瑞士 瑞士为寰球世界语会所在地，世界语尤为发达。日内瓦各初级学校最末一年级一律授世界语，成绩极佳。日内瓦无线电台每日用世界语传达新闻及广告。

美国 纽约、华盛顿、**Los Angels** 商会附设学校，多已授世界语，并举行世界语考试。无线电台之用世界语传声者遍于全国。亚美利加无线电联合会认世界语为正式国际语。国际圣书学生会发刊世界语杂志一种。**Wellesley** 大学心理学系最近举行实验，证明世界语较其本国语为尤易学。

1926 年 1 月 10 日

——原载《学生杂志》

世界语四十年

自从波兰柴门霍夫博士（Dro Zamenhof）第 1 次把他所创造的新语 Esperanto 公布于世，到现今已是整整的 40 年了。在 40 年前，Esperanto 的《第一书》（Unua Libro）用了 Dro Esperanto（这笔名后来就作国际补助语的名称）发表时，大多数都加以嘲笑，加以漠视。连那《第一书》的出版，也是费了无数的苦心，方才成功的。当时学这种新语言的，除了柴门霍夫博士以外，就只有和博士最接近的几个亲友。因为那时世界语还是一种新奇古怪的文字，就有许多人加以猜疑，俄国政府并禁止世界语杂志的发行。但因了柴门霍夫的热情的感动，与此种新语言的优点的显著，终于引起了许多人们的注目。学会世界语的就一天天的多起来了，在绿星的旗帜下，“和平的战士”一天天聚集拢来，逐渐积成雄厚的势力了。在 1887 年世界语出世的时候，那时 Volapük 语在盛极一时之后，完全归于失败，使许多热心于国际语的人们，幻想完全破灭。因此没有人相信继 Volapük 而起的 Esperanto 是会发育长大的。但是，说也奇怪，世界语的信徒却一天天的增多。在世界语运动的初期柴门霍夫以及许多先驱者虽然经过了长久的艰苦的奋斗，但到 1905 年，第 1 次的国际世界语大会在波洛业（Boulogne）开会，一时就有许多世界语同志，从全地球的各处来会，在会议里公布了著名的 Esperantismo 宣言，于是世界语运动就确定了巩固的基础，世界语在理论上与实际上的价值，已开始为一般人所承认了。

1905 年大会以后，每年在欧洲的名都轮流举行世界语大会，到会的同

志逐年增多，世界语的书籍报章，日有增加。在人类文化的各方面，世界语的用途逐渐推广。在欧战以前的几年是初期世界语运动的全盛期。柴门霍夫博士的梦想差不多已经实现了。但 1914 年的世界大战，却给与此种新兴的运动以极大的打击。在那时候，杀气遍布了大地，人类正在从事于屠戮，哪有功夫来干这空洞的世界语运动。在这四五年中间，世界语的发展，几乎完全停顿，柴门霍夫博士也因了忧郁感伤，于 1917 年在西欧的炮火声中一瞑长逝了。

柴门霍夫虽死，和平的种子却已遍播全世界了。虽经大战的重大的打击，世界语运动并不因此而消灭。大战以后，人类感受战争的痛苦，渐有倾向国际主义之势，而世界语运动乃乘机复兴。每年一度的世界语大会，继续在欧洲各国大都开会，书籍报纸的出版，也逐渐恢复战前的状况。不但如此，世界语的实际的效用，近年来已为各方面所确认。最显著的事实，如国际联盟的知识合作委员会曾经讨论国际语问题，并提及请各国政府提倡 Esperanto 的建议。国际电报会议，于去年正式通过决议案，承认世界语为电报明码文字，将条文列入国际电政公约内，同时劝告各国电政人员学习世界语。有好几次的国际无线电会议通过采用世界语的议案。在欧美的许多无线电播音台，已开始用世界语播音。自无线电发展以来，因各国语言的分歧，使播音事业受极大的障碍。现在有了世界语就可把这重障壁打破了。在商业方面世界语的实用的价值也非常明显。在欧洲各国的商品赛会（foiro）都采用世界语作商品广告，并和国外的顾客通信。

在劳动运动方面，近年世界语占了重要地位，向来世界语学者的国际团体只有一个 U.E.A.（寰球世界语会）。但自利俾瑟（Leijzig）的寰球无国

界同盟（Sennacieca Asocio Tutmonda）成立后，各国的劳动者入会很多，现在已有会员 7000 余人，出版机关报二种，成为国际无产界革命运动的中心机关，其发展的神速，实出于意想之外。

今年的第 19 次万国世界语大会于 7 月 28 日至 8 月 4 日的一星期期间在丹齐（Danzig）自由邦开会，同时举行世界语诞生 40 年的纪念。这次到会的世界语同志，有 1000 余人。国际联盟行政会，各国政府都派代表到会参加。在蜀巴（Zoppot）的“世界语地”（Placo de Esperanto）的上面种了 40 年纪念树，各国同志都从本国带了泥土来加上。同时第 3 次的暑期世界语大学也在丹齐开学，由著名的天文学家斯密特教授（Prof. Schmidt）举行开学典礼，科目多属于科学的方面，讲师则多为各国著名的学者。一切讲演全用世界语，听讲的学员却并不觉到隔阂之苦。

为纪念世界语的创始家柴门霍夫起见，苏联的邮政当局特于今年发行一种纪念邮票印有绿星并柴门霍夫小像。各国政府发行世界语的邮票，是从俄国始。俄政府发行的世界语邮票已有了三种：第一种是无线电发明家波波夫（Popov）的纪念邮票，用世界语的文字；第二种是去年寰球无国界同盟在列宁格勒举行大会时所发行的纪念邮票；第三种便是现在的一种了。

当丹齐大会开幕的时候，在我国上海，也举行了一次世界语同志的 40 周年纪念宴。到会的有奥地利、菲律宾、日本、中国的同志，颇极一时之盛。近来学校加入世界语为必修科的有上海南洋中学与江湾劳动大学。至我国世界语团体历史最久长，组织最完备的要算是上海世界语学会，该会现办有世界语函授学校、《绿光》杂志，及世界语图书室等。但和欧洲相比，我国的世界语运动究竟还幼稚的很。在 50 年纪念的时候，我们希望我

国的世界语运动，和欧、美、日本同等的发达，这是要凭全国的同志的努力了。

1927 年 11 月

——原载《东方杂志》，第 24 卷第 22 号

文网与文学

——《东方寓言集》序

天下老鸦一般黑。走到无论什么地方，都不会容许你自由说话的。虽然有过“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一句古话，但是古今中外的权力者似乎总想把天下的人的嘴都封锁起来，全不想到这是一种不可能而且可笑的事呢。单说从前的俄罗斯罢。从前俄罗斯的皇帝在现今是只有流亡国外，托庇外人宇下的一些白党在追悼他了；可是在十年以前，不过十年以前，他还相信他是可以长治久安的，所以他就尽力箝制言论，他不许俄国人民说一句不大恭敬的话。当时俄国政府箝制言论，检查新闻的方法，是特别完备，而且周密，因此直到现在，还有许多国家的政府是在竭力仿效呢。

在俄皇时代，据说一切的印刷品，书籍报章，在印刷以前，或印刷以后，都必须经过检查官审阅，认为“并无违碍”，方才可以发行。报章杂志的编辑人，以及书店老板，时常接到政府警告，不准刊行某种的文字；要是检查官对于某种书籍认为不合，立时可以禁止发行，甚至把发行机关封闭，把著作人拘捕监禁；因此被放逐到西伯利亚或遭杀身之祸的，是常有的事。检查的条例更非常苛刻，抵毁政府的不必说；对于教会及因袭道德的批评，以及一切关于社会问题的文字，全在禁止之列。有时竟至闹出十分可笑的事。克鲁泡特金在他所著的《俄罗斯文学的理想与现实》里是这样说：

在以前，关于检查官的种种笑柄，单从斯喀

鼻恰甫斯基（Skabitchevsky）的一部《文字检查史》（History of Censorship）里，就可以找到了许多。单讲一件事就够了：普希金写了一首诗，是讲到女人的，里面有“你的神圣的身躯”、“她的天国的美貌”这一些句子，检查官就在这首诗上打了一个大叉，用红墨水在原稿纸上批注着，说这等句子是亵渎神明的，不准刊印。诗歌往往被检查官割裂删节，不问它是否合于韵律。有的时候，在一篇小说中，检查官甚至代你随意的添上了一二段。

因了检查的严密，俄国的出版界，就造成了两种的现象：第一，关于批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道德问题的著作，往往送到国外去印刷发行。第二，报章杂志上竭力减少评论时事的文章，多登文艺作品，如小说、寓言、文学批评等。因为文学作品，在表面上并没有提及政府，教会等名辞，在骨子里却依旧可以批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或思想问题等，这样就把检查官的目光瞒过了。例如屠格涅夫的小说，满纸是讲男女关系，是讲恋爱，在脑筋不大灵敏的检查官（无论何处的检查官脑筋总是不大灵敏的啊！）看来，以为这并不是“危险”的，可是每个读者却都能感到这些小说里面充满着反抗思想和对一切现存制度因袭道德的批评。所以从别一方面说，19世纪的俄国文学，有特殊的发展，未始不是受了检查制度之赐。现在我们的

作者陀罗雪维支也便是罩着文艺的面幕瞒过检查官的眼目的俄国讽刺作家的一个了。

佛拉斯·米恰洛维支·陀罗雪维支（Vlas Mihajlović Dorosević）生于 1863 年。和许多别的俄国著作家相同，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在经过了长时期的生活奋斗之后。他做过戏子，做过舞台说明者，可是都失败了。到后来他开始替各种日报和杂志撰著讽刺的小品文，方才博得广大的荣名。他在报纸上所发表的文章，传诵很广，对于革命前的俄国社会生活，他是一个有伟大影响的人。他是惯用比喻的文体，指摘俄国政治社会各方面的种种罪恶和缺陷。他把当时的暴政和握权的人物，都攻击的体无完肤，描写的淋漓尽致，却绝不显露出“违碍”的字句。他所专长的，是借用了东方生活作题材，尽量地讽刺俄国政治社会的情状。（但是本书的读者都会明白，他所讽刺的，怕不只是俄国的情状罢！）他是大胆地说出了当时俄国人所不能说不敢说的，可是从文字的表面看来，却只说着土耳其的故事，印度的故事，中国的故事，所以检查官竟不能禁止出版，也不能将他治罪。

除了寓言的故事童话以外，陀罗雪维支更写了许多文艺批评、戏剧批评，以及关于莫斯科中等阶级、城市贫苦阶级的生活的小说。他的整部的文学作品有数大册，此外短篇的小品文字则散见于数千种的报章杂志中间。他的作风是尖刻，深切，纯朴，刚劲，印象非常强烈而又是富于诗趣的。在他晚年，任莫斯科最著名的报纸《Russkoje Slovo》的主笔，至十余年，直到该报被苏维埃政府没收时止。1921 年，陀罗雪维支因受政治环境的刺激，并为贫穷所迫，悒郁而死。

本书所选陀罗雪维支的作品共六篇，除《雨》是从《世界语周刊》

《Sennaciulo》中译出外，其余的五节都是从世界语《国际文学丛书》第十五种《Orientaj Fabeloj》转译。世界语的原译者为 sro Nikolao Hohlov。就中《错打了屁股》一篇，因为所说的是中国的故事，不少牵强附会的地方，译成中文后，曾加以改作，和原文已有许多出入。又本书的书名，照世界语题名，应称为《东方童话集》，但就陀罗雪维支的文体，却是以讽刺为主，似更近于伊索式的寓言，并不是专给儿童看的，所以改题为《东方寓言集》。列入《文学周报社丛书》。

最末的一篇，却于东方生活无关，据世界语本译者的意见，此篇最足代表陀罗雪维支讽刺俄国上等社会生活的作品，所以把它附在后面了。

本书内《寓言的寓言》、《赫三怎样落下了裤子》这两篇，译成中文后曾在《小说月报》发表。最末一篇《猪的历史》曾在《东方杂志》发表。蒙《小说月报》编辑郑振铎先生、《东方杂志》编辑钱经宇先生允许收入本集，这是译者所应表示感谢的。

最后说几句关于世界语的话：

本书的作者陀罗雪维支，在革命以前的俄国，虽然有盛大的荣名，但是他的作品，还很少介绍到国外。在英日文中，就译者所知，还不曾有过一本翻译。现在是靠了柴门霍夫语的媒介，才得把近代俄国文学中一种别具蹊径的作品呈献给中国的文艺爱好者。这是一件可喜的事：在近年来，亏了翻译家周作人、王鲁彦诸先生的努力，我们得已从世界语中，认识了欧洲许多大民族小民族的珍异的文艺作品。译者对于世界语在文艺上的价值，虽然早有了坚信，但是深愧平时太不努力，至今日只成就这一点小小的翻译。本书付印的时候，恰巧是在 Esperanto 出世以后的 40 年，全世界

数百万绿星旗下的信徒，正在集合着到处举行盛大的纪念祝典。因此译者翻译了这一本小小的书，也就算是替 40 年的世界语运动留下些微的纪念罢。

但是在世界语中蕴蓄各国文学的无穷的宝藏，各国的名作译成世界语的有数万数千种，在这中间不知道有多少的奇卉异木，单凭转展翻译，是不能发掘的尽，采撷的尽的。译者很希望每个读者都亲自去发掘，亲手去采撷。好在这不是艰难的事情，世界语是“不下泪的拉丁文”，学会世界语，不必费去很多的时间，比学任何种外国语，要容易到数倍。要是中国的文艺爱好者都学会了世界语，都能直接领略世界语中无数的文艺珍品，译者自然可以躲懒，不必再来做这些拙笨的翻译工作。这是译者最后的过分的奢望了。

译者

1927 年 11 月 24 日于上海

世界语文学

——为世界语产生 40 周年纪念而作

文艺是没有国界的，世界语也没有国界。

人是有恶新的癖气的。凡是一切新的东西，新的理想，不是“古已有之”的，或者人类的“家谱”里所不曾载下的，当初出世的时候，必不免受尽人们的猜疑和攻击。当蒸汽机初次发明的时候，许多人疑是妖物，要把铁路拆断。达尔文说了一句人是从猴子变的，也就因为这话不是“古已有之”的，所以至今美国数州的法律，还禁止学校里教达尔文的学说。Esperanto 在它的诞生的初期，也遭了同样的恶命运。一种人造的文字可以作为全世界的公用语，这在许多学者先生们看来，固然不会相信，就是一般人听了，也要疑为“妖言惑众”，因为人造语言是人类的家谱里所未有的；即使从前的妄人曾经有过这种奇想，但是他们的计划早就失败了，死了。因此世界语于 1887 年第 1 次出世的时候，人家都说这是波兰一个怪医生所产生的怪胎。怪胎如何能发育成长呢？可是说也奇怪，怪胎后来居然长大起来了，在世间也居然有许多疯子去学习这种古怪的言语。在人类中间，疯子太多了，是多么危险的事！因此就又有许多关心治安的人，出来反对，禁止。所以世界语在初出世的时候，一般人是加以讪笑，加以漠视。过了不多几年，却又加以攻击，加以咒诅。在过去的 40 年中，世界语的运道是顶坏的，在一般人目中，世界语仿佛和洪水猛兽一样，世界语运动者也就归入无政府党共产党一类，为文明人类所不齿了。

但是攻击的尽管攻击，咒诅的尽管咒诅，聚集在绿星旗帜下的 **Esperanto** 信徒，却一天天的增加起来。到了今日，在世界语产生 40 年以后，是怎样的情形呢？自然，大部分的人们还在讪笑着，漠视着，怀疑着，自己不愿张开眼睛来看看，却只是猜疑攻击的人，现在也还是多着。可是，我们却可以说一句宽慰的话了：**Esperanto** 产生以后的最困难最艰苦的时期，现在是已经过去了，过去了。

在全世界的 127 国土，到处都有世界语的信徒；走遍全世界的大都市，到处都有亲热的同志用了人类的语言和你接谈；用了世界语，你可以和非洲、南美、阿拉伯、南洋群岛、冰岛……的同志通信。无论在天之涯，地之角，用了世界语你可以和“老死不相往来”的那些人们结成坚固的友谊，这不是世界语已经普遍全地球的铁证吗？在交通、商业、旅行、教育各方面，都已承认了国际补助语的效用。俄国政府用世界语印邮票，万国电报会议承认世界语为明码文字，国际无线电会议议决请各国的播音台用世界语发音，这些，这些，不是世界语有实际效用的证据吗？今年夏间，在北欧的但泽自由市，从 40 多个国家，聚集了 1000 余名的世界语同志，举行盛大的 40 年纪念的祝典，这不是世界语运动已从艰苦的奋斗中得到最后胜利的事实吗？

人造的语言，何以能打破一切盲目的攻击，冷酷的漠视，而普遍世界呢？这是很明白的，是因为国际的补助语，已为现代文化生活的各方面所迫切需要的缘故。但自从 19 世纪以来，国际语的方案多到数 10 种，何以都先后消灭，只有 **Esperanto** 却戴了胜利的花冠，这又是什么缘故呢？简单的说一句，是因为 **Esperanto** 在实际的效用，有伟大的价值，尤其是因为

Esperanto 产生虽不过 40 年，却已有了繁荣富丽的文学的缘故。

拿语言和文学相比，语言是肉体，而文学是灵魂。文学给与语言以生命。没有文学的语言，就好比电报号码或阿剌伯数字一类的符号罢了，决不是活的语言。许多盲目的偏见的语言学家向来只以为 Esperanto 是一种符号，所以他们不相信世界语是能传达人类共通的感情意志的。但从 40 年来世界语文学的成绩看来，就足以证明这是全然与事实相反的。从世界语产生以后，用此种人造语所写的文学作品，一天天的增加，同时语言的本身也一天天的进化。虽然，世界语的语法规律，为避免不规则及方言化起见，是极严格的，不变的，决没有像国语那样的混乱的情形。但是就文体和用字的文法而论，今日的世界语已比 40 年前进步的多了。这都是因为世界语的文学作品一天天增多，所以语言亦随之而生长，渐由简单而变为复杂，由干枯而变为丰腴，由粗鲁而变为细腻，由生硬而变为柔软。从无论哪一方面看来，都足以证明世界语是文学的语言，是时刻在进化中的语言，是活的语言，而决不是死的，机械的语言。

有了文学的世界语，才产生了世界语的文学。说到文学，我们平常只听得说有俄国文学、英国文学、日本文学、中国文学等等的分别。但我们要是承认文学是表现情感的东西，那么人类的情感本来是共通的；恐怕无论哪个心理学家都不能证明人类的情感因国界而有不同。实际上文学所以有国别，只是因为语言不同的缘故。与其说是俄国文学、日本文学，倒不如说是俄罗斯语文学、日语文学来的确切。太戈尔是印度人，康拉特是波兰人，但太戈尔的诗，康拉特的小说，一样的成为英文学中的珍宝。人类感情的隔阂，语言是一重最大的坚壁。我们假想世界各国的作家，都用

了同一的语言，来写文学的作品，这样，人类在文艺方面的发展，必非现在所能想象。到了那时，全人类思想情感的传达，再没有半点的障碍。无论哪一个作家，都有均等的机会，可以把他的作品，自由贡献给全世界，供全世界的赏鉴和批评。但在现在呢，却只有几个大国的作家，有着这样的机会。在几个小国里，即使有了伟大的天才作家，也只能供本国人的赏玩。所可靠的只是重重的翻译，但文学作品的翻译是何等困难而拙笨的事啊！而且你更不能把一切国语中的作品，都译成一切的文字。自然，把语言的障碍完全打破，现在还只是梦想，但从 **Esperanto** 中，至少已经证明这梦想是有实现的可能性了。

配充作人类的文字——非民族的文学——用的语言，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简单；二，明确；三，富丽。**Esperanto** 是具这三个优点的，所以世界语的文学作品的丰富，远非他种人造语所能比拟。要是把 40 年来发表的世界语的作品，一一加以叙述，不但不是这个短篇文字中所能办到，就是当作一种专门学问去研究，恐怕也是皓首难穷吧。在这里我们只找最重要的几点来说说。那其余的，只好让读者自己走进这宝库去探索了。

世界语的创作者，那位柴门霍夫博士（**Dro Zamenhof**）本身就是个伟大的文艺作家。他是具有锐敏的感觉，柔嫩的心情，宗教家的信仰，艺术家的情操，醉心于未来的憧憬的乐天诗人，而同时又是具有悲天悯人的心肠的多愁善感者。他创造了“人类爱”的宗教，建立世界化的文学。他的作品，是作了人类的文学的永久的典型。假如他不曾创造世界语，他的文学天才，也足以使他不朽了。我们在这里介绍他的一首小诗罢：

Ho, Mia Kor'

Ho, mia kor', ne batu maltrankvile,

El mia brusto nun ne estu for!

Jam teni min ne povas mi facile,

Ho, mia kor'!

Ho, mia kor'! Post longa laborado

Ĉu mi ne venkos en decida hor'!

Sufiĉe! trankviliĝu de l' batado.

Ho, mia kor'!

啊，我的心啊！

啊，我的心啊，不要再跳了，

如今不要跳出我的胸膛去罢！

我是已不能拿稳我自己了，

啊，我的心啊！

啊，我的心啊！经了长久的奋斗，

难道在最后的顷刻，我竟不能得到胜利吗！

够了，静下来罢，不要再跳了，

啊，我的心啊！

世界语是素以音律的美见称的，所以世界语常被称为“音乐的语言”，“诗的语言”。在世界语的创作文学中，诗歌方面有特殊的发展。世界语的诗人，随便举几个，如格拉波甫斯基（Grabowski）、台夫耶德宁（V. Devjatnin）、桐卜罗夫斯基（A. Dombrowski）、戈尔堡（M. Goldberg）、脑曼（A. Naumann）

等，都是人类爱的歌咏与梦想者。在世界语产生的最初 20 年中，这一类诗歌最为发达。所谓世界语的内部理想（*interna ideo*），我们可以从这些韵文中去吟味。最后，我们都知道 5 年前来到中国的那个盲诗人爱罗先珂（*Vaseli Eroŝenko*），他的作品在中国、日本，虽然已经打动了许多青年的心，但在国际的文坛中，他还不过是一个无名作家。

世界语的散文的创作，虽不像韵文的发达，但近来也尽有不少的长篇小说。在欧战后有许多中欧作家刊行了好几部世界语的小说，有的是描写战争的苦痛的，也有的是讽刺社会生活的。创作的剧本也有许多种，每年一次的万国世界语大会中，所表演的剧本，都是用世界语写的。

但是世界语的年龄，究竟还太幼稚些，就创作方面虽已有了不少收获，但比之于各国国语文学，究竟相差的多——虽然拿世界语的年龄和现在任何种国语的年龄相比，这 40 年间的收获，已经是足以惊人了。在这 40 年中，世界语在文学上所显示的功效，却大半是在翻译的方面。从各国国语翻译成世界语的文学作品，才真是出于一般人想象以外的丰富而且满意。在这里世界语是做了各种民族文学的最好的媒介。就古典的作品来说罢：

《新旧约全书》、《伊索寓言》、荷马、莎士比亚、莫里哀、歌德、西万提斯、魏琪尔的名作，都已有了世界语的译本。就近代作家而论，译成世界语最多的，要算是波兰、俄罗斯、匈牙利、法兰西、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那一些作家了。除了整部的著作以外，在现在出版的数百种世界语杂志中，几乎没有一册不附载各国名作的翻译。世界语的文艺丛书，在现今继续发行的有两种：一种是《国际世界文学丛书》（*Internacia Literaturo Tutmonda*），另有一种是名叫《寰宇丛书》（*Biblioteko Tutmonda*），这些

丛书都是挑选各国文学中顶好的作品，由本国人动手译成世界语，所以对于世界语文学上，加添了无数忠实的贡献。

世界语的翻译文学所以有意外的发展，可以说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用国语翻译，是一件困难的工作，译者除了精通本国语文外，必须精通一种外国语，方能胜任。精通两种语言，并不是十分容易的事。因此甲国人翻译乙国语的作品，多少不免有许多阻碍。但世界语因为它的构造单纯，不像学一种外国语的困难，所以很容易精通。世界语的翻译工作，大概是由作家的同国人来担任，所以比较的更为信达了。

各国的语言都带着一种民族特殊的格调，译成格调不同，语法不同的别种国语，是非常困难的。世界语因为是从现代主要国家的国语归纳成的文字，所以它是粗具了各国语文中的特点。它的构造又是富于挠折性的，所以译别种国语是比较的更顺利了。拿莎士比亚的戏曲来说罢。他的杰作《哈姆雷特》是有了数十种的国语译本。但据英国《评论之评论》的主笔说，《哈姆雷特》的无论哪一种译本，都没有像世界语译本的忠实。从这里我们更可看出世界语在翻译文学上的价值了。

在世界许多小民族中，有不少伟大的文艺作家，都因为语言的困难，没有机会介绍给国境以外的读者。自从有了 **Esperanto** 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们从世界语中发见了小国的奇卉异木。芬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爱沙尼亚的国民文学里，蕴蓄着无数伟大的作品，现在是有尽量贡献给全世界的机会了。

中国文学不能在世界文学中占一个主要位置，大半的原因也还是由于我们的艰深的国语，使我们的作家，永远和世界文坛隔绝了。从世界语里，

我们希望得到解救。我们希望中国文学因了世界语的翻译介绍，而得受全世界读者的鉴赏。

文艺是没有国界的，世界语也没有国界。天然的语言真是文艺发展的一大障壁。多少的天才作家因语言的障壁而被埋没了，多少的著作家枉费了无数脑力，在各种语言的学习里。用了人造的语言，我们来打破这重障壁罢，来实现人类的文艺罢。

1927 年 12 月

——原载《小说月报》，第 18 卷第 12 号

上海世界语学会的现在与将来

Esperanto 产生以来，已有 40 年的历史了。在这 40 年中，亏了各国许多和平战士的努力，在欧美日本，已经聚集了无数绿星的信徒，世界语已成为到处通行的活文字，它的效用，已经各方面的公认，而毫无疑义了，但是说到我们中国，事事都比人家落后，世界语运动，在我国虽然也有 20 年的历史，依然不能普遍到全国，大多数的国人，对于这种新语言及其理想，盲目反对的也有，怀疑惶惑的也有，冷淡漠视的也更不少。所以世界语运动的工作，在地大人众的中国真是比什么地方都更重要，而在中国的吾语同志所负的责任，自然是更艰巨而且亟要了。

在中国 20 年的世界语运动无成绩可言，这虽然是由于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使然，可是最大的原因还是由于在中国的吾语同志太无组织，太缺乏合作精神。论到中国的世界语团体，此仆彼起的，不下百余个，20 年中出版的世界语刊物，也不下数十种。但因各个同志，各地同志都个别做世界语运动，大家既无组织，又不联络，所以终不克支持到久远。其中比较的最有组织而且时间最久的团体，就要算是上海世界语学会了。

上海世界语学会是占着中国世界语运动中最主要的地位，上海是中国最大的都市，而且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在上海有各国的侨民，又几乎每天有欧美邮船的往来。在这里世界语是比内地更其需要的多。而吾语同志在上海的也比在其他各都市的多。因此上海世界语学会乃成为中国世界语运动的中心了。

上海世界语学会是成立于 1920 年，当俄国同志 Stopani 来中国的时候。但当时同志稀少，组织又很散漫，所以没有多大的成绩。自从 1925 年本会正式改组，择定会所以后，会务始有正轨的发展。但中间五卅风潮，去年春间闸北的战事，屡次发生波折，致会务进行受重大的阻碍。直到最近，会务方才恢复常态，一切预定的计划，有逐渐实现的可能。就本会现在的工作，可分两方面来说：

一方面是 por Esperanto 运动，就是传播世界语。最近本会除印刷宣传品，小册子，及讲演鼓吹外，所办世界语函授学校课本讲义已完全编成，使远近有志者，都有学习世界语的机会。学员近来已达 360 余人，遍于国内各省及南洋日本。《绿光》杂志是以宣传世界语为目的的，从本期起，就改为月刊，按月发行一回，此外如世界语展览会，暑期学校等都在计划之中，在今年打算逐一举办。

别一方面是 per Esperanto 运动，就是实用世界语。本会因地处中国交通中心的缘故，对于国外旅行到上海的同志，无不加以招待及援助。本会已设有世界语图书室，备有图书数百种，供会员借阅。本会又与上海世界语书店联络，印行并代售国内外世界语书籍，就上海世界语书店之营业而论，去年售出之外版书籍约近千元，开向来未有的新纪录。此外本会事业在拟办中者，有世界语通信社，国外贸易部等。但因中国世界语运动方始萌芽，我们的同志，人数还是太少，能力还是单薄。所以不能有大规模的发展。本会认为欲求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目前最要的有两件事：

- 1、召集第 1 次的全国世界语大会（Nacia kongreso）。
- 2、组织中国世界语学会，或即以本会为基础扩大组织亦可。

但这两件事，范围很大，不单是在上海一部分的同志所能包办，我们很希望各地同志努力合作，得早日实现我们的理想，上海世界语学会虽为上海方面的 *loka grupo*，但却居于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指导地位。我们更不拒绝内地同志的加入本会。我们的意思，各地的同志应各在本地组织小团体，从事传播世界语的工作，但同时更必须时时与上海世界语学会联络。各地同志应一律加入本会，并尽力替本会征求会员及函授学员。直接为本会效力，间接实以谋全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

现在在国内的吾语同志，虽无确实统计，大约当有数千人。要是大家都以上海世界语学会为中心，合力工作，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前途，希望是很大的。我们要求中国世界语同志的能力集中，共同结合，作有规律有步骤的斗争。我们更希望 1928 年间中国世界语运动开一个发展的新纪元。

——原载《绿光》，第 5 卷第 1 号

《星火》后记

以上杂文 20 篇，是我出国以前替各种定期刊物翻译的文字。其中有一小部分译自英文本，一大部分却是从世界语译出的。前半部所包含的，是几篇短篇小说，但后半部却只是些讽刺文、寓言、杂感、小品而已。本书所选的 20 个作家，有一部分是不甚知名的，大多数却全是“弱小民族”的作品。总之，只是一些杂凑而不甚重要的东西罢了。

对于文学我是门外汉，介绍西洋文学的名著杰作，我是既不能，也不能担承。我选择这一些东西，只是凭了个人的癖性。肥鱼大肉，在我还嫌缺乏消化的能力，所以我只选了些纤巧轻松的。我只觉得这一些杂文，多少都给我一点轻快的刺戟，使我尝得一些新鲜的口味；这样的口味却在我们读中国人的作品时所难以遇到的。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至于读者是否感到和我同样的趣味，那自然是另一问题了。

这 20 篇东西包含欧洲大陆及近东 12 个民族的作品，是用 12 种不同的文字写下的，大半是亏了柴门霍夫语的介绍，我们才得有机会领略这一些素不识面的作家和作品。我们如从本书里得到一点欣悦，那我们首先应该感谢那位“媒婆”——Esperanto。

至于本书的题名，也并没多大的意义。我在上面已说过，本书对于文艺界，不会有毫末的贡献。所以所谓“星火”当然不是指“文艺之火”。只因我个人心头近来时常感到一种微温，感到一种“仿佛近在目前”而又永远不可捉

摸的微温，正像本书最后一篇中所暗示着的，所以我就随意拿这两字当作本书的标题了。

1928 年 2 月 21 日

盎凡尔之万国世界语大会

1500 人之国际盛会。我国大学院代表列席。夏季大学用世界语讲演。
40 余国人民欢聚一堂。世界语发达之最近状况。

欧洲每年七八月为休假之期，国际大会每在此时举行，今年 8 月初旬在欧洲西北部，同时有两大集会。一为荷兰京城阿姆斯特丹之第 9 次万国运动会，一为比利时北部盎凡尔 之第 20 次万国世界语大会，万国运动会国内报纸当已有详细之记载，至世界语大会则国内尚少注意，兹就记者之经历，特作简略之报告焉。

自来国际会议之关于政治或外交性质者往往舌剑唇枪，尔诈我欺，固无诚实可言，即平和会议学术会议，亦每因各国代表，各操不同之语言，展转传译，每多隔阂，难收相互谅解之实效，其由各国人民自动发起，集数十国代表于一堂，操同一之言语，毫无隔膜，聚首联欢，推诚相与，此则惟万国世界语大会中方得见之，自波兰柴门霍甫首创世界语后，迄今 41 年，全世界通此种新语者，已达 10 万人，自 1905 年以来，每年举行万国大会；除欧战时期外，从未中辍，每届大会，全世界世界语同志，麋集一堂，演说辩论，悉用此种新语；既以谋世界之普及，复以图各民族之联合，裨益于世界生平，实非细小，今年大会地点为比利时之盎凡尔，盎凡尔为欧洲最大商港之一，不但交通便利，工商繁富，且尤为佛兰德民族文化之中心，绘画音乐备极发达，1911 年第 7 次大会开会于此处，今年第 20 次万

即安特卫普。

国会仍在此开会，自 8 月 2 日至 11 日，盎凡尔全市飘扬绿星之世界语旗帜，车站搭欢迎之绿牌，各大商埠张贴世界语欢迎之标语，报纸发行世界语之专刊，全市无一处不谈世界语，盖此旬日中，吾人已亲见世界语国之实现，数十余国籍，远至南美及澳洲均有代表列席，东方国家向来列席世界语大会者甚少，今年则来自日本者 3 人，来自土耳其者 1 人，来自波斯者 1 人，来自阿富汗者 1 人，来自新嘉坡者 1 人，来自印度者 1 人，除我国国民政府所派正式代表外，有挪威巴西西班牙诸国政府均派代表参加，此外国际机关，如国际联盟协会，国际红十字会，国际新教育协会，国际童子军联合会，国际药物学会等，或派遣代表，或来电祝贺，盖世界语在今日不仅为各国人民间之运动，且已逐渐引起政府及国际机关之注意矣。

8 月 4 日大会正式开幕，有各国代表之演说，我国大学院及上海世界语学会代表胡愈之，亦向大会致词祝贺，国际委员长瑞士柏里卫博士之演说尤引起全场之喝采，略谓彼于日前出席海牙宗教和平会议，此会议悉用世界语演说辩论，毫无困难，此足证世界语已渐为各种国际会议所采用，未又申明世界语为宣传弱小民族文化之良好工具，例如比利时之佛兰德民族，向来知者甚少，然赖世界语之媒介，佛兰德文学渐为各国所注意。故世界语不但不败坏民族运动，且可扶助一切弱小民族运动，世界语之普及，实为世界各民族互助合作之张本云。

此次大会共开全体会议五次，其中一次专讨论无线电问题，盖自无线电播音发明以来，国际公用语已刻不容缓，因各国语言不同，甲国所播之音传至乙国即不能了解。此惟俟国际语普及后，无线电播音方能显其最后之功效，又有一次所讨论者，为大学校加入世界语问题，大会议决组织全

世界大学同盟，合力传播世界语于各国最高学府，现在欧洲各大学教授赞助世界语者甚多，而尤以法国波兰德国为最焉。国际世界语运动委员会在大会之报告尤可注目，据其所述，就去年之统计，全世界 120 国 7 千都市中，均已有世界语同志，至于世界语会共有 1776 所，在 1926 年一年中全世界各地所开设之世界语班，共计 12104 所，报告中又备述世界语在商业旅行铁路交通教育学术无线电各方面实际应用之情形，备极详尽。盖现在无论何方面，莫不显世界语之功效也。在出版事业方面，近来尤为发达。每年新出之世界语书籍，约在千种以上，杂志现在发行者约 600 种，最足注目者则各弱小民族之文学作品，在世界语中翻译甚多。今年大会中比利时世界语会特刊行世界语比利时文选两巨册；分赠与会员，就中包含拉丁民族与佛兰德民族之数百作家，此其一例也。近来各种民族运动，文化运动，宗教运动莫不利用世界语以向各国宣传。例於日本之大本教，向未为人所注目，但近年因大本教本部刊印世界语之月报，及小册分赠各国同志，因此各国对于大本教注意者甚多，我赴会时欧洲同志纷纷向予称道大本教之优美。吾国近来正需对外宣传，苟当道能利用世界语刊行书报小册，分赠各国，阐明帝国主义压迫我国之实际情形，其效力必较一切宣传机关为伟大，惜吾政府尚未能注意及之。本届大会中尚有许多小会，即专门会议，缕举之如下，一新闻记者会议，二世界语科学会议，三万国教师会议，四银行业会议，五铁路人员会议，六商业会议，七国际邮电职员会议，八第 7 次万国盲人大会，九出版家会议，十国际警察会议，十一世界语教师会议，十二文学者会议，十三波海教会议，十四万国医生会议，十五法学家会议，十六基督教徒会议，十七佛莱梅商会议，十八反对吸烟会议，十九万国平

和同盟会议，二十巡回俱乐部会议，二十一药剂师会议，二十二无线电会议，二十三速记术会议，二十四音乐师会议，在各个小会议中，各专门家讨论用世界语传播及交换，各有重要之决议，其中如新闻记者会议，议决创立万国世界语新闻记者同盟，一方面谋各国新闻消息之联络及交换。一方面则就新闻记者中间，尽力传播世界语，此同盟成立后，于国际新闻界裨益必不小也。

与大会同时举行者有第4次夏季世界语大学，请各国名教授讲演，因盎凡尔为欧洲重要海口，故今年暑季大学所讲之科目，为海埠与航海学，计分十个讲题有关于科学方面者，有关于航海技术方面者，又有关于法律方面者，其中尤以巴西大学教授拜克贺绥博士所讲之海口与赤道国之文化，巴黎国立无线电研究所主任梅斯尼教授所讲之无线电应用于航海术，国际联盟劳工局泰雷里所讲之国际劳工局对于海员之工作为最有兴味，每次讲演悉用世界语，听众多至千余人。此实为学术国际化之先声。

世界语大会之目的不仅宣传语言，讨论问题，交换学术、思想而已，且更其有娱乐之性质。聚各国人士于一堂，本博爱之精神，谋感情之联络，世界语创造者柴门霍甫博士，以全人类为一大家族之理想，于每次万国世界语大会中仿佛见之。本届大会于开会先一日有会员交谊会，大会最后一日，有千余人之大聚餐会，此外又有万国化妆跳舞会，及音乐会。同时在佛兰德歌剧院，利用世界语表现莎士比亚之名剧《哈孟雷德》，演员大半为盎凡尔之著名优伶，一切歌唱说白则悉用柴博士之世界语译本，此则又为罕见之盛举。大会闭幕后，会员组织游历团，由比国同志导引，遍游比利时各地名胜，历四五日始毕。最后乃尽欢而散，此次大会盎凡尔市政府

招待备极殷勤，各大博物馆及动物园一律免费，准许会员自由游览，开会之日，全市均悬绿星旗，盎凡尔市之警察，通世界语 50 余人，散布于各热闹街市，故会员虽不懂本地言语，而旅居市内，绝无丝毫之困难，此次大会招待费用，系由盎凡尔市政府拨给，比王亚尔培德第一则为本届大会之保护者，明年第 21 次万国大会，已议决在匈牙利京城布达佩斯德开会，同时维也纳之世界语博物馆，系奥国国立的，举行正式开幕礼，届时当更有一番盛况也。最后尚有一事足为我国读者告者，历届世界语大会开会地点，均在欧美大都市，我国同志因距离太远无参加之机会，本届大会中我特与日本代表众院议员小潼辰雄君，讨论拟由中日世界语团体联合发起远东万国世界语大会，于明年在上海或东京开会，此种提议苟能成为事实，则于远东方面之世界语运动，影响必非细小也。

1928 年 7 月 7 日

——原载《绿光》1928 年第 5 卷第 6-7 号

我的旅行记

——德国西部三大城的世界语旅行

记得我是一个中学生的時候，我最爱读的书是康有为的《欧洲大陆游记》和孙毓修译的《谦本图旅行记》。到远处旅行是一件快乐而有益的事。即使不能亲去游历而单读游记，也可以给你无上的乐趣。因为异邦人情风物的记述，不但可以满足年轻人的幻想和好奇心，而且可以给你许多实际生活上有益的教训。有一位西班牙的作家说，旅行是照镜子。人总不能看见自己，唯有和别处的人相比较时，方照见了自己的真实面目。所以旅行和读旅行记，是和照镜子有同样的快乐，在镜子中发见自己时，无论是美的或丑的，你总会生出一种愉悦。

我算是有幸福了。到欧洲去跑了一回。在三年中间，走过了七个国土。我愿意把我的浮面的观感，写些出来，给我们的青年读者以些少的愉悦。我有很丰富的资料，可惜没有像康有为谦本图那样富丽的文笔，这是要向读者诸君抱愧的。我现在先从最近的一段经历写起，便是从巴黎回到中国的途中经过德国西部三个大城的一段。其余的让我有别的机会再来补足。

同车的波兰苦学生

1931年1月12日晚十时，在巴黎北车站上了火车，在朦胧的雾气中，开始了1.4万基罗米突的长征。这车是从巴黎经比利时、德国、波兰直达俄国边境的国际特别快车。三等车的设备却非常简朴，不像开行英法国内

kilomentro(公里)的音译。-----编者注

三等列车那样的舒适。是在隆冬而且又过了新年，不是旅行的季节，所以旅客寥寥可数。我们的车厢中，只有四个旅客：一位比利时姑娘，一个丹麦拳术师，一个波兰学生和我。那拳术师，除了丹麦话以外，就不能讲别种语言，没人能和他谈话。可是他却爱向人做出种种怪样唱着哼哼调儿，把那位比利时姑娘吓坏了，坐的不久，便换到别的车厢里去。

剩下的是我们三个人。我便和那位波兰青年对话起来。才知道他是在比利时 Gand 大学读书的，而且已得了工程师的证书，因为想继续求学，而且又没有钱，所以去巴黎做工。最近受了世界经济恐慌影响，没有工作了，便只好回到波兰去设法。他和我谈了许多在巴黎做工的情形。他曾经做过汽车夫、机械工人，替阔人家看门，在墙头上糊广告。他说时气宇昂然，仿佛很骄傲的样子。我问他既是工程师为什么不回波兰做事去。他说，在波兰像他同样学历的人，有整千整万没有事做。所以只好再加深研究，方能得一个位置。知识者的失业恐慌，原来到处是一样的。

一夜没有吃什么东西。清晨到了德国边境的大城科伦（Köln）下车。我就约那位波兰学生同去咖啡店早点，他说不愿去，我问他为什么不愿去，他才说出了实话，他说身上只剩下三个马克，还要买车票到爱森（Essen），所以不能吃早点了。我说我可以请他，他当初仍不肯。我邀了再三，他才同我去吃了。

吃过了早点，我们便分别。他是到爱森去找波兰领事馆借旅费回国的。到爱森去的三等车票要八马克，而他只有三马克，我想送给他几个马克，他一定不肯收。他说打算先用三马克买票到一个中间的车站，到了那车站不下车，这样便可到了爱森。到爱森时如车站检票员要求补票时，他可以同他去领事馆设法。这样我便只好让他独自走了。他走后我却还是替这位苦学生担心。

莱茵河畔

在科伦我去访问《世界语周报》（Heroldo de Esperanto）的主笔，是我前年出席比利时万国世界语大会时相识的。但他因病在家，馆中的人另去找来了一个通世界语的人，陪伴我去游览城市。那位先生又是一个失业的，本是一个银行雇员，失业了已有两年。他陪了我走到街上，开头就请我原谅，说是因没钱，要叫我请他和他的家人吃一顿午饭。我当然答应了。后来他领我到了一家顶便宜的工人饭店，他的夫人和小孩随后也来，四个人同吃，是我付的账。菜是非常粗陋，我几不能下咽。但是他们却津津有味地饱嚼了一顿。饭后向我谢个不了。看他们的样子，是好多天没有饱餐了。

因为我留科伦的时间不多，所以他只领我去走了几条大街，并去看了一看莱茵河的风景。科伦是莱茵河上的第一大城。河的两岸尽是工厂烟突。还有许多旧营房，半年前还驻有法比军队，新近是撤退了，但按照凡尔赛和约，德国仍不许在此驻兵。前年的万国报纸博览会曾在此开会。

道特芒

先后上车往道特芒（Dortmund）。道特芒有几位世界语同志是去年在伦敦识面的。这次闻知我要回国，再三邀我在他们那里留下住二三天。在我未到以前，他们已经准备好一切招待的事了。车到时友人H君和道特芒的工人世界语同志都来车站迎接。当晚我便在H君家下宿，住了两天，直到第三日早晨方离道特芒。

道特芒是德国西部的大工业城市，所谓鲁尔煤矿区（数年前被法军占领的）便在道特芒的附近。就街市建筑而论，这里是一个最有趣味的城市。因为城内的一部分还保留着中古的哥特式的建筑，而另一部分则为战后新

建的最新式的表现派建筑。我们在街上闲游时，有时走进湫隘的小巷，两旁是古色斑斓的旧教堂，但绕过一个弯，便见了高可摩天的钢骨洋灰的大厦，外面排着百货商店的市招，一切的装饰全是新奇古怪的。这可以给你一个非常离奇的对比。

去参观了道特芒一个最大的钢铁工厂。这工厂的四周有十多里路远，比得上一个小城市。厂内有电车，有铁路，几十个大烟突整日放出烟煤，把附近一带的房屋、田庄全熏成了黑色。熔铁厂的大锅炉，有一所房屋那样大，透着赤色的火焰，远远望去，活像一个会吞人的怪兽。一走到了厂门附近，就听得机器震动的声音，镇日价和雷一般的响着。平常的人进去便会觉得头晕脑胀。在里边整日夜工作的，生活更可想而知了。这样便是现代的文明，因产业革命而造成的现代生活！

那厂平时雇工 1.4 万人，现在减少到只有 5 千人。道特芒全城失业工人多达 6 万人。

我去看了厂附近的工人住宅。虽然都是七八层大洋房，但是老旧污秽的不堪。走近时便觉臭气扑鼻，和上海浦东一带苦力所住的棚屋也差不多。特别是屋旁囚首鸠面的一群小孩，光景更是可怜。

道特芒既是大工业城市，所以工人的势力非常大。工人的报纸就有两家。一家是属于社会民主党的，名叫 **General Anzeiger**。一个是共产党的，名叫 **Volks-Zeitung**。我因为对于新闻事业特别有兴味，所以两家都去参观了。而且还会见了 **General Anzeiger** 的总主笔。虽然是工人报纸的总主笔，却向一个银行行长那样的威风。知道我是远从中国来，却格外的客气。他仿佛不大明白中国事情的样子。他所知道的关于中国的消息，全是从英国资产阶级报纸上得来的。共产党的那家报馆，空气就不同。那边的印刷工人看见了一个中国客人都放下工作，争着握手招呼。谈起中国事来，也很熟悉。

世界语同志的集会

到道特芒的第二天晚上，全城的工人世界语同志在市内的工会俱乐部内特意召集了一次会议，请我讲些中国的事。与会的男女老小有四五十人。我是和王子一般地被优待着。我讲了一些中国的大概情形后，大家都提出问题来问我。问到了中国工人的生活，妇女的地位，平民教育的情形后，大家都非常惊诧，想不到中国人能过这样的非人的生活。他们虽然也有失业，也有经济恐慌，但像中国苦力的生活，他们是做梦也想不到的。最后有一个七岁的小姑娘操着极流利的世界语问我：“中国有洋囡囡没有？”我说：“有的。你跟我到中国去，我便给你一个中国磁制的大洋囡囡。”满堂的人都笑起来。

在道特芒虽只住了两天，但我对于道特芒世界语同志的热情是永不能忘怀的。他们对我真像兄弟一样地亲切。一切我要求的事，他们全应许了，我要去看的地方，他们全陪我去看了。而且到处全替我设法，竭力要使我满意。我在H君家住了两天，一切食宿车资零用，不要我花费分文。他们说是特地请了我来，所以应该由他们花钱的，我因此倒反不安起来。因为他们自己都不是有钱人，而且有的是失业工人，他们却挨了饿来陪我玩。当我上车离开道特芒那天，全体的世界语同志都到车站来送行。我要替他们代买月台送客票，却不许。他们每一个未失业的工人代买一张票给一个失业的。我见了这种情形，感愧到万分。只有下层民众，才真能消除民族国家的成见，大家如兄弟般地携手。只有统治权到了这些人手里，世界才有和平可言，至少我是这样相信的。

工人家庭

现在再来说一说工人的家庭生活。拿我友H君的家庭来做例子。H是

一个印刷工人，已有 50 余岁了。他和他的夫人一个儿子同住着。夫人操家政，儿子是在五金工厂做工的。他们父子俩侥幸都没有失业，所以在工人中间要算是有幸福的。他们的住宅是在四层楼上，一个客堂，两间卧房和一个厨房。器具是很简朴的，但客堂里有钢琴，缝衣机，打字机和无线电收音机。收拾的很清洁，在中国已要算是小康的家庭了。他们一家每日只吃一顿正式的餐饭，便是在正午。早晨和晚上，只喝茶或咖啡，和几块面包就算了。H 君夫妇是素食主义者，所以食品很简单。他们父子每天清早六时便到工厂去。午刻回家午餐，餐后又去工厂，到四点余回来。每晚的生活大多是围炉坐谈，或者阅读世界语文学与杂志。他们一家全能讲流利的世界语。H 夫人待我和母亲待儿子一样的亲切。在旅行中我的外褂钮扣都丢失了。在 H 家过了一宿，清早起来，披上外褂时，钮扣却都是完好的。H 夫人在深夜偷偷地替我补缀好了。

失业登记所

不幸而失业的几位，生活就不像 H 君那样的舒适了。他们虽然多少都可以领得一点失业扶助金，但这往往不到原有工资的半数，自然是难以生活，他们只好节衣缩食地挨着日子。我去同他们看了失业登记所。每个失业工人，每星期一三五日都必须到登记所去盖印。在每人有一本的小册子上盖了印后，方能领得两天的扶助金。因为失业工人多，登记所门前总是挤的满满的。要排了队，候了两三点钟，方能挨到登记的柜前。工人住处较远的，每去盖印一次，这样便花了一个整天。多浪费劳力和时间啊。我挨进去看时，屋子内却很宽大，排列着有十多个柜台，依照字母分划着。登记所办事的人大部分是工会的职员，所以对工人都和气。虽然挤着满屋子的人，满屋子的愁苦与贫穷，但是大家都是静悄悄地，并不怎样骚扰。有时也有失业工人的示威运动，则是排了整齐的队伍，在街上游行，喊口

号。行列却依然非常严肃。德国人守秩序，具组织的精神，却是可以使人佩服的。

汉诺威

别了道特芒的同志以后，坐四点钟的火车，就到了汉诺威（Hannover）。汉诺威的世界语同志 75 岁的老翁 L 君冒着大雪来车站迎接。汉诺威是普鲁士邦的一个大城，工商业非常繁富。有前皇室的别宫及御苑，现在都改为公园及博物馆。全城可游览的地方很多。但我到的那天，下着拳头样的大雪，气候降到零下 20 度。埋葬在白雪下的古城虽然分外美丽，可是因街上太寒冷的缘故，不能出去游览。L 君引导我到了一家车站近旁的咖啡店内，坐了半天。那咖啡店是一所玻璃建筑的圆亭，四面可了望大街上的行人和远处的雪景。又有着悠扬的音乐，所以并不觉着寂寞。

L 君去找了当地的许多世界语同志，晚间在一所公共食堂里集会，大家闲谈了一个黄昏。这里的空气可是和在道特芒不同。因为在道特芒所遇见的是些工人同志，而在汉诺威，陪伴我的却是几位绅士先生绅士太太和小姐们。他们都温文和蔼，懂得礼貌。我很愉快，但也感到拘束不安。我们虽也谈到了未来战争，谈到政治，谈到经济恐慌，可是大部分所谈的还只是风月。所以在这里没有报告的必要。

在夜半以后，我上了夜快车，由两位先生一位太太伴送我到车站。天明时我已到柏林了。

1931 年 5 月

——原载《中学生》，总第 15 号

Kelkaj Impresoj de Mia Lasta Vojaĝo

Veturante de Parizo al Ŝanhajo lastan januaron mi havis la okazon viziti Germanion, Polion kaj Sovetion. Mi restis unu aŭ du tagojn en Köln, Dortmund, Hannover, Leipzig kaj Varsovio, kaj unu semajnon en Berlino kaj Moskvo. La tempo estas tre malmulta kaj mi scias neniajn nacilingvojn de ĉi-supraj tri landoj, tamen per Esperanto mi sukcesis viziti la urbojn sen ia ajn malfacileco kaj konatiĝi kun la vivo tiea, precipe la laborista vivo. La unumonata vojaĝo donis al mi pli multe ol trijara lernado en universitato. Ne estas eble priskribi ĉion kion mi vidis kaj aŭdis dum la vojaĝo. Nun mi rakontas nur kelkajn rimarkindajn impresojn en tiuj urboj.

Antaŭe mi jam restis tri jarojn en Eŭropo kaj jam bone kutimis vivi en Esperanta vivo. Laŭ mia sperto ĉiuj esperantistoj estis afablaj homoj. Tamen nenie kaj neniam mi trovis tiel grandan entuziasmon kiel en mia lasta vojaĝo. Ĉie mi estis bonvenigita kiel malofta gasto, akceptita de la geesperantistoj kiel ilia propra frato. Multokaze oni helpadis, gvidadis min tage kaj vespere, gastigis min ĉe sia hejmo kaj plenumis ĉion kion mi petis. Kelkfoje mi min trovis eĉ iom ĝenata pro tio ke oni tro honorigis min. Oni ofte akceptis min kiel la princon senkronan. Tion mi ja ne decas. Alie mi nevolonte ekspluatis la gekamaradojn. Por mi ili perdis multe da tempo kaj mono. Mi ĉiam hontas ke mi havas nenion rekompenci ilian afablecon kaj entilecon. Nun mi esprimas ĉi tie mian tutkoran

dankecon al ĉiuj gekamaradoj kiuj helpis min dum mia vojaĝo kaj deziris al ili la ĝojan vivon kaj bonan farton, kvankam tio tute ne sufiĉas esprimi mian dankecon.

Unu fakto ree konvinkis min en mia lasta voja ĝo; t.e. ke la laborista esperantisto ludas la ĉefan rolon en nia movado. Unue laŭ la organiza punkto. De post la granda milito la laborista esperantara movado ekkreskis kaj vigliĝis, kaj nun trapasis la burĝa neŭtrala movado. SAT, la tutmonda laborista Esp. organizo, multe pli juna ol UEA, la neŭtrala organizo, estas nun preskaŭ egale forta kiel UEA laŭ la nombro de membroj kaj eĉ pli forta ol ĝi laŭ la agadkapableco. En Germanio kaj Polio la laboristaj Esp. asocioj estas pli aktivaj kaj pli bone organizitaj ol la neŭtralaj naciaj asocioj. En Sovetio, la Sovet-Respublikara Esperantista Unio (SEU), ankaŭ laborista organizo, estas la plej granda nacia grupo en la tuta mondo. Laŭ mia sperto nur la laboristaro vere bezonas internacian lingvon kaj nur ĝi kapablas batali por ĝi ĝis la fina venko.

Due laŭ la morala punkto. Post la milito la interna ideo, la esperantismo mortis aŭ preskaŭ mortis, nun ĝi revivas en la laborista movado. Proletara solidareco kaj marksista internaciismo donas novan forton al Zamenhofa lingvo kaj savas ĝin el la morala disfalo. Mia kontakto kun diverslandaj kaj diversklasaj esperantistoj pruvis tiun ĉi vidpunkton. En okcidenta Eŭropo mi renkontis multajn tiel nomatajn neŭtralajn esperantistojn. Nur kelkaj tre malnovaj pioniroj, samtempuloj de Zamenhof, estas sinceraj, bedaŭrinde ili estas troaĝaj, kaj ilia ideo estas tro utopia, fanatika kaj tute ne taŭgas por nuna situacio, ili do povas

fari nenion por nia movado. Aliuloj lernas Esperanton nur por ekspluata celo, ili uzas Esperanton por sinamuzado, pro scivolemo aŭ por komerca intereso. Sin doni por Esperanto-movado ili neniam volas. Kiam mi renkontis burĝajn ne-ŭtralajn esperantistojn, oni ofte demandis min: "Ĉu la ĉinoj manĝas hundon?" "Kiom da edzinoj vi havas?" ktp. Ili ja pensis ke ili parolis kun malalta sovaĝa popolo. La nova lingvo neniam ŝanĝas ilian naciisman antaŭjuĝon. Estas ja paradokso ke mi estis de tiuj estimataj sinjoroj nomata "ŝamideano", ĉar verdire neniun ideo estas sama inter ni.

Laboristoj uzas Esperanton por sia klasbatala celo, sed ne por persona intereso. Ili estas fanatikaj agitatoj, tamen materialismaj pensantoj. Ili lernas, propagandas Esperanton sur reala idealogibazo. Patrion ili ne havas, sekve malaperis inter ili ĉiuj naciaj antaŭjuĝoj. Kiam mi estas inter laboristaj esperantistoj mi sentas ke mi vivis vere en Esperantio, ke mi estis ĉirkaŭata de miaj propraj familianoj. Multaj kamaradoj kiujn mi vidis en Germanio, Polio donis sian tutan tempon kaj sian malriĉegan havaĵon por nia movado. Tio neniam okazas en la neŭtrala rondo.

La germanoj estas la plej bonaj organizantoj en la mondo. Ankaŭ la germana Esp. movado estas pli bone organizita ol en aliaj landoj. La lokaj grupoj, kiujn mi vizitis, estas ĉiuj en bona ordo. La kunvenoj estas ĉiam multe vizititaj. En Berlino la laborista Esp. movado estas organizita laŭ la ĉelmetodo. En multaj fabrikoj, sindikatoj, lernejoj ekzistas esperantista ĉelo, kiu varbas, propagandas kaj instruas inter la laboristaro. En tiu ĉi jaro la Germana Laborista

Esperanto-Asocio aranĝis kun Sovet-Respublikara Esperantista Unio kontrakton de socialisma konkurenco por Esp. movado.

Bedaŭrinde la germanaj gekamaradoj estas nun en tre malfacila situacio. Multe da ili ne povas trovi laboron. En la tuta lando 5 000 000 laboristoj senlaboriĝis. La senlaboruloj vivas en tre mizera vivo. Ĉiuj du tagoj ili iris al la stampejo de urbdomo por ricevi iom da subtena mono. La berlina k-do diris al mi ke dum la lasta novjaro nur la magazenoj de malmultkosta produkto, la dekpfenigaj magazenoj vendis multe, la pli grandaj magazenoj preskaŭ ruiniĝis pro la manko de aĉetantoj. La vendistoj plendis ke ili havas tro multe da komercaĝoj nevenditaj, tamen la laboristoj ne havas sufiĉe da mono por kontentigi siajn bezonojn. La kapitalismo kreis la tutmondan ekonomian krizon, en kiu la germana laboristaro suferis plej multe.

En Varsovio mi restis nur unu tagon, tamen mi konatiĝis kun multaj esperantistoj. Tieaj kamaradoj ankaŭ multe suferas pro senlaboreco. Ili entuziasme akceptis min ĉe la stacidomo, kaj kondukis min viziti la tombon de Zamenhof. De tagmezo ĝis nokto mi ĉeestis kaj paroladis en kvin kunvenoj: du laboristaj, du studentaj kaj unu neŭtrala publika kunveno. Mi estis kortuŝita ĉe la kunveno de "Laboro", kie pli ol kvarcent gelaboristoj aŭskultis mian raporton pri SAT kongreso kaj ĉina afero. Bedaŭrinde la tempo estas limita. Ili ne volis min foriri. Nur kun granda malfacileco mi sukcesis eliri el la kunvenejo. La vizito estis tre tre laca, tamen tre ĝoja kaj serioza. Mi multe dankas la junajn kamaradojn kiuj gvidadis kaj akompanadis min.

La sekvantajn tagojn matene mi reveturis kaj alvenis Moskvon post unutaga vojaĝo. Multaj gekamaradoj atendis min ĉe la stacidomo. Mi havas pasporton nur por transiri sed ne por resti en Sovetio. Tamen per la helpo de moskvaj esperantistoj mi sukcesis resti en Moskvo unu semajnon. Mi vizitis fabrikojn, lernejojn, infanejojn, publikajn kuirejojn, laboristajn domojn, malsanejojn, Kremlin, tombon de Lenin, teatron, lokan sovetan administracion ktp. Raporti ĉion kion mi vidis kaj aŭdis dum la semajno necesas unu dika libro. Tie ĉi mi nur diris kelkajn vortojn: (1) En Sovetio la senlaboreco ne ekzistas, tiun ĉi jaron por la industrio mankas ankoraŭ 2 milionoj da laboristoj. (2) La sovetanoj nun kunigis ĉiujn fortojn krei socialismon; la kvinjara plano estas plenumata kun granda sukceso. (3) Ĉiuj, kiujn mi renkontis en Moskvo esprimis al mi sian kontenton de la nova justa vivo.

La 3-an de februaro mi forlasis Moskvon kaj post ok tagoj mi estas ree en mia malluma malfeliĉa lando. Adiaŭ Eŭropo! Adiaŭ, miaj eŭropaj geamikoj.

Hujucz

15.3.31. Shanghai

——原载《绿光》，1931年第3—4期

附译文：

最近一次旅行的几点印象

今年1月份，我从巴黎回上海，途中有机会访问了德国、波兰和苏联。我在科隆、多特蒙德、汉诺威、莱比锡和华沙各停留一、二天，在柏林和莫斯科分别逗留了一星期。时间是短暂的。我并不懂这三个国家的民族语言，但借助世界语，我毫不费力地、顺利地参观了这些城市，熟识了当地的生活，尤其是工人的生活。一个月的旅行比我在大学里学习三年收获还大。我不可能把我在旅行中的所见所闻都写出来。现在我只讲述在这些城市的几点突出的印象。

以前我曾在欧洲呆过三年，并且已经很好地习惯了世界语的生活。根据我的经验，所有的世界语者都是和蔼的人。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还是在什么时候，我都从未见过像最近一次旅行中这样高的热情。在各地，世界语者就像欢迎不寻常的客人一样欢迎我，就像招待自己的兄弟一样招待我。在很多场合中，他们帮助我，白天、晚上都给我做向导，让我在他们家做客，我所有的请求他们都办到了。有几次我都为他们过分的厚待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他们接待我就象接待无冕之王。这对我是不合适的。另外我也不愿意剥削这些同志。他们为我花费了许多时间和金钱。我没有任何东西回报他们的热情和客气，我总是感到羞愧。在这里，我向所有在这次旅行中帮助过我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祝他们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尽管这完全表达不了我的谢意。

在最近一次的旅行中，再一次使我确信的一个事实是：工人世界语者

在世界语运动中起着重要作用。首先，从组织这一点讲，第1次世界大战后，工人世界语运动就开始发展和活跃起来，现在资产阶级的中立的运动已经过去了。全世界工人世界语组织——全世界无民族协会比中立的组织——国际世界语协会年轻得多。现在这个组织会员的数量几乎与国际世界语协会同样多，而活动能力甚至比国际世界语协会还强。在德国和波兰工人世界语协会比较活跃，他们比中立的国家协会组织得更好。在苏联，也是工人组织的苏联世界语联盟，是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团体。根据我的经验，只有工人阶级真正需要国际语，只有工人阶级有能力为国际语的最后胜利斗争到底。

其次，从精神上讲，大战后，内在理想——世界语主义，已经死亡了，或者说差不多死亡了，而现在它又在工人运动中苏醒了。无产阶级的团结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主义给柴门霍夫的语言以新的力量，把它从精神崩溃中解救出来。我同各国和各阶层的世界语者的接触证明了这一观点。在西欧我遇到过许多所谓的中立世界语者。只有几位非常老的前驱——柴门霍夫同时代的人，是真诚的，遗憾的是他们年纪太大了，他们的思想过于不切实际，过于狂热，完全不适应当前的形势，他们在世界语运动中做不了什么事了。其他人学习世界语的目的是为了剥削，他们用世界语是为了消遣、好奇，或是为了商业利益。他们从来都不想为世界语运动献身。当我遇见资产阶级中立世界语者时，他们常常问我：“中国人吃狗肉吗？”“你有几个妻子？”等等。他们以为他们在和矮小的野蛮人讲话。这种新的语言永远改变不了他们的民族主义偏见。我被这些尊敬的先生们称为“同志”，这实在有悖常理，因为老实说我们之间并没有相同的思想。

工人使用世界语是为了阶级斗争，而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他们是狂热的鼓动者，然而却是唯物主义思想家。他们在现实的理想主义的基础上学习、宣传世界语。他们没有祖国，因此在他们中间一切民族偏见都不存在。当我置身于工人世界语者中间的时候，我感到，我真正地生活在世界语国度里了。周围都是自家人。我在德国和波兰看到许多同志，他们把自己的所有时间和贫乏的财产都献给了世界语运动。这样的事在中立的团体中永远不会发生。

德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组织者。德国的世界语运动也比其他国家组织得好。我所访问的地方小组都井然有序。总有很多人到会。在柏林，工人世界语运动是按支部的方法组织起来的。在许多工厂、工会、学校里都有世界语者支部，这些支部征收会员，在工人阶级中宣传和教授世界语。这一年德国工人世界语协会和苏联世界语联盟签订了为推动世界语运动而进行社会主义竞赛的协议。

很遗憾，德国的同志们现在处境很困难。他们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在全德国有500万人失业。失业者的生活极度贫困。每两天他们去市政府大厦的盖印处去领一点救济款。一位柏林的同志对我说，新年时，只有那些商品价格便宜的商店和十芬尼 的商店销售额高，一些大的商店由于没有顾客几乎要破产了。售货员抱怨他们积压了许多卖不出去的商品，而工人没有足够的钱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资本主义制造了世界经济危机，受害最大的则是德国工人阶级。

在华沙我只停留了一天，但却结识了许多世界语者。这里的同志也遭

芬尼，德国的货币单位。

受失业的痛苦。他们在车站热情接待我，带我去参观柴门霍夫的坟墓。从中午到夜间我出席了五个会议，并作了演讲，其中两个是工人的，两个是大学学生的，一个是中立的公共会议。在一个“工作”的会上我很受感动，那里有400多工人听我报告全世界无民族协会大会和中国的事情。很遗憾，时间是有限的。他们不愿意让我走。费了很大的劲儿，我才走出会场。参观是非常累人的，然而却是令人高兴的，也是严肃的。我非常感谢那些给我引路、陪伴我的年轻的同志们。

第二天早上，我又启程了，一周以后，我抵达莫斯科，很多同志在车站等我。我的护照只能路过苏联，而不能在苏联停留。然而通过莫斯科世界语者的帮助，我顺利地、在莫斯科逗留了一星期。我参观了工厂、学校、托儿所、公共食堂、工人住宅、医院、克里姆林宫、列宁墓、剧院、地方苏维埃管理处等。要报告我一周的所见所闻需要写一部厚厚的书才行。在这里我只说几句话：（1）在苏联没有失业，这一年工业还缺200万个工人。

（2）苏联人正在团结一切力量建设社会主义；五年计划正在进行，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3）我在莫斯科所遇见的每一个人都对新的公平的生活表示满意。

2月3日，我离开莫斯科，8天后我又回到了我们黑暗不幸的国家。再见，欧洲！再见，我的欧洲的朋友们！

胡愈之

1931年3月15日于上海

（肖平译）

莫斯科印象记（节选）

Al Moskvoj gekamradoj, kiuj volonte gastigis, helpadis, gvidadis min dum mia vizito de la ĉefurbo de tutmonda proletaro, mi dediĉas tiun ĉi libreton.

Hujucz

序

日本的世界语者秋田雨雀先生于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游俄归来后写了一本《青年苏维埃俄罗斯》。在那书里，他说：

知道苏俄的将来的，便知道了全人类的将来。

苏维埃联邦正在改造的途程中，它的将来，还没有人能知道。但是单就目前说，十月革命却已产生了许多奇迹。而就我所见，最大的奇迹是人性的发见。

在莫斯科使我最惊奇的，是我所遇见的许多成人，都是大孩子：天真，友爱，活泼，勇敢。有些人曲解唯物主义，以为苏维埃的生活是冷酷的、机械的、反人性的。我的所见，恰巧是相反。我在那里是一个生客，但是住了一二天，就觉得个个人是可亲的、坦白的、热情的。

但是想起来这也并不足以惊异。因为苏维埃革命，是以废除掠夺制度、

世界语的译文是：“我谨将这本小书，献给莫斯科的男女同志们，当我访问全世界无产者的首都时，他们自愿地给予我接待、帮助和指导。 胡愈之”——戈宝权译

奴隶制度为目的的。掠夺制度一旦废除以后，有手有脑的人，不必再为生活而忧虑；人不必依靠剥削别人或向人求乞而生存；这样成人与孩子间的鸿沟自然是给填平了。

说布尔什维主义是“恨的宗教”的，分明是在说谎。试想国家、种族、阶级、身分的成见除去了以后，再有什么能阻碍人与人的相爱呢？自然，阶级斗争还在猛烈地继续着。但愈是在勇猛的火线里愈显出人类大众的同仇敌忾。雷马克（Remarque）的《西线无战事》，成为时下流行读物，不就是因为他所描写的战壕中的 camaradrie^① 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吗？

奴隶打破了锁链以后，奴隶便是大勇者。不然，对于苏联产业改造的超亚美利加^② 的速率，便无法解释了。

要是我们的知觉还未完全麻痹了，当着这伟大的创造和这些诚实、勇敢、热烈的创造者的面前我们是不免要面红耳赤的。

为了表示我的惊奇与愧怍，并为了酬答莫斯科的朋友们的礼让与善意，我才写了这一本小书。

本书的目的，也就不过如此。除此外，我劝告读者，对于本书最好不要有什么大奢望。

诚然，现在有许多人，颇想明了苏联的内情。但我这一本小书却不能给他们一个满足。我只是偶然在莫斯科停留了一个星期。除了首都以外，占全世界陆地六分之一的苏维埃联邦，我都没有到过。靠了这一点浅薄的经验，想明了苏联及其空前的革命事业的实迹，那简直是梦想了。（为了使这些关心苏联内情的读者，不至过分地失望，我愿意把本年天津《大公

^① 法语，同志爱。——编者注

^② 美国。——编者注

报》所载的“苏联特约通信”^①介绍给他们；虽然这位通信员的观点并不和我相同，但我敢相信在国内关于苏联的新出版物中，这是仅有而比较忠实的一种。）

要是有人想从我这书中，找出一些观念，或者一些主义，他的失望一定是更大了。因为观念和主义是为了别种目的用的。我并没有为了同样的目的而写这本书，这是很明白的事。也许竟有人截取了我的文字的片段，去回护他自己的观念主义，或攻击别人的观念主义，那么，只好由他们去胡缠，我哪里理会得这许多。

著者

1931年7月28日于上海

跨进普罗之国

从巴黎开来的国际列车，通过波兰境内最末一个车站后，便鸣着悠长的汽笛，放低了速度开行。不上一会儿，已到了苏联边境。这样地旅客便从白色的法西斯国家，跨进了赤色的苏维埃国家，可是并不曾有什么异样的感觉。从车窗向外探望，只见路轨的两旁，有两列的红军放着步哨。这些哨兵都披着黄色皮大氅，臂上和帽上缀着红星章，枪上上了明晃晃的刺刀。一个个全是雄纠纠，顶呱呱。他们，他们原来是世界第一个无产国家的前线的守卫卒，他们要防御全世界的布尔乔亚国家的袭击，自然格外要耀

^① 曹谷冰：《苏俄视察记》。——编者注

武扬威，才见得普罗国家是不可轻侮的。

进了俄国边境，车便在奈戈莱罗亚（Negoreloe）车站停下。旅客照例在这里检验护照行李，随后换车开往莫斯科。从西欧第1次到俄国的旅客，对于入境检查，都不免有戒心。但就我个人的经验，入俄境的检查并不比法、德、英、比等国的入境检查更麻烦。俄国的检查员，对旅客很和气，不像别国税关吏那样地板起面孔。下车的中国人，除我以外，有两个青田小商人。我们的行李只约略看了一看，并不留难。只有我们旁边一个日本人，像大学教授的模样，带的箱笼很多，却一件件地细细检查过，连随带的德文画报和日记册都一页一页地翻阅过。税关内部的布置，和别国税关并没有什么差异，所不同的就是壁上满贴着赤色的标语，此外还有赤色救济会的招待所。在车站上最觉得可异的，是站上办事人员的从容不迫的态度。站内的搬运夫替客人提行李，老是慢吞吞地走着，客人催促着，他也不理会。检查员也是如此。绝不像在别国车站所见的那样匆忙紧张。有人说这是斯拉夫民族的习性，所以如果你只到了俄国的车站，你便不能相信，他们是在厉行五年的工业化计划，是在用着所谓“布尔什维的速度”，追赶美国的生产阶段呢。

莫斯科车站

清早醒来，车已快到莫斯科了。铁路两旁渐渐看见许多建筑房屋的木架。到了莫斯科近郊，在建筑中的房屋愈多，有的是在建造工厂，有的是盖着工人住所。大概是五年计划的建筑设计的一部分罢。除了这些已落成

未落成的新建筑以外，到处便只是一片冰雪。我来是在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莫斯科乃至俄罗斯的北部，整个埋葬在白雪底下。早晨的微弱的阳光，从雪地上面反射，闪耀着眼目，风景却是梦想不到的美丽。

在我将从巴黎出发以前，很早我就想了种种方法，请求驻在巴黎的苏联总领事，准许我在莫斯科停留一星期。巴黎领事署说是作不得主，便替我拍电去问莫斯科政府，可是莫斯科的复电只准许通过，却不许停留。所以我只办了个过境护照，在莫斯科下车停顿是早已绝了望的。不过从俄国西境到西伯利亚的列车，照例要在莫斯科停车八小时，我想利用这非常宝贵的八小时，看看赤都的大概情形，所以在出发以前，就写了几封信给莫斯科的世界语同志。在以前我并没有和俄国的世界语同志通过信。这次我是从工人世界语的团体的年鉴中，随便找出几个地址，寄信去，告知我到莫斯科的日期。果然，正如我的预期，车进了莫斯科站时，远远已看见两个女同志手挥着小绿星旗^①在迎接着。一位是在中央邮政局工作的 R 女同志，另一位是在她的同部练习工作的少女。下了车，进了车站，又有两位，N 与 L 同志（请读者勿生误会：对于苏维埃人民如称“先生”或“女士”，便是一种不能饶恕的侮辱，所以我在本文里，只好依着他们的习惯，称为“同志”或“女同志”，虽然俄文的 *tovarisch*，世界语的 *kamarado*，译作“同志”是很不确切的。）也在等候着。异国的世界语同志，初次见面时，照例是和见了家里人一般的亲切。中国人讲着世界语来到苏联的更是不常有。所以他们见了我也就和我见了他们一样的欣喜。R 女同志便问我在莫斯科能住几时，我说午后就要动身走。他们都说，在这里只停七八个钟头是看不到什么的，

^① 世界语的旗帜。—— 编者注

如要看看，至少也得住上十天五天。我就说了因护照办不成虽想停留而亦不能停留的原委。于是 N 同志与 R 女同志提议和我同去向莫斯科当局交涉，会得到停留的准许也未可知。我想不到还有这样的机会，自然是接受他们的提议了。

他们也不很熟悉请求停留的手续应该怎么办。于是先引导了我到车站内 O. G. P. U. 的办公室里去询问。一听到 O. G. P. U. 这名称，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这不是在西欧一般人所称为神出鬼没、狡诈残酷的苏俄政治警察机关吗？可是一到了那里，我便大为失望。O. G. P. U. 的办公室，原来是空空的，中间只有一张破旧的长桌，桌上放着一架电话机，几本破烂簿册。桌旁坐着一个着黑色制服、腰系手枪的人，正在低着头写字。我们进去后，那人就起立招呼。N 同志代表我说了原委，那人就打了几个电话，随后向我们说，应该到莫斯科市苏维埃去交涉。于是我们便辞了出来。假使在西欧，有人知道我曾去过莫斯科的 O. G. P. U.，他们不会相信我还能生还的！

莫斯科苏维埃

我们到了莫斯科苏维埃，这是莫斯科的市政府，全市的地方行政事务，全在这里办。关于外人入境出境的护照签字，在这里另设着一个专部。苏维埃的房屋很老旧，大概是从前官署改的。入口处有两个卫兵，但对一切往来的人全不查问。我们在门口脱下了大衣存放着，就到了楼上办公处。

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英文译名的缩写。—— 编者注

办公处的布置，和平常银行的柜台相似，分着几个窗口，分别办事。一切情形和我们在英，法的市政厅所见的差不多。只是柜台内坐着办公的，女职员较多，态度和蔼，少一些官场气。在办护照签字的那一部分，我遇见了两个中国工人，也在办出境护照的交涉。

我的同伴，代我向办事人问了一下，方知是应该向一位主任请求。于是，我们进了另一间屋子，去见那部分的主任。L同志等便向他说了许多话，表明来意。那人起初还不肯，后来伴我去的人，再三和他交涉。我全不懂他们的话，大约是说莫斯科世界语会要请我演讲，所以非停留不可。后来那人把我的护照留下，我们便兴辞而出。

出门时R女同志很高兴地向我说：

“好了，好了，现在你已得到在莫斯科停留七天的准许了。”

D 同志的家庭

出了莫斯科苏维埃以后，我们便分了道路：R女同志去火车站，代我取回行李，并退回卧车票价。N同志陪伴着我，去会见苏联世界语同盟的总书记D同志，并商量食宿等事。

D同志是工程师出身，共产党党员，有一个时期，曾任过政府要职。现在是担任莫斯科大学教授，工业报主笔，V. O. K. S.（对外文化联络会）的委员。他又是个世界语运动的先辈，在欧战以前，他已是一个著名的世界语学者。革命以后，世界语得为现政府所重视，有不少地方是依靠了他的力量。目前他是全俄世界语运动的领导者。但因为他和国际工人世界语会

领袖（法人）个人意见冲突的缘故，致使苏联世界语运动与国际工人世界语运动中间，发生了裂痕。到了最近，普罗的国际世界语组织，也和国际工人体育会一样，分成了第三国际与非第三国际的两派，这是很可惋惜的。

到了 D 同志的家，主人已在等候着。D 同志的家庭，就我在莫斯科所见，要算是最富裕的。房屋是一间卧房，一间客室，和一个小厨房。客室里的装饰，算不得十分华丽，却是足够舒适，有沙发椅，有无线电收音机，有留声机架，有名贵的油画。木器全是上等的。虽然比之于西欧工人家庭，这样的装饰，不算是奢侈，但以后我在莫斯科看到过的几个家庭，都没有像这样的阔绰。满屋的书架，装满世界语的书籍。据 D 同志自说，各国世界语的出版物，不论新旧，凡是重要的，都在这里了。原来这是费了二十余年的时间搜集成的。D 同志的夫人是一个娇小美貌的少妇，装束也颇入时。即使走到巴黎的交际社会里，也不会觉得奇怪。据她自说，从前也曾到过巴黎，所以能说得漂亮的法国话。这样的女子，我在莫斯科，也只有见过这一个，此外我所见的少女（外国旅客不算），全是不加修饰的。后来 R 女同志附着我的耳说：“你看，D 同志的家庭是有些太像布尔乔了。”

和 D 同志谈了许多话，大半是关于世界语的。他因知道我是从法国来，所以问了我许多关于国际工人世界语组织的事，并探听我个人的意见。我也问他俄国政府对世界语的态度。据他说，俄国革命以后，政府对世界语是不大同情的。因为俄国革命领袖都是多年流亡国外的，他们大多学会了二三种外国语，所以不感到世界语的需要。列宁夫人并且在《真理报》上撰文反对世界语。所以当时世界语运动的进行颇困难。后来经过了许多次论争，到现在政府对于世界语，只算是取中立态度，也不反对，也不提倡。

各地的世界语会却可以自由活动，从事宣传，政府不加干涉。但现在政府发行的邮票明信片，却有许多是把世界语和俄文并列。又国家设立的无线电播音台每星期总有几次用世界语播音。**V. O. K. S.** 也刊布了许多世界语文件，以供国际宣传。所以和现在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苏联政府还算是能帮助世界语运动的。

寝室内的欢迎会

到了福金街二号，扣门进去。于是我得救了。

在大雪中奔走了三点钟骤然进了温暖的室内，虽然只是简单的工人的住所，在我已如进了皇宫一般。尤其是第1次见着我时，宿舍内人们的和蔼的笑容，使我从内心里感到无量的温煦和愉快。

宿舍的办事员，引导着我进了寝室。满屋子人大多已睡在床上。R女同志替我介绍了一下。这宿舍的旅客多是从乡间来的，很少见过中国人。闻知我从上海来，都非常高兴。尤其是室内的一大群天真的小姑娘——从南俄克里米亚岛来莫斯科参观的女学生——都喜的不想睡觉，一个个都披着睡衣起床。这样便在寝室内开了一个小小的欢迎会。他们要求我报告一些中国的情况，并七嘴八舌地问了我一些中国的事，以及我在欧洲旅行中的见闻。R女同志用世界语作了我们中间的翻译。那克里米亚学校的女教师，向我致了简短的欢迎辞。中间有一个犹太人说了几句犹太语，一个鞑靼人说了几句鞑靼语，都表示欢迎之意。

大意是如此，他们都是东方或亚洲弱小民族，在革命以前和中国民族

处着同样的地位，现在他们是自由了，却对着正在解放斗争中的中国民族表着甚深的同情。接着一群十七八岁的克里米亚姑娘唱了一曲南俄的民歌。最后是大家站在床前大声欢呼，声音震动寝室的四壁，惊破莫斯科夜半的静寂。

我忘却了刚才的寒冷，忘却了一日间的困顿。我兴奋了，我感动到下泪。饱吃了一顿茶和饼干后，我便倒在床上睡下。这一晚我有着一生中少有的甜蜜的熟睡。

克里米亚的女学生们第二天午后便向列宁格勒出发了。分离前她们还要求我和她们合拍一个照片，留作纪念。

盲诗人的消息

早餐后，走到街上买了一份英文报《Moscow News》，仍回到寓所一边读着，一边等候 R 女同志。因为她约着今天向邮局请了假，来陪伴着我去游玩。实在，如没有她陪伴着，我便成了聋哑盲人，不懂得一句话，不认识一条路，偌大的莫斯科，我真不知道到哪里去才好啊。

直等到下午一时，R 女同志才来寓所，我们便出去先到车站取出了一些行李。随后同到苏联世界语会总事务所，请求那边的同志介绍了去访问 V. O. K. S.。在苏联世界语会内，遇到五六位世界语同志，并且得到了七八年前来中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的确实消息，这使我得到意外的喜悦。因为当我出国的时候，从日本方面得到消息，说这位不幸的诗人已经死了。我不敢

相信。在法国，我用了种种方法，托在俄友人设法探听，可是不曾接到过一个确实的答复。这一次，我在莫斯科世界语会遇到一位爱罗先珂的朋友，才知道盲诗人好好地活着。后来我遇到幼年时教他世界语的老师 J 同志，也得到同样的报告。据他们说，爱罗先珂不但没有死，而且比以前更愉快康健。他的兴趣非常好，和以前一样的“干着使我们明眼人惭愧的事”（J 同志说的）。在前年去年的暑假，他都到堪察加的北冰洋面上，坐着破冰船去探险，这几乎是不能使人相信的。在以前的几年中，他都在莫斯科当日文翻译和教师。要是我来莫斯科早了五个月，还能和他见面。现在他是在乌克兰的一个盲童学校教书，离莫斯科有 24 小时的火车。可惜路太远了，我不能去看他，不然，我可以和他诉说七八年来的别情，而且可以知道他最近的生活感想。无论如何，我相信他现在不会像在北京的时候那样，天天嚷着住在沙漠中的悲哀呢。

到莫斯科世界语会时已经是下午四点了，到 V. O. K. S 去已太迟，所以约定了明天再去。R 女同志说，福金街 2 号今晚有一个盛大的集会，她和我都被邀请作客人，所以我们必须早回去。因此我们只在街上走走，买了些零物，便回到寓所了。

R 女同志的历史

在回到福金街去的电车里，R 女同志叙述她自己的历史。她说：“我生平经过无数忧伤患难，在十年前我万想不到我还能亲见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我能过这样幸福的日子！”

原来 R 女同志是匈牙利人。在大战前，她是一个匈牙利的世界语运动者。在当时托尔斯泰一派的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思想，风靡全欧洲，她是受了这影响而学世界语的。她在匈牙利京城布达佩斯创办了当时著名的世界语刊物。她对于世界语文字的精通，在当时匈牙利是数一数二的。后来因为加入了政治社会运动，便渐渐把世界语的工作抛弃了。

1915 年大战进行的时期，她和她的丈夫 R 同志加入了社会党国际中的反对战争派，即布尔什维克。当时的领袖列宁、托洛斯基还流亡在西欧。俄国革命后，中欧一带革命，达到了最高潮，结果在佩拉·昆（Bela Kun）^① 指挥之下，产出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她的丈夫 R 同志便是这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邮电人民委员。这中欧唯一的苏维埃政府，不到数月便遭倾覆。政府要人到处流亡。R 同志夫妇改换了姓名假扮欧战时俄国俘虏，由万国红十字会送往俄国，但 R 夫妇不曾到过俄国，又不能讲俄国话，还带着三四个孩子，混在俄国俘虏队里，一不小心，便会露出马脚。这一路困难可想而知。这样的侥幸到了莫斯科。到莫斯科时虽然已出了险，但俄国话不能讲，俄国情形不明了。他们虽然是布尔什维克党员，但一切证据在路上已完全毁灭，无从证明。亏了库恩·贝拉和瓦尔加教授认识他们，向莫斯科当局代为证明，他们一家方在莫斯科住下了。

这是 1921 年的事。后来 R 同志因和 R 女同志个人感情不合，独自回到中欧仍去做革命工作。老 R 女同志则在莫斯科中央邮局做工，并看护小孩。

因为她是老党员，所以在邮局占重要地位，邮局职员也都爱重她。她

^① 现通译为库恩·贝拉，下同。——编者注

几次想脱离邮局职务，未得许可。这次陪了我在莫斯科走了几天，她更觉得邮局工作太枯燥，想把生活变换一下。因此又向邮局提出辞职。到我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她和我说，已得了辞职的准许。以后她想到乡间去做农村文化工作，因为她最爱和农民在一起。但因为她的大儿子还未在莫斯科学校毕业，所以一时还不能到乡村里去。她暂时想在无线电大学（用无线电授课的）任职员，或在一家少年日报当编辑。

在我写此文前数天，接得一个可惊消息：R 同志从国外乘飞机回莫斯科，在半途飞机坠死了。我想 R 女同志一定非常悲痛。我在这里附带表示我的同情与敬意。

列宁墓

从克里姆林出来，便去看列宁墓。列宁墓背靠着克里姆林城墙，前面就是每年五一节和十月革命节举行劳动者大示威的有名历史纪念地红场。

在我的想象中，以为列宁墓应该是一座巍峨的建筑物。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者，应该埋葬在像麦加的回教堂那样巨大的殿堂里，至少也应有像巴黎 Invalides^① 内拿破仑墓那样的规模，方才可供全世界平民大众的凭吊。但我走到红场前面时，便大大地失望。原来这列宁墓不过是一座低矮的构成派的建筑物。外表颇和巴黎国葬院（Panthéon）相类似，但只有四分之一的高大，雕饰和一切苏联新建筑物相同，是非常单纯。和墓后的克里姆林城墙，左旁的高大而华丽的城楼相比较，更显出这建筑物的谦卑。不

^① 法语，意译为残老军人院。——编者注

过整个的气概，却是雄壮而朴素。墓的前门宽不过二三尺。来参观的人在门前排着单人的队伍，鱼贯而入。进了门便向左转弯，踏着磁砖砌成的石阶，走下墓道，正中便是棺木，棺木下层是铜制的，上层是一个玻璃罩。列宁的遗体露出半身。颈部和右臂靠在枕上和被上。玻璃罩内面有反光镜的装置，所以状貌看的很清楚。观众绕着从前经过，全屋静寂无声，随后从右旁偏门走出门外。据说，每天列宁墓开放的时间，参观的人是和流水般来往不绝的。

墓门上面砌着列宁的名字。墓内却没有半个字。连一切图画雕刻的装饰全没有。

我是在巴黎所演的电影里第1次看见过列宁。他从办公处缓步出外，头戴着工人小帽，右手夹着一个皮夹，一边和一个老年的教授谈话。使我吃惊的是他那种谦卑的模样。身躯和腿比常人短小。但广阔的肩头，高耸的额部，英锐的目光，显出他是一个非常的人。这次看到他的遗体，使我也有同样的印象，只是两眼半闭着，已经不能反射出锐利沉着的光芒了。

列宁墓两旁，数十丈长的石阶，据说下面是埋葬着数百革命的献身者的遗体。但现在是被一尺余厚的白雪掩盖着，看不出一些踪迹。

在苏维埃国家，英雄主义与个人崇拜是不存在了。但阶级斗争的战士，仍然有着他们的“不朽”！

世界语者的招待会

世界语同志的招待会开始，已经是晚上八点了。和我同时被邀请的，

更有一个意大利的金属工人，他因受了白色迫害，到美国避难，后来又从美洲来苏维埃国土，到莫斯科已有一个多月，略能讲世界语。我问他在这里的感想如何，他说是以前意想不到的满意。他打算在苏维埃住下，进金属工厂作工。

我向莫斯科世界语同志表示了恳切的谢意，接着报告了去年在伦敦出席 S.A.T.^① 大会的情形。列席的莫斯科世界语者，似乎都非常关心国际工人世界语运动，显然关于俄国以外的世界语运动，他们都不易得到正确的消息。末后，D 同志代表苏联世界语同盟莫斯科分会向我致辞，大旨是说目前苏联与中国国交虽尚未恢复，但这两大民族的命运是联结在一起的，不久必能重新携手。这两大民族共有六万万的人口，全世界四分之一的陆地，一旦联合起来，世界和平有保障。而使这两个民族联合国际公用语 Esperanto 实是唯一必需的桥梁。

直到午夜，联络工人俱乐部的集会，方才尽欢而散。

大戏院的跳舞剧

虽然对于戏剧，我是门外汉，但新俄罗斯的电影与演剧艺术，常使我感到特别深长的趣味。苏维埃电影艺术，现在已震惊了全世界了。可惜俄国电影的代表作品，因受神经过敏的各国当局的取缔，我没有机会见到，但就我在巴黎所看到过的《一张沙发和一只床》《亚细亚的风潮》《土西铁路》，在柏林所看过的《大地》，虽都是些不重要的作品，却都充分表

^① 国际世界语组织全世界无民族协会（Sennacieca Asocio Tutmonda）的缩写。——编者注

现出真实的情绪与特创的风格，和充满着卑陋趣味的好莱坞作品相比，真要算是电影艺术中的一大革命了。至于苏联的演剧，我在巴黎见过的莫斯科艺术舞台演剧团所演瓦丹戈甫（Vakhtangov）的《都兰多公主》（Princess Turandot），梅耶荷尔德（Mayerhold）剧团所演《巡按》（即由 Gogol 的名剧《Revizor》改作的），莫斯科犹太剧团所演《二十万》。（《二十万》和《都兰多公主》两剧我在《东方杂志》25 卷 15 号里曾经介绍过。）这几次的观剧都使我感到十二分的兴奋和悦意。可惜在西欧，看俄国戏的机会太少了。所以我这次侥幸得在莫斯科住几天，很想再有机会去看几次新俄的演剧。

但是不幸的很，一个外国旅客，要在莫斯科观剧，并不是一回容易的事。因为莫斯科的戏院全是国立，或者是由国家补助的。演剧的目的，并不是为赢利，而是为宣传与教育。所以观众几乎全体是劳动者。戏票是在各工厂和职业工会里分派的。据说工人看戏的机会很多，而购买戏票也很便宜。至于外国旅客只有在几个大戏院里，方买得到戏票，而且须出很贵的票价。我到莫斯科的第三天，曾托 V. O. K. S 代买戏票，第二天，V. O. K. S 回复我，说是因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开会，一星期内全莫斯科戏院出售的座位全被大会代表包去了。如要买到戏票，至早须在十天以后，我不能在莫斯科留的这么久，因此对于观剧几乎绝望了。

但到了第五天 U 同志来报告我，说莫斯科大戏院还有二三个空座，但售价非常贵，每人要 12 卢布，合中国钱就要 24 元。我虽旅囊不充裕，也颇想去一试，因这机会是不多得的。但 U 同志却再三阻止，说犯不着花了这么多的钱去买票。他可以设法免票去观剧。他为这事，整整去奔走了两

天。因为他有红军军官与普罗作家这两重资格，到处可以通融。可是去戏院交涉几次，仍被拒绝。后来他跑到人民委员会的秘书长那里去要了信来，方才弄到三张免票。当他告诉我们成功的消息时，我们都不胜狂喜。因为他所要求的免票，是莫斯科大戏院的座位。那时正演着哄动一时的跳舞剧《红花》。而且这剧的情节，又是取材于中国的。

莫斯科戏院都是在晚上7点左右开演，到九点余便散了。在7点以前我们到戏院广场里，前面便是莫斯科大戏院，这是莫斯科最大的剧场，可比之于巴黎的歌剧场（Opera）。建筑很大，除楼下大厅以外，中央及两旁的厢楼共有7层，全场大约有3千个座位。是完全挤满的。我们虽然不花一个钱，却坐了全场最优的座位。原来是厢楼正中的一间，在革命前是俄皇和皇后的御座，这御楼正对舞台，而且直通屋顶，只有一层。在从前，这一间里放着两个宝座，在皇帝和皇后不来观剧的时候，便闭锁着，平常的观客不能进去。现在是把宝座除去，安放了十余个座位。无论怎样卑微的劳动者也可以进这御楼观剧了。我们也侥幸占了这御楼的座位。这御楼中，地毯、门帘都非常讲究。在厢楼后面是休息室，有着列代名伶、名文学家的雕像和许多名画。坐椅全是用很厚的绒垫，楼梯和走道全用大理石铺成。这样华贵的地方，现在只有劳动者有权利享用了。

据说平常在大戏院演的都是歌舞剧。我们去看的那天是演着 **ballet**^①，**ballet** 是一种只有音乐动作而无唱白的跳舞剧。俄国的跳舞默剧本来是世界有名的，现在更导入革命后新派艺术的成果，结构、跳舞、布景、音乐，就无论哪一方面而论，都有了彻底的改革。

^① 芭蕾舞。—— 编者注

《红花》还是初次上演的剧本，据说已有很大的成功，苏联的文艺界颇加以重视。这跳舞剧完全取材于中国，用中国背景、中国音乐，表现现代中国生活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全剧不过四幕：第一幕的布景是上海黄浦滩上的一个轮船码头。一支苏联商船正停泊着，苦力们在起卸货物。码头上有许多外国水兵（也许是英美水兵），一面拿着鞭笞打苦力，一面戏弄着码头旁经过的妇女。后来来了一乘花轿，抬着一个漂亮的新娘子。水兵把花轿拦住，抢去新娘子，叫她在码头旁的“酒排间”内陪着水兵跳舞。这新娘也居然从命，殷勤向水兵侑酒。码头上许多黄脸苦力看的不平，立时暴动起来，把码头上水兵一个个打倒，再进酒排间，去打那不要脸的新娘。于是酒排间内大批外国水兵出来，和叛乱的苦力，互相厮打。正在危急中，船上戴着红星帽章的水兵数十人，赶到岸上，帮助中国苦力，把英美水兵一起赶跑。第二幕是新娘的父亲——一个就地绅士的客厅，这狡猾的绅士（大概是买办一类的人）把苏联船主迎到家里，谢他们营救之恩。第三幕是绅士家后花园的夜宴。原来绅士串通英、美水兵，想用药酒毒死苏联船主及水手。幸绅士宅中的佣工暗中通知客人，客人拒绝饮酒。主人见事败，乃做一手势，园中树枝上埋伏的英、美水兵巡捕一齐出来，把苏联水手团团围住。同时宅内佣工及苦力则加入水手方面，和“帝国主义”战斗。第四幕极短。工人得了最后胜利，开幕时全场黑暗，渐渐放出一线红光，东方天空上一颗红星出现。场中隐约看见一面红旗。渐渐光明，最后在满场红光中，幕徐徐落下。

就剧情而论，仿佛只是浅薄平凡的宣传剧而已。但实际并不如此，剧中处处用象征的暗示的方法表现出生命活动的力量。从开演到闭幕，全用

跳舞和布景来表现，在平常教训剧、主义剧中所用的写实的方法，全然找不出来。反之观了《红花》，正如看梅特林克、罗斯坦一派的象征剧，把人引入幻想的世界里。不过在这里象征的用法，却更有气魄，更有活力，决不是带着颓废气氛的新浪漫派戏剧可比。

新俄的演剧艺术里，布景占极重要的位置。像我所见过的瓦丹戈甫与梅耶荷尔德的戏剧，布景的方法，都打破向来的传统，而别树一帜。不过跳舞剧的布景又和这些不同，《红花》一剧布景，可谓穷极奢华。连我在巴黎 Music Hall^① 所见过的布景，也远不及此。这戏是用中国材料，所以布景也全然是中国的。剧中人物的服饰大部分是模仿中国旧戏中的服装。剧中客厅花园的布景，华丽到了极点。举一个例，如描写花园的富丽，则用池中游鱼来烘托。其中有一景是用电影来帮忙，把满池的五色鱼映在幕上，自由自在地游泳着。像这样不惜工本的布景——自然这只有在大剧场才有，在苏联特别发展的小剧场，决不会有的——我还是第 1 次见到。

音乐也很奇特。因为所用的全是中国调子，配入西洋曲谱，用西洋乐器演奏。其中最常奏的是《梅花三弄》的调子。这是成功和失败，我不懂音乐，不敢断定，但我只觉这一类的音乐和台上的布景和动作，非常调和。

苏联的戏剧理论家，以为西方的戏剧，由宗教剧一变而为宫廷剧，再变而为专供有闲阶级赏玩的心理表现剧，完全失去了戏剧的社会意义。唯有东方的戏剧尚未脱民间艺术的意味，和大众文艺隔离的不远，所以主张尽量采纳日本古代剧和中国旧剧的布景和表现方法到新剧里去。《红花》之用中国材料而得到绝大的成功，或者也因了这个缘故。本来西洋演剧艺

^① 音乐厅。—— 编者注

术，自新浪漫主义以后已渐渐走到末路。在欧战以后，伦敦、柏林、巴黎的剧场，除重演旧作品以外，比较伟大的新作品很少出现。在这时候，别树一帜的新俄演剧艺术，于未来戏剧界，一定会有极大的影响。

重印本后记

这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厉行反共的白色恐怖政策，上海许多革命知识分子被逮捕和活埋。当时，郑振铎等人和我都还是青年，只好流亡国外。郑振铎去了英国，我去法国。因为那时法国货币贬值，生活费用和中国差不多，我没有钱，就依靠《东方杂志》的稿费，在法国读了三年书。后来法国货币涨价了，我无法生活，只好取道西伯利亚回国，途经莫斯科，由当地世界语会招待，游览了七天。这本书就是1931年回国后写的。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不许出版关于苏联和社会主义的书刊。我这本书是侥幸出版的。物以稀为贵，出版后就行销国内以及香港、南洋一带。虽然这本书很快就遭到禁止，但在海外翻印的很多，不过在目前很难找到一本了。现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决定把这本书收入《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重新出版；并且请戈宝权同志为重印本书写了序言，加以校注，改正了原书的一些错误，还增加了宝权同志搜存的当年的照片。这样这本书变成了我们两人合著的新书，我要对他表示十分的感谢。

事隔50余年，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莫斯科也有了变化。但是，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感情是没有变的。留下这本书作一个宝贵的纪念。

胡愈之

1984年3月于北京

巴比塞与《世界》

法国著名作家巴比塞将代表着国际反帝大同盟，来中国了。我们知道这位《火线》与《光明》的著者，不仅是人道与光明的斗士，资产阶级文化的背叛者，而且也是世界语运动的一个倡导者。他虽然不是一个Esperantisto，但是从大战以前的时期起，巴比塞便热烈拥护着世界语，在战后又曾被推举为劳动者世界语大会的名誉主席。所以这次巴比塞来到中国，在中国的世界语者，是多么一件欣喜的事啊！

在这里我所要说的，是我从巴比塞所得的一些印象。我和巴比塞见面的机缘，是从一个周刊杂志得来。这周刊杂志是巴比塞主编的，名称恰巧也叫做《世界》（Monde）。（这巴黎的《世界》有一个时期，每期也都附刊世界语栏）就我现在所能记忆的，大概如下。

这是在1929年秋间，适值巴比塞所主编的《世界》创刊的一周年纪念，巴黎的《世界》之友会开会庆祝。从《世界》的第一期出版时起我便成了这个周刊的爱读者，不久我便加入了巴黎的《世界》之友会（是读者所组织的一个团体）。自然这个有意义的庆祝会，我是非参加不可的。记得是在深秋初寒的晚上，当我走进会场时，场内已挤得水泄不通了。我只得在讲坛旁立着。主席报告开会以后，巴比塞便站到主席台前面演说，是一个瘦削而颇长的身材，他的身体是代表一个纤弱的书生，但是他那倔强的姿势和洪亮的富于爆发力的声音，却表现出他是一个革命大众的领导。他那

时的演说，至今还能记得是说明《世界》的立场和态度。他宣布《世界》是站在革命的唯物主义的立场。革命的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唯物主义不同。只有把理想和现实，意识和行动，结合起来，才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唯物主义。《世界》就是抱着这种态度的刊物。所以《世界》之友不但应该讨论学理，而且更应该注意行动，不但应该信仰理想，而且更应该直接参加革命活动。

这几句话至今还在我的脑中，留着深刻的印象。即使巴黎的《世界》未必完全能贯彻巴比塞的主张，我相信至少巴比塞自身是以理论家而兼行动家，以文学者而兼革命者，他是已把他所说的都实践了，这是巴比塞所以值得我们赞扬的地方。

回头说到，我们世界语者，巴比塞这几句话，也何尝不可作我们的教训呢。很多的世界语者，忽略了世界语者改造世界的实际任务，以为世界语本身就是目的，却不必过问一切实际的世界。这样便把世界语运动和现实世界隔离了。这世界语的乌托邦主义，应该对大战后世界语运动的消沉，负一大部分责任。真正的世界语者，却不能抛弃了现实世界，除了文学以外处处要想到怎样用世界语去帮助世界改造，并且亲自参加这改造的工作。所以我愿意把巴比塞对巴黎《世界》之友的几句话，移赠中国的《世界》之友。

4月10日

——原载《世界》，1933年第5号

世界语与中国文字的改革

从前，我曾经一度热烈地从事世界语运动，现在因为事务日益繁多，渐渐地离开了；但是世界语运动的声浪，却天天在那里增高起来。以前只是空空洞洞的宣传，而现在则能应用到各种实际生活方面去；这是近数年来一种新的现象。

依照我个人参加世界语运动的历史来说，世界语运动的意义，是值得我们赞扬与传播的；它在中国已有 30 年的历史，时刻在各种旧势力挣扎中；这种现象，在中国如此，在世界也是如此；然而它能够受世界人赞扬与日趋发达的原因，并不是单纯的运动，而是和整个文化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世界语运动和中国文化革新运动的发生关系，是在辛亥革命到俄国十月革命时期，由留俄学生把它带到中国来，我也在那时候开始学习世界语，而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普遍之汇合，也在那个时候。其时可称为世界语运动在中国初期的勃兴时期。

到袁世凯执政时期，因政治关系，上海世界语学会竟被查封，及后至 1914 年世界大战，在中国方面，也同样受到很大的影响。从那时起，中国人民——尤其是文化人大都感到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有汇合的必要，于是又重新提倡宣传世界语运动。

至欧战到五四运动，世界语在中国便有一个新的发展。当时有一个俄国青年，名叫 **Stopain**，他对于中国世运发展上，有着很大的帮助，他到上海时，年纪很轻，只有十九岁。他懂得好几国文字，他凭着满腔热诚，召

集上海世界语同志，组织上海世界语学会，开创世界语讲习班，中间虽经许多困难和阻碍，他一点也不灰心，一面在洋行服务，晚上仍忍苦教下去。这样地经过了二三年的时间，他在洋行服务所得的薪金，大部分充作世运的经费，他虽然是个外国人，但他没有看轻中国人或任何国人的心理，因此一般中国世界语同志，见他那种耐劳传习的精神，受了感动，故不惜任何牺牲，奋起提倡世界语。

经过了一个时期，他觉得社会对他冷酷无情，感到有点灰心；但他对于世运工作，仍抱着乐观的态度；后来不知受了何种刺激，竟用煤气自杀！临死时，他写下一封遗书，是给上海世界语学会的同志的，词意极为凄楚，勉励同志们继续他未完的工作。当时大家对他的热诚和努力，都表示钦佩和叹惜。事后同志们把他的遗体葬在上海万国公墓，他是欧战后第一个把中国世界语运动复兴起来的，是文化史上一个值得赞扬的人物！后来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到中国来，在上海世界语学会做了很多事情，也使我们难于忘记。

中国整个的世界语运动，早已给人很好的印象；在五四运动时期《新青年》杂志上，已经热烈地讨论过世运的问题，其最大的目的，不单在言语的优美和富有国际性，而在其具有伟大的和平的精神受人欢迎。最近逝世的鲁迅先生，他对于世界语运动的帮助，也很大，以前他招待爱罗先珂时，在中国文化界引起很大的影响，在他的著作中也有着关于世界语的宣扬。

欧战后，世界各国思想界起了很大的变化，在那时一般青年曾热烈倾向到世界语运动的潮流；因之在五四文化运动后，中国言语也起了变化，为沟通国际的文化起见，这责任便可由世界语担任，因此许多人便热烈地

学它；同时更认为世界语可以改革中国的文字，使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并驾齐驱！

“九一八”以后，世运又更进一步，大家已认世界语是一种改进人类生活的工具而不是一种目的，要使它普遍起来须应用到实际方面去；为文化为民族为无数的人群的幸福，都得使用世界语与各国人士互通声气，把中国现状介绍给世界各国；在文学方面，更可从世界语翻译世界有名的著作，给我们参考；这些往往是别种文字所不能达到的，故大家都很喜欢学习起来。

关于世界语本身问题，在中国从五四运动到“九一八”，被一般青年的重视，已认为足以沟通中外文化的工具，希望从大家协作推动之下而达到世界大同的境域。但有些人以为世界语文字本身的优良，足以供改革中国文字的参考；因为中国的文字，是最最落后的，别国文字早已达到了拼音的阶段，中国还是停在很难学习的方块字里，对于普及教育，确有绝大的妨碍，这问题在五四运动时已被提出来。中国白话文运动，虽已改良了中国文字之一部分，但在使用白话文表现思想和感情，还嫌不够。这原因是由于白话文运动，为时不久。因此欲使白话文能充分表现我们的思想和情感，便须从文字构造方面改革着想，才能够获得良好的效果。因为世界语最能介绍中国大众的白话文到改革方面去，使它日趋完美。总之，我以为单是白话文仍不能解决语言文学上的困难，故有新文字（拉丁化）运动的提出，这是世界语者的主张和改革中国文字应有的新趋向！

——原载《语文》，1937年8月1日

纪念国际语理论家柴门霍夫

柴门霍夫是一个理想主义的革命家，可是同时又是现实主义的语言学家。和他的同时代的许多学者一样，柴门霍夫的社会思想，不能逃出观念论的圈子，所以他把语言的价值估计得过高，以为只要把各民族的语言统一起来，就会达到和平的最后目的，却把现代战争的经济的原因为完全忽略了。可是另一方面，他的语言理论，却完全采取了辩证唯物论的方法。柴门霍夫是第一个主张国际语的方案，要用活的民族语作为蓝本，而他自己实践了这一主张而得到成功的。柴门霍夫第一个主张国际语的产生是跟着民族语的发展而来，所以国际语运动，与各民族语言独立运动是矛盾的统一。

柴门霍夫这一个国际语理论，是非常正确的。最近一世纪中的国际语方案有 200 种以上，只有柴门霍夫的方案——Esperanto——能够在过去 51 年中不断发展，到现在已成为唯一的活的国际共通语。这成功的原因，大半是在于这一正确的语言理论上，而并不在于他的中立主义的社会理想上。

我们以及后代的人类要永远感谢柴门霍夫，他给我们以一个新的语言工具和一个正确的语言理论。我们——中国的世界语者——更应该明白，只有抛弃了中立主义的幻想，运用柴门霍夫所给予我们的这一工具，来参加当前的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这样才不辜负这一个为人类和平的语言工具。我们更要应用柴门霍夫这一语言理论到一切文化运动上面，来发展中国的民族语文，解决民族语文中的一切困难问题，以提高人民大众文化水准，

建设崭新的民族文化，这样才能对于未来的国际主义文化，有异常广大丰富的贡献。

所以，我们是柴门霍夫主义者，但应该是不脱离现实的好的柴门霍夫主义者。

柴门霍夫 80 诞辰于重庆

——原载《新华日报》，1938 年 12 月 29 日

语言和社会进步

12月15日是世界语创造人柴门霍夫的生日。经过多年的战争与凌乱，人们早把柴门霍夫和他的伟大的和平事业忘怀了。今年，在马来亚，一部分人们才又说起了这位世界语的创造人。

柴门霍夫是波兰首都华沙的犹太人。华沙和新加坡一样，是人种博物馆。在那城里，有各种不同的民族。因为语言不通，宗教不同，风俗习惯互相歧异，所以时常发生闹殴和冲突。柴门霍夫青年时代是医科大学的学生。他就想到，要使各民族间消除仇恨，使全世界得到和平，首先应当使全世界各国有一种共通的国际语言。他从青年时代，就立下决心，专门研究语言，到后来终于创造了一种简明易学的国际语言，就是世界语。

柴门霍夫是在第1次世界大战中死的，他死后，世界和平仍然未有实现。1次大战完了以后，又有第2次，第2次以后还不免要有第3次。到现代，人们把原子弹看得比世界语更重要。所以柴门霍夫的理想可以说并未实现。但是50年来的世界语运动无论如何播下了一些和平种子。而语言对于社会进步和民族合作的重要性，也因此被一般人所认识了。

语言虽然不是造成战争与和平的唯一因素，但是民族语言的统一与相互沟通，确是社会进步的一种重要推动力。就当地的情形来说，南洋华侨因为语言不统一，思想隔阂，所以时常有地方帮派的斗争。最近20年来，国语运动在南洋普遍展开之后，大部分受国语教育的青年，头脑思想已经改变，不再有地方帮派的成见。国语运动帮助华侨社会的进步很大。在印度尼西亚也有同样的例证。爪哇和苏门答腊一向分成数十个不同的民族，

操数十种不同的语言。后来用拉丁化马来语，印度尼西亚语作为国语之后，印度尼西亚的民族统一战线才建立起来，巩固起来，终于有印尼独立共和国的出现。

南洋是许多不同民族聚居的地方。在这里要使各民族密切合作，以共同致力于民主自由，则首先应当从语言文字方面，使各民族的文化互相交流沟通，因此在南洋的青年，对于各民族的语言文字的相互学习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马来亚人民主要包含三大民族。这三大民族间的文化合作，还不够密切，语言不同虽不是唯一的原因，但却是主要的原因，我们时常看到在各民族的公众集会中，因语言隔膜，翻译困难，各方的意见不能顺利沟通。而每次会议，因辗转翻译所耗费的时间却非常之多。由于此，我们青年人，应当注意于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在华侨社会中，有一种人对于马来语或印度语，表示蔑视态度，而对英语则特别加以尊重。这是一种奴才心理，是应当加以纠正的。

语言文字是从事社会改革的一种重要武器。没有这一种武器，我们不能深入到各民族的人民大众中间。因此，我希望文化界青年界人士对于语言问题特别加以关心，而尤其是世界语问题，中国新文字问题与当地民族语问题。

1946年12月14日

——原载《风下》周刊，1946年

郭后觉先生与我

后觉公学夜学部编印纪念刊，同学们要我写一篇文字。后觉公学是由陈岳书、王叔 诸先生为纪念郭后觉先生而创办的，郭后觉先生死后已经三年多了。他和我有二十余年的交谊。我早就想写些文字来纪念他。但每次提起笔来，一阵心酸，都不曾写成。现在同学们再三要求，不能再拖延了，写几句话，借纪念刊的余幅，来表示我对亡友的哀思罢。

我和郭后觉先生相识，大约是在 1923 年前后，当时郭先生加入上海世界语学会，自己学习并劝别人学习世界语。有一个长时期，我们每星期都见面。当时的郭先生是一个热情的青年，在中华书局担任国语编辑。但我觉得郭先生和当时我们一些青年有些不同。郭先生是有热情的，但他的热情不外露。郭先生生活十分严肃，但在外表上天真活泼，和任何人都能接近。和五四前后的许多青年一样，郭先生有理想，有信仰。可是他却不是一个空想主义者，他能够脚踏实地的为理想而工作，而斗争。在工作中，在斗争中，他永远是愉快，天真活泼的。

论到性格、思想、态度，郭后觉先生和陶行知先生这两个人非常相似。两人都活泼天真，像一个大孩子。两人都把“知”与“行”打成一片。两人的生活都十分简单朴素。郭先生和陶先生一样。可以作为我们的教育家的人样模范。

郭先生最初是国语运动者，但进了上海世界语学会以后，他的兴趣转移到世界语运动。到后来，他对世界语的提倡传导，比对于国语更来的热

心，在这一点，至今想来，我实在是愧对亡友。因为我到后来，作国际问题的研究，同时投身于新闻界，对于世界语运动，几乎丢在脑后。在最近十五六年中，中国世界语运动能够继续伸长，由于郭后觉先生以及一些青年世界语同志的努力居多，我实在并没有做出什么来。

但是我和郭后觉先生一样，对于语言文字，始终感到一种研究的兴味。郭先生来南洋以后，我们几乎有十年不曾见面。1941年新年我第1次去吉隆坡，会见了十年不见的老友，并且认识了吴瑞英先生。使我觉得惊异的，郭先生一点没有改变十年前的风度，虽然身体不大好（因工作太劳苦），但依然保持天真活泼的样子。他的兴趣也照旧是在世界语上面。他告诉我，几年来不断和欧洲日本的世界语同志通信，而且还译出了几本世界语名著。他的这种忠于学术，诲人不倦的精神，使我增加了对于老友的敬佩，而对我自己的不能专心一志于学术研究，以至于虚度半生，一事无成，更感到无限的惭愧。

1942年2月，我和郭后觉先生在同一时期，离开炮火下的新加坡，流亡到对岸的小岛上面。我很希望和郭先生在一起，使我在流亡生活中，可以得到郭先生的激励与切磋，于我自己的修养和学问，一定大有帮助。当我由小岛迁居巴爷公务时，我曾经约郭先生同行。但是郭先生的看法和我不同，以为盟军胜利可能很快到来，他宁愿隐居在荒岛中种菜，不想再往苏岛内地走。谁知后来，他竟被岛上的敌探发觉，以致惨遭毒手。我却得以侥幸生存。真想不到，我们从此就没再见面的机会了。

和平以后，故旧凋零。从前一些共同工作的文化界友好，有在抗战中殉难的，有遭军阀特务惨杀的，有死在我们自己的集中营的，有因贫病交

迫而死亡的。在国内，我们损失了邹韬奋、杜重远、陶行知、李公朴、闻一多，以及无数优秀的作家和教育家。在海外，就我所熟识的，郁达夫与郭后觉先生的为国殉难，同样是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一想起数十年来时常在一起的许多亡友，我自己感到异常孤单寂寞，几乎失去生存下去的勇气。

不过肉体容易死灭，精神与事业却不容易死灭。郭后觉先生和其他在战争中与战争后遭难殉身的文化战士一样，他们永远生活在千千万万人的心中。郭先生死了，他的伟大的教育家人格与治学精神，却永远生活在后一代的人们中间。

年青的兄弟们！不要灰心，不要绝望，永远向前人学习，踏着先烈的足迹前进。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1947年7月1日于新加坡

——原载《后觉公学纪念刊》，1947年7月1日

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大会开幕词

各位来宾，各位同志：

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在今天正式成立了。这是一件大事，这是世界语产生和发展的长期历史中的一件大事。

很明显，没有以苏联为首的全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胜利，没有中国伟大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要在世界上一个大国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之下，产生一个全国性的世界语者的大团结，是不可想像的。

世界语运动在中国已经有了四十多年历史，但只是到了今天，全国世界语者才有了真正广泛的团结和真正的统一的组织。

全国世界语者是在哪一种基础上面团结起来和组织起来的呢？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面，就是在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运动的基础上面，也就是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为争取持久和平和人民民主而斗争的基础上面。

必须承认，中国世界语运动在其发展的初期，是为小资产阶级的和平空想和资产阶级的语言学理论所支配着的，这种资产阶级的理论，就是说：通过一种国际共通语，可以使各民族差别消灭，使各民族语言自行灭亡，或者溶合而成为一个统一的语言。这就是所谓世界语的“内部理想”。

这种理论是完全错误的，是从唯心论出发的。斯大林同志早在 1929 年已经指出：“在世界帝国主义失败之后，使用可说是从上面下命令的方式，

就可以马上一下子使各民族差别消灭，使各民族语言自行灭亡，这种观点是最错误不过的了。使用从上面下命令的办法，使用强迫的办法来企图实现各民族的溶合——就是帮助帝国主义，断送民族解放事业，葬送各民族合作和兄弟般亲爱的事业，这样的政策是与同化政策相等的。”（斯大林《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中译本 20-21 页）

斯大林同志这一伟大的指示以及他的关于语言学的卓越理论，应当成为我们世界语者的经典，在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内胜利之前，即在世界社会经济的基础已经奠定以前，空谈民族语言的溶合和国际共同语，是只有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而和广大人民在解放以后渴望发展和繁荣其各别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这一要求是相违反的。

同志们！我们必须和资产阶级的唯心论的语言理论作斗争。我们自己首先应当从这种错误的泥沼中摆脱。假如我们还不能完全摆脱的话，只有在这一共同的认识的基础上，我们——中国的世界语者——才能团结一致，做好工作，展开新的世界语运动。

这是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加以肯定：作为为人民的、为和平民主的斗争武器，世界语有它的一定价值和作用。世界语产生以后，已经有 64 年的历史，两次世界大战的沉重打击，并没有使这种语言归于消灭。相反的，在人民民主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国家内，现在仍然有成千成万的人在学习它、在实际使用它。它已经不是一种完全人造的语言，而成为国际人民的活的语言了。它并不是国际共通语，但应当说是至今试验成功的唯一的国际辅助语。对全世界各民族的先进分子，它提供了一种有实际效

用的战斗武器。

不应该忘记：在我国，世界语运动是在反动统治阶级残酷的压迫之下成长起来的，是在革命者的牢狱和集中营中发展起来的。在 30 年来为革命牺牲的人民英雄的光荣名录中，有着不少世界语者的名字。在许多人民民主国家，都有同样的情形。这些事实都证明了世界语这一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的时候，它增加了国际人民的力量，它产生了打击人民敌人的效果。

同志们！让我们团结起来，把世界的这一战斗武器，紧紧掌握在人民手中，不让一个反动分子混进世界语者的阵营里来！

同志们！让我们团结起来，为了向全世界人民宣扬我们伟大的人民祖国而工作，为了争取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而工作，为了揭露和打击帝国主义战争贩子造谣惑众挑拨战争的阴谋而工作，也为了促进全世界各民族间的友爱合作而工作。

让世界语为伟大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运动服务！

让世界语为和平民主服务！

让世界语为伟大的人类解放事业服务！

现在我宣布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大会正式开幕。

1951 年 3 月 11 日

——原载《人民世界》，1951 新 1 卷第 3 期

在北京全国世协会员大会上的开会词

（摘要）

首先，我认为世界语是有发展前途的。这个问题几十年来一直都在争论，但我个人对世界语的发展前途是有信心的，这信心的根据就是人民群众的需要，特别是今天国际形势的发展，各国间的关系日趋复杂、交往频繁，这就更加需要有一个共同语言。柴门霍夫创造世界语到现在已有 70 年的历史，这就证明了它是有生命力的。目前看来，它的发展虽还不大，但一旦条件成熟，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而且可以相信它是唯一有权发展成国际语的，因为至今还没有第二个赛过世界语的国际语方案。在第 1 次世界大战前，世界语发展很快，其原因是世界语对当时的资产阶级有用。可是当第 1 次世界大战起来后，由于世界语与民族主义是不相容的，所以世界语运动就停止了。这说明世界语只有和无产阶级结合起来才有前途，资产阶级是不会真正用世界语的。目前国际形势已发生了新变化，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已占绝对优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全世界胜利已为期不远，世界语大跃进大发展的时期也会很快到来，世界语的发展前途是光明的。

其次，关于世界语协会的工作任务问题。世界语的工作不能离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世界语应该为社会主义服务。早在 1939 年，毛主席就指出世界语只是一个形式，它必须载之以真正革命之道和真正的国际主义之道。只有这样世界语才是可以学的，而且是应该学的。今天看来这个提示仍是解决我们现在工作方针政策的指针。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毛主

席的提示。我们应该批判世界语的所谓内在理想，这种“理想”是一种空想的和平，是资产阶级麻痹人民的東西。我们应该依靠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用社会主义的思想、社会主义革命来建立人类大家庭，而不能为世界语而世界语，世界语者必须明确我们首先应是个革命者，其次才是世界语者。

最后，我们要求世界语者必须成为又红又专的革命者。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红比专更重要，能红就能专，不红不能真专。我们必须认清今天世界语运动中资产阶级思想仍起主导作用，因此必须赶紧建立起无产阶级思想领导，要政治挂帅，脱离了政治，工作就是无目的的。

1958年7月6日

——原载《中华全国世界语协简报》，1958年第1期

希望正在变成现实

—— 纪念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诞生一百周年

今年是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诞生的 100 周年。许多国家的世界语者都举行了纪念集会。在波兰首都华沙，在今年夏间举行的第 44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有来自 45 国的 3 千余世界语者参加世界语创始人的百年纪念典礼。柴门霍夫这个名字，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也并不陌生。早在 50 年前，柴门霍夫所创制的世界语已经传入中国。今天，当全国人民正在鼓足干劲、建设社会主义的日子里，纪念这一位国际文化界著名人物，是很有意义的。

柴门霍夫生在当时属于帝俄的波兰的小城市比亚里斯托克。在这个小城市里杂居着四五种不同的民族，操不同的语言。柴门霍夫是犹太人，而犹太人在当时是受欧洲上层社会的排斥和鄙夷的。柴门霍夫在华沙和莫斯科大学里学医。后来大部分时间在华沙执行眼科医生业务。到了 1917 年 4 月 14 日他因心脏病去世。这时候离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的胜利还有半年多。他更没有见到他的祖国波兰的独立和解放。

柴门霍夫的简单的一生，就是如此。他是一个平凡的人。正像他时常所说的，他只是生存在地球面上的亿万人类中的一分子。但是这一个平凡的人却干了一件不平凡的工作。从学生时代起，他就有一种理想，要创造一种国际语，以消除各民族之间的隔阂，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这是宏伟的理想和大胆的创举。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贡献出毕生的智慧和力

量。一切新生的事物都会遭遇到社会习惯势力的抗拒，当世界语最初产生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是柴门霍夫并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继续坚定地奋斗。到最后他成功了。

柴门霍夫在历史上第一个成功地创制了一种国际语方案——世界语，并且成功地把世界语推行到许多国家中间，使它成为各民族之间的交际工具。尽管这种新语言还没有被各国政府公认为国际通用语，各国语言科学界对于世界语也仍然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是世界语产生后，经过 72 年的实践和两次世界大战的考验，直到今天仍然在国际经济文化生活中，作为一种活的语言被几千几万人实际使用着，是不能加以否认的。

柴门霍夫绝不是为世界语而创造世界语。他还有一种更远大的理想。1887 年当他第 1 次发表世界语方案的时候，他不用他的真姓名，而用了“希望者”（ESPERANTO）这个笔名。“希望者”后来就成为世界语的正式名称（“世界语”是中国和日本用的译名）。“希望者”希望的是什么呢？从柴门霍夫用世界语创作的诗篇《希望》可以看出，他希望长期以来分裂的各民族团结起来，建成人类的友爱的大家庭。

柴门霍夫的青年时代正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即帝国主义的时期，一方面殖民主义强国向殖民地、保护国人民以及一切弱小民族，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另一方面，全世界殖民地已经分割完毕，帝国主义为了重行分割殖民地，进行疯狂的战争准备。柴门霍夫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他的理想，或多或少，反映了欧洲各国人民要求和平与民族团结的一种良善愿望。但是他并没有找到通向和平与民族团结的真正道路。他并没有意识到只有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推翻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消灭战争和

民族压迫的根源，持久和平与民族团结才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正因为他不像当时已露头角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样，起来号召和依靠人民群众，为争取真正的和平与民族团结而斗争，所以“希望者”只能是一个“希望者”而已。当 1917 年，在第 1 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中，柴门霍夫抱恨而终了。

当柴门霍夫诞生百年以后的今天，世界已经起了巨变，和当时的形势是完全不同了。在柴门霍夫去世以后，首先在欧洲产生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第 2 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欧洲和亚洲产生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到了今天，东风压倒了西风，和平力量胜过了战争力量，成为国际形势的特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把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团结成为友爱的大家庭，这是不可攻破的无比强大的和平堡垒。另一方面，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正在掀起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帝国主义奴役压迫的统治正在土崩瓦解。柴门霍夫当年所希望的和平与全世界人民大团结，现在已经不再是一种希望而是各国人民的行动和战斗的口号了。

百年来的人类历史证明，和平与民族团结，不能依靠希望和幻想来求得。向帝国主义者企求和平是与虎谋皮。只有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战争阴谋作坚决斗争，才能争取真正的持久和平。世界语作为民族间的一种交际工具，在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谅解、文化交流与友好团结中，可以起一定的积极作用。归根到底，对于和平事业的最后胜利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各国人民的力量。人民是需要和平的。由于和平、民主与社会主义力量的不断壮大，制止战争的条件更加有利了。

但是帝国主义者日暮途穷，伪装和平的姿态，企图欺骗人民，掩盖制造战争和分裂的阴谋，是必须加以警惕的。

——原载《人民日报》，1959年12月15日

人类的美梦将要实现

我们《人民中国报道》向各国亲爱的读者们致敬。1959年就要过去了。这是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当中，和平力量的增长，无疑地有利于争取国际形势的进一步缓和，在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自己的继续大跃进庆祝了十年国庆。此外，它是柴门霍夫年！

柴门霍夫博士是人类的一个伟大的好心的儿子，不幸的是，他生在一个周围环境被帝国主义和战争所毒化的时代，没有看到他的祖国——波兰的独立和解放，他就离开了人间。

希望者博士是永远被祝福的！他有一个神圣的理想和使许多世纪以来有分歧的人民互相友爱的强烈愿望，而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他献出了毕生精力和天才与智慧。他是国际辅助语的创始者，这是无庸争辩的了。但是很遗憾，作为达到全世界人民互相结合的崇高目的的战士，他是失败了。柴门霍夫诞生后百年来的历史证明，人民之间的分歧和战争是由于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人们是由于牺牲了多数人的幸福而致富的。在现代，在这种制度集中的表现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为了一小撮垄断资本家的利益，在各民族之间散布仇恨和分歧。这是阻碍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和相互友好的真正原因。就民族语言的多样性而言，人们可以这样说：这种多样性客观上增加了人民之间友好合作的困难，但是不能成为人民之间分歧的主要原因。

1973年以后中文名称更名为《中国报道》，下同。——编者注

尽管这样，柴门霍夫的一生和他的努力反映出近百年来整个人类的好心愿望和崇高目的，人类社会目前的情况应该改变，各国进步的和勤劳的人民应该团结在一个大家庭内，人类前进道路上的阻碍应该加以清扫，人民分歧和战争的原因应该消除。

“不要背离正路，勇往直前，让我们走上预定的途程，甚至是一滴水，不断的冲击也会穿透花岗石的山，希望、顽强和坚韧都是信号，借助于它们的力量我们经过长期的工作定会一步一步地达到光荣的目的。”

正像柴门霍夫所赞美的，凭借着希望、顽强和坚韧人们不停地前进，不断地消除道路上的阻碍，最终他们会冲破黑暗，在东方发出柔和的阳光，在这阳光的照耀下，千百万的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们将团结成为一个兄弟般的大家庭，在那里找不到民族分歧，也没有种族仇视。为了自己美好的未来他们勤劳地工作，为了保卫自己和支持还在受压迫的弟兄勇敢地斗争。

亲爱的读者们，请允许我们向你们报告人民中国的可喜的消息：我们已经在工业和农业主要生产方面完成了 1959 年的跃进计划。人民公社得到了加强和发展。在毛泽东光辉的旗帜下我们全体人民正以全部的力量为崇高的目标为未来的一年的大跃进尽一切努力。人民中国改变了经济和文化上的落后面貌，将成为保卫世界和平和使全世界人民互相友爱的巨大力量。全世界人民互相友爱，一定能战胜帝国主义的战争力量和殖民主义制度，给整个人类带来无限的光明和希望。这就是我们的道路。

和平的敌人还在散布分歧和仇视，还在阻碍人民的互相友爱。他们是枉费心机的。觉醒了的人民永远不会受魔鬼的欺骗。他们将用自己的力量

创造和平世界和各民族间的互相友爱世界。

春风送走了严冬。为了创立一个美好的人类世界，我们的工作刚刚开始。我们再重复一下柴门霍夫的有名的诗——

“我的勤奋的同事，在和平工作中不知疲劳，直到为了永远的祝福的人类的美梦实现为止。”

在迎接充满希望的 1960 年的同时，我们向亲爱的读者们致最好的祝愿。

——原载《人民中国报道》，1959 年第 6 期

在第一次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次会议收获很大，可以说超额完成任务。这是有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在中国是破天荒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思想收获也很大。正所谓思想、工作双丰收。缺点是：时间短了一点，具体问题的讨论多了一点，思想问题、重大问题讨论少了一点。

搞世界语工作，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对外，为了完成国际任务。

（一）这次会开得好，同形势有关，领导重视，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因为我们的工作同当前的形势发生了关系。中国的国际地位愈来愈重要，全世界各族人民都要团结起来，为正义和进步斗争。世界语工作是大有可为。应当采取积极的、主动的态度参与这个进步斗争。方法应该是细水长流，要有长期打算，不是轰一下子了事，而是坚持工作。不能性急，要一点一滴做工作。不要急躁冒进，但不能停止不前；冒进就是不顾主观客观条件，我们决不要强加于人。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因为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人。要看主观条件客观条件具备不具备；如果不具备主客观条件，硬要发动，那就会失败——虽然有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但终究对我们全局不利。切不要要求过急；对我们有利，而我们主观力量又充分时，就争取实现。总的说就是服从形势——掌握形势也不是很容易的。如果把我们的世界语工作同形势分割开来，那么我们的工作搞不好的。

（二）国内工作，也可以说是“全国世协”的工作。全国世界语运动必须

在统一领导下工作。对外工作的目的是争取世界各国大多数人，首先团结各国世界语者，然后通过他们争取广大群众。争取大多数人，包括进步的、中间的、落后的在内；即使在敌人营垒中也要进行工作。争取的对象是越广泛越好。为此，我们也要广泛团结全国世界语者，扭成一股绳。中立主义者当然是我们的工作对象；但我们自己绝不能满足于中立主义。国内任务是团结、教育新老世界语者，因为要发挥积极性，不能单个儿干，要团结起来，要团结就要教育。我们（世界语工作干部）不能把自己降到中立世界语者的水平，我们要形成一支革命的坚强的战斗队伍。切切实实做工作，不要说大话，用工作来证明世界语是有效的。至于将来全世界是否都用世界语，这个问题暂可以不争论；今天用世界语有实效，我们就得充分使用。我看柴门霍夫很有点马列主义，第一，他不承认自己的方案是十全十美的，他说这是一个试验，不是个人试验，而是拿到社会上去大家试验。第二，他说世界语不能代替民族语。第三，他埋头苦干，译了许多书，他用世界语写，鼓励大家去实践。

地方组织是有必要的。组织起来力量大。地方组织要广泛团结个人；便于国际活动；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有组织当然比没有组织好。协会本身不健全，会员要整顿。地方分会要成立，先要有骨干力量，有领导有骨干，那就可以搞。没有条件的地方，慢一点进行。地方组织与“全国世协”没有组织关系，不搞垂直领导。

（三）培养新生力量是一个迫切问题。一是着重政治、品德；二是有计划有选择去培养；三是正规与业余都可以搞，现在以正规为主；四是提高水平十分重要，要注意保护老专家，请老专家带徒弟。

最后让我向大家提出一个口号：

Per Esperanto por la liberigo de la tuta homaro! （“为全人类的自由解放
而用世界语！”）

1963 年 7 月 31 日

（陈原整理）

——原载《世界》，1987 年第 1 期

在《人民中国报道》第三次编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人民中国报道》的编辑方针基本可以。政治、经济、文化类稿件的比例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怎样做法；研究哪些适合采用，哪些不适合采用？时事性稿件太多，有个篇幅问题。目前，全世界都关心中国，注意中国对国际重大事件的态度，时事性稿件是要登的。可以总结一下今年的宣传情况，考虑明年如何贯彻。

世界语刊物不受地区的限制，因为各国都有世界语者，各国学世界语的，有不少是下层群众，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这些人不容易看到其他外文刊物。《人民中国报道》的影响不限于世界语者。有些读者常把这份刊物读给别人听。也有人把它翻译成本国文字向报刊去投稿。世界语者有组织，他们每周聚会，也要阅读和谈论我们刊物。还有人在自己的大门口搞一个框窗，把我们刊物的图片贴起来，不懂世界语的人也能看懂。

意见表中反映，刊物最受欢迎的是图片和中心插页。以前考虑过出画报 世界语版，因人力不够作罢了。现在可考虑出画报的世界语版；或者《人民中国报道》改成月刊。改月刊，时间快些，时事性宣传中的某些问题就解决了。要反映时事，两月刊是不适合的。改月刊后，文字可以减少，精一点，文章不要长，长了没人看。政治性文章短了，看起来不成问题。文章长，调子再高，人家不看，还是起不了作用。文章不管政治性非政治

这里指的是《人民画报》。——编者注

性，短，有人看。我看外国刊物，都是找短文章看。世界语学得很精通的人在读者中总是少数，短了，看起来方便些。短文章，就要自己组织，自己写。这样国外读者再转译也容易。改月刊，篇幅可以减少，文字少些，图片不要减少，使这份刊物更加画报化，不懂世界语的也可以看。工人、小市民也喜欢。这样劳动量也不会增加太多。

《人民中国报道》的读者对象是中间读者。《中国建设》的读者对象也是中间读者，但它目前还不大能进入东欧，主要在亚非。《人民中国报道》第一位发行地区是东欧国家。只是阿尔巴尼亚少些，南斯拉夫能进去，苏联也还可以进去。波兰、保加利亚的订户增加很快，很值得注意，那里左派力量相当大，对中国同情的很多，但他们看不见中国的东西，只有靠这份刊物，所以订户增加是有道理的。从这几年来信中也证明波、保、东德同情中国的不少。有的来信说，尽管扣压，你们来信还是收到了。扣也收到了，他很高兴。来信中流露出的感情很好。

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法国和西德的读者比较多。从这些情况看，《人民中国报道》与其他刊物不同，尽管这些国家政治上反对我们，但我们刊物却受到读者欢迎。这是因为其他外文刊物是通过上层关系发行的，下层群众不容易看到，而这份刊物是通过群众的关系进去的。

我们办这份刊物给国外读者看和在国民党时办半公开式地下刊物相似。如这个意见是正确的话，那么，办刊物要有些保护色，调子太高，有些国家当权派要控制，同时读者也有顾虑。宣传政治当然需要。不为政治办刊物，就毫无意义了。但要有些保护色，这与保护读者也有关系。苏联

指政治态度处于中间状态的读者。——编者注

虽然检扣，刊物的订户，实际上仍有不少。刊物表面上不反修的，仍然可以进去。保加利亚一读者来信说，你们不要登反对苏联的文章，我们是和你们站在一起的。这话说得很有意思。

世界语者过去都是和平主义者，中立主义者，没有人注意他们。世界语本身有掩护作用，但如挑明是马列主义，别人就另外一种看法。注意这种技术问题，作用可能更大些。

如果这样，确定明年的宣传计划，不是政治调子高低的问题，是要不要照顾读者，作些针对性考虑。

前年搞的那次展览很好，但是有很多领导同志没有请，他们不知道，没有看。这一个时期，可以再搞一次小型的展览。

国际上对我们刊物的世界语很欣赏，他们说我们文字风格流畅，是世界语的世界语，这是有定评的。它和其他外文的反应不同。

——摘自 1995 年 6 月中国报道社业务档案资料

迎接新年

——给相识和不相识的远方的朋友们

亲爱的朋友们，

祝你们新年好：

新年给人们带来新的希望。新年也给人们带来旧日的回忆。

让我们从旧事谈起吧。

1913 年，这是我取得“Esperantujo”的“公民权”的一年。

在那时，我还没有离开中学的校门。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第 1 次摧毁了两千多年来专制的封建王朝，震动了东方世界。但是幻想不久就破灭了。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世界里，喘不过气来。

是世界语，使我从黑暗中打开窗洞，瞧见了五彩缤纷的世界。我不是孤独的，我交了许多异国的朋友们。

在那时，我又是何等地幼稚和愚昧啊！好象有了世界语，人类共同的语言，和平和幸福就会出现在整个人类社会了。

事实并非如此。接着，人类历史上第 1 次的世界大战爆发了。战火从西方延烧到中国。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了我们的东三省。

然后，人类历史上第 1 次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俄罗斯取得了胜利。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它照亮毛泽东主席指引的中国人民解放的前途。

前途是光明的，但是道路仍然是曲折的。中国出现长期的军阀内战和

蒋介石的叛变。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这一伙法西斯头子霸占了西方和东方。

人民——只有人民是历史的动力。第2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摧毁了几乎整个旧世界，之后产生了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改变了面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末日似乎已经到来了。

可是人类解放的历史长河远没有到达尽头。第2次世界大战过去了。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依然存在，扩张主义依然存在，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列宁所首创的伟大事业竟被叛卖了。正如我们的伟大作家鲁迅的预见：“斗争未有穷期，老谱还要重弹。”

在这些漫长的岁月里，我有幸在许多远方国家交上朋友。在两次大战中间，我到了巴黎、日内瓦、伦敦、柏林、华沙、莫斯科。有了世界语的媒介，我不会忘记你们，亲爱的远方朋友们，有的是早就相识的，有的还没有见过面，而其中大部分是通过这个小小刊物——《中国报道》——建立我们的友谊的。

亲爱的远方朋友们，不论是相识和不相识，我们是心连心的。随着新的一年到来，我们对世界和平和人类幸福都怀着更大的希望。但是现实的生活也教导我们，单凭希望是不成的。要使希望成为现实，就需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共同进行不懈的斗争。世界语的学习和使用，只能是为世界人民的团结斗争服务才是有意义的。

早在38年以前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就在延安的窑洞里写道：“如果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真正国际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

那么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是应该学的。”

毛主席离开我们了！毛泽东思想将是永存的。毛主席这一教导是永恒的真理。

说实在的，亲爱的朋友们，毛主席并没有离开我们。他老人家正在北京为他建筑的纪念堂里安祥地躺着，面对天安门城墙上的大字标语：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原载《中国报道》，1977年第12期

在第二次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是 1914 年学世界语的，到现在还能讲两句，说明世界语并不难学。当时我是个学生，学了两年英语没有学好，遇到了困难，后来听说世界语容易学，就试一下。学了世界语再学英语，进度就比较快。后来我感到，世界语不仅容易掌握，它本身还可作为国际文化交流的工具。因为世界语是一种比较科学的语言，发音和语法比较规则，所以容易学，我学了几年就有用处。

中国的世界语运动搞了五六十年，没有很大发展，中间走了一些曲折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对世界语非常重视，没有党的领导，世界语在中国不可能发展。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重视世界语，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都支持世界语。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世界语者，但党和政府这样重视世界语的，恐怕只有中国。

在抗日战争时期，许多革命同志在监牢里学世界语，因为通过世界语，可以看苏联出版的许多世界语书籍。俄语不但难学，而且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日本的世界语者绿川英子，大家都知道吧，她支持我们的抗战，用世界语向全世界宣传我们的民族解放斗争。全国解放后，成立了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创办了《中国报道》。我觉得世界语重要，世界语工作很有希望。我们要向前看，看到将来。

世界语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它是国际普通话。毛主席曾说过，将来实现了共产主义，各国之间来往更密切了，甚至国家都没有了，那时的问

题就是讲话困难。到那时，我看就要掌握世界语这个普通话。就像我们中国以前不统一，各地有各地的方言。现在国家统一了，语言还没有统一，所以我们的教育部要推广普通话，但至今还没有完成这一工作。要在国际上推广世界语，应是个长期的事情。上次开会以来，已经十多年了。当时陈毅同志讲了话，有一点我还记得，就是世界语可以搞，应该搞，但要细水长流，不要性急。认为世界语在全世界可以马上推广，世界语到哪里都可以用，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当然，我们每年可以参加一次国际的世界语大会，但还不能在国际交往中把世界语作为唯一的语言工具。但是总会有一天，到了共产主义或者世界实现和平时期，那时世界语就会有一个大发展。

许多外国朋友认为，中国的语言最难学。许多朋友希望到中国来了解中国的情况，要有翻译。有的翻译容易找，有的翻译难找。所以我们有义务，不仅在国际上推广世界语，还要在国内推广世界语。现在我们搞“四化”，要同世界各国人民来往，引进各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要大大发展我国的旅游事业。所以搞世界语是实际需要。

我们有了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各地还成立了世界语组织，进行一些活动。现在我们有 1000 多人，两三年后可以发展到 1 万人，五六年后可发展到五六万人。到那时候，大中学校里可以设立世界语专科，培养年轻人。我们在座的大部分是年老的，我们要把世界语传给下一代。

我在世界语方面贡献很少。但希望我们的事业，一天天发展。毛主席讲过：“如果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真正国际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末，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是应该学的。”这番话给我们指出了方向。希望

大家坚持努力，多做实际工作，与外国朋友通信，多参加一些国际世界语会议。这些都是应该做的。

1979年8月27日

（陈原整理）

——原载《世界》，1987年第1期

在庆祝《中国报道》创刊三十周年

座谈会上的讲话

亲爱的同志们：

同志们好！我很高兴出席今天的座谈会，预祝我们的第2次展览会成功。

我作为一个世界语者，参加这个会应该讲世界语，但是我现在忘了，只能讲这么几句。现在我想谈一谈我的感想。我们今天举行第2次的世界语展览，在北京，第1次展览是在1963年，那一次是陈毅副总理参观了，并且举行了一个报告会，给我们做了一次很重要的报告。当时，陈毅副总理认为世界语的作用很大，不仅仅在对外宣传方面，还有我们的对外活动、国际方面的文化交流、和平友好，都能起一定的作用。所以他主张不是很急，可以细水长流地搞，把世界语运动在全国继续搞下去。同时还可以在我们国内召开一个国际的世界语大会。因为现在世界语的大会是每年都开一次，但是一般都是在欧洲国家和美洲国家开，亚洲只在日本开过一次。那么，我们中国呢，很多外国世界语者希望到中国来。我们假定召开一次世界语大会，可能在国际上影响很大。那么当然召开这样的大会，我们要准备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我们国内要有一大批会接待外宾的人。假定开一次世界语大会有一两千人，两三千人，他们来自几十个国家，那么我

这是1980年5月22日胡愈之在庆祝《中国报道》创刊30周年座谈会上的即席讲话。

们这里就得需要很多的人作翻译。世界语者不用翻译，但是他们要碰到中国人，同中国人交谈时，需要翻译。那么，我们国内学习过世界语的人越来越少了，大部分都老了，同我一样，学了以后忘了，所以要培养一批年轻人。过去，陈毅同志讲了话以后，我们有几所大学开办世界语班，外语学院、广播学院开办过世界语班，培养了一批人。假定没有那一次座谈会，就不可能培养出这批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今天在座的里面就很多，他们比我们这批老的要好得多了。没有这批人，我们的世界语广播，我们的《中国报道》，我们的世界语图书出版工作就很困难。所以才有现在这些成绩，刚才张企程同志已经报告了。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受些挫折，但是这几年功夫，又重新发展起来，不光《中国报道》销路增加了，世界语的出版、广播都发展起来了。《中国报道》已出版 30 年，虽然中间停过刊，但总的讲，它已经 30 年了。我们国内的读者和领导同志不知道有这个刊物，另一方面我们刊物的内容也有些缺点，就是只报道我们中国内部的事务。这也不奇怪。因为我们的一切外文刊物，包括世界语刊物在内，都是为了对国外宣传现代的中国——解放后的中国，这是一个主要目标，这点是没有错的。问题是，要考虑我们的宣传到底效果如何？世界语的出版同其它种语文的出版，性质是不同的。因为世界语的读者不只有一个国家，它的本身就是国际性的。在世界语者中有各式各样的，有进步的，也有落后的，但是有一条，他们都主张国际和平友好，这一点是共通的。我们在宣传方面，应当重视这一点来编辑、出版我们的世界语的刊物和书籍，正如毛主席讲的，“如果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真正国际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么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是应该学的。”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国家，我们是采

取国际主义政策的，在对外活动方面是采取国际主义的，不是采取民族主义的。所以我们要用国际主义之道来编辑世界语杂志，来出版世界语书籍，那么世界语就会起很好的作用。这同我们党的目标，同中国革命的目标是完全符合的。这一点同我们新中国的宣传也并不矛盾。因为我们宣传的目的，是希望各国人民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有更多的接近。不管什么语种，都是如此。但是，我们办刊物都希望能有广泛的读者，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为我们中国人民服务，要为了中国宣传；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为国际、为进步人民服务，为读者服务。假如我们不考虑读者的利益，只考虑我们自己的利益，只考虑我们中国人民的利益，那么，这是不是叫作国际主义呢？这就不是国际主义的，这就会走到民族主义的错误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编刊物，编世界语书籍，以至于世界语广播，我们应当想一想这个问题，应当照顾听众、读者——世界各国的听众和读者的兴趣。这样呢，他们才对中国有美好的感情。尽管他们的思想各有不同，但是对我们中国有好感，这样才真正收到宣传的效果。

在过去 30 年里，我们在世界语出版方面，广播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也有缺点，只照顾到中国，不考虑读者是不是喜欢看。有的时候甚至于把我们自己的主张强加在别国人民身上，这在林彪、“四人帮”的时候是更加明显。硬把我们中国的一套，很“左”的思想，很“左”的主张，放进我们的刊物里，使他们中的一半人感到毫无兴趣，有些人甚至反感。那么，我们的目的是宣传，结果违反了宣传的要求。这种宣传好在很快改变了，特别是林彪、“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外文局的方针也开始变了。在罗俊同志的领导下，我们的刊物这两年已经开始起变化。我们对于世界语的介绍、

宣传更多了一些，更加照顾到世界语刊物的读者利益。对于我们国内问题的报道，不限于枯燥无味的政治性的报道，方面很广泛，各种知识都有了一些。这样的方针是符合我们世界语刊物的精神的要求的，所以这一两年来销路又增加了，不像文化大革命中间销路跌下来，甚至订户比其它外文刊物增加得更快一些，说明我们内容这样改变是合适的，正确的。在外文局的领导下，刊物将越办越好。现在看来，我们的工作是有大有可为的，是大有希望的。

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的文明古国，而许多人了解得很少，现在他们迫切想了解中国，希望从中国党取得支持。以后到中国旅游的人也将越来越多，国际间的往来恐怕也会日益频繁，那么今后不出陈毅同志所希望的，在中国开一次国际世界语大会，我想完全有可能。可能不需要等很长时间，大约五年之内。但是现在还是要在我们国内有更多的人学习世界语，懂世界语。世界语有一个特点，它确实容易学，比其它的各种外语要容易得多，因为它的语法也规则，发音有一定的规律，一般是一年或者两年，就能学会。我们现在学别的外语，往往用四五年，还不一定学得很好，但是我们学世界语，时间要少得多。今后，我们要为大家创造更多的学习机会，外语学校可把世界语列为选修课，可以广泛地推广。另外也可以组织函授学校，可以创办函授班。过去世界语的同志，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函授学校出来的，我自己是在 60 多年前学习世界语的，也是从函授学校出来的，没有进过正式的学校。在我上中学的时代，最吃香的是英文。中学毕业后，许多人想考清华大学。考取了清华大学可以到美国去。但考清华大学要考英文，英文不行是考不起的。它在全国招生。但

是我在中学，英文不行，无论如何读不好，后来，我索性中学不念了，到上海世界语函授学社学习世界语，学了半年，就可以同国外世界语者通信了。经过通信，世界语水平又有提高，到后来就可以看书了。学了世界语之后再学别的外国语，后来学了一些英语，又学法语和其它别的外国语。我觉得学了世界语之后，学别种外国语比较容易。现在我们国内，外语的教学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现在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但是我们能懂得外语，看外国科学资料的人很少。现在学校里要花好几年学一种外语，还比较吃力，所以应该拿世界语作为学外国语的桥梁。因为世界语里的许多科技名词，差不多在欧洲各国都一样，不论英文、德文、俄文、法文，都是一样的。你如果会世界语，再学其它外语时就容易了。这一点，在国内还没有被人们所认识。

现在，我们应当培养一批年轻的世界语者。学习世界语并不浪费，就是以后不搞世界语工作，也可以搞各种文字的工作。今天我来参加第2次世界语展览会，是希望这个展览会可以推动世界语运动。应当组织更多的人来看这个展览。第1次展览是内部展览，看的人不多，这次在北海公园展览，完全开放，我想许多人会看到。这对宣传世界语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很有意义。我今天简单地讲这一点，讲得不对请大家批评。

成立“世界语之友会”倡议书

世界语是波兰柴门霍夫所创造、于 1887 年公布于世的一种国际语。它建立在印度欧罗巴语系的基础上，吸收了欧洲各主要语言的语法与语汇，去掉了其中不合理成分而发扬了其合理部分，因此具有科学化、合乎逻辑、简单易学的优点。

将近一个世纪来，世界语已传播到 90 多个国家，应用于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以及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充分显示了它的生命力。

世界语在本世纪初传入我国。它在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中都起过积极的作用。在救亡运动和抗日战争中，我国世界语者以世界语进行国际宣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此，蔡元培、鲁迅等文化教育界先辈和毛泽东、陈毅等革命先驱都对世界语作出了肯定的评价而积极予以支持。

我国党和政府一贯重视世界语的作用。在建国初期，我国世界语者即通过世界语展开了人民之间的对外友好活动，出版了月刊《中国报道》和各种图书，后来在陈毅同志的支持下，又开办了世界语对外广播。这些世界语对外工作都获得了较好的成绩。

楚图南、胡愈之等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世界语之友会在当代中国世界语运动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在国际世界语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份倡议书是按照胡愈之同志的指示起草的，并经他本人审定。

我国现有全国性世界语组织“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由胡愈之同志任理事长，积极从事世界语的推广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工作。我国曾多次派代表团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经常接待国外世界语代表团与个人的来访，对团结国际友人、反对民族之间的歧视和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现在我国世界语运动蓬勃发展，在湖北、湖南、北京、上海等省市以及其它许多地方都建立了世界语组织，各地学习世界语的人也逐渐增多。我国已成为世界语运动日益兴旺发达的国家之一而受到国际上的重视。

我全国世协已于去年加入国际世界语协会为团体会员，并有常务理事 2 人当选为该会执委会委员。国际世协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咨询关系，以普及世界语为宗旨，争取使世界语早日成为人类的国际共同语。它对我友好，对我国各项世界语工作都尽力予以协助。

我们认为：世界语既有消除人类隔阂和大国与小国语言之间的歧视、维护世界和平的理想，同时又有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实际作用，推广世界语是一项值得我们加以赞助的工作。因此我们考虑，邀集同情与支持世界语的各界人士，成立一个赞助世界语的组织，名为“世界语之友会”，以便在国内扩大世界语的影响，促进社会上对世界语的了解，在国际上为世界语运动增加一份道义上的力量，推动世界语运动更广泛地发展，使它的理想能够早日成为事实。同时这也显示我国人民支持人类的一切进步事业，为增强我国人民与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

的相互了解、相互支持和进一步团结而作出的努力。这无疑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因此我们提出这个倡议，吁请各界知名人士参加。一俟参加者达到相当人数，即拟召开大会，宣告成立。

发起人：

楚图南、胡愈之、夏衍、谢冰心、赵朴初、白寿彝、叶圣陶、巴金、
朱九思、叶籁士

1981 年 9 月 1 日

在第三次全国世界语工作 座谈会开幕式上的致词

亲爱的同事们，

亲爱的同志们：

第3次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现在开始了。这是十分重要的会议，因为目前是我国世界语有长足进展的时候。我向出席今天大会的所有同志致意，因为这次会议将讨论我们世界语运动的未来种种问题。全国世界语者应当团结起来。祝贺座谈会成功。谢谢。

1984年8月29日

（陈原译）

——原载《世界》，1987年第1期

我的回忆（节选）

一 走向革命

1896年9月9日（旧历八月初三），我出生在浙江省上虞县县城（今为丰惠镇）的一个地主家庭。

上虞县是一个滨海靠山的小县，北乡沿海平原交通比较便利，物产亦较丰富；南乡接四明山区，丛山群岭，土地贫瘠，农民生活十分痛苦。有这样的民谣：“走的是石子路，吃的是六谷（苞米）糊”。清末之际，江浙地区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地主对农民的盘剥也随之加重。官府为地主撑腰，对交不起田租的农民进行严厉镇压，使得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在我少年时期，上虞曾多次发生山区农民进城跪香请愿和暴动的事件。这些农民的自发斗争，虽未形成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但在我的幼小心灵里已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农民斗争的发展，也促使了地主阶级内部发生分化，一部分地主坚持对农民的严厉镇压，而另一些地主则开始同情农民困苦的处境。我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清末民初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在乡创办新学。由于受民主主义思潮影响，加上家庭经济状况日益下降，体会到稼穡之艰难，对农民境况表示同情。父亲的这种态度，也对幼年的我有很大影响。

1902年，我6岁开始上学，进了私塾。不久清政府以推选新政之名，废科举，废八股，县里设立了高等小学堂，我即进学堂上学。刚开始，学堂与私塾没有什么差别，仍以经学为主，后来才有了各种课程，学制为五

年。我因自幼体弱多病，祖母、父亲都不放心我离家去外地上中学，托校长留我在小学多读了两年。在小学里国文课我已熟读了《古文辞类纂》里百余篇选文，数学学过了大代数，历史看完了《御批通鉴辑览》，地理学完了屠寄的《寰瀛全志》，物理、化学、博物、生理都学过一点。那时世界历史等还没有教材，老师用日本教材现学现卖，这样我还跟着学了一点日语。按当时的规定，小学堂毕业，我已取得了秀才的资格。但由于父亲思想倾向于民主革命，家里订了《新民丛报》、《浙江潮》和谭嗣同的《仁学》等书报，我也经常阅读这些书报，使我幼稚的头脑里也装满了民主主义的思想，对于那些功名出身已不放在眼里了。

1911年，我离家去考绍兴府中学堂，这是为绍兴府属下八个县而设立的中学堂。学制四年，读完四年可获得举人的资格，但中途插班就不能得此功名了。学堂这时已分设文、实两科。我对数理有兴趣，又不愿追求功名，所以根据自己学力，决定插班考二年级实科。家里祖母和叔父都不以为然，认为我家世代书香，不该弃文就实，更应从一年级读起，以便获取功名。但我认准了目标，终于说服了父亲，结果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实科二年级。

在绍兴中学堂的一年，正是辛亥革命前夕。鲁迅先生当时在校任学监并兼授生理卫生课，我正是在这里和鲁迅先生结下了师生之谊。绍兴府中学堂的同学，思想也很活跃，大家都崇尚革命，曾掀起了剪辫的热潮，这促进了我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

但是，我在绍兴府中学堂的学习生活十分短暂，下半年我就得了伤寒病，病情十分严重，不得不休学养病，辛亥革命正是在我病中发生的。

1912年，我病愈后因不愿降级，决定不再回绍兴府中学堂，而进了杭州英文专科学校，想学好英文，可以学习欧美文化科学知识。杭州英专的教师来自上海梵皇渡教会学校，教材则是用的英文原文版的《穆勒名学》，这样既学了英语，又读了这本逻辑名著。但学校因学生太少，半年后就停办了，我的学习也就中断了。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我回家和我的姑表姊结了婚。

1913年，由于家庭经济状况日下，父亲对我和几个弟弟上学费用越来越感到负担不起。我父亲对我说：“现在的学校功课没有用，你还是拜一位教师，把国文的根底打好，只做一件事吧！”于是我就拜了绍兴名宿薛朗轩为师。这位老师是蔡元培先生的同学和连襟，蔡元培先生清末考上了翰林，后来又成为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大教育家，而我的这位老师却一直是个穷秀才，没有从政做官，大半生埋头在故纸堆里，以精通经学和舆地学闻名浙东。这位老师很怪，他有16个字的座右铭：“守旧守弊，维新维利，中立不倚，奄奄无气。”这四句话可以看出他的为人。他自己承认是保皇党，可他只是一个穷秀才，没做过官，不能算是遗老；他不主张守旧，又不主张维新，而要中立而不倚，这实在是难以做到的。所以他虽算是一位名学者，但一生穷极潦倒，谁也不能理解他。我随他学了一年的国文，对我文学水平的提高是有帮助的，而且也多少受到他的为人和中庸思想的影响，使我在后来一段时间里，虽然同情和拥护革命，但却埋头于研究学问，没有投身于革命斗争的第一线去。

就在这一年里，我没有放弃外语的学习，除自学英语外，我还参加了世界语的函授学习，使我初步掌握了世界语。

1914年，我刚18岁，就告别了学生生活，走向了社会。夏天，父亲带我到上海，由父亲的一位朋友介绍，把我写的几篇作文送给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张菊生先生，他看了认为还可以，这样我就考上了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年10月进入该馆当了编译所的练习生。

做编辑出版工作，我是非常满意的。我对这个工作很有兴趣，还在小学时，我就爱看父亲订的报刊，成了一个“读报迷”。后来我还和二弟仲持，从弟伯恳，一起编了一个家庭“杂志”，那是用手抄在黄草纸上的“杂志”，内容有论文，有小说，也有插图，很是热闹。这个“杂志”竟坚持了三四年，共出了四五十册，直到两个弟弟都离家到外地求学才停止。所以进“商务”正是我的理想。

最初，在“商务”的生活是很艰苦的。第一年每月工资只有4元，第二年才增到14元，不过吃住都由“商务”供给。我被分配在理化部工作，当时理化部主要是编教科书，《东方杂志》也属理化部。作为编辑练习生，我什么都干。《东方杂志》需要翻译一些外文资料，我日文、英文都学了一点，就试着翻译一些小文章；参加编写一些小册子，我编写出版的第一本小册子就是《利息表》；还参加编写动植物大辞典的索引。编书还要管印刷，我要经常跑印刷厂看排版，搞校对。这样我很快地了解了出版工作的全过程，也熟悉了印刷厂的工人。所有这些都给了我很好的锻炼，对我后来的工作很有好处。

“商务”每天工作时间是六小时，它还有一个很好的东方图书馆，工作人员可以随时去借阅图书，这对我的学习非常有利。我只有中学二年级的学历，我读书都是在“商务”读的。当时我把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在读书上了，

晚上还参加惜阴公会办的英文夜校，我的知识就是靠自学得到增长。后来我专搞《东方杂志》的编辑工作，这是个大型的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学、社会、时事综合性的刊物，它需要我去熟悉和研究各方面的问题，以提高编辑水平。我还翻译和写作了不少文章，在《东方杂志》发表，提高了自己的著译能力。这一时期我接触了许多新知识，了解了世界的新情况，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我就在《东方杂志》作了报道。但从思想上说，我受当时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很深，后又读托尔斯泰的书，使我成为一个赞美人类爱的理想主义者、唯心论者。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一伟大运动，也给我以深刻影响。早在“五四”前，新文化运动已经兴起，《新青年》举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提倡白话文，向封建礼教与封建文化进行冲击，这对我确实起到了启蒙与思想解放的作用。“商务”是很保守的，出版的一切图书杂志都还用文言文。当时“商务”编译所的理化部主任和《东方杂志》主编是杜亚泉，虽然他热爱科学，但在思想体系上是个唯心主义者，在政治上则是改良主义与实用主义。他就反对白话文，曾用这样的话来讽刺白话诗：“一个苍蝇嘶嘶嘶，两个苍蝇吱吱吱，苍蝇苍蝇在说什么？苍蝇说：我在做白话诗。”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只能偷偷地看《新青年》，偷偷地练写白话文。那时《新青年》出版，报上一见广告就得马上去买，晚一点就买不到了。在买《新青年》时，常常可以碰到沈雁冰。那时一些报纸的副刊已用白话文了，我和沈雁冰都喜欢写白话文，写了文章就用笔名投到《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去登载。“五四”时期我和沈雁冰是提倡白话文最力的两个人。

五四运动的第二天，商务印书馆内就有反应，几天之内工人开始组织起来了。6月3日以后，运动中心由北京移至上海，运动主力由学生变为工人阶级。6月5日至11日，上海工人阶级举行了大罢工，商务印书馆的工人都参加了，工厂和编译所都停止了工作。我也参加了这一场伟大的斗争，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但当时我还只是一个热情的支持者，我主要的精力仍然是集中在自己的学习和工作上。

在五四运动浪潮的推动下，“商务”也终于实行革新，以赶上历史的潮流。1920年，《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等都更换了主编，开始改用白话文；1921年“商务”还邀了胡适来编译所考察，提出改进方案。胡适又推荐王云五来“商务”编译所任所长，还聘请了经济专家杨端六来改革“商务”会计制度，杨贤江、郑振铎、周建人等一大批新人也都在这一年进入“商务”，“商务”开始展现了新的面貌。

“五四”以后，我更努力进行著译，在《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学生杂志》等发表了不少文章，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文学、国际问题、妇女问题、社会和哲学思想等各个方面。同时还积极参加了各种社会活动。这样，我已成为“商务”小有名气的编辑，我的工资也增加到120元。

我对世界语特别感兴趣，并以很大精力从事世界语运动，我联系了一些世界语学者，创立了上海世界语学会。我们租房设立了会所，开设世界语讲习班、函授班，还和各国许多的世界语团体和学者建立了联系。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从日本来上海，我从日本世界语者来信中知道了消息，最先找到了他，后来鲁迅先生把他请到北大教授世界语。当时世界语运动参

加者中，不少是无政府主义者，如我认识的沈仲九、匡互生等就曾要我也加入他们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但被我拒绝了。

这时，我对文学也很感兴趣，开始用世界语翻译一些文学作品。后来我的二弟仲持也来上海工作，我和他一起翻译了不少俄国和其他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因而1920年郑振铎、沈雁冰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时，我也成为该会在上海的积极发起者和参加者之一，除向《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积极投稿外，后来还协助郑振铎编辑《文学旬刊》。我还写了几篇关于文学理论的文章，如《近代文学概论》、《文学批评——其意义及方法》、《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等。1922年5月后，发生了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争论，我当时也主张为人生的艺术，不满创造社个人主义文艺思想。但是后来争论越来越激烈，使我感到文学界这种派别之争很麻烦。同时，这时我的兴趣又逐渐转向新闻工作和国际问题的研究，所以慢慢地和文学界疏远了，后来几乎完全脱离了文学界。

在这一时期，由于我著译了不少文章，也由于我积极参加文化团体的社会活动，使我在文化界广泛地结识了许多朋友，我在文化界也小有名气和影响了。1924年后，由于《东方杂志》的主编钱智修，还兼任函授部主任等工作，《东方杂志》编辑工作实际已由我负全责，我通过《东方杂志》帮助和培养了一批新作家和社会学家。后来我又积极支持章锡琛创办了开明书店，这也是一个比较进步的书店，为我国文化出版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党成立后积极领导了工人运动，“商务”职工也组织起来成立了工会。我积极支持了工会的斗争，还作为编译所职工

工会代表，向资方争取职工的经济利益。党成立后，沈雁冰早期就参加了党的组织，我与他文学研究上虽往来较密切，而在政治活动上对他却一无所知。后来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商务”的沈雁冰、杨贤江、丁晓先等都弃职参加了革命。我家庭负担重，1924年我父亲去世，留下上万元的债务，还有两个弟弟要上学，都得靠我这个家里的长子来负担，所以不能弃职。我在大革命兴起后，只同情和支持革命，参加“商务”内部的职工运动，没有参加政团组织和直接的革命斗争。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这时“商务”的工会组织已经成为运动中的骨干力量，积极参加了游行示威和罢工斗争。当五卅惨案发生后，帝国主义的租界工部局，压迫上海各报不许刊载惨案真象的报道，所以连国民党在上海的《国民日报》也无法报道实况，有的报纸连总商会宣布罢市的消息也不敢登。为此，“商务”的一些职工，决定自己搞一张报纸，冲破帝国主义的压迫，开展对运动的宣传报道工作。这样由编译所的职工发起，大家凑钱（“商务”王云五也给了一点钱），一张《公理日报》就办起来了。报纸由郑振铎、王伯祥、叶圣陶等编辑，我主要和新闻界联系，把那些在别的报纸不敢登的稿子拿来，就在《公理日报》上发表，这张报纸，实际成为了宣传、指导运动的重要舆论工具。在五卅运动中，我第1次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斗争，我和大家一起游行集会和罢工，同时对运动发展进行采访和报道。除了出《公理日报》，我还专门组织出版了《东方杂志》“五卅”事件的临时增刊，我在增刊中发表了《五卅事件纪实》的长文，详细报道了运动的起因和发展过程，指出由“五卅事件而引起的全国民众运动，是中华民族要求独立与生存的大抗争的开始”。增刊也引起了帝国主义的不

满和干涉，上海租界工部局对“增刊”提出刑事控诉，最后判罚了 200 元才算了事。

五卅运动后，随着上海总工会的成立，“商务”的工会组织也更加健全了，此后进行过几次经济斗争，都取得了胜利，使“商务”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有较大的改善。

1927 年 3 月 21 日，北伐军进到上海市郊，党领导下的上海工人第 3 次武装起义开始了。这一天的 12 点，商务放工钟声响了，但钟声一直打个不停，这是起义的信号，工人们迅速集合起来了，拿着武器，开始向指定地点冲击，经过一天多的激烈战斗，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使上海回到了人民的手里。在这伟大的革命斗争中，我看到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力量，心情十分兴奋。我还被推为编译出版工会的代表，出席了上海市民代表大会。这个时期，我读了一点马列著作，也组织了一些共产党员，看到了工人阶级力量，对工人阶级的斗争抱有深刻的同情。但我对国民党仍抱有希望，从我的思想来说，仍然是一个民主主义者。

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给我思想上以极大的震动。4 月 13 日下午，我亲眼见到反动派在宝山路上对工人群众的大屠杀，当时我的心情十分愤懑，当晚就起草了一封对国民党的抗议信，我说：“上海市民方自庆幸得从奉鲁土匪军队下解放，不图昨日闸北，竟演空前之屠杀惨剧。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开枪轰击，伤毙至百余人。‘三一八’案之段祺瑞卫队无此横暴，‘五卅’案之英国刽子手无此凶残，而我神圣之革命军人，乃竟忍心出之！”“目睹此率兽食人之惨剧，则万难苟安缄默。”要求“最高军事当局应立即交出对于此次暴行直接负责之官长兵士，组织人民审判

委员会加以裁判”。信写好后，邀了郑振铎、冯次行、章锡琛、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等一起签了名（按姓氏笔划为序，笔划多者在前），就寄给当时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又是上海政治分会委员的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三人。并把原稿送《商报》，因我二弟仲持在那里工作，所以第二天《商报》就发表了。这封信不仅表达了我对国民党反革命屠杀行动的愤慨，同时也说明了我对国民党的希望和幻想的破灭。

整个青少年时期，我都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对于新、旧民主革命，我都是拥护和支持的。后来，在革命激流的推动下，我还直接参加了群众斗争，我是在现实教育下逐渐走向革命的。在实践斗争中，我看到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对国民党的希望和幻想渐渐破灭，在思想立场上开始转向党和劳动人民。

二 入党前后

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接着又是七一五汪精卫反革命政变。宁汉合流，全国一片白色恐怖，许多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被杀害。国民党已完全撕下了革命的面纱，它所建立的南京政权，开始了新军阀的专制统治。我由于写信抗议蒋介石国民党四一二大屠杀，也遭到了反动派的忌恨。有消息传来，反动派也要对我们下毒手了。在抗议信上列第一名的郑振铎，不得不首先逃亡去了英国，他也劝我尽快离开为好。可是，郑振铎有一个有钱的岳父资助，我在经济上却没有办法。后来郑振铎从英国来信告诉我，法国法郎与中国银价比值低，这样到法国学习和生活比较便宜。于是我筹

了一点钱，向“商务”请了假，并和“商务”《东方杂志》约定，我在国外寄稿，以所得稿费来维持我国外的生活。1928年1月，我逃亡到了法国。

去法国，那时我还不懂法语，也没有熟人，完全靠了世界语。我与法国世界语团体联系，得到了他们的帮助，解决了生活和学习问题。我进入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国际法，研究国际问题。还到新闻专科学校听课学习新闻。所以，在法国我最初结识的都是法国世界语协会的一些成员，法国参加世界语运动的大都是觉悟的工人群众，其中有法国共产党党员，也有不少是无政府主义者，以后我还经常去参加他们的小组学习活动，这样较多地接触了法国觉悟的工人群众，使我得以更深入地了解到法国社会面貌和被压迫阶级的生活情况。我的亲身实践证明世界语是国际交往的有力工具，我成了世界语运动的积极宣传者。在1928年和1930年，我还作为中国的世界语学者，参加了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和在英国牛津举行的世界语大会。

在法国交往较多的是李石岑，孙伏园，他们都是在国内就熟识的朋友，后来遇到巴金，也常常来往，那时他翻译小说，我介绍他与《小说月报》联系，这样文章发表得到稿费，解决他的经济问题。巴金那时有点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但同时又是个民族主义者。他们是我在法国时的主要朋友。我在法国结识的唯一一位好友是孟雨，他是早年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后留在法国的一个细菌研究所工作，并参加了法国共产党，他在法国的时间长，我接触法国工人群众和法共党员都是他介绍的，我受他的影响比较大。解放后孟雨回国，曾在卫生部一个研究所任所长，1967年去逝了。

在法国，我学会了法语。为了学好法语，我还专门跑到瑞士日内瓦，

因为那里生活费用更便宜，比住在法国可以少花些钱。同时我对出版工作仍很感兴趣，所以还抽时间跑到法国的书籍装订作坊，专门学习他们的书籍装订艺术。这样，我在法国的三年里，跑了欧洲好几个国家，学习的东西也比较广泛。

1928年至1930年期间，正是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严重经济危机的时期。法国也是一片萧条景象，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法国在第1次世界大战和以后的时间里，曾经是劳动力不足，中国有大批华工到法国去，许多中国留学生，专到法国去勤工俭学。但在这时，对中国学生勤工俭学进行了限制，规定我们这些去学习的人不准搞勤工俭学。我是学习国际问题的，课堂上教师讲的也都是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危机。我参加世界语协会的一些小组活动，他们议论的中心还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阴影笼罩了每一个人的心头。资本主义的现实景象，使我对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的幻想破灭了，资本主义并不像我原来想象的那样好，在表面的虚假现象背后，隐藏着许多严重问题和深刻危机。就在这样情况下，我去图书馆读了《资本论》，特别是对《资本论》的第一卷，还认真地下一番功夫，这促使我思想发生了一个大的转折，我深刻地感到，资本主义是没有出路的，我开始由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这可算是我在法国留学的最大的收获。

1930后，法郎开始升值，法郎与白银的兑换比价开始增加一倍，以后又逐渐增到四倍。本来我靠国内汇寄的一点稿费来维持学习和生活就很困难，这时我虽由二弟仲持和一些朋友帮助尽量多给我寄一些钱来，也仍难以维持生活了。这样，1930年底我不能不非法回国了。

我决定由陆路取道苏联回国。我要看一看苏联，资本主义没有前途，

社会主义的苏联又是怎样呢？这是我想得到回答的问题。我与苏联驻法国使馆联系，但没有得到在苏联逗留参观的允许，只准我过境。于是我又设法求助于苏联的世界语学会，我从国际工人世界语团体的年鉴中，找到几个在莫斯科的世界语同志的地址，写信告诉他们我到莫斯科的日期，希望到时得到他们的帮助。

我登上归程，从法国进德国和波兰到苏联，在德国和波兰只作短暂的停留，都是通过那里的世界语协会的帮助，进行参观访问，了解这两个国家的一些情况。1931年的1月下旬，我到了苏联莫斯科，在这里换车，可以有一天的时间，我想利用这一天时间进行一下参观访问也是好的。我一下车，就见到了两位挥着小的绿色星旗（世界语的旗帜）的女同志，原来我写的信他们收到了，所以特地到车站来迎接我。莫斯科世界语学会的同志非常热情，当他们知道我想参观但又没得到逗留签证后，立即为我积极奔走，使我得到了在莫斯科停留七天的许可，接着他们又为我解决了食宿问题，具体安排参观日程，这样我终于实现了在莫斯科参观访问的愿望。

短短的七天里，我参观了苏联的工厂、国营农场、商店和学校，参加了工人和青年的一些集会，接触了工人、农民、学生、作家、教授等各方面的人员。苏联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感觉最深的是在苏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如我后来在《莫斯科印象记》里所说的：我所遇见的许多成人都是大孩子！天真、友爱、活泼、勇敢。“觉得个个人是可亲的、坦白的、热情的。”“掠夺制度一旦废除以后，有手有脑的人不必再为生活而忧虑；人不必靠剥削别人或向别人求乞而生存；这样成人与孩子间的鸿沟自然是给填平了。”还有一个感觉很

深刻的问题是，正当资本主义世界经历经济危机，弄得一片萧条景象的时候，苏联恰恰渡过了艰难的过渡时期，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热烈图景，我确实觉得“十月革命却已产生了许多奇迹”。七天的参观访问，使我深深地认识到一个真理：未来的世界是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认清了中国的社会发展前途，心里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我怀着十分愉快的心情告别莫斯科，经西伯利亚到中国东北，我回到祖国来了。我特地转到我所向往的故都北平，在那里游览了几天。

1931年2月底，我到达了上海。离开三年的中国，正是处于最黑暗的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在对革命人民进行政治、军事、文化的全面“围剿”。我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充满了热情和信心，但对国内革命斗争的情况却不太了解，我想找共产党，可是到哪里去找呢？我只能回到商务印书馆去，仍当《东方杂志》的编辑。这时主编钱智修年老，于右任又要拉他去南京监察院任事，这样，他把《东方杂志》的编辑责任基本上都交给了我。

没有多久，突然樊仲云来找我。樊仲云原来也在《东方杂志》做过事，大革命时去了武汉，与国民党的关系密切，后来就依靠国民党搞了一个新生命书店，还办了一个叫《社会与教育》的杂志，他是国民党汪精卫派的，后来当了汉奸。他来找我是要我给他的杂志写文章。因为他办的《社会与教育》杂志没有什么销路，所以想从各方面拉点稿，好吸引读者。我说没有什么可写的，要写就写一写这次我回来的沿途见闻，写一写对莫斯科的印象。他同意。我和他约定，我写的稿不能删改。他也答应了。就这样我开始写了《莫斯科印象记》，每周一段，发表在《社会与教育》上。文章

很能吸引读者，增加了杂志的销路。樊仲云很高兴，所以连载完后，他又提出在他的新生命书店出单行本，我也同意。这样 1931 年 8 月这本书就出版了。这本书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文化“围剿”，查禁各种进步书刊的情况下得以出版，可说是件侥幸的事。这是因为文章最初是在樊仲云编的杂志上发表的，书也是他办的书店出版的，所以没有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但后来就不得了，书出版后影响很大，从 1931 年 8 月到 1932 年 10 月，书就再版了 5 次。鲁迅先生对这本书也表示赞赏说：“……这一年内，也遇到了两部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记》，一就是《苏联见闻录》”。国民党终于注意了，书就遭到了禁止，但在香港、南洋翻印出版的还很多。

由于书的出版，首先上海青年会就来找我去做报告，要我介绍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情况。不久，担任上海法学院副院长的沈钧儒，也要我去法学院给学生讲一讲苏联的情况。这样我和沈老相识了，后来成了忘年之交。这以后，苏州青年会也来要我去做报告，一个星期天我去了，但这一次国民党反动派出来干涉了，我一到苏州，警察局长就找我谈话，说上面有通知，不准谈苏联的问题。报告做不成了，只能在苏州游览。但来听报告的青年却不肯散，都跟在我的马车周围，边走边问我苏联的情况，这样实际上我是在游览途中，在马车上做了报告。

《莫斯科印象记》的发表，对于世界语运动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一些青年从这书里看到了世界语在国际交往中的作用，开始学习世界语。我回国后积极联络世界语同志，1931 年底，在楼适夷、叶籁士、张企程等具体努力下，建立了中国青年世界语者联盟（后称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

并把我推为联盟的书记。这是个秘密的组织，我只是和张企程等联系，交谈工作，后来在这基础上又成立了一个公开的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出版了《世界》这个刊物，提出了“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的口号，还举办了世界语学习班和函授教学，后来“语联”还进行了汉字拉丁化的宣传推广工作，使世界语运动又有了新的发展。在“语联”活动中我加强了与左翼文化界的联系，靠近了党组织。

这一时期我还在《社会与教育》发表了一篇《学问易主论》的文章，提出知识分子应彻底否定自己本阶级，转而为无产阶级服务。这篇文章表明我的思想转变，自己决心站到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来。

《莫斯科印象记》等文章的发表，也引起了党对我的注意。一天，沈雁冰来电话，说有一个熟人要找我谈谈，约我到 he 家里去。我到沈雁冰家里，见到的是张闻天。张闻天过去常给《东方杂志》写稿，所以我们早就认识，后来我知道他去了苏联，我途经苏联时想找个熟人，还打听过他，结果他的一个在苏联学习无线电技术的弟弟来了，告诉我张闻天到外地去了，不在莫斯科，实际上他已经回国了。这次与张闻天见面，谈了工作，也谈了思想，从谈话中可以看出，张闻天在了解我对党的看法，试探我对党的态度。但以后我们没能再次深谈，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又见面。

——原载《胡愈之文集》，第6卷

Mia Vojaĝo tra la Esperantujo

欧 游 通 信

亲爱的同志们！

我到了欧洲了。我到了欧洲快一个月了。从小蛰伏在江南，不曾出过“国门”的我，第 1 次到了海外，人物风景全是从来所不曾见过的；饮食起居又都和我们家乡不同。尤其因为我没有学过一句法语，所以初到了法国，简直同哑巴一样，一切都听不懂，讲不出。……可是，话虽如此，我却并不感到羁旅之苦，我也并不觉得举目无亲。我只觉得我仍在我的家乡，不过换了一个环境。在这第二家乡里，我虽住的不久，却已找到了许许多多亲切的友朋，温和的伙伴。他们招待我，慰问我，扶助我，指导我，和我故乡的兄弟们一样诚挚，和我邻居的友人们一样和气。我没有觉得我在这里是外国人，也没有觉得因为我是黄脸孔的缘故，而被天骄的西方人轻蔑了，夷落了。

原来我虽然离开了“第一祖国”，却到了“第二祖国”了。这第二祖国就是 Esperantuj。在这里我们第一祖国的同胞虽然很少，但 Esperantujo 的 kolegoj, kamaradoj, samideanoj 却是多着多着。在这 Esperantujo 里，一切人种的差别，国家的畛域，全都消灭了。大家就都是 la familio granda 的一份子。生活在这 familio granda 中，我还会感觉寂寞与不方便吗？

许多人都说世界语是纸上的文字，在欧洲很少有人讲世界语的。在这

原意为“在世界语国度的旅行”。这篇文章发表时有中外文标题——编者注

里的中国学生也大都是这样说。可是我到了欧洲。已完全证明世界语已成一种 *vivanta lingvo* 。

说世界语无用的人，都是因为自己不学世界语的缘故，不学过世界语的人，即使当面遇见了一个 *Esperantisto*，也不会知道他是懂世界语的，怪不得他要说欧洲没人讲世界语了。我到了这里后的经验就不然。在船埠，在车站，在街道，在饭馆，到处我遇到了吾语同志，我就只觉得太多太多了，他们看见黄种人都很亲切，我不去招呼不好，一一招呼又反觉太麻烦了。

我是4月27日在 *Marseille* 上岸的。在我未离上海以前，我写了一封信给 *Marseille* 的 *U. E. A.* 代理员 *Isnard* 君，说我坐 *Porthos* 来法。那天清早7点，船刚到埠的时候，我正在甲板上了望，一个矮胖而和蔼的法国人走近来（因为他看见了我身上佩着上海世界语学会的绿星徽章）向我说：“*Ĉu vi estas Sro Hujucz?*” 我才想到他就是 *Sro Isnard*。我就和他握手招呼。原来他知道我的乘船 *Porthos* 于那天到埠，他就一清早起来接我的。他还说有许多在马赛的同乡同他一同来接我，他们都在岸上。我这时快活极了。因为一个不相识的东方人初次到了欧洲，就有异邦的同乡来招呼，这不是我的最大的荣幸吗？我们见面了以后，*Sro Isnard* 问我有什么事情（如验关，运行李等）要他办没有，我当时很感谢他的好意。但因为有许多中国学生同来，有几个能讲法国话，情形很熟的，我的行李又和他们在一起，所以我觉得上岸并没有什么困难，不必再烦劳马赛的同志。因此我再三谢了他们

意为“活的语言”。——编者注

“你是胡愈之先生吗？”——编者注

的好意以后，约定下午到 Marseille 的 Esperantara grupo 去和他们聚会。我们就在码头上分散了。

那天下午，我和同行的中国友人，办好了验关，搬行李到车站，买车票（因为我预备当天晚上搭车到巴黎的）等手续后，就雇车到马赛的 Esperantara grupo 去。那 grupo 是借用万国海员俱乐部（Internacia Marista Grupo），因为 Sro Isnard 与马赛的许多同志，都是操船海业的，所以以该处，为集会所。我到了那里，会见了许多的世界语同志，有一位波兰女士 Fraŭlino Roula Lakheim，保加利亚同志 Sro Techerneff 及其他三四位青年同志。我们谈了一回，大家出去在街上散步，看看街上的风景。那天正是法国大选举二次投票的前一天。马赛同志便引导了我去听选举演说，颇有趣味。马赛是法国第二大埠，Sro Isnard 劝我在那边多留一天，以便导游各处的胜迹，但我因为同行友人等候着，不便再留。七点钟马赛同志便送我上车站，在车旁高呼“Ĝis la revido”而别。这是我在欧洲第 1 次会见 Esperantisto 的情形，单是这一次，已使我得到很亲切的印象了。

到了巴黎以后，因为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旅行，感到疲倦，不得不休息一下，所以一时没有去找吾语同志。但因为我佩了绿星徽章，在街上行走时，好几次遇见了世界语同志。到巴黎一星期后，一天晚上在巴黎大学对门的一家饭馆吃饭，坐在我的对面的恰巧是一位法国同志 Sro Chausyson，他便和我说起，巴黎的 Esperanta Grupo 便在巴黎大学内，每星期五的晚间开会，叫我去参加。我很高兴。于是到了 5 月 11 日那天晚上（星期五）我就到了那里，第 1 次参加 Pariza Grupo 的 vendreda kunveno 。

“世界语团体俱乐部”。——编者注
星期五例会。——编者注

这 **Pariza Grupo** 是巴黎很老的世界语团体。是在欧战以前成立的。加入的会员虽不甚多，但办事很有精神。办着一个小图书馆，一个月刊杂志：“**Paris-Esperanto**”，会员每星期五集会一次。每次总有讲演及讨论问题。那天我去就在那里遇见了吾语的 **Pioniro**，那位 **Akademio** 的 **Prezidanto** 卡德君（**Sinjoro Cart**），他是有名的老教授，对于世界语运动的初年，尽过不少的力。近来又专主张 **fideleco al Fundamento**，对于吾语文字的统一倡导甚力。吾语产生 40 年，不致分裂，蹈 **Volapük** 之覆辙，皆出于吾语先辈维护之功，而 **Profesoro Th. Cart** 则为其中最有力之一人。他是一个 60 以上的人，须发斑白，但精神却还很旺，态度非常和蔼。我见了他，就把黄尊生君托我带来会信交给他，他就向会员把我介绍了一下。我是十分感激他的厚意。

接着就正式开会了。会员 **Sro Warnier** 报告，今天是法国无线电世界语俱乐部的讲演（**Seance du Radio-Club Esperantiste de France**）。于是接着就有三位同志，用世界语讲演关于电气机械上的问题。可惜我于电学是门外汉，所以不能十分明了。但听众却都觉得非常有兴味。直到 11 点才讲毕，尽欢而散。

5 月 10 日我去访 **K-do Lanty**（就是世界语周刊 **Sennaciulo** 的编辑），在他家中吃了晚饭，同时有日本同志长谷川理卫君也在。**K-do Lanty** 是和 **K-dino Limouzin** 同居的。她是英国人，而 **K-do** 是法国人。他们日常在家庭所用的言语就只是 **Esperanto**，这是很可以效法的。

K-do Lanty 约我到巴黎的 **Laborista Grupo** 去。我于 5 月 14 晚第 1 次到

“男同志”的缩写。——编者注

《无民族者》。——编者注

“女同志”的缩写。——编者注

那里去出席。那边是在巴黎的 **Laborista Esperantisto** 组织的团体，和 **Pariza Grupo** 性质稍有不同，集会的期间是每星期一晚七时。近年世界语在劳动界发展甚速，**Laborista Grupo** 出席的人数比 **Pariza Grupo** 更多。那天晚上是一个讨论会，讨论美国工人的情形。辩论到十时余始散。诸同志因为我新从中国来，要我讲一点关于中国工人的情形。我乃于第二星期即 5 月 21 日去出席，讲了一次。他们都觉得很有兴味。他们都希望中国工人都学世界语。将来便可同各国工人团体联络。

我到巴黎还未久，我所见到法国的世界语情形便是如此。以后我愿意随时把此间世界语消息继续写一些在《绿光》发表。现在再把法国吾语的近况约略报告一下：

法国在大战以前，世界语运动发展甚速，但在欧战后，进步颇遭停顿。在 1922 年（？）法教育部甚且有禁止公立学校教授世界语之事。当时巴黎大学便不许世界语团体在校内开会。所以战后世界语在法国远不及英德的兴盛。可是这几年来情形便好多了。亏了许多老同志不断地努力工作，法国世界语运动，已渐复旧观。今年法国 **Nacia Kongreso** 居然请前国务总理现任教育总长 **Sro Herriot** 为名誉会长，可见法政府已不再像从前的蔑视世界语了。

到法以后，我觉得此间的世界语团体有可以佩服的二点：第一，他们每星期定期集会，在这会议中联络会员感情，练习谈话，讨论问题，交换思想知识，如 **Pariza Grupo** 每星期五集会，**Laborista Grupo** 每星期二集会，没有一个星期停顿，而且大多数会员每次都出席，这样会员才有团结，吾语才有实地作用的机会。第二，此间的 **Esperantistoj** 见面的时候都讲

Esperanto，在开会时，虽然大部分是法国人，但全讲 Esperanto，没有一个人讲一句法文。因此他们讲话都很自然纯熟。讲惯听惯了，这种新语言，就成了他们的“母语”，这是很可佩服的。

我以为这两点我们都应该仿效。我们国内的同志，平时集会的机会太少了，上海世界语学会虽然办事尚有精神，但集会次数太少，连常务委员会都不是每星期开会的。因此会员中间缺少联络，会务也难以发展。我希望以后会员中间要多开讲演会，讨论会，会员要有一点责任心，遇开会必须出席才好。又我们平时太少练习讲话。遇开会时，如无外国同志，有时竟会不讲 Esperanto。因此大部分同志虽能用 Esperanto 看书作文，但因缺乏实习。都不能讲话。我到此地后，对外国同志讲话总觉远不及外国同志的顺畅流利，此因我自己太少讲之故。对他们真有愧色，我希望Ŝ. E. A. 的同志们在平时大家见面非不得已，不要讲中国话，这样方能把吾语练习的纯熟，这样方才是一个忠实的 Esperantisto！

祝诸同志好，祝吾语在中国进步发展！

胡愈之

1928 年 2 月 6 日

——原载《绿光》，第 5 卷第 6—7 号

给汉口世界语学会的信

汉口世界语学会诸同志：

先后奉到三信，均收悉。因连月事多，且关于 **Nacia Grupo** 之事，无可报告，故未及奉复，甚为抱歉，乞谅之。

黄尊生先生曾于上月过沪，来敝会报告各地考察经过，并陈述组织全国协会之意见。据其报告，现存团体，以粤、汉、沪三团体为最有实力。粤团体与社会各方面较有联络，惟办事能力缺欠，现在会务极少生色。汉团体最为活动，办事亦极有精神，惟历史太短，故尚多困难。敝会历史较长，组织较为完善，惜负责同志太少，只能守成，而无法进取，就黄君意见，全国协会中央事务所，可即就沪会改组成立。因上海为国际都市，地位较为重要，而沪会现所办函校、图书室、《绿光》、书店等事业，均可作为全国世运之事业也。经敝会各执委共同讨论，均赞成黄君之主张。如 **Nacia Grupo** 设在上海，则敝会愿将现在所有之一部分事业及固定经费收入让与 **Nacia Grupo**。此外，敝会同志可负担 **Nacia Grupo** 一部分职务。但必须外埠同志加入合作方可。因现在沪会最感缺乏者为有充分时间能负责办事之人才。因此项人材缺乏，故沪会难于发展，倘又改为全国协会，而无外埠人才加入，则恐必不能胜任。同人等希望黄尊生君能留沪担任发起 **Nacia Grupo** 事务，则 **Nacia Grupo** 可以克日成立。黄先生非不能离粤，而此外又不易找得外埠有力同志来沪主持，因此组织 **Nacia Grupo** 之事只好暂时搁置。但如外埠有其他同志愿常驻沪担任 **Nacia Grupo** 之职务，则敝会即可改组也。

以上情形，恳请代向贵会诸同志陈述，并提出讨论。贵会办事人中颇多热心之士，倘能来沪主持，则 **Nacia Grupo** 即不难早日成立。总之现在上海方面最大之困难为人才之缺乏。例如最近商务印书馆工会及侨沪日人均办世界语夜课，均出资延聘教师，而无人能去担任。其他可想而知。至于经费则反不成问题。因沪会现在每月有二百元之稳固收入（捐款在外），虽不及英德日 **Nacia Grupo** 之规模宏大，但较诸其他各国之 **Nacia Grupo** 当无逊色也。

至于尊处主张先设联合会，其问题仍与 **Nacia Grupo** 无异。因中心仍不易找得负责之人，不知尊意以为然否？

再者，弟此信系受上海世界语会委托代表奉复。至关于组织全国协会及全国大会事，前敝会年会推符恼武先生与弟为代表，与各地同志共商筹备事宜。嗣因弟个人事繁无暇，业由沪会改推黎维岳先生担任。以后关于全国组织之事一切通信望与黎符二君接洽。至此外关于敝会接洽事务，请与敝会总书记索非先生接洽，或直接通函敝会亦可。

胡愈之

1931年8月10日

——原载《希望》月刊，1931年第11期

贺世界语五十周年纪念庆祝会

Karaj gesamideanoj,

Karaj gekamaradoj,

Karaj amikoj,

Okaze de la 50-jara jubileo de nia internacia lingvo, mi tutkore salutas vin kaj deziras la bonan sukceson de nia jubilea kunveno!

Mi estas esperantisto depost mia knabeco kaj mi estas pro tio fiera. Jam 23-jare mi esperas la sukceson de esperanta movado kaj la realigon de ĝia fina ideo. Mi ankaŭ konvinkiĝis ke mi neniam disiluziiĝos. En tiu ĉi mondo, precize en nia kompatinda lando, ni multon havas por fari kaj devi fari. Tamen esperanta movado estas unu de niaj gravaj taskoj por la tuta homaro kaj por nia propra lando.

De nun antaŭ ĉio ni devas unuigi ĉiujn esperantistojn por nia komuna batalado. Unuiĝo estas forto! Plue ni devas labori penade por la disvastiĝo de Esperanto. Alie ni neniam kaj nenie forgesu uzadi esperanton por la savado de nia patrujo kaj la liberigo de ĝia popolo! Mi do deziras ke nia nacia ligo fondiĝos plej baldaŭ!

Vivu Esperanto! Vivu Ĉina Esperanta Movado!

Hujucz

附译文：

贺世界语五十周年纪念庆祝会

亲爱的同志们，

亲爱的朋友们：

值此我们的国际语诞生50周年之际，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祝贺，并祝我们的纪念会取得圆满成功！

我从少年起便成为世界语者，并为此而骄傲。23年来，我一直希望世界语运动获得成功，希望它的最终理想得以实现。我也确信，这希望永不会破灭。在当今世界，尤其在我们这个可怜的国家，我们有许多的事情要做，并且应该做。然而对于全人类和我们国家来说世界语运动是我们重要任务之一。

今后，为了我们共同的斗争，我们首先应该把所有的世界语者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我们还应为发展世界语而努力工作。另外，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要忘记，为了拯救我们的祖国和解放我们的人民而用世界语。我希望，我们的全国协会尽快成立！

世界语万岁！中国世界语运动万岁！

胡愈之

——原载《世界语》，1937年第1卷第7期

（肖平译）

致日本 Keio 大学生世界语俱乐部

尊敬的同志们：

对于你们的问题，我愿意发表我个人的如下意见：

用国际语世界语这个工具为团结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保卫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为各民族的独立、解放，为全人类的进步而斗争，互相交换意见，对于世界各国人民是有益的。

只为上述的高尚目的，世界语可以起积极作用。否则，世界语是不值得推广的。

现在中国和日本两国人民必须紧密团结，互相支持，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政策而共同斗争，为我们两国人民的光明未来而共同斗争。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日两国的世界语者用世界语为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友好和团结贡献了各自的力量。我认为，今后我们还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基于这个理解和希望，我评价世界语的功用。

胡愈之

1960年，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胡愈之同志收到了日本 Keio 大学生世界语俱乐部的来信，询问关于世界语的功用问题。本文是胡愈之同志的复信，发表在同年出版的《人民中国报道》第6期上。

贺北京电台世界语广播开播十五周年

亲爱的北京电台世界语组的同志们：

值北京电台世界语广播开办 15 周年之际，我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我非常高兴，你们为我国人民和世界的世界语者做了很好的工作。北京电台的世界语广播就象布谷鸟一样呼唤着人们在各国人民之间播种友谊。今天在世界语这块绿色的大地上友谊的鲜花盛开。我们中国世界语者应该更加勤奋地工作。中国世界语运动具有光荣的传统，一直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同各国世界语者一起努力，世界语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肯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还很年轻。我们老一代的世界语者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希望你们勤奋学习，努力工作，把广播节目办得更好。利用这个令人高兴的机会，我诚挚地问候各国世界语者听众朋友们，对你们给予北京电台世界语广播的支持和鼓励表示衷心的感谢。

胡愈之

——原载《中国报道》，1980 年第 2 期

北京电台即现在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其世界语广播开播于 1964 年 12 月。

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广播开播二十周年

亲爱的同志们：

在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广播开办 20 周年之际，我向你们大家致以热烈的祝贺！

在过去的 20 年里，你们用世界语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的广播帮助各国世界语者了解了中国和中国人民。你们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我很高兴，你们得到了各国听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我衷心地感谢他们。

亲爱的同志们，勤奋地工作吧，让我们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世界和平共同努力！

胡愈之

贺《中国报道》创刊三十五周年

中国自从有世界语的刊物，已经有 70 多年了。但是那些刊物都没有出很久，就停刊了。而且那些刊物主要谈世界语的语言文字，而不是介绍人民中国——解放后的中国，唯有《中国报道》杂志是以报道人民中国为主，而且出版已经有 35 年了。它报道了解放后的中国，人民的新中国，所以行销到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甚至有些还是终身订户。这证明了用世界语作为国际辅助语，联络各国人民的友谊和生活，是没有一种语言可与伦比的。现在是信息社会开始的时候，世界语是信息社会的最理想的工具。我相信到《中国报道》创刊 50 周年，就是 21 世纪的初头，世界语在传达信息上将起更大的作用，人民的幸福，世界的和平，将成为现实。我，作为一个希望者（Esperanto）是这样的希望着的，中国人民也是这样希望着的。

胡愈之

1985 年 1 月 24 日

——原载《中国报道》，1985 年第 5 期

给北京青年世界语者的信（节选）

我离开世界语运动，已经有十多年了。为了忙于别方面的工作，久已丢开了我从幼年所熟悉的这个新语文。但对于国际语的信心，对于世界语在人类文化上的重要性，我至今保持着从前的态度，并没有改变。现在人民有了政权，我们应当更加可以利用国际语，来替人民服务了。你们问到当局对世界语运动的态度，至今我还没有跟任何人讨论过，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只要世界语确实于人民有好处，人民的政府是会帮助世界语运动的，在解放区有不少世界语同志，首先应当团结起来，商量以后要做什么和怎样做。

——原载《人民世界》，1950年第1卷第2号

给文化部党组的信

文化部党组：

关于世界语工作，前经陈总当面指示，要我们提出意见及办法上报。为此，我们草拟了向中央请示报告稿。此稿除送请对外文委党组审核外，现在送上一份。是否妥当，请予核示。

敬礼。

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

胡愈之 8月12日

给孙国璋的信

国璋先生：

与盛先生讨论的信已拜读了。对于“新书月旦”的辩论，已由盛先生详细答复，我可以不再多说。不过先生来信，劝盛先生抛弃个人权利，我虽不懂先生所指的权利是什么（因为盛先生未尝因世界语而享何种特权），但大体上我却很赞成这一句话。因为我自己很有一种感触：吾语本是神圣的事业，但往往被坏人利用，当作猎名营利的工具。有好多的人，天天提倡世界语，天天演讲世界语主义，但实际上却是想靠吾语来赚钱，把传播吾语当作一种职业。神圣的吾语，被这种人利用后，就蒙上了永难洗刷的污点，柴门霍甫怕要在地下哭了！所以我们现在正宜以身作则，全以牺牲精神去做，抛弃一切私人利益，这才不失为一个真正的 *Esperantisto*。先生既以此勉励盛先生，我希望先生也以此自勉，我们都以此自勉，这才不负原始家创造吾语的苦心孤诣呢！

以上系因一时有所感触而发，还望先生恕其饶舌。

愈之

——原载《绿光》，第3卷第1号

给罗俊的信

罗俊 同志：

关于世界语工作，我们草拟了向中央请示报告稿。此稿除已送请文化部和对外文委党组审核外，现在送上一份。如有不妥处，请面告李奈西同志，以便修改。

敬礼。

胡愈之

8月12日

此信写于1963年8月12日，罗俊当时任对外文委副主任兼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主管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工作。

罗俊，老世界语者，曾任对外文委副主任、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在任期间，他积极支持世界语书刊的出版、世界语人才的培养和国内世界语工作，离休后，仍关注国内世界语运动的发展，曾任中国世界语之友会副会长。

——编者注

给李奈西的信

奈西 同志：

我今天陪外宾去外地参观。（参加）日本 **Kongreso**，决定把报告改写送外办。陈原同志已答应在最近修改。改好后请籁士同志签发。请你联系办理。

胡愈之

3 月 25 日

此信写于 1965 年，信中言及的参加日本世界语大会，系指当年在日本召开的第 50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经刘少奇、周总理批准，计划派 10 人代表团出席会议，由叶籁士任团长、陈原任秘书长。后因故未能成行。

李奈西，著名老世界语者。曾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办公室主任、副秘书长、《世界》杂志主编。——编者注

给侯志平的复信

侯志平 同志：

来信收读。你有雄心大志搜集关于世界语的史料，甚为钦佩。（来信附还，以便查对）

你所提的八个问题，就回忆所及，作以下答复：（1）爱罗先珂是我收到日本一个世界语者的来信介绍。此人可能是UEA的delegito（因为当时我也是上海的delegito），但不一定可靠，总之我记不起来了。（2）先由鲁迅周作人写信给我，因爱罗先珂在上海生活极困苦，可以到北京安排工作，这样才去北京了。是鲁迅直接介绍到北大，或者由蔡元培聘请就不清楚了。

（3）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是孙国璋办的。此人也是北大世界语教师，但没有学好世界语，Eroŝenko 和他相处得不好。（4）我可能没见过，现在记不得了。（5）1922—23年和鲁迅通信大概是为Eroŝenko作品翻译出版事。1931年以后没有为世界语事和鲁迅谈过。（6）1930及31年鲁迅同世界语学会通信，主要是叶籁士同志办的全国世协，我不知道内容。（7）没有。（8）你写史料可以找一下世界文学研究所戈宝权同志，他正在研究Eroŝenko 历史，准备在明年1月发表一篇文章，纪念Eroŝenko 80岁。

编辑我的关于世界语论文集没有必要。因为前期所作现在看来有很多观点是错误的。Eroŝenko在中国所写作品，倒可以重译中文成一本文集。

敬礼！

胡愈之

11月19日

此信写于1979年，在信中回答了若干史实。——编者注

侯志平，中国报道杂志社副编审，曾任中国报道杂志社副社长，中国世界语出版社社长。——编者注

给侯志平的复信

志平同志：

20 日寄来并转来杭州的信都收到。

蒙询各节，就记忆所及奉答如下：

- 1、孙中山是否论述过世界语，我头脑中无此印象，对瞿秋白亦如此。
 - 2、张闻天、博古同志在延安题字是有可能的，但我不在延安，也未听说过。
 - 3、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校长，据我所知，好像是孙国璋，他也是当时全国世界语协会会长。
 - 4、鲁迅去世时，世界语会似未送过挽联。
 - 5、我在 1917 年参加中华世界语协会的函授班开始学世界语。
- 敬礼！

胡愈之

1980 年 8 月 22 日

胡愈之是 1913 年学习世界语的，这里是作者的笔误。——编者注

给张企程的信

企程同志：

这次世界语座谈会必须改选领导机构，特别是理事长，我不能再挂名，我意选陈原同志为理事长，巴金、籁士和我选为顾问是可以的，因为这关系到 1986 的 Kongreso，那时领导再不解决，就糟糕了。祝

好！

籁士、陈原同志均此不另。

胡愈之

8 月 30 日

附录一：

胡愈之生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代主席胡愈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86年1月16日11时15分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胡愈之同志1933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五十多年来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奋斗不息，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个重大损失。全国人民为失去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和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而感到万分悲痛。

胡愈之同志1896年9月9日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1911年后，他入绍兴府中学堂，受到鲁迅先生的熏陶。1914年，他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当练习生，刻苦自学。他接受了新文化思潮的影响，1919年在上海参加了声援“五四”运动的斗争，并在《东方杂志》连续撰文，提倡科学和民主。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创建了上海世界语学会，介绍俄国和其他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1920年他和郑振铎、沈雁冰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积极推进新文学运动。1925年，他积极投入上海“五卅”运动的游行、集会和罢工活动，编辑出版《公理日报》，成为指导运动的舆论工具。他还撰写《五卅事件纪实》，忠实报道了这一历史性的群众革命斗争。1927年，他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次日，激于对反动派血腥屠杀革命群众的义愤，起草了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信，邀集郑振铎等共同签名，发表在《商报》上。在实际斗争中，他的思想、立场日益转变，倾向中国共产党和劳动人民。迫于国内的白色恐怖，他于1928年1月流亡法国，入法国巴黎大学国

际法学院学习，并系统地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思想开始由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1931年初，他在回国途中，以世界语学者的身份到莫斯科，进行了七天的访问，写下名著《莫斯科印象记》。这是我国第一本比较系统地介绍社会主义苏联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状况的著作，反映了他对新的社会制度的向往，在广大青年中激起强烈的反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主编《东方杂志》，利用这个阵地，积极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同时他与邹韬奋共同主持著名的《生活周刊》，并推动创办生活书店。1933年初，他应鲁迅之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总会临时中央执行会执行委员，努力把国民党当局迫害革命同志和进步人士的情况向国外揭露、报道，争取国外进步人士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声援。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胡愈之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在生活书店先后筹划创办了《文学》、《太白》、《译文》、《妇女生活》等多种进步刊物，并亲自主编《世界知识》。这些刊物在国民党实行文化围剿的情况下，成为进步文化工作者进行战斗的重要阵地，推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同时，他还推动生活书店出版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籍，影响了一批青年投向革命。在《生活周刊》遭受国民党当局查封后，他又积极推动杜重远创办《新生周刊》，并且通过杜重远做争取东北军上层人士团结抗日的工作，对以后发生的西安事变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5年，上海各界抗日救亡活动风起云涌。胡愈之同志受党的指示把主要精力投入组织救国会的活动。由于国民党特务的追捕，他于1935年12月逃亡到香港，1936年受党组织的派遣，经法国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汇报情况，1936年4月返回香港，支持邹韬奋创办《生活日报》，

不久又回上海从事支持救国会的活动。1936年11月22日深夜，救国会“七君子”被捕，他担负声援营救“七君子”的组织工作，一方面组织律师为“七君子”辩护，另一方面通过舆论工具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揭露和抗议。他采写的《爱国无罪听审记》，有力地抨击了国民党当局迫害抗日爱国志士的反动行径。他和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发动了“救国入狱”运动，陪同宋庆龄等知名人士亲赴苏州自请入狱，以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愈之同志以聚餐会的形式，联系和团结了在上海的一大批爱国人士，推动他们在抗日救亡中发挥作用。他倡议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把上海文化界、新闻界进步人士团结起来，向海外宣传我国抗战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共产党、八路军在抗战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他还出版《团结》、《上海人报》、《集纳》、《译报》等报刊，并深入到群众中去，对难民、市民和工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他在极端的困难条件下，以极短的时间，组织翻译出版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并首次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上海沦陷，他到武汉，于1938年5月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五处处长，主管抗日宣传动员工作。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辛勤地工作。武汉沦陷后，他受周恩来同志指派，到桂林从事统一战线工作，通过继续出版《国民公论》，组织“国际新闻社”、“文化供应社”，创办“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等多种活动形式，使桂林很快成了大后方的抗日文化中心。皖南事变前夕，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迫害，他于1940年7月撤离桂林到达香港。接着，他按照周恩来同志指示，赴新加坡开辟海外宣传阵地，团结广大海外侨胞共同抗敌，并帮助陈嘉庚先生办《南洋商报》。他还组织了星洲华

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到群众中进行抗敌宣传工作。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马来亚，新加坡危在旦夕，他在和郁达夫、沈兹九、王纪元、张楚琨等人到苏门答腊避难期间，写了《少年航空兵》一书，憧憬社会主义新中国。同时，他进行印尼语研究，编写了《汉译印度尼西亚辞典》、《印度尼西亚语语法研究》等著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愈之同志回到新加坡，创办了“新南洋出版社”、《南侨日报》、《风下》周刊和《新妇女》杂志，在海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团结侨胞共同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贡献力量。1948年8月，他经香港到达华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在解放前漫长的岁月里，他长期从事文化出版工作，同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进行不懈的斗争，是我国进步文化出版事业的先驱者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胡愈之同志历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出版总署署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等职。他为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新型的出版机构，出版大量的革命书刊和知识性读物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他多次率团出国访问和接待国外友人来访，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发展民间外交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他极力在我国提倡学习世界语，为推动世界语在我国的发展，增进中外世界语学者的友好交往费尽了心力。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长期主持民盟的实际工作，忠实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善于和党外同志合作，

团结广大民盟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民盟的进步和发展，开创民盟工作的新局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受到民盟广大盟员的尊敬和爱戴。30多年来，他为了发展我国的新闻出版、文字改革和人民外交事业，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不辞劳苦，兢兢业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十年浩劫中，胡愈之同志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拨乱反正以来，他虽然年事已高，仍然不遗余力地工作和学习。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拥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拥护改革和对外开放等各项重大决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关心国内外大事，敢于提出利国利民，清除弊政的建议。近几年来，他特别注意扶持年轻的同志承担第一线的工作，言传身教，希望他们接好革命事业的班。在病重期间他仍然关心着民盟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胡愈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战斗、全心全意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不息的一生。他对党忠心耿耿，坚信党的事业必定胜利，忠诚地接受党的领导和执行党所交给的各项任务。他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他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廉洁奉公，作风正派。他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知识分子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好榜样。他的历史功绩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

——原载《人民日报》，1986年1月23日

附录二：

胡愈之生平与世界语活动记事

1896 年

9 月 9 日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丰惠镇敕任堂深宅大院。

1902 年

进私塾上学。

1904 年

进县立高小读书。

1910 年

冬，县立高小毕业。

1911 年

入绍兴府中学堂实科二年级。后患伤寒症休学。

1912 年

春，入杭州英语专科学校补习英语。

1913 年

拜绍兴名宿薛朗轩为师，研读语文，并自学英语，还报名参加了上海世界语学会举办的世界语函授班，开始学习世界语。（见《我的回忆》）

1914 年

10 月，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练习生。继续坚持学习世界语。

1915 年

任《东方杂志》编辑。

9 月 4 日，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世界语在学术上之地位》。

9 月 29 日，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世界语之新势力》。

1916 年

与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沈雁冰用白话文为《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写稿，大力提倡白话文。

1917 年

1 月 15 日，以胡学愚的笔名在《东方杂志》第 14 卷第 1 号上发表《世界语发达之现势》。同年支持沈雁冰用白话文编《小说月报》。

1920 年

12 月 25 日，在《东方杂志》第 17 卷第 24 号上发表《国语之统系的研究与孤立的研究》。

同年，与陆式楷、斯托帕尼、汪千仞、王克绥等人发起重建上海世界语学会。巴金写信给胡愈之请教有关世界语的事。

1921 年

6 月 25 日，在《东方杂志》第 18 卷第 12 号上发表《新字创设之管见》。

10 月，受日本世界语学会之托，照顾路经哈尔滨的俄国盲诗人、世界语者爱罗先珂（Eroŝenko）。邀请爱罗先珂到上海世界语学会讲学。爱罗先珂到达上海后，同上海世界语学会组织国际晚会，爱罗先珂在晚会上用世界语演唱，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上海世界语学会用这次演出的收入，不仅还清了欠债，而且还创办了世界语图书馆，并为会刊筹集了资金。同月 14 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介绍盲诗人爱罗先珂》一文，该文又于同月 20 日载北京《晨报副刊》。

11 月 4 日，致函鲁迅商谈翻译爱罗先珂作品一事。

11 月 21 日，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译作《我底学校生活一断片》（爱罗先珂用世界语写的回忆录）。

11 月 30 日，《晨报副刊》发表由爱罗先珂口授、胡愈之、严既澄记录的《现代的忧虑》。

12 月 26 日，再次致函鲁迅商谈翻译爱罗先珂作品一事，并把爱罗先珂的文集《最后之叹息》寄给鲁迅，鲁迅从这本文集中翻译了《两个小小的死》。

同年，胡愈之与许多国家的世界语者建立了联系，被聘为环球世界语协会（即国际世界语协会）上海代理员。

1922 年

1 月 10 日，在《东方杂志》第 19 卷第 1 号上发表译作《为跌下而造的塔》（爱罗先珂著）和《译者后记》。

2 月，将爱罗先珂介绍给鲁迅，鲁迅推荐爱罗先珂到北京大学讲授俄罗斯文学和世界语。

3 月，在《东方杂志》第 19 卷第 5 号、第 6 号上发表译作《枯叶杂记》（爱罗先珂著）和《译者后记》。

4 月 5 日，在上海《教育杂志》上发表《世界语在普通教育上的价值及我国学校加入课程的准备》。此文后载入吕蕴儒编的《世界语论文集》。

5 月 3 日，在上海《文学旬刊》上发表悼念世界语者的文章《亡友胡天月传》。

5 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世界语过去、现在及将来》。

6 月 13 日，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译作《大炮在远处轰击》（爱罗先珂著）。同月，上海世界语学会创办机关刊《绿光》（Verda Lumo），胡愈之是编者之一。同月，在他主编的《东方文库》第 81 种出版了《枯叶杂记及其他》，书中收集了夏丏尊译的《幸福的船》。

7 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爱罗先珂童话集》，收集了胡愈之译的两篇译作。

8 月 10 日，在《东方杂志》第 19 卷第 15 期发表《国际语的理想与现实》、《Esperanto 以外的国际语方案》和译作《她爱我吗？》（波兰 B.Prus 著）、《失望的心》（爱罗先珂著）。同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生杂志》开辟“学生世界语专栏”，胡愈之为其写了一部分介绍世界语和如何学习

世界语的文章，并编写了一些中世对照的世界语读物。

1923 年

3 月，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世界语通信方法》一文。

6 月 5 日，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世界语学习法》一文。同月，主编爱罗先珂的世界语文集《一个孤独灵魂的呻吟》（*La Ĝemo de Unu Soleca Animo*），以上海世界语学会的名义出版，并用世界语为该书写了序言。

8 月，在《绿光》第 3 卷第 1 号上发表“*Ni Organizu, Kunlaboru!*”、《关于 Ĉinio 和 Ĉinujo 之我见》、《给孙国璋的信》。

同年，与上海世界语学会的同仁一起创办中国第一座世界语图书馆。主编的《国际语运动》一书由上海东方杂志社出版。另一译作《寓言的寓言》（陀罗雪维支著）由开明书店出版。

1924 年

在《绿光》第 3 卷第 4 号上发表“*Civila Milito en Ĉinujo*”。

1925 年

6 月 1 日，与上海世界语学会同仁一起，并联合其他世界语团体拟定《致全世界之抗议书》，分致国际联盟、各国世界语团体和世界语杂志，揭露“五卅”惨案真相，抗议帝国主义镇压工人运动的暴行。同月，在《东方杂志》上专门组织出版《五卅事件临时增刊》，并发表《五卅事件纪实》一文。

10月1日，在《绿光》上发表《五卅事件与世界语界》。

同年，胡愈之领导的上海世界语学会积极开展活动，宣传和推广世界语，举办夜校、星期学校和函授学校，胡愈之亲自担任教员。

1926 年

1月1日，在《绿光》第4卷第2号上刊登《告国语运动者》。

1月10日，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世界语普及概况》。

同年，与徐云阡合编的《世界语函授课本》出版。

1927 年

4月13日，撰写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大屠杀的抗议书。

4月14日，邀集郑振铎、章锡琛、周予同、冯次行、李石岑在抗议书上签名，寄给国民党文化界名人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他们都是世界语的倡导者）。

11月24日，为其翻译的《东方寓言集》（陀罗雪维支著）作序，题目为《文网与文学》，该书从世界语转译，于同年由开明书店出版。

11月25日，在《东方杂志》第24卷第22号上发表《世界语四十年》一文。

12月，在《小说月报》第18卷第12号上发表《世界语文学》一文。

1928 年

1月，在《绿光》第5卷第1号上发表《上海世界语学会的现在与将来》

一文。同月，迫于国内的白色恐怖，以《东方杂志》驻欧洲特约记者身份流亡法国，入巴黎大学法学院学习国际法，同时入新闻学校学习新闻学，并系统地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在法期间受到法国世界语者的许多帮助，使他感到世界语的真正价值。

2月21日，他的译作《星火》由现代书局出版。

6月至7月，在《绿光》第5卷第6—7号上发表《欧游通信》和《盎凡尔第20次万国世界语大会》两篇文章。

7月，受民国大学委派参加在比利时安特卫普举行的第20次国际世界语大会。同月，他的世界语论文集《世界语四十年》由上海世界语书店出版。

同年，在巴黎首次与巴金见面。12月，巴金从法国回到上海，应上海世界语学会理事索非的邀请，暂居学会会所，并帮助学会编会刊和办函授。

1929年

胡愈之在法国期间，最初结识的都是法国世界语协会的一些成员，他们大多数是觉悟的工人群众，其中还有法国共产党党员，胡愈之经常去参加他们的小组学习活动，这样较多地接触了法国觉悟的工人群众，使他得以更深入地了解法国的社会面貌和被压迫阶级的生活情况，使他更进一步地认识到，世界语是国际交往的有力工具。

1930年

从法国赴英国牛津，出席全世界无民族协会举办的世界语大会。

1931 年

年初，因经济窘迫，在巴黎大学中途辍学回国，归国途中，路经德国柏林，访问了设在柏林的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国际的机关刊《国际主义者》编辑部和当地的世界语者，后访问了波兰，考察了当地的世界语运动。

1 月 27 日，到达莫斯科，通过世界语者的帮助，获得在莫斯科停留 7 天的准许。其间会见了苏联世界语同盟总书记、著名世界语活动家、《柴门霍夫传》和《世界语史》的作者 Drezen。依靠苏联世界语者的帮助，在莫斯科参观了工厂、农场、学校、托儿所、大剧院，访问了工人、知识分子的家庭。

2 月 1 日，参观克里姆林宫，并拜谒列宁墓。晚上，出席莫斯科世界语者为他举行的招待会。

2 月 3 日，乘火车离莫斯科回国。

2 月 11 日，到达满洲里。途经北京作短暂停留，月底到达上海，仍回商务印书馆当编辑。

3 月，应樊仲云约稿，开始为《社会与教育》杂志撰写《莫斯科印象记》，每期连载。

5 月，在《中学生》总第 15 号上发表《我的旅行记——德国西部三大城的世界语旅行》一文。

7 月 28 日，在上海撰写《莫斯科印象记》序言。

8 月，在《希望》月刊第 11 期上发表《给汉口世界语学会的信》。同月，由新生命书店出版《莫斯科印象记》单行本，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引导一批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该书当年曾再版多次。

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事变，汉口世界语学会联络上海世界语学会等20个世界语团体发表告世界语大众书，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从此胡愈之投入了为保卫民族生存、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10月，与邹韬奋相识，成为挚友。

11月3日，与楼适夷、叶籁士、张企程、陈世德、乐嘉煊、覃净子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普罗世界语者联盟（Ĉina Proleta Esperantista Unio），又称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简称“语联”。胡愈之当选为联盟的书记。该组织的行动大纲是：①以无产阶级立场宣传、普及和运用世界语，反对资产阶级的世界语运动；②用世界语提高中国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准，并增进全世界无产者的团结。该组织设书记处、组织部、联络部、研究部。它标志着中国世界语运动已经跨进了一个新的时期。

同年，应苏州世界语学会的邀请到苏州开明大戏院作关于世界语运动的演讲，使陈世德创办的星期日世界语班学习的人数猛增至近百人。

1932年

年初，应鲁迅之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当选为临时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

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一·二八”侵沪战争，上海世界语学会和商务印书馆被炸毁。胡愈之与邹韬奋、郁达夫、丁玲、冯雪峰、叶圣陶、周扬等43人联合签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后又在此基础上联合129名爱国人士发表《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

2月至4月，《云南世界语周刊》第2、4期转载胡愈之的《世界语文

学》一文。

12月15日，在胡愈之、叶籁士、张企程支持下，《世界》杂志(La Mondo)创刊。该刊由叶籁士、张企程、胡绳负责主编，历时四年多，指导中国世界语运动，宣传推广世界语，在“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的口号指导下，团结全国世界语者，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新文字运动，为中国世界语运动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同年，胡愈之领导的中国普罗世界语者联盟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化总同盟，用世界语进行革命斗争，出版《中国普罗世界语通讯新闻稿》(Ĉina PEK-Bulteno)，向全世界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苏区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活动，中国人民的生活以及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

1933年

1月1日，在其主编的《东方杂志》上开辟《新年的梦想》专栏，以“梦想的中国”、“梦想的个人生活”为题向各界征文。谢冰莹、巴金、叶圣陶、索非、邹韬奋、周谷城、陶孟和、楼适夷、茅盾、周作人、孙伏园等世界语者和世界语的支持者积极应征。胡愈之以记者名义发表《读后感》。

1月22日，中国普罗世界语者联盟建立了自己的公开组织——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后来成为团结中国世界语组织和世界语者的核心。

1月至4月，为支持《世界》杂志的出版，每月捐资5元。

4月10日，在《世界》4月号上发表《巴比塞与〈世界〉》。

7月14日，邹韬奋被迫离开上海，胡愈之负责《生活》周刊的编务和

生活书店的工作。

8月，与鲁迅、巴金等105人在“中国著作家欢迎巴比塞代表团启事”上签名。

9月10日，上海世界语者协会举行第2次大会，提出“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Per Esperanto por la Liberigo de Ĉinio*）的口号，得到全国世界语者的热烈拥护。同月，由张庆孚介绍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属中央特科直接领导。

1934年

6月23日，在《申报》上发表《关于大众语文》一文。

9月16日，创办《世界知识》，任主编。

9月20日，生活书店出版《太白》，在创刊号上发表《怎样打倒方块字》一文，主张将来用拉丁字母拼音，代替方块字。

1935年

8月，中国普罗世界语者联盟出版《*Sin Wenz*》月刊，积极宣传拉丁化新文字和世界语。

12月10日，去香港找华南工委书记宣侠父，汇报张学良和东北军的情况。

1936年

1月，秘密回到上海，向鲁迅转达苏联的邀请，鲁迅婉言谢绝，又回香

港。后根据党的指示，经法国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汇报国内情况，特别是张学良思想转变和东北军的动态情况。

5月，陪潘汉年到香港。后协助邹韬奋办《生活日报》。

8月，在《生活星期刊》上发表《新文字运动的危机》一文。

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胡愈之与救国会领导人商定，由蔡元培、宋庆龄、毛泽东、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胡愈之、茅盾、曹靖华和周建人等组成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

10月22日，与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史良等参加鲁迅葬礼，并致悼词。

11月23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逮捕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七人。胡愈之担负起声援营救的组织工作。

1937年

3月，在《语文》第1卷第3—4期发表《有毒文谈》一文。

6月，《世界语》杂志转载胡愈之写的《爱国无罪听审记》、《救国入狱运动宣言》。

8月，在《语文》第2卷第2期上发表《世界语与中国文字的改革》一文。

11月12日，上海陷落后，继续留上海从事抗日宣传工作，还出版了《团结》、《上海人报》、《译报》等报刊，报道抗战消息。组织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的翻译出版工作。

1938 年

初春，《西行漫记》出版，后又出版《续西行漫记》。

2 月至 4 月，着手《鲁迅全集》的出版、编辑、发行方面的组织工作。

5 月，从上海抵武汉，根据周恩来、郭沫若的安排，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五处处长，主管文字宣传。

6 月 15 日，在胡愈之的推动下，《鲁迅全集》普通本出版。

8 月 1 日，《鲁迅全集》精装本出版。同月，在《南洋商报》上创办副刊《绿星》（Verda Stelo），宣传世界语。

10 月 24 日，与周恩来、郭沫若撤离武汉，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去桂林做李宗仁、白崇禧的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在桂林从事抗日宣传和进步文化活动，曾多次参加当地的世界语活动。

12 月 29 日，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发表《纪念国际语理论家柴门霍夫》一文，该文后来被桂林《救亡日报》转载。

1939 年

2 月 15 日，《南洋商报》副刊《绿星》转载《世界语与中国文字的改革》一文。

10 月，出任文化供应社董事和编辑部主任。将救国会办的《国民公论》迁桂林，继续出版，开展抗日文化宣传工作。

同年，应邀去广西大学世界语班发表演讲。

1940 年

在广西桂林期间，胡愈之非常关心当地的世界语运动，经常出席张振之、凤永益组织的世界语者座谈会。

7月，接受党的指示，离桂林去香港协助国新社香港分社工作。

11月，受党的派遣，离香港去新加坡，在南洋从事抗日宣传救亡运动。

1941 年

1月1日，任《南洋商报》主编，利用报纸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6月，刘尊棋、沈兹九、王任叔、张企程、杨骚等人相继到新加坡帮助胡愈之工作。

12月，日本帝国主义者进攻新加坡，同郁达夫发起成立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1942 年

2月4日，与28名抗日文化工作者撤离新加坡，开始流亡的航程，后抵达印尼苏门答腊，为躲避日本特务和汉奸的搜捕，隐姓埋名三年零八个月。在印尼期间编写《汉译印度尼西亚语辞典》和《印度尼西亚语语法研究》两部书稿。

1943 年

在印尼马达山度过流亡生活两年。与沈兹九合著《流亡在赤道线上》一书。

1945 年

10 月，与沈兹九等人从苏门答腊返回新加坡。筹办新南洋出版社。

12 月 1 日，以“沙平”笔名，主编《风下》周刊。

1946 年

1 月，在新加坡成立民盟南方总支部驻星洲办事处，领导南洋地区民盟组织。

11 月 21 日，创办《南侨日报》，任社长。通过《风下》、《南侨日报》在海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团结侨胞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贡献力量。

12 月 14 日，在《风下》周刊上发表《语言和社会进步》一文。

1947 年

胡愈之在新加坡主编《南侨日报》期间，新加坡有一所以世界语先驱者之一郭后觉命名的后觉公学，校内设有世界语研究班，胡愈之应该校的邀请作关于世界语的演讲。

7 月 1 日，在《后觉公学夜校部纪念刊》上发表《郭后觉先生和我》一文。

8 月 10 日，《后觉公学纪念刊》转载《郭后觉先生和我》一文。

9 月 27 日，主持民盟马来西亚在新加坡召开的第 1 届代表大会，并起草宣言。

1948 年

4 月，由新加坡到香港，向党组织汇报了南洋地区的情况和自己的工作。

8月，从香港到大连。

9月，从大连到达党中央所在地平山县西柏坡，向党中央汇报南洋地区的情况和在华侨中进行的工作以及港澳地区民主党派的情况。

1949年

5月，在《进步日报》上发表《五四与文字改革》一文。

6月16日，《光明日报》创刊，任总编。

8月5日，在北京饭店召开第1次世界语者座谈会，就如何开展世界语工作交换意见，会上推选胡愈之、冯文洛、金克木、亚克、丁汇川、邱及等六人为全国世界语团体筹备会的发起人。

9月，任新华书店总编辑。

9月30日，北京世界语者在中山公园举行第2次世界语工作座谈会，会后，在胡愈之的支持下，由亚克、张企程拟定一份计划，向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申请成立全国性的世界语组织，并筹办世界语的对外宣传刊物。同月，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体会议，共商新中国成立事宜。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正式成立。它的中心任务是对外宣传，其中把筹备出版《人民中国报道》世界语杂志作为自己的一项具体任务。同月，被任命为国家出版总署署长。

12月，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被推为副会长。

1950年

1月8日，在《光明日报》编辑部召集第3次北京世界语者座谈会，再次就建立全国世界语组织和出版对外宣传世界语杂志问题进行讨论。会议推举胡愈之、张企程、翟健雄、冯文洛等七人负责各项筹备工作。

1月15日，召集全国世协筹备会议，通过世协章程草案，协会名称定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并就有关事宜请示政务院文委。在胡愈之领导下，积极向中央建议创办世界语的对外宣传刊物，并完成有关的报批手续。胡愈之的建议得到胡乔木、郭沫若同志的支持。全国世协筹备委员会决定在北京举办世界语的初级班和中级班。

4月，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批示：“同意成立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将工作中心放在国际宣传与联络方面，协会由新闻总署领导。”同月，新闻总署批准《人民中国报道》（*El Popola Ĉinio*）出版，在新闻总署署务会议上讨论了创刊号的内容构成。胡愈之指示编辑部的同志一定要遵循中央的宣传方针，针对国际社会的客观情况，特别是针对世界语读者的情况，把刊物办好，力戒宣传味。胡愈之还亲自出面，请有关部门协助，调冯文洛、张闳凡、李士俊等世界语者到《人民中国报道》编辑部工作。

5月1日，《人民中国报道》创刊。该刊由国际新闻局编撰处主编，编撰处副处长张企程负责刊物的领导工作。同月，《人民世界》（*Popola Mondo*）第1卷第2期在“世界语通讯”栏上摘要刊载胡愈之给北京青年世界语者的复信。

5月21日，参加在中山公园举行的世界语座谈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高长荣、张企程、孙源、冯文洛、霍应人、张闳凡、王食三、李林、章曙、丁汇川、张载、许禾金、叶君健、金克木、赵桂镛、李奈西、于贻倜等20

人。在胡愈之主持下，讨论了新出版的《人民中国报道》和建立全国性的组织问题。

1951 年

3 月 11 日，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胡愈之主持成立大会，并致开幕词。会上胡愈之当选为全国世协理事长。同月，《人民世界》新 1 卷第 3 期刊载《胡愈之同志在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大会上的开幕词》。

同年，《人民世界》改为全国世协的机关刊。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出版《共产党宣言》的世界语译本。

1952 年

在胡愈之的支持下，全国世协再版冯文洛编著的《世界语中文大辞典》、外文出版社出版世界语文版的中国诗歌集《和平最强音》和中国小说集《新事新办》。

1953 年

5 月 7 日，在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七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

6 月 3 日，外文出版社就《人民中国报道》世界语月刊的出版问题请示出版总署，反映自 1952 年以来，苏联及东欧国家都先后改变了对世界语的态度，取消了世界语团体和刊物；民主德国有关方面通过正式外交途径向我方提出，认为世界语是世界主义的产物，应予反对，并表示不能接受中国出版的世界语刊物。出版总署发文给外文出版社和国际书店，提出：关

于世界语刊物停止出版问题，当听候政务院文委指示办事。在未得到指示前，外文出版社和国际书店应先完全停止向兄弟国家发世界语刊物；并停止向联邦德国发行。

9月，在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11月，出版总署撤销，被政务院任命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外文出版社出版世界语版的中国小说集《幸福》。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指示《人民中国报道》暂时停刊，全国世协也暂停世界语工作。

1954年

1月，世界语《人民中国报道》停刊，至1957年12月复刊。

1955年

10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赴上海、浙江等地了解文字改革工作情况。

同年，作为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的主要助手，协助吴玉章搞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先后主持召开新闻出版界的座谈会，讨论文字改革问题。后成立拼音方案委员会。

1956年

2月9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2届第2次会议上作《关于推广普通话和拟订拼音方案》的发言。

5月，作为人大常委会委员率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五·一”观礼，访问了苏联，并顺道访问了捷克，考察了当地世界语运动情况。他了解到那里的世界语运动已经得到恢复，回国后向国务院、中宣部、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报告，建议恢复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工作和《人民中国报道》的出版。

6月，在胡愈之的提议和推动下，中央批准派叶籁士、陈原、张企程赴丹麦参加第4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

7月17日，陈毅副总理批示，同意全国世协恢复工作。同月下旬，叶籁士、陈原、张企程赴丹麦哥本哈根参加第4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

8月，听取叶籁士、陈原、张企程汇报第4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情况，商定积极推动《人民中国报道》复刊和恢复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工作。

9月12日，国务院批准恢复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改由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领导。

同年，胡愈之亲自商请外文出版社领导同志由张闳凡管理筹备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复会和《人民中国报道》复刊的联系工作。随后，又商请该社同意正式调张闳凡到全国世协工作。

12月4日，全国世协将“关于恢复编印世界语书刊的请示报告”呈送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党组，并转中联部。

1957年

1月，中共中央联络部召集外文出版社、对外文协和全国世协代表，研究全国世协的组织、宣教、国际联络工作和编辑出版世界语书刊事宜。会

议决定，将上述工作全部集中于全国世协。全国世界语协会正式恢复工作。

1月27日，全国世协在青年团中央大礼堂举行世界语报告会，胡愈之、叶君健作报告，听众达320多人，同时举办世界语展览，展出400多种书籍。

5月，胡愈之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汇报全国世协编制情况，习仲勋表示同意。

5月25日，对外文协将全国世协编制正式报国务院。

6月4日，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除国内会刊由全国世协编辑出版外，其它世界语书刊由全国世协负责编辑业务，外文出版社负责出版方面的工作。国务院批准全国世协编制。

8月，文化部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发出通知，令各省、市、自治区的对外文协分会及文化局要支持并指导各地的世界语运动。

10月15日，中宣部致函对外文协党组：“同意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出版世界语《人民中国报道》双月刊和出版世界语书籍。”同时批准该刊的编辑方针。复刊后的《人民中国报道》以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机关刊的名义出版。

10月30日，在全国世协上报北京市文化局、出版局的“报纸杂志登记表”中写明胡愈之任《人民中国报道》杂志总编辑、叶籁士任副总编辑。

12月，《人民中国报道》正式复刊。

同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世界语版出版。

1958年

2月，全国人大和政协召开大会，胡愈之同叶圣陶等人在会上作了“大家都来作文字改革的促进派”的联合发言。大会批准汉语拼音方案并公布实施。会后积极领导宣传推行工作。

7月6日，全国世协召开在京会员全体大会，胡愈之就世界语的发展前途问题、全国世协的工作任务以及世界语者必须成为又红又专的革命者发表讲话。在会上选出全国世协临时常务理事会，以领导日常工作。胡愈之被选为理事长，叶籁士为副理事长，陈原为秘书长。同时，成立《人民中国报道》编委会，主任胡愈之，副主任叶籁士，委员有陈原、叶君健、张企程、李奈西、冯文洛。

8月，陈原代表全国世协赴保加利亚参加保加利亚第33届世界语年会。

9月，全国世协在胡愈之的倡导下，报请对外文委，请示有关世界语书刊出版工作的分工问题，建议协会只作编译工作，将国内出版交商务印书馆，对外出版交外文出版社。

11月，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出版内部参考资料《世界语运动简讯》创刊号。同月，冯文洛编著的《世界语初级课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年末，赴广东、福建视察汉语拼音方案和普通话推广情况。

1959年

4月，国务院外办负责人廖承志指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仍以办好《人民中国报道》对外宣传刊物为主，国内不搞运动，但可以用开办讲习班及函授学校等方式，适当地培养干部。”

7月7日，经胡愈之批准的“世界语协会1959年工作规划”上报对外文

委，规划积极贯彻外办指示精神，确定协会今后的工作以对外宣传为主，着重在办好《人民中国报道》，国内不搞运动，着重在培养一批干部。规划还确定了《人民中国报道》的编辑方针，仍然应该以团结进步的世界语者为基础，争取中立的世界语者，影响落后的世界语者，共同为世界和平、人类幸福和进步而努力。规划明确指出《人民中国报道》是一个综合性的报道刊物，它通过文学、艺术、生动活泼的特写，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中国人民丰富多彩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报道有关我国的基本知识，以及包括世界语活动的国际和平友好活动，在内容上，多说我国的和平政策，多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少说理论，同时为了配合国际世界语运动，以少量篇幅报道国内外世界语活动的情况，刊登通讯启事、世界语书籍评介、读者来信和一些有关世界语的研究文章，使刊物在形式上更象没有脱离国际世界语运动的世界语刊物。这一方针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

8月，叶籁士代表世界语协会参加在波兰举行的第44届国际世界语大会。胡愈之应邀参加“柴门霍夫诞生百周年纪念国际监护人委员会”。

9月，被国务院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分管出版工作。同时仍任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10月，全国世协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决定编辑出版世界语的《中国文学作品选集》，该文集由茅盾同志任主编。

12月，全国世协组织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活动，胡愈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希望正在变成现实——纪念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诞生一百周年》一文。在《人民中国报道》上同时发表《人类的美梦将要实现》一文。同月，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编辑的《世界语新词典》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60 年

4 月，接待来京的日本考察中国文字改革学术代表团，向代表团介绍中国文字改革情况。同月，在第 2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2 次会议上作题为《汉语拼音方案是文化革命的有效武器》的发言。

6 月 23 日，全国世协报请对外文委批准，将世界语书刊出版工作划归外文出版社领导。

同年，在《人民中国报道》第 6 期上发表《世界语的作用》一文，回答日本 Keio 大学生世界语俱乐部的信。中华全国世协决定并出版《和平》（Paco）的中国版和《列宁主义万岁》的世界语文版。

1961 年

2 月 3 日，全国世协制订“1960 年工作规划”，其中提出《人民中国报道》的方针是“应着重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三面红旗，但这个刊物在国际上系以人民团体机关报的面目出版，而宣传对象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职员和一部分工人群众，因此应注意艺术性”，“报道应以人为主，以事为主，通过事实，说明政策，切忌空谈理论。内容和形式都应该保持生动活泼的风格。调子既不能太高，同时又要注意内容的高度思想性”，“在报道上不强求配合当前时事政策，对政治问题的报道，应着眼于宣传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支持亚、非、拉美各国人民反帝反殖的斗争以及有关与各国人民和平友好往来的情况”，“为了照顾世界语特点，每期应以适

当篇幅（约六至七分之一）发表有关世界语的作品”。

同年，全国世协决定并出版《实践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的世界语文版。

1962 年

3月1日，出席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外文委专门讨论世界语工作的会议。

3月20日，发表《中国的文字改革》一文。

3月23日，经胡愈之批准，全国世协上报对外文委，并转中宣部、国务院外办“关于今后世界语协会工作的请示报告”，其中建议：“双月刊《人民中国报道》仍继续贯彻中宣部1957年规定的编辑方针，调子要低一些，要照顾读者可能接受的程度，通过文学、艺术和生动活泼的特写，除适当宣传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外，应以介绍知识性的东西为主，有系统地介绍我国五四以后的文学著作，民主革命经验、基本知识、人民生活、文化艺术，尤应着重于宣传我国为世界和平，争取各国友好合作而进行的各方面的活动。”

6月25日，中宣部批复：“世界语协会的对外宣传工作，仍照过去办法，由对外文委领导。对国内工作和联系，可请文化部领导。遇有重大问题，转报外事办公室和中宣部决定。”在胡愈之的领导下，根据上述精神，《人民中国报道》编辑部制订了“关于改进编辑部工作的意见”和“1962年工作计划”。

9月，主持召开“汉字简化座谈会”，听取党外专家对文字改革的意见。

同年，全国世协出版《评白皮书》、《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国风光》（画册）世界语文版。给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周新武写信，建议开办世界语国际广播，得到广播事业局领导的支持。

1963 年

5 月 21 日，国务院第 131 次会议决定设立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人民中国报道》编辑部改为独立的《人民中国报道》杂志社，受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领导。

5 月 25 日，人大常委会第 97 次会议批准设立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同月，胡愈之、叶籁士、陈原等召开全国世协常务理事会议，决定于 7 月举办“世界语对外宣传工作汇报展览”，同时召开第 1 次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

7 月 21 日，“世界语对外宣传工作汇报展览”在北京开幕，胡愈之邀请并亲自陪同陈毅和夫人张茜观看展览，胡乔木、孔原、楚图南等领导同志也先后观看展览。

7 月 25 日至 8 月 1 日，在北京和平宾馆主持召开第 1 次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胡愈之邀请陈毅同志出席大会。25 日，陈毅同志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胡愈之在会议结束时作了总结发言。会议后，胡愈之与高教部领导协商：把世界语列为全国大专院校的第二外语，并建议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办第一期世界语教师培训班，为在全国各大专院校开设世界语选修课，培养世界语教师。

8 月 12 日，给对外文委副主任、外文局局长罗俊同志和文化部党组写信，征求对世协工作报告“关于在当前形势下开展世界语工作的请示报告”

的意见。

8月13日，高教部发出公函，通知全国高等院校凡有条件者可在外文系开设世界语第二外语课，其它系科可开选修课，以培养世界语干部。

10月17日，经胡愈之修定的“关于在当前形势下开展世界语工作的请示报告”呈报对外文委党组、中宣部、国务院外办、陈毅副总理。在报告中提出：“根据这几年来世界语对外工作所取得的经验，在当前形势下利用世界语这一工具在各国世界语者中进行耐心的、广泛的宣传联系工作，并且通过他们来影响各国广大群众，对团结世界上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这一政治任务，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的。因而这项工作应当和必须做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这是今天世界语者责无旁贷的国际主义义务。”“由于宣传对象主要是政治上的中间派，因此必须采取细水长流，耐心教育的方针，不能性急，调子一般也不要过高，更不要强加于人。”整个报告贯彻了陈毅副总理在世界语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

11月12日，高教部发出通知，从全国11所大学调集一批青年教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世界语教师进修班，胡愈之十分关心这个班的教学。

年底，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出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世界语文版，并编辑出版了《鲁迅小说选》的世界语文版。

1964年

1月8日，胡愈之在中国人民大学对全国世界语教师进修班和该校新闻系世界语班发表演说，勉励大家要努力学好世界语。他强调指出，学习世界语对于新闻记者也有好处。

6月，世界语教师进修班在文化部礼堂举行结业式，学员们用世界语演出话剧《青年一代》，胡愈之因外出访问未能参加，回国后即接见教师进修班的学员，鼓励他们回学校以后继续学习世界语，开设世界语选修课。

7月，全国世界语协会派叶籁士、陈原参加在荷兰举行的第49届国际世界语大会。

10月，经胡愈之与高教部领导同志协商，为培养世界语专业干部，高教部批准在北京广播学院开设世界语班，从全国5所大学调来20名学生学习世界语。胡愈之去北京广播学院看望世界语班的学生，并发表讲话。

12月19日，在胡愈之的积极推动下，北京电台（即现在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广播正式对欧洲播音，每周两次。

同年，全国世协主持了世界语版的《矛盾论》、《中国地理概述》、《中国针灸疗法》、《阿诗玛》的出版。

1965年

3月25日，给李奈西写信，谈派世界语代表团出席在日本召开的第50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写报告的问题。胡愈之与叶籁士、陈原商讨代表团的组成、出访计划和活动方针。

6月24日，在《人民中国报道》杂志社编委会第3次扩大会议上就如何办好杂志发表讲话。同日，发表《压缩汉字字数的第一步》。

7月，为保证出席第50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我国代表团能够顺利和圆满地完成任务，胡愈之不辞辛劳，分别拜访了廖承志、乔冠华、刘宁一同志，请他们给予关照和帮助。以叶籁士为团长的10人代表团拟赴日本，后

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事后胡愈之亲自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鼓励大家要树立信心，克服困难，搞好今后的工作，并同大家共进午餐，合影留念。

同年，全国世协主持出版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立》、《越南人民必胜，美国侵略者必败》的世界语文版。

1966 年

1 月初，北京世界语者举行新年联欢会，胡愈之出席并讲话。他说：“在国内外大好形势下，中国世界语工作者的任务是用世界语这一工具更好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

1 月 27 日，外文局党组决定外文出版社成立世界语文组，专门负责世界语图书的出版。

8 月，胡愈之因“文化大革命”受到冲击，直到 1972 年恢复工作为止。

1967 年

1 月，经陈毅副总理批准，《人民中国报道》由双月刊恢复为月刊。

4 月 29 日，在文化部小礼堂，胡愈之被文化部、民盟、文改会、全国世协“造反派”揪斗，萨空了、叶籁士、陈原等陪斗。

1972 年

胡愈之恢复工作后，十分关心文字改革工作，自己编写拼音教材，撰写有关论文。

1973 年

年初，胡愈之同有关部门商量，并经中央批准全国世协的工作从外文局转给国务院科教组领导。

3 月 5 日，与郭沫若、廖承志接见并宴请日本文化代表团团长土岐善磨和日本世界语活动家德田六郎。事后，胡愈之和叶籁士又单独会见德田六郎，就促进中日两国世界语者之间的友好往来，加强友谊，进行了交流。

8 月，在胡愈之的促成下，以叶籁士为团长、陈原、祝明义为团员的中国世界语代表团去日本访问，参加了第 60 届日本世界语大会。胡愈之亲自去机场为代表团送行。

8 月 23 日，77 岁高龄的胡愈之又去机场，迎接中国世界语代表团访日归来。事后，他仔细地听取了代表团的汇报。胡愈之不顾“四人帮”和极“左”路线的干扰，非常巧妙地抓住有利因素，恢复世界语对外活动。

同年，经外文局批准，《人民中国报道》中文刊名改为《中国报道》，外文刊名不变。

1974 年

4 月，在胡愈之的建议和促成下，日本世界语代表团应邀来我国访问，胡愈之以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的身份在北京饭店宴请日本代表团。

10 月 13 日，胡愈之会见应邀来华访问的越南保卫和平世界语者协会代表团，同代表团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文革”后期，胡愈之拜访了当时主管世界语出版工作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就对外宣传工作中只出世界语刊物而只字不提世界语的错误作法，提

出意见和建议，后未被采纳。

1975 年

10 月 21 日至 11 月 4 日，在胡愈之的促成下，以全国世协秘书长陈原为团长，李玉萍、龚佩康为团员的中国世界语代表团一行三人赴河内访问。

同年，胡愈之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汉字标准化和应用频率的研究。

1976 年

2 月 24 日，全国世协接待国际世协执委沃辛克夫妇来访。

1977 年

3 月，发表《揭批“四人帮”，文字改革有希望》一文。

6 月 2 日，世界语者刘火子拜访巴金，转交了胡愈之给巴金的信，信中对巴老表示问候。

6 月 3 日，巴金给胡愈之复信，对胡愈之的关怀表示感谢。

10 月，《中国报道》的西班牙读者安东尼奥·阿隆索·纽内兹给胡愈之写信，就有关数学的现代教学法问题了解中国的情况，请求胡愈之给予帮助。胡愈之同志将信转给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请陈景润研究员给予回答。陈景润于 10 月 31 日复胡愈之信，回答了有关问题。胡愈之委托《中国报道》写信转告安东尼奥·阿隆索·纽内兹。他们的复信和来信刊登在《中国报道》上。

同年，在《中国报道》第 12 期上发表《迎接新年——给相识和不相识

的远方的朋友们》。

1978 年

1 月 2 日，安·阿·纽内兹致函《中国报道》编辑部，对胡愈之和陈景润的帮助表示感谢。

2 月，在第 5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第 5 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政协常委。与出席第 5 届全国政协会议的代表叶籁士、邱及、叶君健、方善境、金克木、黄乃就世界语工作交换意见，并向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提出相关建议。会议期间，两次看望巴金。

7 月 29 日至 8 月 5 日，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派出以张企程为团长的世界语代表团出席在保加利亚瓦尔纳召开的第 63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出国前，胡愈之对代表团的工作作了指示；回国后，又听取了代表团的汇报。为扩大世界语的影响和重振世界语运动，他特地请楚图南以全国政协文教组的名义，安排一次小型报告会，由张企程向一部分政协委员作了一次有关世界语和代表团活动的报告。胡愈之在报告会上也发表了长篇讲话。

8 月 19 日，接见并宴请以德田六郎为团长、梅田善美为秘书长的日本“中国报道之友”访华团的客人。

9 月 28 日至 10 月 19 日，《中国报道》社邹国相、谭秀珠作为记者和翻译，随中国木偶剧团前往南斯拉夫参加第 12 届国际戏剧节和第 11 届国际木偶节，木偶剧团用世界语演出的《大闹天宫》获得艺术奖、儿童奖和集体语言荣誉奖，演员安子明获得语言奖第三名。回国后，受到胡愈之的接见。胡愈之观看了他们用世界语表演的《大闹天宫》，高度赞扬了他们

所从事的工作和精彩的表演。

10月，在《中国报道》第10期上发表《悼念郭沫若同志》一文，文中赞扬了郭老对中国世界语运动的贡献。

12月，在《生活周刊》上发表《吴玉章同志和中国文字改革》一文。

1979年

3月，中国报道杂志社党的核心小组提出“关于《中国报道》的改进设想”，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强调要加强针对性，办好《中国报道》杂志。

4月，胡愈之与外文局局长罗俊研究有关全国世协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体制，全国世协由外文局代管的问题。

5月16日，教育部、外文局会签行文“关于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恢复‘文革’前的体制，由外文局代管的请示报告”，上报中宣部。

5月23日，中宣部同意上述有关报告，并批准全国世协参加国际世界语协会，成为国际世协团体会员的请示；同意全国世协机构设在外文局内，编制3—4人。同月，经胡愈之与外交部协商，调张企程到全国世界语协会和中国报道杂志社工作。

6月，外文局改组中国报道社领导班子，由张企程任总编辑、毛大风任副总编辑。并成立新的编辑委员会，编辑委员会由张企程负责。为解决世界语干部不足的困难，胡愈之亲自与劳动人事部协商，调自学成才的青年人蒋鸿章到中国报道社工作。同月，向《世界知识》总编辑郑森禹建议，在该刊上发表一篇介绍世界语的文章，并要求在文章中提到陈毅同志生前

曾支持世界语。郑森禹嘱托张企程同志完成这一任务。

7月28日至8月3日，全国世协派出以张企程为团长的世界语代表团，一行6人，出席在瑞士卢塞恩召开的第64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同月，外文出版社世界语组并入中国报道社。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业务和日常工作均由文化部外文局指导和管理。《世界知识》第7期发表了张企程的《谈世界语和世界语工作》一文。

8月27日，在胡愈之的关怀下，全国第2次世界语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13个省、市的49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了今后的工作方针和任务，会议还听取了中国世界语代表团参加第64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情况报告。全国世协理事长胡愈之、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出席大会并发表讲话。会后，在胡愈之的领导下整理了会议纪要并上报中宣部。会议选举了全国世协新的理事会。

8月28日，在《汉字改革》报第4期上发表《四个现代化与汉字拼音化》一文。

11月19日，给侯志平复信，回答有关中国世界语运动史的八个问题。

11月26日，经胡愈之与中宣部领导协商，确定了全国世界语协会与地方协会的领导关系问题。中宣部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宣传部门发出“关于各地世界语组织领导关系的通知”，其中指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是旨在推广、宣传和运用世界语于国际宣传与对外友好的群众团体，由我部委托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代管，经研究，各省、自治区、市及所属各地世界语组织，可由当地党委宣传部领导，或由党委宣传部委托当地有关部门代管。“全国第2次世界语工作座谈会纪要”作为上述通知的附件一并下

达。

12月15日，全国世协举办柴门霍夫诞辰120周年和毛泽东主席给延安世界语展览会题词40周年纪念会，胡愈之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他说：“柴门霍夫博士所创造的世界语，在中国9亿多人口中推广，是有很大的前途的。中国要广泛地、逐步地推动世界语运动，为世界和平，为使世界语成为全世界通用的国际语而作出贡献。”同月，根据胡愈之同志的指示精神，中国报道杂志社编委会讨论和制定了“1980年至1981年工作规划”，进一步调整了编辑方针，在规划中还提出要把《中国报道》办成一本畅销的国际性的世界语刊物。同月，在《中国报道》第12期上发表《世界语工作很有希望》一文。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成立，被推选为协会的名誉理事长，并发表录音讲话。

1980年

1月27日，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会选举新的常务理事会，胡愈之、巴金、叶籁士、陈原、张企程、叶君健等14人当选为常务理事。

2月28日，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新的常务理事会举行第1次会议，确定分工，胡愈之继续担任理事长，巴金、叶籁士、陈原任副理事长，张企程任秘书长。

2月，《中国报道》杂志第2期上发表《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广播开播15周年》一文。

5月22日，出席《中国报道》创刊30周年庆祝会。会前参观了“世界语书刊广播展览”。在庆祝会上发表祝贺《中国报道》创刊30周年讲话。当

年即将召开的第 65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将讨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加入国际世界语协会的问题，为提高我代表团的规格和扩大影响，胡愈之提议由巴金任代表团团长，叶君健任顾问。陈原受胡愈之之托，写信给巴金，征求其意见。

6 月 2 日，巴金给陈原复信，表示愿意接受胡愈老的提议，率团出席当年的国际世界语大会，他在信中说：“去瑞典参加国际大会，只是报答愈之的好意，我 60 年前在成都就同他通过信，谈 Esperanto，受到他的鼓励。”中国报道社赶在大会之前出版了巴金的《春天里的秋天》的世界语文版。

7 月 2 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5 届全国委员会第 2 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7 月 26 日，薛诚之率世界语代表团出席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 2 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会后，胡愈之听取了代表团的汇报。

8 月 2 日至 8 日，巴金率团出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 65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大会一致通过决议，接纳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为团体会员，张企程、叶君健作为执委会委员参加国际世协执委会，圆满完成了胡愈之的嘱托。

8 月 12 日至 17 日，中国世界语代表团在北京进行总结，其间，胡愈之设宴招待巴金，罗俊、叶籁士、陈原、张玉麟、李奈西作陪。胡愈之高度评价代表团在大会期间的活动，对代表团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

8 月 22 日，给侯志平复信，回答有关中国世界语运动的五个问题。

1981 年

1月3日，就“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问题致函叶籁士、陈原、张企程、李奈西、邱及、叶君健同志，信中强调指出：“关于世界语工作，只能搞合法运动，不能搞非法或半合法运动。世运与外事活动有关，是有关全世界各国的问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在国内教学、宣传、出版必须在外事部门（至少外文局或对外友协的党组）领导之下，由集体负责，才不至发生误会，或被人利用。”

2月3日，中宣部同意出版全国世协会刊《世界》杂志。同年，出版三期试刊。

3月10日下午，全国世协工作人员给胡愈老送去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关于澄清他并非该校名誉校长一事的“声明”时，他再次对函校工作做了指示。他说：世界语协会如果要办函校，要报批，要得到组织批准。人数不能像现在那样大批招生。陈毅同志指示我们的“要细水长流”，这句话指导我们现在的世界语工作、运动仍然适用。中国的情况不同于国外。在外国学了世界语能用，旅游就用得上。现在我们中国运用世界语主要是对外宣传和外事活动。用世界语为国际友好交往、加强人民之间的友谊做一些工作是有意义的。但目前世界语不可能有很大的发展，我们不能去做一些不切实际的事情。在接见中，胡愈老对全国世协近期的工作给予了肯定，他说：做世界语工作是有意义的，但做什么事情都要有组织性，要“合法化”，要踏踏实实地去做好这些工作。

7月25日至8月1日，经胡愈老同意，全国世协派出以陈原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在巴西的首都巴西利亚召开的第66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会上选举巴金为国际世协荣誉监护委员会委员。

11月23日，经国家出版局批准成立中国世界语出版社，专门负责世界语书籍的出版。

11月28日，外文局报请中宣部核准“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1982年工作计划”，该计划事前曾经请示胡愈之，得到胡愈之的支持。

12月6日，与楚图南、巴金、夏衍、谢冰心、赵朴初、叶圣陶、朱九思、叶籁士共同发起的“世界语之友会”成立，政治界、文化界、教育界、科技界、新闻界的150多位知名人士参加了该会，受到国际世界语界的广泛赞誉。

同年，中国报道社出版胡愈之等译的《枯叶杂记》（爱罗先珂著）。

1982年

1月，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会刊《世界》（La Mondo）正式创刊。

12月，约请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主要负责人前往北京北纬饭店，看望来京开会的巴金同志，商讨推动中国世界语运动发展事宜，决定在中国主办一次国际世界语大会，以实现陈毅副总理的遗愿。会后即草拟报告，请示中央。

1983年

6月18日，在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7月31日至8月6日，由全国世协秘书长张企程率领的中国世界语代表团，出席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的第68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会议通过决

议，同意 1986 年在中国北京举行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在闭幕式上国际世协决定将流动奖杯“费恩杯”授予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以表彰该会在发展世界语运动方面的成绩。

1984 年

3 月，为湖南人民出版社重版《莫斯科印象记》撰写《重印本后记》。

4 月 19 日，以文化部、外交部、财政部名义，联合上报国务院“关于 1986 年在北京举行国际世界语大会的安排”。

4 月 26 日，国务院批复：同意于 1986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2 日在北京举行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胡愈之一再嘱咐全国世协一定要不遗余力地把这次大会开好。

7 月 21 日至 28 日，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派陈原率团参加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 69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会议选举胡愈之为国际世协荣誉监护委员会委员。

8 月 29 日，在北京胡愈之主持召开第 3 次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在会上致词。大会就如何开创我国世界语工作新局面进行了讨论，并就开好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作了动员和布置。

8 月 30 日，致函张企程，就改选世界语领导机构提出意见。

8 月，《莫斯科印象记》由湖南人民出版社重印出版，作为《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之一。

12 月 19 日，致词祝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广播开播 20 周年。

1985 年

年初，应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要求，口述《我的回忆》，由胡序文记录整理。

1 月 5 日，文化部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转发“第 3 次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纪要”，并要求各地世界语协会按照“纪要”的精神开展工作。

1 月 12 日，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国家委员会成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担任大会最高监护人，副委员长黄华担任主席，副委员长胡愈之、楚图南担任副主席。胡愈之对委员会的工作给予了许多重要指示。

1 月 24 日，为庆祝《中国报道》创刊 35 周年题词。同月，在《文史资料选辑》第 1 期上发表《南洋杂忆》。

5 月 21 日，89 岁高龄的胡愈之出席在民族文化宫举行的《中国报道》创刊 35 周年庆祝会，接见了远道而来的国际世协代表和其他国家的世界语者贵宾。

8 月，第 1 届中国世界语大会在昆明举行，胡愈之担任大会名誉主席。

9 月，《世界》杂志第 9—10 期合刊发表戈宝权撰写的文章“一个世界语者写的访问莫斯科的游记——重读胡愈之著的《莫斯科印象记》”。

9 月 27 日，由民盟中央常委会会议决定，为民盟中央代理主席。

11 月，接受中国报道社记者邵斌的采访。

12 月 27 日，接见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和中国报道社的负责人和部分工作人员，听取关于在北京召开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筹备工作情况的汇报。

1986 年

1 月上旬，因患肺气肿住院治疗。

1 月 16 日，在北京病逝，终年 90 岁。国际世界语协会主席马尔滕斯、秘书长芙洛拉·萨波·费尔来唁电，对胡愈之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高度评价他对中国和国际世界语运动的贡献。

1 月 21 日，《人民日报》发表李一氓的文章《悼胡愈老》。

1 月 24 日，《人民日报》发表《胡愈之的生平》。同日，发表楚图南的《与人照肝胆，见义轻风浪》、胡乔木的《无私无畏，鞠躬尽瘁——深切悼念胡愈之同志》。同日，《中国日报》刊登《向胡愈之遗体告别》、《文摘报》刊登《胡愈之与开明书店》。

1 月 26 日，《光明日报》刊登张楚琨的《胡愈之在南洋的七年》一文。

1 月 31 日，《光明日报》发表陶大镛的《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敬悼胡愈老》。

2 月 6 日，《文汇报》发表高天的《千功无一我，高山复景行——沉痛悼念胡愈老》一文。同月，《世界》杂志第 2 期发表《痛悼胡愈老》、《新文化史料》第 2 期发表于友的《胡愈之与进步文化事业》。

3 月 16 日，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 35 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大会首先对胡愈之的逝世表示哀悼，与会者一致称赞胡愈之对中国世界语运动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同月，《中国报道》第 3 期发表邵斌的《胡愈之与世界语》一文。

4 月，商务印书馆重版胡愈之的《国际语的理想与现实》。同月，《中国报道》第 4 期开辟“沉痛悼念胡愈之同志”专栏，发表了世界语之友会、中

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中国报道社、中国世界语出版社、《世界》杂志编辑部的悼词《沉痛悼念胡愈之同志》；《北京各界向胡愈之同志遗体告别》；《来自国外的唁电和唁函》。

5月，《世界》杂志第5期发表下列文章：《沉痛悼念胡愈之同志——国内外唁电胡愈老逝世》；《心香一瓣悼愈老，回忆往事寄哀思》（张企程）；《痛悼引路明灯的熄灭》（张闳凡）；“Ĝermos, Floros Viaj Semoj —— Funebre al K-do Hujucz”（李士俊）；《最后一次在胡愈老身边》（祝明义）。

6月，《世界》杂志第6期发表陈世德的《忆胡愈老二三事》、祝学礼的《访胡愈老的夫人沈兹九同志》、祝明义的《胡愈老，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刘铃的《怀念胡愈老》、李应瞻的《一颗永闪光芒的绿星》等文章。

7月27日至8月2日，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在北京召开，在大会开幕式上，国际世协主席提议全体为胡愈之默哀一分钟。53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世界语者出席了大会，大会取得了圆满成功，陈毅、胡愈之的遗愿得以实现。大会设有“胡愈之厅”，以纪念胡愈之。同月，《群言》第7期发表陈原的文章《胡愈老与世界语》。

附录三：

胡愈之逝世后有关纪念文章及活动记事

(1986—1997)

1986 年

1 月 21 日，《人民日报》发表李一氓的文章《悼胡愈老》。

1 月 24 日，《人民日报》发表《胡愈之的生平》。同日，发表楚图南的《与人照肝胆，见义轻风浪》、胡乔木的《无私无畏，鞠躬尽瘁——沉切悼念胡愈之同志》。同日，《中国日报》刊登《向胡愈之遗体告别》，《文摘报》刊登《胡愈之与开明书店》。

1 月 26 日，《光明日报》刊登张楚琨的《胡愈之在南洋的七年》一文。

1 月 31 日，《光明日报》发表陶大镛的《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敬悼胡愈老》。

2 月 6 日，《文汇报》发表高天的《千功无一我，高山复景行——沉痛悼念胡愈老》一文。同月，《世界》杂志第 2 期发表《痛悼胡愈老》、《新文化史料》第 2 期发表于友的《胡愈之与进步文化事业》。

3 月 16 日，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 35 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民族文化馆举行，大会首先对胡愈之的逝世表示哀悼，与会者一致称赞胡愈之对中国世界语运动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同月《中国报道》第 3 期发表邵斌的《胡愈之与世界语》一文。

4月，商务印书馆重版胡愈之的《国际语的理想与现实》。同月，《中国报道》第4期开辟“胡愈之与世界语”专栏，发表了世界语之友会、中华全国世界语世界语协会、中国报道社、中国世界语出版社、世界杂志编辑部的悼词《沉痛悼念胡愈之同志》；《北京各界向胡愈之同志遗体告别》；《来自国外的唁电和唁函》。

5月，《世界》杂志第5期发表了下列文章：《沉痛悼念胡愈之同志----国内外唁电胡愈之逝世》《心香一瓣悼胡愈老，回忆往事寄哀思》（张企程）、《痛悼引路明灯的熄灭》（张闳凡）、《Ĝermos, Floros Viaj Semoj----Funebre al K-do Hujucz》（李士俊）、《最后一次在胡愈老身边》（祝明义）。

6月，《世界》杂志第6期发表陈世德的《忆胡愈老二三事》、祝学礼的《访胡愈老的夫人沈兹九同志》、祝明义的《胡愈老，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刘铃的《怀念胡愈老》、李应瞻的《一颗永闪光芒的绿星》等文章。

1987年

1月16日，《老世界语者》第7期转载陈原的《胡愈老与世界语》一文。同月，《世界》杂志第1期发表经陈原整理并加注的《胡愈老关于世界语工作的三次讲话》。同期还发表了《世界》编辑部整理的《胡愈之世界语工作事略（一）》。

2月，《世界》杂志第2期发表祝学礼的文章《胡愈之和翻译工作》、《世界》编辑部整理的《胡愈之世界语工作事略（二）》。

1989 年

2 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费孝通、夏衍等著的《胡愈之印象记》。

1990 年

5 月至 9 月，《世界》杂志第 5 至 9 期连载《胡愈之谈世界语学习法》。

7 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胡愈之《我的回忆》一书。

11 月，《世界》杂志第 11 期发表《胡愈老谈‘世界语主义’》。

1991 年

5 月，《世界》杂志第 5 期“人物志”专栏刊登侯志平的文章《胡愈之》。

8 月，长春出版社出版李文编的《胡愈之论世界语》一书，书中收集了胡愈之的 14 篇有关世界语的论文和讲话。

12 月，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朱顺佐、金普森著的《胡愈之传》，书中第 9 章的篇名是《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先驱》。

1992 年

10 月，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出版陈原著的《记胡愈之》，其中有多篇文章回忆了胡愈之对世界语工作的贡献。

1993 年

新华出版社出版于友著的《胡愈之传》。

1994 年

7 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陈原著的《书和人和我》一书，书中收入了《张元济与胡愈之》、《胡愈之和世界语》、《〈记胡愈之〉序》等三篇文章。

1996 年

8 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胡愈之文集》（1—6 卷），书中收集了胡愈之的 27 篇有关世界语的论文和文章。

9 月 3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都各界隆重举行胡愈之同志诞辰 100 周年纪念会。

9 月 9 日，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举行纪念胡愈之同志诞生 100 周年座谈会，陈原、张企程、陈昊苏等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们一致赞扬胡愈之对我国进步文化和出版事业以及世界语运动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同月，在《中国报道》第 9 期上发表陈原撰写的《我怀念胡愈之：时代的巨人》。《世界》杂志第 9 期也发表了一组纪念文章，它们是：《沿着胡愈之走过的道路前进》、《一代师表》（费孝通）、《我怀念胡愈之：时代的巨人》（陈原）、《无尽的思念——回忆我的外公胡愈之》（胡孟崙）、《胡愈之论世界语》。同月，新闻出版报发表于友在纪念胡愈之诞辰 100 周年会上的书面发言《运筹帷幄的卓越智慧，德高望重的领导才能》。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北京市邮政管理局联合制作纪念封一枚，纪念胡愈之诞辰 100 周年，冰心为纪念封题词。

9月15日，胡愈老的家乡浙江省上虞市为胡愈老诞生100周年举办隆重纪念活动，除召开纪念会外，还为胡愈老在该市的龙山公园建立了一个半身铜像，胡愈老的几千册藏书在上虞市藏书馆公开展出。

10月13日，新加坡《联合早报星期刊》以“老报人胡愈之诞辰百周年纪念”为题发表了区如柏撰写的《一生醉心办报，为民喉舌》和《自学英语日语之余，更通过函授学习世界语》两篇文章。

10月2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星期刊》又以《胡愈之在南洋》为题发表了区如柏撰写的《办报、流亡、抗战坎坷路》和《逃往印尼，避过特务追踪》两篇文章。

11月，外文局的《对外大传播》第11期发表于友的《胡愈之——中国人民对外报道的开拓者》一文。

1997年

2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陈原散文》一书，书中收入了纪念胡愈之的有关文章《悲剧性的‘冲突’》、《闹剧》、《张元济与胡愈之》、《爱罗先珂·胡愈之·鲁迅》。

本文参考文件和书籍：

- 1、《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大事记》
- 2、《中国报道杂志社大事记》
- 3、《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大事记》
- 4、侯志平：《世界语运动在中国》
- 5、《中国报道》杂志（1950—1996）

- 6、《世界》杂志（1981—1997）
- 7、费孝通、夏衍等：《胡愈之印象记》
- 8、朱顺佐、金普森：《胡愈之传》
- 9、陈原：《记胡愈之》
- 10、陈原：《书和人和我》
- 11、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胡愈之文集》
- 12、陈原：《陈原散文》
- 13、李文：《胡愈之论世界语》
- 14、上海世界语协会：《人民世界》（1951）
- 15、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人民世界》（1952）
- 16、上海世界语学会：《绿光》（1922—1931）

附录四：怀念篇

无私无畏 鞠躬尽瘁

胡乔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代主席，终身为人民民主、民族解放、社会改革事业而英勇奋斗的杰出革命家，我国进步文化出版事业的主要先驱者之一胡愈之同志不幸因病逝世，这是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一个重大损失。我们为失去了一位献身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而感到十分悲痛。

愈之同志青年时代因家境贫寒，18岁就辍学步入社会，刻苦自学。他长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工作，很早就接受了新文化思想的熏陶和工人运动的洗礼，并且自觉地把自已的行动和社会斗争实践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他是我国早期重要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他第1次参加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是1925年在上海爆发的“五卅”反帝运动。在运动中他和“商务”的职工共同编辑出版了《公理日报》，成为指导运动的重要舆论。同时，他还专门组织出版《东方杂志》“五卅”事件临时增刊，并撰写了“五卅事件纪实”一文，详细报道了运动的起因和进程。这充分说明，在这场激

胡乔木（1912—1992），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30年代曾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书记、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书记。曾任新华通讯社社长，新闻总署署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有《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等著作。30年代初学习世界语，后积极支持左翼世界语运动。50年代初，他又支持世界语对外宣传刊物《人民中国报道》创刊。80年代中期专门撰文纪念世界语诞生一百年。

烈的革命斗争中，他是完完全全地站在工人群众一边的。

愈之同志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是在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的时候。1927 年 3 月 21 日，北伐军进入上海市郊，党领导下的上海工人第 3 次武装起义开始。这一天中午，“商务”放工的钟声一直拉个不停。这是起义的信号。他见到工人们迅速拿起武器，开始向指定地点冲击，起义取得了胜利。但是只隔了 22 天，反革命政变就把革命工人淹没在血泊之中。4 月 13 日下午，他见到反动派在宝山路对工人群众进行惨不忍睹的大屠杀的情景，心中激起无比愤怒。当天晚上，他起草了一封对国民党的抗议信。信中说：“上海市民方自庆幸得从奉鲁土匪军队下解放，不图昨天闸北，竟演空前之屠杀惨剧。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开枪轰击，伤毙至百余人。”他邀集郑振铎等人签名，将这封抗议信寄给了国民党中央，并在《商报》上发表。

愈之同志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法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接着是“宁汉合流”，全国一片白色恐怖。由于他写过信抗议蒋介石的暴行，必然遭到反动派的忌恨。1928 年初，他流亡到法国，入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1929 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法国也是一片萧条。资本主义的现实景象，使他对资本主义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到图书馆非常认真地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的思想由此发生了根本的转折，开始由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他多次说：“这可算是我在法国的最大收获。”从法国回国途中，他以世界语学者的身份访问了莫斯科，写下了名著《莫斯科印象记》。书中说：“掠夺制度一旦废除以后，有手有脑的人，不必再

为生活而忧虑；人不必依靠剥削别人或向别人求乞而生存。”他从正反的比较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真理：未来的世界属于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愈之同志在革命斗争中结识了不少共产党人，包括我党早期重要党员沈雁冰、杨贤江，受到他们许多教益。1931年从法国回到上海后，他积极靠拢党，努力为党工作，在实践中接受党的考验和了解。1933年9月，他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更加努力工作。当时上海正处在国民党文化围剿的中心，党的组织遭到很大破坏，进步书刊遭到严重摧残。愈之同志按照党的指示，想方设法打开宣传局面，占领宣传阵地。他曾在一个短期间主编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他积极筹办并亲自主编至今还在继续出版的我国最早的通俗国际问题刊物《世界知识》，并曾为开明书店主编过大型的国外报刊文选杂志《月报》。但是这个时期他在出版事业方面做的一件最重要的工作，是支持和帮助邹韬奋同志办好《生活周刊》，创办生活书店。在韬奋接受了愈之同志的主张之后，《生活周刊》开始宣传反蒋抗日的言论，面貌为之一新，发行量也大大增加，成为直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强有力的舆论阵地。这当然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和不满，因而《生活周刊》随时都有被封闭的可能。于是，愈之同志又协助韬奋创办生活书店，巩固和扩大进步文化的阵地，出版了一系列重要书籍和其他刊物。他还协助韬奋起草了生活书店章程，并在1933年进一步协助韬奋把生活书店改组成一个生产合作社，规定了成套的经营管理原则，使生活书店的组织形式更适合于进步文化出版事业的需要。生活书店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出版了大量的革命和进步书刊，为在我国传播马

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愈之同志从没担任生活书店的任何职务，只是默默地勤奋工作。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品格的高尚。

愈之同志对抗日救亡运动所作的最大贡献，就是支持和帮助沈钧儒先生等建立救国会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后，日本侵略者已越过长城，侵入华北，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当时，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愈之同志深深认识到，必须把大家组织起来，形成力量，才能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因此，他就同沈老、韬奋等人，从1935年下半年开始，经常邀请一些文化界人士在一起聚会，共同讨论国内外形势和抗日救亡的道路，积极酝酿首先在上海文化界发起成立救国会组织。“一二·九”运动促使上海妇女界、文化界、教育界、职业界的救国会相继成立。到了1936年“一·二八”四周年的时候，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也成立了。在这期间愈之同志虽曾因环境险恶，一度离开上海到香港，但是所有熟悉上海救亡运动历史的人，都知道愈之同志在这一运动中起了怎样重要的作用。愈之同志在救国会中也没担任什么职务，仍是默默地勤奋地工作，这就是愈之同志的一贯作风。

愈之同志是自觉地执行党的政策的模范。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愈之同志受命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五处处长，主管宣传动员工作。他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文化界人士共同抗日，做了大量工作。武汉沦陷后，他又受周恩来同志指示，到桂林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使桂林成为大后方抗日文化的一块绿洲。1941年，国民党发动第2次反共高潮，他按党的指示撤离桂林到香港，接着经周恩来同志指示，到新加坡开辟海外抗

日宣传阵地，团结广大海外侨胞共同抗敌，并协助陈嘉庚先生办《南洋商报》。抗战胜利后，他在新加坡积极开展活动，向东南亚华侨宣传和平民主、争取祖国独立和解放的思想，为发展党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作了大量的工作。他在海外工作和战斗达八年之久，坚定地自觉地执行党的指示，为我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卓越贡献。

愈之同志总是以开拓式的思路和毅力去完成党交给的每一项工作。他知识丰富，思想开阔。新中国成立后，他创办了我国第一张反映知识分子要求的报纸《光明日报》。并在担任出版总署署长期间，创建了一整套社会主义新型的出版机构，出版发行了大量的革命进步书刊和知识性读物。他在发展人民外交，推进世界语工作和我国文字改革工作的发展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他长期主持中国民主同盟的实际工作，在工作中忠实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善于和党外同志合作，倾听知识分子的意见和要求，敢于代表知识分子的利益说话，为民盟的进步和发展，开创工作新局面，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他长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以后又担任副委员长，勇于提出利国利民的建议，为我国的法制建设和政权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

愈之同志是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的好榜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精神振奋，衷心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他在逝世前不久还撰文说：在新的 1986 年要做好两件事，一是坚持改革，开拓前进；二是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尽管他年事已高，仍然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关心国家大事。他特别注意扶持年轻同志承担第一线的工作，言传身教，希望他们接好革命事业的班。整党开

始后，他多次表示要对自己一生作一个总结，哪些事是做对了的，哪些事是做错了的，对党好有个交待。在他逝世前不久，他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要求，口述了六万字的历史资料，其中除了叙述个人的历史经历外，更多的是总结自己的不足。他说：“这就算是我在整党中交给党的一份个人总结。”这是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

愈之同志的一生，是忠心耿耿为党的事业奋斗不息的一生，是革命、战斗的一生。他无愧于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称号。他是我国知识分子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优秀榜样。

中华民族的脊梁——胡愈之

夏 衍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论及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中国历史上也经历过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这就是 70 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革命，和接着而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这个伟大的时代需要巨人——这个时代也的确产生了一批思想、学识、才艺上卓绝的巨人，——在知识界，胡愈之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应运而生的巨人。

1927 年四·一二事件之后，我从日本回到上海，经杨贤江同志的介绍，我认识了愈之同志，初次见面，谈得不多，不久他就逃亡到法国去了，这一年我刚入党，年少气盛，一次和贤江同志闲谈，认为愈之是《东方杂志》主编，在危难时刻他不该离开这个岗位，贤江同志沉思了一下，然后从书架上找出一份同年 4 月 14 日的《商报》，低声说：“你看看这篇‘抗议信’，这是四·一二那一天晚上愈之起草的”。这是一篇掷地有金石声的檄文：“上海市民方自庆幸得从奉鲁土匪军队下解放，不图昨日闸北，竟演空前之屠

夏衍（1900—1995），作家。长期从事革命文化工作，对中国戏剧、电影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曾任《救亡日报》总编辑，重庆《新华日报》代总编辑，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影协主席，中日友协会长，全国政协常委。有《包身工》、《上海屋檐下》、《心防》、《法西斯细菌》等著作，他热心支持世界语的宣传和推广，是中国世界语之友会发起人之一。

杀惨剧。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开枪轰击，伤毙至百余人，三·一八惨案之段祺瑞无此横暴，五卅惨案之英国刽子手无此凶残，而我神圣之革命军人，乃竟忍心出之。目睹此率兽食人之惨剧，万难苟安缄默”。这封抗议信是写给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的，签名者七人：郑振铎、胡愈之、章锡琛、冯次行、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当时，宝山路上的血迹未干，正是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刻，公开发表这样一封抗议信来揭露蒋介石屠杀革命者的罪行，的确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的，也由于刽子手陈群查明了这封抗议信是愈之起草的而要加以暗害，他才听从了郑振铎的劝告，离开了上海。这件事距今已经 60 多年了，当时愈之还没有入党。记得抗战初期周恩来同志曾和我说过：“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四·一二事件之后有两件事我一直不会忘记，一是胡愈之、郑振铎他们写的‘抗议信’，二是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

愈之同志在法国三年，在巴黎大学法学院学习国际法，研究国际问题，参加了法国的工人进步运动。我还听说过，巴金在上海《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也是经过愈之介绍的。1930 年他经过德国、波兰到了苏联，1931 年 2 月回到上海，正碰上柔石、胡也频等五烈士遇难之后不久，一方面白色恐怖严重，另一方面又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全盛时期，愈之巧妙地运用他的社会关系，在国民党办的《社会与教育》杂志上发表了《莫斯科印象记》。这本书哄动了知识界，一年之内重印了五版，鲁迅先生写过：“这一年内，也遇到了两部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记》，一就是《苏联见闻录》。”

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大约是10月下旬，我在内山书店遇到夏丏尊先生，他约我到开明书店去吃饭，这是相隔四年之后再次和愈之见面，同席的都是开明书店同人，有叶圣陶、章锡琛、吴觉农、徐调孚、宋云彬等，当时愈之已经是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了。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把东三省拱手送给了日本，而西欧和美国还处在经济大萧条之中，席间谈到国事，难免会流露出一些悲观情绪，而愈之却非常敏锐地指出罗斯福的“新政”已初见成效，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必然会日益加剧，所以当前最重要的问题，首先是团结人民，反对国民党的反共反苏政策。他不断地抽烟，低声细语地说，日本侵略东北，最终的目的在于进攻苏联，所以我们应该和苏联复交，争取苏联的援助。早在半个世纪之前他就预见到东西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他的远见卓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淞沪战争之后，我和愈之有了更多见面的机会，有时在吴觉农家里，有时在开明书店。我参加了电影工作之后，有一次我和他谈起明星电影公司的老板张石川和周剑云约我和钱杏邨、郑伯奇写剧本的事，他很有兴趣地问我：他们知不知道你们的政治背景。我坦然地说：正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左联的人，所以才要我们帮他们出主意，写剧本的。他忽然高兴起来，对我说，你们做得对，这就说明不当权的资本家也可以在爱国抗日的前提下合作的，当然他们的进步是有限度的。平时喜怒不形于色的愈之为什么对这件事感到兴趣和高兴呢，因为这件事正好证明了他早已预见到的一种即将到来的新的形势，这就是：当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国难当头的时刻，不仅小资产阶级，连民族资产阶级也可以争取到反日反蒋这方面来的事实。九·一八、一·二八之后，人民群众普遍地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停止

内战、联合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而王明左倾主义者，却看不到这一形势，还在提“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和“武装保卫苏联”这一类不切实际的口号——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左联”发动了一场反对第三种人的论争。因此愈之在《东方杂志》和《生活周刊》上发表的主张争取广大群众，联合抗日的文章，也被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刊上对他进行点名批评——1931年10月的《红旗月报》第23期《满洲事变中各反动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党政府》一文中，居然把愈之看作是第三党改组派的人物。值得钦佩的是愈之并没有被错误的批评吓倒，他还是不断地发表文章，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中，民族资本家开始对国民党不满，国民党内部也有“不愿做奴隶的人”，蔡廷锴、蒋光鼐的19路军在上海奋起抗战，就证明了这一论点，而这一场淞沪战争又得到了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的支持，这一切也就说明了当政的国民党也不是铁板一块。我还记得他不止一次发表文章，认为美国经济复苏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决不会甘心让日本独吞中国，所以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矛盾也将逐渐显露。在30年代初期王明路线占上风时期，在进步文化界能有这种实事求是的远见卓识，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营救被国民党逮捕和迫害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协助邹韬奋办《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通过张志让先生认识了国民党中的“亲苏派”孙科，接着担任了法国在远东唯一的通讯社“哈瓦斯社”的中文编辑主任，结识了当时在上海的许多国际知名人士，如路易·艾黎、史沫特莱、伊罗生等，这样，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发挥他不知疲倦的精力和如椽的笔力，写出了大量有独到见解的文章，也

正是由于他的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和旺盛的工作能力，1933 年秋，中国共产党吸收他为特别党员。

从 1933 年到 1935 年 2 月，党在上海地下组织连续遭到三次大破坏，损失重大，过去常说，王明左倾路线使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地下党损失了百分之百，事实上，单说上海，尽管中央上海局和江苏省委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党组织并没有全被消灭，工会（马纯古等）、青年团（陈国栋等）、文委（周扬等）也还在人自为战，继续工作，特别是和地下党有关系的外围组织，却正利用了民族矛盾上升的机会，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反蒋运动。在这严峻时刻，我们这些身历其境的人永远也不能忘记愈之同志所作出的难以估计的巨大的贡献。愈之晚年写的《我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话：“留在上海坚持斗争的一些党员，已都处于人自为战的状态，工作十分困难。这一年里，我除继续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外，还努力多方联络有志反蒋抗日的人士，力图在文化界首先能酝酿组织起一个抗日救亡的团体，以使在万马齐喑的形势下，救亡运动能有新的兴起。同时，我也以极大的热情来发展生活书店的业务，以扩大这一块宣传抗日救国的文化阵地。继 1933 年创刊的《文学》杂志后，在 1934 年 9 月，又创办了《世界知识》、《太白》、《译文》等刊物，1935 年还创刊了《妇女生活》。这些刊物大都是我联系筹划下办起来的。”这是近代革命史、文化史上的一项影响深远的贡献。这个时期在上海新建了三家进步书店，即“读书生活”、“新知”和生活书店，前两家是地下党人徐雪寒、黄洛峰办的，生活书店则是邹韬奋在愈之同志的支持和筹划下办起来的，这几家书店出了许多深受读者欢迎的刊物，出版了许多进步书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马克思主义

的经典著作，都是这个时期由这几家书店冒着风险出版的。在这一段时期内，他不止一次和我谈过，现在形势变了，要联合抗日，单凭热情和勇气是不够的，出书和办杂志，首先要考虑到读者的需要和他们的接受水平，“一定要心平气和地说理，切不可居高临下地训人”，当他筹备出版《世界知识》的时候，他单独约我谈话，他说：“希特勒的纳粹党在德国登台之后，国际形势瞬息万变，现在急需要有一本专门介绍和评论国际知识的杂志，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当前的形势。他要我在创刊号上写文章，我就用韦 的笔名，写了一篇论美国电影的文章。叶圣陶先生说过愈之同志的四个长处，一是他的自学精神，二是他的组织能力，三是他的博爱精神，四是他的友爱情谊。这是对愈之立身行事的最真切的评价，圣陶先生说：“愈之兄创建过许多团体，计划过许多杂志和书刊，他能鼓动朋友们跟他一起干，他善于发现朋友们的长处，并且使朋友们发挥各自的长处，等到团体和杂志书刊初具规模，他往往让朋友们继续干下去，自己又开始新的建设。他有这样非凡的组织能力，所以建树事业之多，能比得上他的似乎少见”。不仅生活书店和它刊行的许多杂志是他“联系筹划下办起来的”，更应该说，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的救国会，抗战初期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青年记者协会，国际新闻社以及文化供应社，《南侨日报》等等，也无一例外地都是他精心策划，组织起来的。当然，我们更不能忘记，1937年冬，京沪沦陷之后，他奋不顾身地留在上海，组织人力物力，迅速翻译出版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接着又奔走呼号，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支持，出版了卷帙浩繁的《鲁迅全集》。这种大无畏的勇气和非凡的组织能力，以及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精神，在近代知识分子中，真可以说是无可伦

比的。

1934年，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愈之同志就是这样一位巨人，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1988年严冬

与人照肝胆，见义轻风浪

楚图南

胡愈之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党和国家失去了一位忠贞的共产主义战士，失去了一位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民盟失去了一位卓越的领导者。我国的文化出版界失去了一位谦虚厚重的先驱开拓者和前辈。我个人失去一位多年肝胆相照的挚友和兄长。

1月4日下午，我听说愈之同志因感冒发烧住院，赶到医院去看望他。他见到我很兴奋，似乎有很多话要说，我怕他过于疲劳，相约等他病后再谈。不料我离开医院后不久，就传来他昏迷病危的消息，终因抢救无效，以90高龄与世长辞。这样我和愈之同志的相约竟成永诀！

我对胡愈之同志的逝世是十分悲痛的，对他一生的高风亮节是十分景仰的。十年动乱之后，赵朴初同志在题赠愈之同志的诗中的两句：“与人照肝胆，见义轻风浪”，是对他革命精神和品质的最好写照。愈之同志是我国现代史上许许多多杰出的人物当中的一个。早在与他相识之前，他在发展我国进步的文化出版事业上所作的许多开创性工作，他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在这当中所表现出的勇于献身的

楚图南（1899—1994），翻译家、社会活动家。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曾任暨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云南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和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民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作有散文集《刁斗集》、《荷戈集》，译作有（美）惠特曼诗集《草叶集选》、（德）威尔布《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俄）涅克拉索夫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和自由》等。在五四运动时期学习世界语，晚年积极支持世界语运动，曾发表一系列讲话和文章，激励世界语的宣传和推广，80年代初他亲自发起成立中国世界语之友会，直至逝世前担任该会会长。

精神，都使我十分钦佩。后来，我们终于经常在一起工作，一起分担辛劳忧患，一起促膝谈心。在相当长的一段相处和共同工作的时期中，愈之同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愈之同志是我国进步文化事业的先驱者之一。他正是从这条战线上，走上革命道路的。最初，他从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练习生开始走上社会，正如他自己所说，在那里，他什么事情都干。编书之外，还学习世界语，并成为我国世界语运动的先驱。在商务印书馆，他还搞翻译，跑印刷厂，搞校对，他把这些都当作是对自己很好的锻炼。在这个岗位上，他接触了许多新知识，不时了解到世界各地的新情况。从此，他从编辑《东方杂志》开始，以他卓越的才能、不断开拓的精神，为我国的新文化运动，为进步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付出大量心血。

他在所主编的《世界知识》创刊词中首先提出“中国是世界的中国”的口号。他和邹韬奋共同主持的《生活周刊》，他推动杜重远创办的《新生周刊》，以及以后在南洋由他主办的《风下》周刊等，都在当时的条件下，传播进步和民主的声音，影响深远，传为我国现代文化出版史上的佳话。当时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生活周刊》原来是韬奋主办的一个指导职业教育的刊物，办得生动活泼，广为读者所欢迎。以后由愈之同志与韬奋共同主持，使周刊紧密联系社会的现实斗争，被看作是一个议论国家民族大事而又主持正义的舆论阵地，影响更大大增加了。大家公认《生活周刊》办出了新的特色，这个特色，与愈之同志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从我与愈之同志接触当中，我深深体会到，他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善于以自己深思熟虑的思想去影响周围的同志。在实际工作中，他严于律己，宽以待

人，总是设身处地为同志们着想。这些都是愈之同志突出的优点。因此和他一道工作，即使任务繁重，也能胜任愉快，而且富有成果。

愈之同志是 1933 年入党的。在那以前，他已经为党做了大量工作。此后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敌后，常常要独当一面地面对复杂的斗争局面，愈之同志都能从容不迫、不屈不挠地坚守岗位，特别可贵的是，他具有完成任务所需要的高度的责任心和自觉性。在所有那些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愈之同志都能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争取党的领导和支持，广泛联系各界人士和各方面的朋友，带动和组织大家一起去争取斗争的胜利。1935 年，党中央还在长征途中，白区党组织又遭到严重破坏，愈之同志在上海积极发起组织救国会开展抗日救国活动。1936 年，他和全国各界救国会一些领导人一起，通过组织鲁迅先生的葬礼，发动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正是这一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于同年 11 月 22 日深夜悍然逮捕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七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救国会“七君子”事件。愈之同志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发动“救国入狱”运动，并陪宋庆龄等亲赴苏州自请入狱。正是通过这些活动，起到了揭露国民党当局真面目的作用，有力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就是这样，愈之同志长期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勇于负责，积极主动，并以他卓越的斗争艺术，在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中，为我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全国解放前夕，我和愈之同志在河北老解放区平山县相遇。我们一起在周恩来、李维汉等同志的关怀和指导下，进行学习，可以说是朝夕相处。此后又长期在一起工作。从此开始，我对愈之同志以大局为重，工作不畏

繁巨、勇于任事的优秀品质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

据我所知，早在愈之同志刚刚从香港到达解放区时，就向周恩来同志表达了希望继续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愿望。恩来同志和他谈了一个通宵，说明了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工作的重要性。愈之同志听从了周恩来同志的意见。30多年的实践证明，愈之同志没有辜负周恩来同志的嘱托，更有效地不断在爱国统一战线的岗位上立了新功。愈之同志一贯是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的，他在许多场合，都反复强调，民盟的工作就是知识分子工作，我们的工作对象是知识分子，我们的依靠力量也是知识分子。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愈之同志多次说，我们民盟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党派，团结着一大批各方面的知识分子，这批人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要努力做好工作，充分发挥同志们在四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他这样讲，而且身体力行。尽管他已年过八旬，却不停地思考。他想得很多、很深。近年来，愈之同志在协助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中积极提出建议，在各种场合对阻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现象提出批评。为推动民盟的工作，为开创新局面，为教育改革，以及积极开展面向社会的智力服务等方面，他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愈之同志好学深思，视野广阔，具有开拓精神，这些优点民盟的同志们一定会当作愈之同志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加以珍惜。

我们要学习愈之同志的民主作风，学习他勇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愈之同志长期从事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形成了善于团结同志的民主作风。他广泛联系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和他们交朋友。他知识渊博，却平易近人，经常和同志们促膝谈心，他深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盟内外许多同志，

其中有不少大知识分子把他当作自己的贴心人。毫无疑问，这对于他了解知识分子和做好知识分子工作，是很有益处的。即使在日常工作中，如搞一个文件，他也是这样，先提出意见，发动有关同志一起来讨论，集思广益，即使一般干部的意见，也能得到尊重。

在十年动乱时期，愈之同志和很多老同志一样，也处在逆境之中。但是他并不因此忘记同志和战友。长期在民盟工作的闵刚侯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折磨，因病早逝，愈之同志多次去看望重病中的闵刚侯同志，并在刚侯同志逝世后，关心照顾其家属和子女。

对当时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一些老同志，愈之同志总是带去革命的情谊。他不顾当时的“舆论”，去看望过无人过问的沈雁冰同志，并利用一切机会反映沈雁冰同志的正当要求，使沈雁冰同志的问题受到重视。

再如冯雪峰同志逝世以后，“四人帮”的大小喽罗不准开追悼会，最初的治丧方案中，甚至不许称呼冯雪峰同志，又是愈之同志仗义执言，奔走呼吁，总算为当时举行的告别仪式争得了准用“冯雪峰同志”的名义。

更令人难忘的是，备受迫害的杨之华同志病危，被从隔离的监狱中转移到阜外医院。愈之同志闻讯后，不顾一切赶到医院，向这位含冤蒙辱的老同志致以最诚恳的慰问。

我自己在“文革”期间，由于对外文委已被军管，我被迫靠边站、并隔离审查，最后下放到干校。但是在困境中，我始终得到愈之同志的关怀和帮助。即使在我失去行动自由时，愈之同志也总是要设法找到我的老伴，关切地询问情况，和给予我种种忠告。当我的处境稍有好转后，愈之同志和我又经常互相走访，交换各种看法和意见。特别在“文革”的混乱时期，愈之

同志忧心忡忡约同杨东纯同志和周士钊同志上书毛主席要求见面。毛主席派人接见了三位同志。整整两个半天，他们都很诚挚地、也是很沉痛地，对当时全国带有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作了痛切的进言。愈之同志说的是发扬民主、广开言路，杨东纯同志说的是青年问题，周士钊同志说的是教育问题。据说这些问题都被详细记录下来，并上报了，但却无结果，并且得到相反的反应。但愈之同志并不灰心。仍然关心国事、关心同志们的遭遇。一直到了“四人帮”覆灭，我们才额手相庆。每当想到在十年动乱期间这些往事，我的心情总是难以平静的。赵朴初同志说愈之同志“与人照肝胆”，“见义轻风浪”，在我更是有着极为深刻的切身体会。

粉碎“四人帮”以后，愈之同志痛感一言堂的教训深刻，更加不遗余力地提倡发扬民主。几年来，他多次与我和其他同志谈起，想搞一个“群言堂”，组织各方面同志发表议论，同时办一个出版社，出书、出刊物，总之，是用民主的办法，反映知识分子的声音。他还利用许多场合为此呼吁。在他亲自关怀下，经过许多同志努力，终于促成了《群言》杂志的公开出版发行。

建国以来，特别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来，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受到“左”的影响很深。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召开的民盟第4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愈之同志代表民盟中央做工作报告，主动地承担了责任。愈之同志在谈到1957年反右扩大化的问题时，离开稿子公开向在反右扩大化中遭到不公正对待的同志们表示道歉。他这种勇于负责、勇于自我批评的诚恳态度使许多同志深受感动。实际上这是出自他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心，尤为值得学习和发扬。

我们要学习愈之同志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好作风、好品质。愈之同志作为一位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为革命事业所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他身居高位却没有一点官气，他从来没有一点居功自傲的表现，他所表现出的，完完全全是一个老知识分子的本色、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本色。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我以为这也正是愈之同志所以能成为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的一个重要方面。

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为共产主义和人类和平进步事业而奋斗一生的战士，我们敬爱的胡愈之同志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四个长处

叶圣陶

作文悼念愈之兄，在我是第二回了。40年前作过一回，那是抗日战争结束前不久，忽然传来消息，说他在南洋某地病故了。朋友们都异常怅惘，不肯相信，可是据说消息十有八九是可靠的。在这样的心情支配下，雁冰、彬然、云彬、伯韩、子婴和我，都作了悼念文字，由我编成特辑，发表在《中学生》杂志上，因为愈之兄也是《中学生》的老朋友。悼念文字虽然写了，而且发表了，大家还希望消息是误传。我的那篇文字就是这样说的：如果我们有幸得与他重新相见，这特辑便是“一死一生，乃见交情”的凭证。

这一回是千真万确的了。同在一个医院里，我住在一楼，听说愈之兄进院了，住在四楼。我向医务人员打听，回答说他感到有点儿不舒服，所以进院来检查，没查出什么问题，过几天就可以出院的。没想到几天之后，他的病情突然恶化。我听说了就让儿子上楼去探望，医生已经在进行抢救。我想亲自上楼去看看，让医务人员给劝阻了。听着抢救的措施逐步升级，我知道要再见一面是没有希望了。都这么大年纪了，总会有这样一天的，听到他去了，我并不十分悲伤，只觉得又异常怅惘。我想起40年前《中学生》上的那个特辑，六篇悼念文字的作者，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了。又想起

叶圣陶（1894—1988），教育家、作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长期从事教育、文艺、出版工作。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中央文史馆馆长，民进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有《叶圣陶文集》等著作。

那六篇文章，我的一篇写在最后，却放在头里作为特辑的序言，为的说明发表这样一个特辑是让读者学习愈之兄的长处，所以题目就用的《胡愈之先生的长处》。

那篇文章我着重说了愈之兄在四个方面的长处。一是他的自学精神。他中学没毕业就考上了商务印书馆当练习生，从此一边工作一边自学。几种外国文字，还有世界语，他能运用自如。他是熟练的新闻工作者，编辑工作者，出版工作者。他兴趣广泛，博而且通，对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语言文字，都有独到的见解。《中学生》当时标榜自学，愈之兄就是一个最可凭信的自学成才的实例。二是他的组织能力。愈之兄创建过许多团体，计划过许多杂志和书刊，他能鼓动朋友们跟他一起干。他善于发现朋友们的长处，并且能使朋友们发挥各自的长处。等到团体和杂志书刊初具规模，他往往让朋友们继续干下去，自己又开始新的建设。他有这样非凡的组织能力，所以建树事业之多，能比得上他的似乎少见。三是他的博爱精神。我说的博爱指是爱人民大众。既然有所爱，就不能不有所憎，尤其在那个时代和那个社会里。愈之兄坚持正义，坚持进步，反对法西斯和帝国主义，在紧要关头，他冒生命危险也在所不惜。可是事过之后，他就不再提起，不愿让别人知道。他不为名不为利，所以坚持做去，只是出于对人民大众的爱，觉得有责任非做不可而已。四是他的友爱情谊。愈之兄关心朋友甚于关心自己。他经常为朋友出主意，帮助朋友解决困难，却没见他为自己出过什么主意，也没听他诉说过自己的困难。所以他的朋友都愿意接受他的意见，乐于跟他共事。

那个纪念特辑发表在 1945 年 7 月出版的《中学生》上。过了不久，日

本投降了，又过了不久，南洋有信来了。朋友们都喜出望外，愈之兄历尽艰辛，居然健在，而且打算尽快回国，迎接新中国诞生。1949年，我绕道香港来到才解放不久的北平，愈之兄已经候在前门车站接我了。旧友重逢，都有说不尽的高兴，何况时代已经变了，美妙的前景已经展现在大家面前。从那时起，我有幸又跟愈之兄相聚了30几个年头，还经过许多次合作共事，有时甚至朝夕相处。这样的日子，今后不可能再有了。现在悼念愈之兄，我仍旧要说他这四个方面的长处，因为都是做人的根本，都是咱们应该向愈之兄学习的。

埋头实干的工作精神

胡 绳

胡愈之同志为人民的革命事业，特别为人民的革命文化事业奋斗了一生。他为中国近代文化运动默默无闻地做了许多别人做不到的事，起了别人所代替不了的作用。

愈之同志生于 1896 年。他在 1914 年脱离学校生活进入社会。他自己说过：“我只读完中学二年级，是以学徒或练习生的身份进入商务印书馆的。”年轻的愈之同志利用商务印书馆的环境努力刻苦自学博览群书，还自学英语、日语、世界语，同时也在认识社会，探索人生的道路。在他当学徒或练习生之后十年，他已在负责主编《东方杂志》。这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种最重要的杂志，也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杂志之一。杂志名义上的主编是钱智修，但他因年老不大管事。《东方杂志》在 1925 年为“五卅运动”出版了一本临时增刊，详细报道“五卅事件”的经过，唤起群众的爱国运动。这个老牌杂志采取这样积极的态度，对五卅运动的兴起是有一定作用的。

在 1925—1927 年的大革命中，愈之同志虽曾参加上海工人群众的斗争，但还没有明确决定自己的政治方向。他经历了 1927 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目睹反动派对上海工人群众的屠杀，这使他在思想上受到极大震动，

胡绳，历史学家、哲学家。曾任国家出版总署党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30 年代的世界语者，80 年代以后曾担任过中国世界语之友会副会长。有《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著作。

他立即起草了对国民党的抗议书，邀集郑振铎等人署名公布。因此，他受到反动派黑手的威胁，他和郑振铎都不得不相继流亡出国。

1931年回国后，愈之同志写了《莫斯科印象记》。这本篇幅不大的书，是最早客观地生动地介绍苏联状况的作品之一。在当时进步的青年中广为流传。由于这本书是先在一个与国民党有关系的文人办的杂志上发表，然后又在发行这本杂志的书店中出版，因此这本书居然未被禁止，而且多次再版，起了很大的影响。愈之同志在1932年被王云五正式聘为《东方杂志》的主编。1933年1月出的《东方杂志》刊载了一个叫做《新年的梦想》的专栏，其中有些文章辛辣地讽刺国民党反动统治，轰动一时。由于这个专栏，王云五辞退了愈之同志。后来，愈之同志回顾说，当时其实是可以不搞这个《梦》的专栏，以保持《东方杂志》这个阵地。不过，《梦》的专栏中其实包罗了各方面的作者，革命作家只占极少数。由此也可见，当时编辑杂志是多么不容易。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愈之同志曾参加一次党组织为筹备成立“苏联之友会”而召集的会。愈之同志在会上发言，认为应该促进中苏邦交，联合苏联以利于抗日。而当时党内的“左”倾冒险主义者成立“苏联之友会”所设想的宗旨，却是号召全国劳动者“武装保卫苏联”（这个“苏联之友会”后来并未建立）。愈之同志在“九·一八”、“一·二八”后，在公开出版的杂志上写文章，提出“民族抗日”的口号，主张动员和团结全民族一切爱国力量，孤立和瓦解国民党政权，实现全民族的抗战。这个主张在当时形势下应该说是正确的，但并不符合党内“左”倾冒险主义者的调子，因此党的地下刊物甚至把愈之同志看作“拥护国民党的反动派别”的人物，点名进行抨击（见1931年10月《红

旗月报》第23期“满洲事变中各反动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党政府”一文）。

愈之同志之所以没有能更早一点被吸收为党员，和上述情况是有关的。

愈之同志当时在文化活动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团结和鼓励许多爱国的、正直的文化界人士，他们虽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是同情共产党的革命斗争，或者是可以成为同情者的。争取和团结这些人士，不对他们的工作提出过高的要求，但逐步帮助他们进步，这在当时实在是很重要的事。在“左”倾路线统治下，党在30年代前期按照“中间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的这种错误想法，很不重视这方面的工作。而愈之同志在入党以前和入党以后在这方面实际上突破“左”的樊篱，出色地做了许多工作。到了30年代后期，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后，他致力于推进救亡运动和在救亡运动中团结文化界的力量，更是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1935年党的《八一宣言》发表以前，愈之同志在上海通过他的朋友杜重远，同东北军中的一些知名人士接触，说服他们同意和共产党合作抗日。这时在上海的党组织已被严重破坏，和愈之同志联系的党员已离开上海，因此他到香港找到这个同志，并受命秘密到法国和苏联，向在第三国际中的中共代表团报告这些情形。虽然东北军和党的合作已通过别的途径在进行，但愈之同志在上海时所做的工作也是有影响的。

在文化界中，章锡琛、夏丏尊等主持的开明书店，最初是在愈之同志的积极支持下创办的。邹韬奋的《生活周刊》的发展，更是同愈之同志的影响分不开。30年代后期，在上海出版的许多有影响的杂志，如《文学》、《太白》、《世界知识》、《译文》、《妇女生活》，大都是在愈之同志的联系和筹划下创办的。

愈之和韬奋的友谊是感人的。1931年愈之初认识韬奋时，韬奋所编的《生活周刊》的内容虽然主张抗日救国，但仍限于政治改良主义，而且“还带些低级趣味”，但愈之发现，如他后来在纪念韬奋的文章所说，韬奋具有真诚的爱国热情，在文雅的仪表下有一副硬骨头，而且从善如流，虚心学习。因此他积极地帮助韬奋改进《生活周刊》，韬奋也把愈之看作最可靠的朋友。韬奋终于进步到共产主义者的水平，有他自己认识的基础，但愈之对他的帮助是有很大作用的。在愈之的支持下，韬奋还在1933年建立了在以后十几年间的进步文化运动中起重大作用的生活书店。愈之同志是党内最早重视韬奋所办的刊物和生活书店的第一个人。

从愈之同志在30年代的工作中还可以看到他的一个特点。他孜孜不倦地为人民革命的事业，为党的事业而工作，当然不是为谋什么私利，而且不居功，不图名。生活书店是在他支持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但他并不在书店里担任任何职务。当1933年7月韬奋被迫出国流亡后，愈之同志是《生活周刊》的实际主编人。当生活周刊终于被国民党查封时，由杜重远出面主编出版《新生周刊》，愈之同志又全力参加编辑工作。《世界知识》这个杂志创刊后，有一段时期是愈之同志主编，但他从未署名。他是对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起了巨大作用的救国会的最初组织者。他是当时的进步的文化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最积极的组织者之一。他做的许多工作是人们所不知道的。后来他也从不和人谈起自己做过的这些工作。

我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认识愈之同志的，并且逐渐从别人口里知道他在30年代上海文化工作和救亡运动中的作用。我把他看作可尊敬的长辈。建国后，他担任出版总署署长，我曾有一个短时期在他领导下和他共事。我

感到，他一贯保持着 30 年代的工作精神。

愈之同志在抗日战争期间先是在武汉、桂林工作，继又按照党的要求，出国到新加坡从事报业工作，太平洋战争后，他在南洋经历了九死一生。他在全中国解放后为新中国的出版事业的发展、为统一战线的发展积极工作，也有卓越的成就。这些我不想在这里说了。我以为，从愈之同志对 30 年代文化工作的不大为人们了解的贡献中，最足以显示他一生奋斗的精神，因此我愿意在这里据我所知说一下，以表示我对这位革命前辈的敬仰和追怀。

——转自《胡愈之印象记》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9 年 2 月出版

从《莫斯科印象记》谈起

戈宝权

今天纪念胡愈之同志，我首先就从整编他写的《莫斯科印象记》一书谈起吧。

1983 年底 1984 年初，应湖南人民出版社《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之请，我着手整编胡愈之同志在 1931 年写的《莫斯科印象记》，并为这本书撰写《重读胡愈之著的〈莫斯科印象记〉》的前言。当时曾向胡愈老询问了一些有关他的生平事迹以及他在 1931 年作为一个世界语者访问莫斯科的情况。

1928 年 1 月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下，胡愈之流亡国外。他在巴黎大学国际学院学习，同时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前后共三年。这时正好是法国货币法郎贬值，生活费用不贵，他经常为《东方杂志》写稿，靠了稿费自筹学费和生活费用。后来由于法郎升值，难于生活，他就在 1930 年底离开法国，经德国、波兰和苏联回国，在路过莫斯科时，他得到苏联世界语者的协助，在莫斯科停留了一个星期进行参观访问，回国后写成《莫斯科印象记》一书。这本书在 1931 年 8 月初版，到了 1932 年 10 月已印行到第五版，深受读者的欢迎。这本书当时在国民党反动派查禁各

戈宝权，苏联文学专家、翻译家。曾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协理事。30 年代世界语者。80 年代后任北京市世界语协会会长。有《苏联文学讲话》、《普希金诗选》、《谢甫琴科诗选》、《高尔基论文学》等著作和译著。

种进步书刊的条件之下能得以出版，确是件侥幸的事。

记得当时我刚从上海大夏大学毕业，进入在望平街（现山东路）的《时事新报》工作，曾到报馆斜对面的新生命书店买了这本书，无论是这本书的封面和封里面的设计，还是书里面附的多幅精美的插图，更不用说正文的生动而有趣的叙述，都非常吸引人。我差不多一口气就把它读完。在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是个被禁止使用的名词，因此在书中不得不用“普罗”二字来代替。当1935年初我作为天津《大公报》的记者和上海《新生周刊》、《世界知识》、《申报周刊》的特约通讯员前往莫斯科时，就带着这本《莫斯科印象记》。我按照这本书，一一寻访旧地，因为当时莫斯科刚开始进行改建，面貌变化还不大。从那时起，多少年来我都珍藏着这本书，因为它最初使我认识了苏联这个“普罗之国”。

1936年我在莫斯科时，胡愈之曾从法文翻译了一本苏联儿童读物作家伊林写的《书的故事》（原名《白纸黑字》），他请当时在莫斯科访问的艾寒松转请我弄清几处疑问，我当即写信向住在列宁格勒的伊林询问，1937年初到列宁格勒时还去访问过他。后来胡愈之翻译的这本书，用“陈仲逸”的笔名由生活书店出版。但我和胡愈之同志初次相见，却是1938年在武汉的事。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后，我经由西欧的德、法等国回到国内在周恩来同志领导的《新华日报》工作，这时胡愈之在郭沫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第三厅第五处主管抗日宣传动员工作。我们初次见面，真是一见如故。

现再回过头来谈谈《莫斯科印象记》吧。当198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准备编辑《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时，他们已把我的叔父戈公振写的《从

东北到庶联》编进去。编者征询我的意见，还应该收一些什么书，我当即推荐胡愈之写的这本《莫斯科印象记》，而且写信去征求胡愈老的同意。

胡愈老在8月4日就复了我一封短柬：

关于《莫斯科印象记》重印事，……这本书是52年前写的，现在没有什么用处。湖南人民出版社如果要重印，我并不反对，由你写序言亦可。

胡愈老说这本书“现在没有什么用处”，事实上它能帮助我们了解50多年以前苏联人民艰苦从事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情景，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正因为这样，我重新整编了这本书，并怀着忆旧的心情写成重印前言，介绍了胡愈之在1931年1月27日到2月3日在莫斯科度过的难忘的七天。

经我整编的《莫斯科印象记》，终于在1984年8月出版了，胡愈老曾在《后记》中写道：

现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决定把这本书收入《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重新出版；并且请戈宝权同志为重印本书写了序言，加以校注，改正了原书的一些错误，还增加了宝权同志搜存的当年的照片。这样这本书变成了我们两人合著的新书，我要对他表示十分的感谢。

最后再谈一谈胡愈之同志和我的叔父戈公振的友谊。

我的叔父戈公振和胡愈之是同时代的人，而且他们在经历和工作上又有不少相似的地方。我的叔父于1913年到了上海，进了由抱有进步思想的狄楚青创办的有正书局，在图画部当学徒；第二年他就进了《时报》馆，从校对、助理编辑最后一直升到总编辑；胡愈之也于同年考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练习生，后来分配到《东方杂志》担任编辑工作。20年代后期，我的

叔父于 1927 至 1928 年出国，前往欧、美、日各国考察新闻事业；胡愈之在 1928 年流亡国外，在巴黎大学攻读，他们在巴黎时见过面。我的叔父在 1929 年回国后就进了《申报》，并经常为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写稿；胡愈之在 1931 年回国后，除主编《东方杂志》，还又协助韬奋共同主持《生活周刊》，并创办生活书店，他当时常用“伏生”的笔名，为《生活》撰写国际时事述评。1932 年“一·二八”战争爆发后，他们常在韬奋家，与杜重远、毕云程等人共同商谈创办《生活日报》，后因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阻挠未能出版。1936 年秋，我的叔父出国前往日内瓦，参加国际联盟讨论有关日本侵略中国问题的特别大会，第二年初中苏恢复邦交后，他就在 3 日随中国首任驻苏大使颜惠庆前往莫斯科访问。胡愈之曾在 4 月 21 日写信给他，约他写稿。

这时生活书店正计划出版《时事问题丛刊》，韬奋和胡愈之又联名写信给我的叔父约稿。

从当年在《申报》上刊登的《时事问题丛刊》的广告中，在“续出各册预告”中已有戈公振著《苏联观感录》，可惜的是我的叔父当时未能写成这本小册子，但却为国内报刊（其中包括《生活周刊》）写了不少有关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有关工农业建设成就的通信文字。1935 年 10 月 15 日他从苏联回到上海后，不幸因病逝世，后由韬奋把他写的各篇通讯编辑成为《从东北到苏联》一书，由生活书店出版。

自从那时起，匆匆已经过去了 50 年。1985 年 11 月 27 日是我的叔父诞辰 95 周年，同年 10 月 22 日又是他逝世 50 周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化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新闻学

会联合会、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学研究所等六个单位联合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纪念大会。事先我曾走访了胡愈老，请他作为家叔生前老友主持这次纪念会，并在大会上发言，他当即慨允。

孰知胡愈老在主持了这次纪念会之后不久，即因病于 1986 年 1 月 16 日以 90 岁的高龄离开我们长逝。现特就他生前的二三事写成这篇纪念文章，作为对他的亡灵的追念！

半个世纪的秘密共产党员胡愈之

——纪念胡愈之同志诞生一百周年

秦凯基

在建国前和建国后的相当长时间内，胡愈之同志一直是我国爱国民主党派领导人，在世人的印象中，他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

实际上，胡愈之是一位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直接受党中央领导，在各个革命历史阶段对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

一、走向革命

1914年胡愈之考上了商务印书馆，进入该馆当了编译所的练习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他大量阅读一些进步书籍和刊物，尤其喜爱阅读《新青年》杂志，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的影响。“五四”以后胡愈之努力进行著译，在《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学生杂志》等发表了不少文章，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文学，国际问题，妇女问题，社会和哲学思想等各个方面。同时参加了各种社会活动。

1924年后，胡愈之负责编辑《东方杂志》，通过该刊帮助和培养了一批

秦凯基，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副译审，曾长期从事世界语书刊发行工作，并热心世界语集邮，在集邮爱好者中积极致力于世界语的宣传和推广。现任北京市世界语协会常务理事、中国集邮世界语协会常务理事。

新作家和社会学家。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胡愈之第1次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斗争，同大家一块游行集会和罢工，同时对运动的发展进行了采访和报道，曾在《东方杂志》的增刊中发表了《五卅事件纪实》的长文，详细报道了运动的起因和发展过程，提出由“五卅”事件而引起的全国民众运动，是中华民族要求独立与生存的大抗争的开始。

1927年3月21日，北伐军进到了上海市郊，胡愈之从党领导下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革命斗争中看到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力量。胡愈之被推为编译出版工会的代表出席了上海市民代表大会。

二、入党之前

1927年，胡愈之同志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次日，激于对反动派血腥屠杀革命群众的义愤，起草了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信，邀集郑振铎等共同签名，发表在《商报》上。这封原件收藏在中国共产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里，曾受到周恩来同志的高度评价。他在抗日战争初期曾和夏衍同志说过：“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四·一二事件之后有两件事我一直不会忘记，一是胡愈之、郑振铎他们写的‘抗议信’，二是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

迫于国内的白色恐怖，胡愈之于1928年1月流亡法国，入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并系统地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胡愈之在法国最初结识的都是法国世界语团体的一些成员，他们相当一部分都是有觉悟的工人群众

，其中有的还是法国共产党员。胡愈之经常去参加他们的小组活动，更深入地了解了法国社会的面貌和被压迫阶级的生活状况。这一时期，胡愈之认真学习了《资本论》，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转折，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没有出路，开始由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

1931年初，他在回国途中，以世界语者的身份到莫斯科，进行了七天的访问，写下了名著《莫斯科印象记》。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社会主义苏联的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状况的著作，在广大青年中激起强烈的反响。

邹韬奋非常称赞这本书，当即写了一篇推荐这本书的读后感，并希望和胡愈之见面畅谈。胡愈之于1931年10月和邹韬奋相识，以后成为邹韬奋的挚友和亲密同志。胡愈之用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和教育韬奋，积极帮助和支持韬奋，使他主编的《生活周刊》成为主持正义的舆论阵地和宣传抗日救亡主张的“人民喉舌”；胡愈之也积极支持和帮助韬奋筹划和创办生活书店，并起草书店章程，撰写进步的出版方针，出书计划，从而出版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书刊。在国民党实行文化围剿的白色恐怖下，生活书店成为进步文化的一个堡垒，与反动派作斗争，这都是在胡愈之亲自领导下进行的。

1933年初，胡愈之应鲁迅之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当选为总会临时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努力把国民党当局迫害革命同志和进步人士的情况向国外揭露、报道，争取国外进步人士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声援。

1933年初，胡愈之认识了当时担任左翼社会科学联合会书记的党员张庆孚。经过几次长谈之后，胡愈之表达了入党的愿望。张庆孚要胡愈之为党搜集和提供情报。胡愈之将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的国民党内部的政治动

态，及时地向张庆孚作了报告。

三、特别党员

胡愈之在实际斗争中得到了考验。1933年9月，张庆孚正式告诉胡愈之说：经他介绍，中央组织部已通过吸收胡入党。他还告诉胡：胡属中央特科直接领导，特科是党的秘密机关，胡作为特别党员，不参加党的基层组织生活，只与他发生单线联系。他要胡在公开活动中不要以共产党员的面目出现，也不要参加群众性革命团体，主要任务还是为党作情报工作。

张庆孚于1934年初去中央苏区，他把胡愈之的关系交给了王学文，后来王学文又把胡愈之的关系交给了宣侠父。

1935年，党中央和红军在长征途中，上海党组织由于“左”倾错误的领导，几乎全部遭到破坏。宣侠父由于不能继续留在上海，决定去香港，临走前把胡的关系交给了严希纯，并告诉胡说：万一不能在上海坚持，可以去香港找他。

四、向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汇报

1935年，胡愈之、杜重远等同志对张学良和东北军的争取工作得到了成效，张学良已决心抗日，应该尽快地把这个情况向党中央报告。但严希纯于1935年11月被捕，胡愈之与党组织的关系中断了。这时上海的党已遭受严重破坏，也已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唯一的办法只有到香港，到那里去找宣侠父。

胡愈之于1935年12月10日左右来到了香港，找到了当时担任党的华南工委书记的宣侠父。胡愈之向他谈了对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工作的情况，他也觉得这件事情很重大，应尽快报告给中央。但是这时香港与党中央也失去了联系，只有通过巴黎的《救国时报》能与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联系。所以宣侠父决定让胡愈之经法国去苏联，直接向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汇报情况。

不久得到了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答复，同意胡愈之立即前往；同时转来了苏联邀请鲁迅先生疗养的信息，要胡愈之把鲁迅先生带着一块去。这样，胡愈之于1936年1月又秘密回到上海，约鲁迅先生到一个咖啡馆里，向他转达了苏联的邀请，但被鲁迅先生谢绝了。他认为在国内可以用笔和反动政府作斗争，去苏联就什么也做不成了。他说：“国民党政府虽然对我十分仇视，想着把我枪毙了，但我看来他们也不敢。”胡愈之当即返回香港，随后以华侨商人的身份弄到了护照，先坐船到法国，得到了在巴黎办《救国时报》的吴玉章的接待，办好了去苏联的手续，于2月顺利到达莫斯科。

在莫斯科车站接胡愈之的是潘汉年，他是在遵义会议之后辗转来到苏联的。胡愈之向当时任中共代表团团长的王明，详细汇报了国内的情况，特别是关于张学良思想转变的情况和东北军的动态。

五、潘汉年让胡愈之只管救国会的事

1936年4月间，王明对胡愈之说：你的任务已经完成，张学良和东北军的事情党中央已经知道，你可以不用管了。你回去把潘汉年带回香港（因为潘汉年不懂外语），以后你的工作就由潘汉年直接领导。

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分会召开，成立了全国性的救国组织。会议的宣言、口号都比较“左”，对蒋介石国民党不能起争取团结的作用。根据这个情况，潘汉年特地找了在香港的邹韬奋和陶行知做了说服工作，由胡愈之帮助起草了一个“为抗日救亡告全国同胞书”。这个文件基本上和“八一宣言”的调子相近，是站在中间的立场写的，主张国民党要停止内战，共产党要废除苏维埃和工农红军，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

潘汉年回来，是受共产国际委托到国内和国民党谈判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他对胡愈之说：“以后你只管救国会的事，别的不要管，有什么问题来找我，没有问题你就自己去干吧！”潘汉年主要忙于找国民党的一些重要人物和特务头子谈话和接触，有时找国民党人士谈话时也把胡愈之邀去，并故意对国民党人说，胡愈之是救国会的，对共产党有意见。他有意用这种方法把胡愈之公开出去，使国民党都知道胡愈之是救国会而不是共产党。

六、帮助重建上海党组织

临时中央自上海撤走后，留下来的中央和江苏省委等机关，也陆续遭到破坏，留在上海坚持斗争的一些党员，已都处于人自为战的状态，工作十分困难。

1936年4月底，冯雪峰由陕北来到上海。他从陕北出来时，党中央领导同志告诉他，可先去找鲁迅和胡愈之，以摸清上海党员的情况，把上海党组织恢复起来。胡愈之在香港接到冯雪峰的来电后回到上海，向他详细介绍了上海的情况。胡愈之并根据自己所了解的介绍了一些可靠的党员，如夏衍等。胡愈之还把潘汉年在香港的情况告诉冯雪峰，后来潘和冯见了

面，潘根据冯雪峰提供的交通路线去陕北找党中央，冯雪峰根据胡愈之提供的情况，联系了留在上海分散活动的一些党员，成立了上海党的临时工作委员会，并开始重建了上海党的组织。

胡愈之在《我的回忆》中谈到这些事情时还谈到：“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个问题：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对冯雪峰进行了批判。其中揭发的一条罪状是，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不找党员，而是去找鲁迅和胡愈之这两个党外的人士。当时我和冯雪峰都不好作解释说明，冯雪峰只好忍受着委屈，现在冯雪峰同志已经去世，我有责任把这事情说清楚。我想中央所以叫冯雪峰先来找我，这是因为中央知道我是特别党员，一直在上海活动，没有暴露。而对其他留在上海的党员，因与中央失去联络，是否有变化中央不大清楚，所以要冯雪峰先找我了解情况，然后才决定是否联络这些同志。”

七、主持鲁迅丧事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后，冯雪峰打电话给胡愈之说，鲁迅的丧事由救国会出面组织来办，比较合适，要胡愈之和救国会联系组织。胡愈之把这一沉痛消息告诉沈钧儒和救国会其他领导人，并共同商讨决定：鲁迅先生的葬仪以上海救国会联合会名义主办，并通过鲁迅先生的葬礼，发动一次民众的政治性示威，把抗日救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葬礼进行得十分隆重。瞻仰遗容和吊唁三天之后，六七千人的送葬队伍浩浩荡荡，唱挽歌、呼口号声势很大，反映了群众对鲁迅的爱戴，也表示了人民的觉醒和意向。

八、组织营救“七君子”

鲁迅葬礼所显示的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运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他们再也按捺不住对救国会的仇视，终于在1936年11月23日逮捕了救国会的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七人，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救国会“七君子”事件。

胡愈之在冯雪峰和上海临时党组织的积极领导和配合下，负担起了声援营救的组织工作。他一方面组织律师为“七君子”辩护，另一方面通过舆论工具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揭露和抗议。他采写的《爱国无罪听审记》，有力地抨击了国民党当局迫害抗日救国志士的反动行径。他和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发动了“救国入狱”运动，陪同宋庆龄等知名人士亲赴苏州，自请入狱，以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

九、抗日初期在上海的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愈之以聚餐会的形式，联系和团结了在上海的一大批爱国人士，推动他们在抗日救亡中发挥作用。他倡议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把上海文化界、新闻界进步人士团结起来，向国外宣传我国抗战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共产党、八路军在抗战中发挥的重大作用。

1937年11月12日上海陷落后，胡愈之没有立即撤离，他和留在上海的进步人士深入到群众中去，组织对难民、工人、市民的宣传教育；还出版了《团结》、《上海人报》、《集纳》、《译报》等报刊，以隐晦曲折的方法来报道抗战的消息，宣传和教育群众；后来还以“社会科学研究所”

的名义，来训练抗日救亡团体的骨干。经过培训的学员，有些被输送到上海周围的游击队和新四军，增加了抗日战斗力量。胡愈之还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极短的时间组织翻译出版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

十、首次组织出版发行《鲁迅全集》

许广平在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后记中谈到：这部煌煌巨制“一切擘画策动，则全赖胡愈之先生”。胡愈之在《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中确实竭尽全力，费尽心血。他在《我的回忆》中谈道：“10月19日（1937年）是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还在7月中旬，我们就成立了以宋庆龄、蔡元培为首的纪念委员会，准备出版《鲁迅全集》。……想出办法后就到处奔走联系，组织了百数十位学者、文人和工友，共同来为《鲁迅全集》的编排印校出力。为了争取扩大发行，用‘复社’的名义出版不行了，就改用‘鲁迅纪念委员会’的名义，实际上只是用会长蔡元培和副会长宋庆龄的名义。我征得刘少文（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秘书长）同志的同意，于1938年4月下旬离上海到了香港，把出版《鲁迅全集》的计划向蔡、宋两位报告，得到了他们的赞同和支持，蔡元培当即写了《鲁迅全集》四个字。蔡元培是国民党的元老，声望很高，经他题签的书，国民党也就不能对他怎么样了。接着我就赶印了预约书券和广告，开始推销。不过一百元一部书，只有富人才买得起，而一般有钱的商人是不会对《鲁迅全集》感兴趣的，到底能推销多少，心中也没有底。当时富人都已集中在香港、广州、武汉等地，所以我就先从香港开始推销。推销的办法是开茶话会，把那些进步的资本家，各界开明人士，乃至国民党要人请来参加，清茶一杯，主要向

他们介绍《鲁迅全集》的情况，请他们签名购预约书券。路过广州时我也这样做。到武汉后，情况更好些，有周恩来同志在那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也积极帮助我推销。……我们在很短时间内，就筹集到三四万元出版资金。各地把书款很快寄到上海，上海马上买纸开印。这样，从2月到6月，仅历时4个月，就将一套全集六百余万字，多达20卷的丰厚的文学瑰宝，送到了广大的读者手中，这在我国出版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通过《鲁迅全集》的出版发行工作，广泛团结了各界抗日救亡人士和群众，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使鲁迅精神得以发扬光大。”

十一、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

胡愈之到武汉后，没有再回到上海，周恩来、郭沫若把他留下了。他们要胡愈之到军委会政治部去工作，担任第三厅的第五处处长。军委会政治部是第2次国共合作后，由国共双方人员共同参加工作的一个机构。陈诚当政治部部长，周恩来、黄琪翔当副部长，郭沫若担任主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第三厅的人事安排是由周恩来同志和各方面协商确定的，集中了全国文化界的许多知名人士，五处以救国会的人员组成。胡愈之不能推托，只好接受了这个任务。

胡愈之负责的第五处是三厅下面主管宣传动员工作，也就是搞文字宣传工作的。但国民党千方百计限制，得不断地斗争和争取，才能做一点有利于抗战的事。不过胡愈之在《我的回忆》中谈到：“在三厅我们也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是对外的新闻宣传工作。当时武汉是抗战中心，从天津、上海撤出来的文化人都集中到武汉，其中有些人是原来当过记者、办过报

刊的，也有许多青年学生，他们愿意投身于抗日的新闻事业，他们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三厅，于是党组织成立了青年记者学会，我们又以政治部三厅的名义，派他们到部队去担任战地记者，这些记者到各地去后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寄回来许多战地的真实消息。当时国民党中央有个国际宣传处……没有什么力量，发不出多少消息。这样他们和三厅联系，由我们编写战地新闻，和国际宣传处一起，每周一次向外国记者发布，报道了中国抗战的一些真实情况……很受外国记者的欢迎。”

这一时期胡愈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和教育下工作，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

十二、周恩来派胡愈之到桂林从事统一战线工作

1938年10月24日夜，胡愈之和郭沫若最后撤离武汉，随后武汉就陷于敌手。这时，由武汉撤下来的军委会政治部一片混乱，没有什么工作可做，胡愈之趁机提出辞职。这次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同意，他要胡愈之去桂林，到那里做好李宗仁、白崇禧的统一战线工作，同时把桂林的抗日文化工作搞起来。

胡愈之在桂林以救国会的身份进行公开活动，把以救国会名义办的一个刊物《国民公论》迁到桂林继续出版。胡愈之通过救国会的关系和广西上层人物建立了关系，并通过组织“国际新闻社”、“文化供应社”等多种活动形式，使桂林很快成了大后方的抗日文化中心。

为了发展广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桂林的抗日文化宣传工作，周恩来同志曾三次来桂林部署工作，并与白崇禧商妥，于1938年11月在桂

林设立了以李克农同志为首的八路军办事处，这样大大加强了党对广西地区工作的领导。

十三、撤离桂林，飞抵香港，接受新任务

“皖南事变”前夕，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迫害，胡愈之根据党的指示，撤离桂林。李克农给胡愈之弄到了一张去香港的飞机票，胡愈之二弟仲持正好这时有病，胡愈之就以处理家事暂去香港为借口，离开桂林。胡愈之是根据党的指示第一个撤离桂林的人，“皖南事变”前后桂林党的干部和进步人士才大批撤离。

胡愈之飞抵香港后，即去找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负责人廖承志同志。廖承志同志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要胡愈之去新加坡办报。新加坡《南洋商报》编辑张楚琨 1939 年秋，以《南洋商报》特派员的身份回国采访抗战新闻，同时接受掌握该报经营管理和舆论方针大权的董事经理傅无闷的委托，在国内物色一个有名望的新闻界权威人士，担任《南洋商报》的编辑主任。张楚琨 1940 年在重庆访问周恩来多次，请其推荐编辑责任人选。党组织内定了胡愈之，由“南委”廖承志办理具体事宜。廖承志对胡愈之说：“《南洋商报》张楚琨过港返新加坡来找我了，党推荐了你。张楚琨十分赞同。打电报给《南洋商报》也很同意，事情就这样定了。”廖承志又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了可以加强对南洋侨胞的抗日宣传教育，扩大党在侨胞中的影响，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廖承志最后交待：“这件事你要同张楚琨联系到底。”就这样胡愈之接受了去新加坡开展工作的新任务。

十四、主编《南洋商报》，发起组织星洲华侨 文化界战时工作团

胡愈之于1940年11月离开香港去新加坡。到新加坡后，经过一个月的调查了解，熟悉了新加坡华侨社会的基本情况。1941年1月1日，胡愈之正式接任《南洋商报》的编辑工作。胡愈之在南洋仍是以无党派人士的面目出现。他作为《南洋商报》的主编，在撰写社论和选编稿件中始终按照党的指示，以抗日救国运动为中心，突出强调民族团结，南洋华侨的团结，以及南洋华侨在抗战救国中的作用，配合陈嘉庚先生领导的南侨总会的工作。

“皖南事变”发生时，胡愈之刚接办报纸。国内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事件真相的报道受到种种限制，胡愈之在《南洋商报》上立即如实地报道了这一事件，并连续发表了几篇社论，评论了这一事件。当时轰动了南洋华侨社会，产生巨大反响，激起了广大爱国华侨对国民党反动派分裂倒退行为的愤慨。

胡愈之除了办好报纸外，还积极参加了广泛的社会活动，在南洋侨胞中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1年6月以后，沈兹九、王任叔、张企程、杨骚、蔡馥生等相继来到新加坡，加强了党在文化界的力量。9月，胡愈之和沈兹九结婚，以后他们一直生活在一起，共同为党的事业工作。

1941年12月8日，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上对美、英同时发动突然袭击，太平洋战争爆发。在这一天的半夜里，新加坡遭到了日机的轰炸，同时日军也在马来亚的哥打巴鲁登陆。在日寇的进攻面前，作为南洋华侨抗日救

国中心的新加坡，很快就掀起了抗敌保卫星马的热潮。胡愈之邀集了一些文化界的朋友，商讨如何对广大群众进行精神动员，大家决定成立星洲（新加坡的简称）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由郁达夫任团长，胡愈之任副团长。战时工作团立即办起了两件事：一是成立了一个青年战工干部训练班，准备训练一批青年干部去担任民众武装的政训工作；另一件是组织宣传队，用演讲、戏剧、歌咏等形式到群众中进行抗敌宣传。

十五、隐姓埋名三年八个月

1942年2月4日，新加坡陷落的前十天，胡愈之、郁达夫等最后一批抗敌文化人，坐上了一艘只有几公尺长的摩托舢板，开始了流亡的航程。

在他们到达望加丽后，所有船只都被扣留，大家插翅难飞。从此，他们在当地华侨的掩护和帮助下，在苏门答腊原始丛林中，隐姓埋名，为躲避日本特务和汉奸走狗的搜捕，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迁徙流亡。

关于这一阶段的情况，胡愈之在《我的回忆》中有详细的描述。他在《南洋杂忆》中也谈到：

“其间的艰难困苦，和当地人民及华侨对我们的深情厚谊，以及我们这群流亡者的团结友爱，足可以写成一厚部动人心弦的书。”

“那是怎样暗无天日、与世隔绝的漫长岁月呵！我们与祖国、与党组织完全失去了联系，只是凭着我们的党性在生活和工作。但是我们并不悲观，始终相信日寇必败，我们必胜。我们一面隐蔽自己，一面养精蓄锐，准备随时投入战斗。据说在重庆还为我开过追悼会，而我那时正在日本宪兵的鼻子底下组织‘同仁社’，定时与隐蔽各地的同志们交流信息和学习心得，批

判‘速胜论’呢！那时我们一边做酒、做肥皂，维持生活，一面看一切能弄到手的书。我还乘机学习印尼话，并写了一本《印尼语言研究》。因为怀念祖国，我写了一个中篇童话《少年航空兵》，我把对祖国未来的设想和憧憬都写了进去。”

“由于我们大家同甘苦，共患难，亲如一家，并与当地人民及爱国同胞建立了友好交往，我们终于安全地度过了那些恐怖的日子，保存了力量。到了 1945 年日本投降，除了郁达夫惨遭日本宪兵队杀人灭口以外，我们全体又陆续在胜利后的新加坡重逢了。”

十六、创办报刊，领导南洋地区民盟组织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愈之同志回到新加坡，先后创办了《新南洋出版社》、《风下》周刊、《新妇女》杂志、《南侨日报》、《南侨晚报》等，在海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团结侨胞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贡献力量。《南侨日报》得到了党中央的赞誉，毛主席和周总理曾为该报三周年题了词。胡愈之同志也在建立、领导和发展南洋地区民盟组织方面作出突出贡献，他成为海外反对美蒋反动统治、争取和平民主的重要力量。

十七、党中央称赞胡愈之在南洋的工作

1948 年 4 月，胡愈之同志由新加坡到达香港。他向党中央华南分局书记方方同志详细汇报了南洋地区的情况和自己的工作，方方同志对胡愈之同志在南洋的工作作了肯定，并经过研究，要胡愈之同志先去解放区，向

党中央报告南洋和港澳的工作和情况。1948年8月，胡愈之踏上了去解放区的旅途。

胡愈之于1948年9月到达了党中央所在地平山县西柏坡。胡愈之首先向党中央统战部李维汉同志作了汇报，详细地谈了南洋地区的情况和在华侨中进行的工作，也谈了港澳地区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思想动态以及响应党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号召的情况。李维汉对胡愈之的汇报和在南洋的工作表示满意。接着胡愈之又向社会部李克农同志详细汇报了南洋的情况。

十八、周恩来要胡愈之继续作民主党派工作

胡愈之完成了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的任务后，心里想：“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很大胜利，我了解放区，我自己也解放了，可以干些我所爱好而又熟悉的新闻出版工作了，民主党派的工作麻烦很多，我真不想干了。”但是胡愈之的愿望未能实现。

周恩来同志和胡愈之一见面就问：“你现在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意思是指胡愈之的党员身份有没有公开。胡愈之回答说：“还是秘密的。”胡愈之也向周恩来说了想去干新闻出版工作的愿望。但周恩来同志却说：“你是秘密的，还是做民主党派工作，如果是公开了，就到新华社去。”周恩来同志看出胡愈之思想上有疙瘩，过了几天，专门跑到他的宿舍里，和他谈了一个通宵，要他读毛主席几篇著作，再读一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周恩来同志说：“我们胜利了，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还在后头。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

呢？对这样一个问题，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斗争。全国解放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还是长期的事。统战工作还有很多事要做，我们一定要把这一工作做好。”这样，周恩来同志把胡愈之同志说服了，确定胡愈之还是在统战部领导下做民主党派工作，党员身份仍不公开。本来沈兹九是可以公开党员身份的，但因为胡愈之的缘故，也没有公开。

十九、党员身份正式公开

新中国成立后，胡愈之同志历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出版总署署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等职。但在长久的岁月里，胡愈之同志一直以民主人士的身份活动，直到1979年，在秘密入党之后过了将近半个世纪，才公开了党员身份。胡愈之同志在去世的头一年写的《我所知道的冯雪峰》一文中谈了前后的详细情况：“1933年前后，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上海党中央、江苏省委等受到严重破坏。就在党中央秘密迁往江西瑞金前后，周恩来同志还在上海时，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才知道，潘汉年和冯雪峰都参加了这次转移党中央、保卫首长安全的工作。当时白色恐怖严重，暴露党员身份就有性命之忧。所以我的组织关系放在绝密的中央特科，只有单线联系，就是特科只有一个人知道我，我也只知道一个人。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的1979年，中央统战

部公布了一批秘密党员的名字，我的党员身份才正式公开。”

——原载《绿穗》1997年第4期

本文资料来源：

胡愈之：《我的回忆》、《南洋杂忆》、《我所知道的冯雪峰》、《关于‘抗议书’的说明》

夏衍：《中华民族的脊梁——胡愈之》

陈漱渝：《数通书信，一席交谈》

胡愈之与爱罗先珂

陈 原

胡愈老好几次跟我提起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Vasilij Jakovlevič Erošenko，1890—1952 年）。

50 年代，我每次去苏联，胡愈老都叮嘱说，有机会可以打听一下这位盲诗人——同时又是世界语学者的下落。但每次我都让他失望。1983 年，我，作为中断了 20 多年来往而“复交”的文化使者，在学者艾德林博士的陪同下，访问了苏联作家协会，也没有得到有关这位盲诗人的任何消息。作家协会那古老的建筑不会说话，它和它的主人们热情欢迎我，主人们虽说我是 20 多年第一只“从南方飞来的燕子”，可就是提供不出爱罗先珂的信息，这“从南方飞来的燕子”回来后没有一点新情况可以告诉胡愈老。也许这位盲诗人从来就没有被列入“作家”的行列，也许祇能在盲人的圈子里找到他的信息，但是来去匆匆，我没有机会到这专门的圈子里去找寻故人的足迹了。正如在这个盲诗人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时，荷兰出版的一份世界语杂志所说，爱罗先珂的名字和作品，在他的祖国和在整个欧洲，“受到了不公正的漠视”。

然而在日本和中国，特别是在中国，爱罗先珂却为许多人所熟知和喜爱。鲁迅不但在他的第一部作品集《呐喊》中写过他，而且翻译出版了他的长篇和短篇童话，也许由于这种特殊的原因，爱罗先珂的名字和作品已深深印在当代中国知识界的记忆里。鲁迅是从日文书刊中知道这位盲诗人

的，但把爱罗先珂介绍给鲁迅相识的，则是胡愈之。

那是 20 年代初的事，距今 70 年了。1921 年 10 月，爱罗先珂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辗转到了上海。被驱逐的理由是他参加了当年东京五一节工人大示威，说他参与了社会主义运动和左翼文化活动。确实不假。爱罗先珂 24 岁（1941 年）到日本，是一个不知人间疾苦的纯补的青年，后来同日本左翼戏剧家秋田雨雀过从甚密，秋田是个革命文化人，同时也是个著名的世界语学者。可以说，爱罗先珂受到秋田雨雀和他的朋友们的言行薰陶，才逐渐成为一个富有正义感的社会革命的“同路人”。

爱罗先珂到上海后，第一个去看他的中国人就是胡愈之。胡愈之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正好早一年（1920 年）与巴金等重建了上海世界语学会。胡愈老后来说，他是从日本世界语者来信中知道爱罗先珂被驱逐出境的消息的。爱罗先珂到了中国后才较多用世界语创作，而在这以前，他是用日本文创作的。爱罗先珂到上海这一年 31 岁，接待他的胡愈之才 25 岁。翌年（1922 年），爱罗先珂去北京，由胡愈老介绍给鲁迅——在这之前，胡愈老已多次把爱罗先珂的日文创作寄给鲁迅。这样，爱罗先珂在北京受到鲁迅和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的热情接待，并被聘到北京大学去教世界语和别的学科。这样，我们中国读者就有了鲁迅的名篇《鸭的喜剧》，并且更加知道爱罗先珂为人的品格。鲁迅在那篇《鸭的喜剧》中写道：

“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君带来了他那六弦琴到北京之后不久，便向我诉苦说：

‘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这真是“一个孤独灵魂的呻吟”！然而这位盲诗人在这“连蛙鸣也没有”的城市里，找到了他的“所爱”——最初得到十几个蝌蚪，然后买了几只小鸡，最后买到了小鸭，而小鸭一下子却把蝌蚪吃个精光。鲁迅接着写道：

“待到小鸭褪了黄毛，爱罗先珂君却忽而渴念着他的‘俄罗斯母亲’了，便匆匆的向赤塔去……

现在又从夏末交了初冬，而爱罗先珂君还是绝无消息，不知道在哪里了。”

爱罗先珂是 1922 年 7 月离开中国的，鲁迅写这篇时是 1922 年 10 月。实际上在鲁迅发表《鸭的喜剧》后一个月，11 月，爱罗先珂又回到了北京。原来他虽然日夜思念着“俄罗斯母亲”，可这一回却只是去赫尔辛基（芬兰）参加第 14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罢了。1923 年 7 月，他又一次离开中国，前往纽伦堡参加第 15 届大会，并且在会上朗诵了他的名诗《一个茨冈女人的预言》（Antaŭdiro de Ciganino），得了文学比赛的金奖。

这首小诗，语言是美丽的，格调是悲哀的，不过在抑郁中，却也蕴藏着希望。盲诗人低吟着：

永恒的爱情，永恒的快乐

只不过是逝去了的美梦：

人世间一切都在变幻，

大地上一切都会消逝。

为了情人，为了朋友，

召来了悲苦的时光，

只有对未来的憧憬

永远留存在年青的心中。

吟了诗，开了会，这位心中充满悲愁的盲诗人在西欧几国漫游；他再也没有回到中国来。1924年，他终于回到日夜思念的“俄罗斯母亲”那里去了。他在革命后的俄罗斯开展盲人教育工作。他在西伯利亚冻土带边远乡间，写了一些文章，是用世界语盲文写成的，寄到欧洲他的朋友那里，后来辑成一册，书名为《冻土带的呻吟》，那可真是悲哀的呻吟，社会性的悲剧在诗人的笔下重现，读来揪人心弦。

十月革命十周年（1927）时，秋田雨雀应邀赴莫斯科参加盛典。爱罗先珂跟秋田雨雀这个老朋友重逢了，爱罗先珂做了秋田的“导游”，正如他在日本时秋田为他作“导游”一样。靠了爱罗先珂的协助，秋田雨雀在莫斯科广播电台作了关于日本普罗文学的演讲。秋田回国后，于1929年在东京出版了他的《年轻的苏维埃俄罗斯》（中国译本《新俄游记》于1930年在上海印行）。

秋田雨雀很了解他的老朋友盲诗人爱罗先珂。就在爱罗先珂被逐出日本这一年（1921），秋田雨雀给爱罗先珂的童话剧《桃色的云》写过一封信（已由鲁迅译出放在这部童话剧译本之首）。他写道：

“你之所谓‘桃色的云’，决不是离开了我们的世界的那空想的世界。你所有的‘观念之火’，也在这童话剧里燃烧着。现在，日本的青年作家的许多，如你也曾经读过了都清楚，大抵是在灰色的云中，躺着安逸的梦，也恰公认这剧曲里面的青年。”

“你叫喊说，‘不要失望罢，因为春天是，决不是会灭亡的东西’。是

的，的确，春天是决不灭亡的。”

爱罗先珂带着希望回到他的故土，为开展盲童盲人教育而奔波——这个时期他的生活和他的思路，直到如今我们没有得到甚么确实的材料，只知道他在边远省份中默默地任教；从他留下来的文章看，盲诗人也呼吸过令人窒息的空气；似乎也没有参与苏联 30 年代轰轰烈烈的世界语运动。也许正因为这样，他居然逃脱了 1937 至 1938 年的大清洗，而在这场社会悲剧中，苏联所有活跃的、杰出的世界语学者几乎无一幸免。

他平安地避开了恶梦的袭击，又安然度过了惨酷的卫国战争，直到 1952 年病逝于他的故乡，结束了他带着美梦和恶梦，带着悲哀和希望的 62 个春秋。

《爱罗先珂童话集》于 1922 年 7 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署鲁迅译——实际上其中收载了三篇不是鲁迅译的作品，除了一篇（《虹之国》）是晚节不忠的汪馥泉所译外，其余两篇都是胡愈老译的——即《自叙传》（另名《我底学校生活一断片》）和《为跌下而造的塔》，这是鲁迅作的《序》中记录了的。

这部童话集后来编入 1938 年初版的《鲁迅全集》时，不是鲁迅译的三篇都抽出。现在日本存有“译者”寄给福冈诚一的一本商务初版《爱罗先珂童话集》，封面有世界语写的一行献词，即：

Al kara sinjoro Fukuoka

de la Tradukanto

译成中文就是

寄赠亲爱的福冈先生

译者

“福冈先生”即福冈诚一，也就是鲁迅在《桃色的云》译本序中提到的那位 S. F. 君——鲁迅写道：

“在翻译之前，承 S. F. 君借给我详细校过预备再版的底本。”

可惜现在鲁迅日记 1922 年本残缺，现在我们只能看到许寿裳的不全抄本，其中 8 月 10 日记有：

“下午收商务印书馆编辑所所寄《桃色的云》稿本一卷，又印本 《爱罗先珂童话集》二册，以一册赠季市。”

没有看到寄赠福冈的纪事。据鲁迅 1923 年日记，他与福冈通信；1926 年在厦门他亦曾写信给这位先生；1929 年有“福冈诚一来，谈至夜半”一条（8 月 8 日），此外就没有有关的记载了。至于《童话集》上的世界语献词中的“译者”用的是单数，也许因为此书封面里都只署鲁迅一人的名字——看来这本样书是胡愈老寄去的。1979 年 10 月我得到日本爱知大学中山钦司先生寄来的那部赠书的封面扉页复印本，很想向胡愈老问清楚寄书的经过，但那时我正好接任商务印书馆工作，拨乱反正，百废待举，一搁下就忘记此事，现在也无从问了。

《童话集》初版扉页背面八行世界语诗句，没有中文译文，这也是很特别的。收在《鲁迅全集》初版本也保留原样。这首小诗题目是《人类一份

子》（Homarano），署名为“本书作者”，那就是爱罗先珂本人了。我曾试译如下：

一

我心中烧起了大火，
任何强暴也熄灭不了它。
我胸中燃起了火焰，
就是死亡也扑灭不了它。

二

大火一直烧到我了此一生，
火焰一直燃到大地不复存在；
我的名字是人类一份子，
这是火的名字，是人间自由的名字。

鲁迅一定知道在这译本中印了这么一首世界语小诗，或者说，鲁迅似乎深知或理解爱罗先珂这首小诗的意境，他在这译本序文中曾写过：

“我觉得作者所要叫彻人间的是无所不爱，然而不得所爱的悲哀，而我展开他来的，是童心的，是美的，然而有真实性的梦。”

爱罗先珂的梦，他的童心，以及他的“人类爱”，撞击在现实面前变成了悲哀——关于这一点，鲁迅是透彻地理解的。

看来，爱罗先珂这“童心的，美的，然而有真实性的”梦，也是20年代初年轻的胡愈之，迷上了世界语以及迷上同世界语与生俱来的天真的“人类爱”的胡愈之的梦。我找到同年（1922）胡愈老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一

篇论文《国际语的理想与现实》，中间有这么几句话：

“……有一部分的世界语学者，为柴门霍夫（即世界语的创始人，波兰医生——引用者）的人格所感动，把世界语的事业，认为一种高尚的理想，认为一种爱世界爱人类的普泛的教义。这一派的人，可以说，是从‘世界语学者’更进一层而成为‘人类一份子主义’的信仰者了。”

我有一次同胡愈老闲聊时，提到爱罗先珂的“梦”，他笑了笑，说，“梦”早醒了。

一点也不错，胡愈老自己的“梦”也早醒了。在这本《童话集》出书后三年，即1925年，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五卅惨案”，帝国主义者在上海肆意屠杀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胡愈老回忆说，他这时是第1次投身到火热的群众运动中，第1次跟工人们一起游行，集会，罢工。他与商务印书馆的先进知识分子一起，为了冲破当时的新闻封锁创办了一张报纸——这就是由郑振铎、王伯祥、叶圣陶主编的《公理日报》。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由觉醒了的、愤怒的知识分子自行集资、自己编印的第一张报纸。与此同时，胡愈老组织了《东方杂志》的一期《增刊》，他亲自采访写成的一篇长文《五卅事件纪实》就登在这期《增刊》上。这篇文章详细报道了事件的起因和进程，揭出了真相，激励了士气。此时，作为一个热衷于世界语的青年，他已从一个单纯的“世界语学者”转变为一个“世界语战士”了。童心的梦已醒了。他用世界语写了一篇抗议书，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中国的事实，呼吁世界公众主持正义。他同上海世界语学会的先进人士一起署名，将抗议书寄给各国世界语团体和学者，同时也寄给国际联盟和其他国际组织——世界语已不是“梦”的语言，而是“现实”的语言。世界语已不是一种憧憬着“人

类爱”的“绿色唐·吉珂德”的语言，而是支持劳苦群众为自由解放而斗争的语言了。1983年我在维也纳的国际世界语博物馆的藏书和文件中，努力去找寻这份抗议书，遗憾的是终于没有找到。我把这事告诉过胡愈老——他说，那么小小的一两页纸，哪里能保存几十年呢，何况还经历了第2次世界大战。

上面已经提到过，爱罗先珂的童话剧《桃色的云》于1922年7月由鲁迅译出，那时应当是爱罗先珂到了北京，同鲁迅一起教书的时候。鲁迅在译序中写道：

“至于意义，大约是可以无须乎详说的。因为无论何人，在风雪的呼号中，花卉的议论中，虫鸟的歌舞中，谅必都能够更洪亮的听得自然母的言辞，更锋利的看见土拨鼠和春子的运命。世间本没有别的言说，能比诗人以语言文字画出自己的心和梦，更为明白晓畅了。”

据鲁迅说，在译事进行到终结的时候，作者加了四句白鹄的歌，那就是——

“梦要消了……就在这夜里，
我的魂也消了罢。
朋友的心变了的那一日，
我的魂呀，离开了世界罢。”

这四句同他的《一个茨冈女人的预言》所写的意境是很相似的，那首《预言》诗中的一段是：

“我亲爱的，我的好人，
茨冈女人给你怜悯，
背叛你的是你最信赖的人，
欺骗你的是你的情人！”

《桃色的云》1922年在上海出版，爱罗先珂是“看”到过的罢。

1923年，由于胡愈老的努力，爱罗先珂还有两本书在上海印行。一本是《枯叶杂记》，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文库》第81种；另一本是世界语原文版，书名为《一个孤独灵魂的呻吟》（*La ĝemo de unu soleca animo*），上海世界语学会印行，书前有胡愈老用世界语写的短序。《枯叶杂记》一书除了胡愈老由世界语译出的用来作书名的一篇外，还收载夏丐尊由日文译出的两个短篇（《恩宠的滥费》和《幸福的船》）。至于《一个孤独灵魂的呻吟》，则收了三篇创作，即《我底学校生活一断片》、《世界和平的一日》和《枯叶杂记》，外加四首小诗。

我告诉过胡愈老，我特别喜爱《为跌下而造的塔》和《枯叶杂记》这两个短篇。我几乎能背诵其中的若干段落——自然是胡愈老的译文，我少年时甚至还能随口背出若干段世界语原文。记得在十年浩劫的最后两年，我常常把“迫”我进行似乎有希望而实际上全无希望的工作称为“为跌下而造的塔”——也许还“迫”我从塔上跳下来呢。我把这个意思不止告诉过胡愈老，还告诉过可以信赖的真正朋友。须知那是处在一种恐怖的文化专制主义横行的日子里。有一回我在他老人家面前随口背诵了一段中译文：

“世间有许多人牺牲了他们的青春，牺牲了他们的一生，以从事建

造；他们建造了高塔，为的是使自己从这塔上跌下来。……”

“牺牲了青春，牺牲了一生，去干这种可笑的事情的人，世间很多着哩，而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我曾经建造过一座高塔，后来便从这塔上跌下来，我曾经建造过一所宫殿，后来却又烧毁它，可是，真要谢天谢地的，我从塔上跌下的时候，竟没有跌死，宫殿烧毁的时候，我也没有烧死了。但是，这是怎么一回事，你能猜得透吗？”

听着听着，胡愈老笑笑，说，实际上也许会造成一座塔的，总会有一天造成而不致“迫”你跳下来的。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在那十年浩劫的窒息日子里，这种对未来的执着的信心，感染了我，使我在最令人沮丧的时刻从没有失掉自信。

我常常记起《枯叶杂记》译文中的几句乍看似乎玄之又玄的话：

“那树不作声，他甚么也不想说了。树委实知道那‘幻想之国’的梦已飞到北地里去了，飞到神秘的‘雪之国’里去了，飞到有伟大精神的国土里去了，飞到具有推翻全世界的潜力的国土里去了，但是他只是不说……”

我爱这段话。我爱这两个短篇。我爱它胜于盲诗人其他作品。我不知道喜爱爱罗先珂呢，还是喜爱胡愈之呢，或者是喜爱那美丽的世界语原文还是那美丽的中文译文，总之，我少年时读过的这两篇文字，好像从来没有离开我的记忆。是梦？是现实？是憧憬？是希望？我说不清。有一回，那是在胡愈老，巴老（巴金），叶老（叶籁士）作出决定，要在我国的首都举办一次国际世界语大会之后某一天，我向胡愈老建议，把爱罗先珂这两个短篇的原文，连同胡愈老的中文译文出版一个世界语汉语对照，并且

请一位画家作一些插图，贡献给中国的以及外国的世界语公众。胡愈老听完我的建议，他没有反对，也没有首肯，他只说，过一阵再说，等会议真能开成时再说罢，事情就这样搁下来了。如今我的档案柜中还有这两篇童话的原文抄本和译文抄本……看来这个“梦”还是要完成的，这可以说是两个“童心”的灵魂交织的“梦”，是个希望者的梦，是个爱“母亲”祖国、同时爱人类的“梦”，看来这个高塔还是要建造的，而且保证不至于“为跌下”而造罢……

——原载《记胡愈之》

商务馆 1992 年 10 月出版

胡愈之和世界语

陈 原

胡愈老 1 月间匆匆离开我们走了。遗憾的是他没有能看到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世界语运动将在这里开花结果。他没有能够看见 7 月间将从五大洲云集北京的 1600 多位操着同一种国际辅助语（世界语）的“绿色战士”们，而这 1600 多位到北京参加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代表，也将无法向胡愈老这位不疲倦的世界语宣传家、组织家和实践家表达他们的景仰之情，虽则国际公众已经在 1984 年于温哥华举行的第 69 届国际大会上，用经久不息的掌声来祝贺胡愈老被国际世界语协会授予最高荣誉称号“名誉监事”。世界上只有很少几位对人类进步文化事业有重大贡献，同时又对世界语运动有卓越功绩的知名社会活动家，才能获得这样的荣誉称号。毫无疑问，胡愈老正是理应得到这个称号的一个。

第 1 次世界大战爆发那一年（1914），胡愈老才 18 岁。这一年，他学会世界语；从这一年起，他孜孜不倦地为世界语奔波了 70 年有余；这多灾多难的 70 年，风风雨雨的 70 年。在这漫长而艰难的岁月中，无论是阳光随处，还是雨雪霏霏，胡愈老对这种被目为“乌托邦”主义的人工语言，对这被雅人讥笑过、被好心人看不起的交际工具，从未失过信心。人世间只有那些伟大、纯朴，有着崇高理想的勤奋工作的思想家，才能看到这种人工语言的理想和现实——在欧洲，有莱布纳兹、托尔斯泰、高尔基、罗曼·罗

兰，在亚洲，有蔡元培、鲁迅、毛泽东，胡愈老步着这些先驱的后尘，看到了世界语对于社会革命和文化交流所能起的作用，哪怕暂时还只是微薄的作用。

1、胡愈老是最好的世界语宣传家——理论家。早在 1922 年他便在当时最有影响的《东方杂志》上发表了有名的论文《国际语的理想与现实》。他用简洁的语言表述了至今基本上仍切合时势的观点，他指出“国际语是现代生活所必需的一种工具”，“是节省时间和提高效率的一种新发明的机器”。他那时就宣称：“国际语的最后理想，是在供给各国人民以一种中立补助语。因为国际语是中立的，所以不干涉人民内部的事情，因为是补助的，所以更不侵害国语或民族语。”这篇富有意义的论文，一年后同其他文章一起，由胡愈老编成《国际语问题》的小册子，作为“东方文库”的一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一论文编入胡愈老的论文集《世界语 40 年》，1928 年在上海印行。值得注意的是，距今 64 年前胡愈老在理论上即倾向于把这种人工语言 Esperanto 称为“国际语”，而不沿用从日本移植来的“世界语”（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即改用音译エスペラント）——这是很有意义的。近几年欧美一些信息科学家也提倡把这种人工辅助语称为“国际语”，并采用这两个词的缩写（ILO，念作“伊罗”）。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胡愈老在那篇论文中实质上表达出这种交际工具是没有政治倾向或阶级性的意思，所以它决不能用来代替任何一种民族语，只不过作为国际交往的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而又容易被各族人民掌握的工具。这样的宣传，是实事求是的宣传，也是消除疑虑的宣传，既有战略的意义，也带有策略的意义，因而是对世界语最好的宣传。当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候，胡愈老在 1933 年，为欢迎巴比塞（法国

著名的左翼作家和热心的世界语者）来华而写的一篇短文中，进一步阐明世界语是中立的工具，然而世界语者却要面对现实，不能陷入“乌托邦”里。他写道：

很多的世界语者，忽略了世界语者改造世界的实际任务，以为世界语本身就是目的，却不必过问一切实际的世界。这样便把世界语运动和现实世界隔离了。这世界语的乌托邦主义，应该对大战后世界语运动的消沉负有大部分责任。真正的世界语者却不能抛弃现实世界。除了

文字以外处处要想到怎样用世界语去帮助世界改造，并且亲自参加这改造工作。

现在看得很清楚，正是这种思想，使 30 年代的中国世界语运动提出了正确的口号“为中国的自由而用世界语”，这个口号团结了一切中国世界语者投身到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中去。

2. 胡愈老是最好的世界语组织家。——他善于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抓住最有利的因素，不失时机地进行世界语运动的组织工作。20 年代，胡愈老同巴老（巴金）等同志重建上海世界语学会，将一个几乎只剩下一块招牌的空壳改造成能传播、能教学的群众组织。30 年代，胡愈老同楼适夷、叶籁士、张企程等同志创立中国无产阶级世界语者联盟（“语联”），这时胡愈老亲任书记，将我国世界语运动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不久，胡

愈老又推动成立了一个公开的、广泛的群众组织“上海世界语者协会”。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胡愈老取得了党和政府的支持，1951年成立了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胡愈老一直担任这个协会的理事长，直到辞世。由于50年代初期国际间一种反世界主义的干扰，协会曾一度停顿，只是到1956年胡愈老抓住时机，以无可争辩的事实争取到这个运动重新起步前进。甚至在动乱的十年后期，胡愈老也不顾“四人帮”和极“左”思潮的阻挠，非常巧妙地抓住有利因素于1973年恢复世界语对外活动。

在解放后的中国召开过三次全国性世界语座谈会，都是在胡愈老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第1次会（1963年）胡愈老根据陈老总（陈毅同志）著名的关于世界语的长篇讲话精神，作了几个小时的落实发言。第2次会（1979年）是在粉碎“四人帮”后举行的，胡愈老在会上以喜悦的心情阐明了今后世界语工作的方向和做法。前年（1984）冬举行的第3次会，胡愈老以88岁高龄亲自到会，并且用世界语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他要我在会上作的长篇报告，其实每一个原则性的提法，都是经过胡愈老改定的，其中有些观点就是他平日提示的。

可以断言，如果没有胡愈老这样一个既有原则同时又十分灵活的组织家，世界语运动在我国的发展决达不到现今的水平。

3、胡愈老是最好的世界语实践家。——胡愈老认定世界语是国际社会最省力的交际工具之后，他便身体力行，从世界语翻译很多文学作品，尤其是“被压迫”民族的作家的作品，以此来显示世界语的有效性，同时也为吸收进步文化作出贡献。其中特别是介绍爱罗先珂和他的童话，成为我国文学发展史和中外文学交流史上不可磨灭的篇章。胡愈老翻译的爱罗先珂童

话，以《枯叶杂记》为名编入《东方文库》印行；胡愈老翻译的同一作者另外的童话，与鲁迅从日文翻译的合成一集，以《爱罗先珂童话集》为名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胡愈老译的陀罗雪维支《寓言的寓言》（开明书店出版），不啻是用翻译向黑暗社会所作的投枪。当 1931 年胡愈老借着苏联世界语者的帮助，从欧洲回国途中，访问了莫斯科，其后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莫斯科印象记》，是他作为世界语实践家的最好见证。这部作品以激动人心的事实，向中国青年显示了世界语作为国际交际工具的优越性（比一万篇宣传文章更有力量），同时，向被封锁的中国读者报道了新社会新制度下的新生活图景。谁也说不清有多少人看了这部书去学习世界语，至少认识了世界语；更说不清有多少人被它吸引，走向光明，走向新的世纪。

70 年风风雨雨：胡愈老以一个全心全意参加社会改造的世界语学者的丰姿，永远留在绿色的（也就是世界语的、和平的）战士心中。7 月将齐集北京的世界语战士们，将永远被他对世界语的信心，对世界语工作的毅力和韧性所激励。

1986 年 5 月 14 日——原载《书和人和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 年 4 月出版

心香一瓣悼胡愈老，回忆往事寄哀思

张企程

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先驱胡愈之同志不幸与世长辞了。这对于我国世界语运动真正是一个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胡愈老在十分年轻的时候就学习了世界语。从此以后，在他的一生中，他始终如一地为宣传、推广、运用世界语而孜孜不倦地工作。他为世界语所作的工作之多，可以说是无以伦比的，恐怕需要写一本几万字的书才能大致把他这一方面的工作记述下来。我这里只把他在建国以后在世界语方面的一些重要活动扼要地作一些描述，借以对我们这位世界语界的老前辈，同时也是我个人的良师益友表达我的深切悼念，寄托我的无限哀思。

我们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从成立之时起就由胡愈之同志担任理事长的职务。由于愈老一贯不爱出头露面，从表面上看来，他在世界语方面的活动似乎并不多，而他自己也常常说他只是个“挂名理事长”，表示他没有做多少工作。实际上，这完全不是事实。他是为世界语费了很多心血、出了很多力量的，不过有很多事情不为外界所知道罢了。

建国初期，他就为创办我国世界语对外报道刊物《中国报道》和建立全国世协奔走张罗，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事实，无庸赘述。我在这里回忆的主要是几件过去没有报道过的或者虽曾提到过而

张企程，著名老世界语者。曾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秘书长、副会长和中国报道杂志社总编辑。由于对世界语运动作出过重要贡献，被国际世界语大会选为国际世界语协会终身荣誉会员。

语焉不详的事情。

大家知道，我们的世界语刊物《中国报道》曾于 1954 年至 1956 年这几年中休刊过一个时期，这完全是由于外部的原因。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全国世协的工作也差不多陷于停顿了。而后来，刊物又恢复出版，世界语运动也终于重新活跃起来了。在这里，起了“起死回生”作用的人正是我们的胡愈老。原来，胡愈老于 1956 年应邀赴莫斯科参加“五·一”观礼，接着又去捷克访问。在苏、捷访问期间，他了解到，由于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受害者得到了平反，世界语所受到的不利影响也终于消除，苏联、东欧国家的世界语运动有了复兴的趋向，因此，他在回国以后就向那时主管文教工作的陈毅副总理申请恢复全国世协的工作。他并且积极主张，全国世协应当派一个小型代表团去参加当年在丹麦举行的第 4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以便一方面了解情况，另一方面逐步开展我们的国际交往工作。结果，又由于愈老的出力，陈毅很快就批示同意由叶籁士、陈原、张企程三人组成一个代表团去参加这次大会，这是我们建国以后第 1 次派代表团出席国际世界语大会，所以愈老对这次代表出国十分重视，他不仅作了很多指示，而且还亲自到机场给我们送行。这次出国使我们增长了见闻，给了我们很大鼓舞，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世界语工作确是大有可为的，我们应该把刊物恢复出版，把世协的活动再度活跃起来。就这样，全国世协和《中国报道》就于 1957 年先后恢复了。

今年，将在我国举行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首先倡议在我国举行这样一次大会的是陈毅副总理。陈老总生前对世界语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曾经对世界语工作给予热情的支持，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但是，恐怕还有很

多人不知道，使陈老总了解世界语的作用从而予以很高评价的也正是我们的胡愈老。完全是由于愈老的竭诚敦请，陈老总才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我们的“世界语对外宣传工作汇报展览”，并且在全国第1次世界语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热情赞扬世界语的长篇讲话。我们敬爱的陈老总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然而他对世界语的热情支持却还在继续产生影响。在这一点上，胡愈老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从1963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几年，中国世界语运动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就在1963年，高教部同意把世界语列为全国大专院校的第二外语，并且批准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办第一期世界语教师进修班，为大专院校培养世界语师资；1964年12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正式开办世界语对外广播，迄今已办了20多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些也都是胡愈老努力所得的成果。

“文革”期间，胡愈老本人遭到“四人帮”的迫害，他在各方面的活动不用说都受到很大阻碍。但是，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仍然念念不忘为世界语尽力。在文革后期，他为了多少改变一下那种只出世界语刊物而只字不提世界语本身的不正常情况，竟不辞辛劳，亲自去拜访一位主管世界语出版工作的领导同志。可是，一则由于那时的客观条件，二则由于这位领导同志对世界语缺乏认识，愈老这次登门拜访的结果是话不投机，不得要领。这件事使愈老十分生气。愈老为人心胸宽宏，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他这样大生其气显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我们的世界语工作遭到了损失。

在打倒“四人帮”以后的1978年，我们又有机会派代表团去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这次开会的地点是保加利亚的海港城市瓦尔纳。虽然我们同保

加利亚的世界语同志已经中断联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还是以很大的热情接待了我们。而且我们经过长时期的沉默之后忽然又在国际大会中出现，这也使国际世界语协会的领导成员惊喜交集，同我们进行了诚恳而又亲切的接触和交谈。这次代表团出国的确获得了出乎意外的成功。胡愈老在听取了我们的代表团的汇报以后非常高兴。为了扩大世界语的影响，为了重振世界语运动的旗鼓，他特地请楚图南同志以全国政协文教组的名义安排了一次小型报告会，由我向一部分政协委员作一次有关世界语和我们代表团活动的报告。那一天，胡愈老不仅亲自到场，而且还在我报告完毕以后发表了很长一篇讲话，对我的报告作了很好的补充。

1979年，胡愈老于30年代创办而深受读者欢迎的《世界知识》在“文革”时期被迫停刊了十多年之后终于复刊了。愈老从一开始就是想把《世界知识》也作为一个宣传世界语的阵地的，在《世界知识》好多种语文的刊名中就有一种是世界语的。因此，在《世界知识》复刊之后，愈老就向当时的总编辑郑森禹同志建议，在刊物上发表一篇有关世界语的文章，并且要求在文章中提到陈毅同志生前支持世界语的那篇讲话。森禹同志嘱托我来完成这个任务。这就是我在《世界知识》上发表《谈谈世界语和世界语工作》一文的由来。因此，文章虽然是我写的，主意却完全出于胡愈老。

外文局的老局长罗俊同志在“文革”时期挨了“整”，靠边站了，直到1979年才恢复职务。罗俊同志一向热情支持世界语，因此在复职以后，除了进行其他方面工作的整顿以外，他也想在世界语工作的复兴与改进方面作一番努力。他的想法是：《中国报道》这个杂志要办得更加具有世界语刊物的特点，为此需要调整一下领导班子；把陷于停顿的全国世协恢复起来，

为此需要建立一个专门的办事机构。他向胡愈老建议，把我调去负责这两项工作。愈老同叶籁士、陈原两位同志商量以后完全赞同，于是他一方面征得我个人的同意，另一方面向我原来工作单位的领导去做说服工作，要求他答应我调离。本来，调动一个人的工作往往是不太容易的，但是由于胡愈老的奔走出力，这件事却进行得异常顺利。

我们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于 1979 年向国际世界语协会正式提出申请，要求加入该会。国际世协的主席团很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申请，并且决定于 1980 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国际世界语大会期间，召开国际世协执委会讨论通过我们的入会问题。这对于我们中国世界语运动来说，无疑是一件大事。因此，为参加那次大会而派出的中国代表团不能只是一个一般的代表团，而必须是一个阵容强大而很有分量的才能以壮声势。关于这一点，我们其他人都没有考虑到，而且也想不出什么好点子。可是，愈老却考虑到了，而且出了很好的主意：请巴金同志担任团长，叶君健同志担任代表团顾问。这样一来，代表团的身份就大不一样，不仅受到了国际世协的热烈欢迎，而且也得到了我驻瑞典大使馆的重视。为了与这相配合，中国报道社在很短的时间内赶译出了巴金的小说《春天里的秋天》，以便巴金同志带往国际大会分送给国际世协的领导成员。第二年，巴金同志被国际世协执委会推选为国际世协的荣誉监护委员会委员。这是国际世协的最高荣誉职务，只有最杰出的人物才能获得这种荣誉，因此全世界当选为这种委员的一共只有 10 个人左右。这当然是巴金同志个人的光荣，但同时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光荣。而这件事情应该说首先归功于胡愈老。

我们全国世协加入了国际世协以后，我们同国际世协领导层的接触增

多了。在接触中，我们了解到，他们很有意思在中国举行一次国际世界语大会，时间最好是定在1986年。我们方面，为了实现陈毅同志的遗愿，当然也很乐于承担这个任务。两方面的想法不谋而合，很快便达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口头协议。我们于1981年从巴西开会回来就向胡愈老汇报了这个情况。他听了十分喜悦，并且很快就趁巴金来京开会之机，在巴金的旅馆里召集全国世协的有关同志进行商讨，当即作出决定，草拟报告请示中央。

后来，这件事正式确定下来以后，愈老对此十分关心，一再嘱咐我们一定要不遗余力地把大会开好。我们原来设想，在国际大会开会之际，我们可以邀集世界各国的世界语者向他老人家祝贺90寿辰。这无疑将成为一件空前壮观的盛举。谁知离大会的召开还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他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当然，胡愈老在建国以后在世界语工作上的业绩远远不止上面这些。例如：1974年，以叶籁士同志为首的中国世界语代表团应邀出席了日本第60届世界语大会，在这件事情上，胡愈老也出了很多力量。这在祝明义同志的悼念文章中将详尽的叙述，我就不再细说了。

胡愈老是当代中国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不仅学识渊博、足智多谋，而且富有组织能力。在他的一生中，他为党为人民做了多少工作、作出了多大的贡献啊！无论在政治方面的统战工作与华侨工作上，在文化方面的新闻、出版、文字改革工作上，他都做了大量而成绩斐然的工作。世界语工作仅仅是他一生浩繁工作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就是这“一小部分”，对中国以至国际世界语运动是多么巨大而又宝贵的贡献！

1984年，国际世协执委会推选胡愈老为国际世协荣誉监护委员会委员。

在他逝世的时候，国际世协主席马尔腾斯发来了十分恳切而沉痛的唁电。
这对胡愈老来说，是当之无愧的。

胡愈老不仅仅是个世界语者，但他却又是一个真正的世界语者。他在世界语工作上的光辉业绩将彪炳史册而永远为后人所深切怀念。

——原载《世界》1986年第5期

痛悼引路明灯的熄灭

——为胡愈老逝世志哀

张闳凡

胡愈老逝世了。当我在今年1月17日突然从广播中听到这个惊人的消息时，顿时感觉到我失去了一盏引路的明灯。

的确，这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进步文化事业的先驱者而又是中国世界语运动旗手的胡愈老，远在我有机会见到他以前，就已经成为我的引路明灯了。

那是1931年，我正在济南乡村师范求学的时候。有一天我偶然在一个书店中见到一本新书《莫斯科印象记》。我立刻买了一本并很快地反复读了好几遍。当时我从一些“新兴文学”和“新兴社会科学”读物中已经模糊地形成了对苏联革命的向往。但苏联人民的实际情况究竟怎样？在我心中仍是一个问号。这本书的作者胡愈之用其亲眼目睹的事实叙述了苏联人民的生活、努力和希望。这些事实进一步增强了我对苏联的向往和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愿望。从此我记住了胡愈之这个促进我走向革命道路的明灯似的名字。

另外，他这本书也给我提示出我此后多半生不断为之努力的世界语事

张闳凡（1910—1989），著名老世界语者，世界语名 Honfan。40年代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教员。曾任中国报道社编委、编辑组组长、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名誉理事、北京世界语协会副会长。有《柴门霍夫评传》、《世界语史》等译著，是《世界语汉语词典》的主编。

业这一个道路。因为胡愈老是借助世界语才能访问莫斯科打开了认识苏联这个窗口的。因此，我知道了世界语这个语种及其作用。所以以后我在监狱中有机会接触到世界语的材料时，就认真学习起来，而且 50 多年来从未间断过。

革命和用以为革命服务的世界语，这两者都是胡愈老这盏明灯为我指路的，虽然在全国解放以前我一直没有机会和胡愈老会面。

1950 年，我来北京参加《人民中国报道》（即现在的《中国报道》）的创刊工作后，当然有了拜见胡愈老聆听教言的机会，但我能更多地趋侍胡愈老左右、接受训诲的时间则是在 1957 年前后，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复会，《中国报道》复刊的那一阶段。

世界语者同志们可能还记得：《中国报道》曾从 1954 年开始停刊，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也随之从那时起停止工作。此后，读者不时给编辑部来信催请复刊或探询何时复刊、如何订阅等。直到 1956 年，即刊物停刊已历三年，这样的信件仍未绝踪。《中国报道》的组织既不存在，人员又已星散，这些信件，组织就决定暂时由我收存。

1956 年胡愈老赴苏联参加“五·一”观礼，同时了解了苏联和东欧各国的世界语运动情况后，他就准备报请中央恢复我国的世界语工作。在这一期间，他曾两次命我去汇报《中国报道》停刊后国外读者的反应情况。到同年 9 月，国务院批准恢复世界语工作后，胡愈老又首先商请外文出版社领导同意由我管理筹备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复会的联系工作，同年年底又商请该社同意正式调我到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筹备复会和《中国报道》的复刊工作。从那时起直到以上两项工作基本完成止，在差不多将近两年的时

间内，我经常要向胡愈老汇报请示，接受他对有关工作的指示和教诲。这使我体会到胡愈老不仅对于我是一盏引路明灯，而且他也是整个中国世界语运动的舵手和明灯。这不仅由于他深刻了解世界语是人民群众所需要的，是当前唯一有发展前途的国际语；而最重要的是：他对于在我国如何开展世界语工作有值得我们学习的远见卓识。

第一、胡愈老是从整个中国革命需要的高度来考虑世界语工作的——1957年我国世界语工作的恢复是胡愈老向中央正确反映情况的结果。因为1956年胡愈老不仅在苏联了解了苏联世界语活动的情况，同时也考察了捷克等东欧各国的世界语情况。他从这次考察中明确了两点：一是这些国家中世界语者对《中国报道》的评论（当然，《中国报道》停刊后其他国家中世界语者的来信，胡愈老也是考虑在内的）；其次是他了解了这些国家中世界语运动及其政府对世界语工作的态度。前者说明我国世界语工作对于向国外报道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与进步以及争取国际友人的重要性；后者则肯定了1953年迫使我国世界语工作暂停的客观情况已不复存在。胡愈老是从这两个坚实根据才提出恢复我国世界语工作而得到国务院批准的。

其次，胡愈老在领导世界语工作中能将革命的需要、世界语特点和客观实际密切结合，因而能使世界语工作在正确轨道上发挥最大的效益。如《中国报道》改由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出版，增加世界语的内容，从人民生活出发等方针都是在胡愈老主持下确定下来的。事实证明，如果违背这个方针，世界语工作的效益就要受到大损失。

其三，胡愈老由于深知世界语的功用，因而也力主尽量扩大世界语工

作的效益。他说：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责任不仅仅在于培养世界语者、出版书刊、国际联系，而应当成为我国对外科技和文化交流的中转站，使世界语在国际关系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如选派青年世界语者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为全国总工会世译赖若愚的报告、为捷克藏语学者提供藏语研究资料等工作，都是胡愈老竭力促成的。他多次指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应将收到的国外资料分别译转国内有关部门以扩大世界语对科技、文化交流的作用。

其四，重视中外友好、人民外交——从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筹备复会起到1957年年底止，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共接待了7个国家的13位国外世界语者，另外还有一个50多人的歌舞团（其中有不少世界语者）。胡愈老对这些活动都很重视，他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加强中外友好的工作，也是开展人民外交的良好机会。他对这些活动的计划都要慎重审定，并指示一般要有群众性的接待。有时他还亲自接见。他认为人民外交既要郑重地作为外交工作去作，又要突出来自人民群众的特点。

其五，领导全面、作风民主——胡愈老虽然担负着重要的、多方面的政府职务和社会工作，但他对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复会工作的领导则是照顾周到，巨细无遗。他不仅亲自向国务院提出申请复会的报告，安排复会后的建制和编制，确定刊物方针和名称这类重要事项，而且对于洽请北京市总工会和青联开办世界语班、举办世界语展览、报告会等，他也亲自指示筹划，而且还亲自到会作报告。

解放后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以后，胡愈老就被选为理事长。但他从不因自己是老前辈和理事长而独自决定什么。每当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

要解决重要问题或进行重要活动时，他总是按会章规定，要我邀集原来常务理事集体会商作出决定。而且为了不妨害大家的工作，总是邀请他们在晚上或星期天到他家会商。因此，被邀请的同志除有特殊情况外，都能如期到会。

胡愈老这种深入实际、充分民主、不当官作老爷的作风，是十分值得我们各级世界语组织的领导同志认真学习和大力发扬的。

其六，世界语工作也要开放、搞活——现在一说到“开放”、“搞活”，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的重要道路。现在回想：胡愈老对于如何作好世界语工作早已有此主张了。胡愈老曾一再说过：要作好世界语工作，重要的是要使非世界语者、特别是领导同志了解世界语，不能关起门来只注意在世界语者间的工作；也不应只注意开班、吸收会员，而忽视开展世界语对各方面的服务。1963年举办的“世界语工作汇报展览”和“世界语工作座谈会”以及若干世界语服务工作，正是根据这一指导思想而进行的。缅怀胡愈老对世界语工作的这一主张，再衡之于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不是也很可以启发我们的深思吗？

胡愈老虽已作古，但他对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功绩是永不磨灭的。他对世界语工作的领导思想和作风也是值得现在世界语工作者、特别是世界语工作的领导人永远学习的。明灯虽然熄灭了，但明灯所指引的方向是会永远引导我们向前的。

——原载《世界》1986年第5期

忆胡愈老二三事

陈世德

第1次我认识愈之同志是1930年间在上海世界语学会。每次我到学会去总能见到他，向他请教。我初学世界语，有时是到学会去翻读报纸和刊物，有时去买书。我看到的宣传品：“什么是世界语？学了有什么用？怎样学习？”这个材料听说就是他写的，写的简单明了，很有说服力。后来我又读了他写的《莫斯科印象记》和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觉得他的学识渊博，文字朴实，优美，说理清楚，读来很有兴趣。

我离开上海以后，开始和他通信，几十年来，一直没有中断过。有什么问题总是找他解决。开头是关于世界语学习中的问题，也有如何宣传，如何实用等等。他是主张学了就用的。

愈之同志在上海时期，除了担任《东方杂志》的主编以外，总是和读者，特别是青年经常联络，对于进步的，革命的文化活动，他总不惜时间和精力去参加。当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简称语联）成立时，他不仅担任了这个组织的书记，而且积极为无产者的世界语运动出力。我参加的一次会议是在新雅酒楼的茶座。我们讨论组织分工后，由楼建南（楼适夷）起草语联的章程。张企程曾将一架印刷机搬到了我住在卡德路的家里，他还经常拿些英文的工农通信之类的稿件回来在这里翻译和印刷、出版无产者世界语通讯。这个油印刊物在各国尤其在苏联的世界语者中间受到很大

陈世德（1905—1995），著名老世界语者，世界语名 Zensto，曾长期从事世界语翻译工作，一生热心推广世界语。

的欢迎。

1931年我在上海工作，一面自学世界语，一面也到苏州去教世界语。每逢星期六我乘火车到苏州回家，就在图书馆上课。这时愈之同志从苏联回来不久，我为使苏州人民了解国际形势，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情况，专程到上海邀请他去苏州讲演“苏联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海报早贴出去了。开明大戏院里已坐满了人，等着听这个很有吸引力的演讲。忽然发现在邻近青年会的门首，我们的广告牌子上面复盖着另一张布告，上面写着：奉谕禁止讲演苏俄题目，署名的是苏州警察厅。

怎么办？愈之同志说：不让讲就算了。可是看着戏院里满坐的听众，我说：你换个题目，讲讲国外旅途见闻如何？他同意了，在一片掌声中他登上了台，我还在猜想他讲什么，他已开口对国外的世界语运动作了介绍，最后他讲了世界语是什么、学了有什么用和怎样学习。在结束话题之前，他说：“你们中间如果有人想学，可在星期天上午到图书馆去报名，那里办有世界语讲习班。”在这次讲演后，我的星期日世界语班学习人数猛增到近100人。这在当时是个很了不起的数字。

1984年8月间我在北京，曾同儿子到胡愈老住所去看望他。警卫同志要我写个字条，我只简单地写了“陈××带了儿子从苏州来看望胡老。”这位同志接过字条说谈话时间不要太长，我见了胡老，心里记着话要简短，所以只把苏州和江苏的世运三言两语汇报了一下。我看他精神还很好，脚步也轻健，和他告别时我一再请他进房休息，可是他坚持送我们到了二门口。

想不到今年1月他却离开了我们。作为一名世界语的老兵和他的追随者，我将在工作和学习中永远怀念着这位战士。

——原载《世界》1986年第6期

怀念胡愈老

刘 铃

正当大家都在紧张热烈地准备迎接即将在北京召开的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杰出领导人我们敬爱的胡愈老竟不幸与世长辞了。我怀着悲痛的心情深深地怀念着他老人家。

我和胡愈老接触不多，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近 20 年来，我一直从事世界语图书的出版工作。胡愈老对我们的工作很关怀。我们出了新书，都要给他寄去一份，请他指教。1976 年《毛选》第四卷世界语版出书后，我亲自把样本送到胡愈老家去，他老人家立刻在客厅接见了我们，对我们的工作充分肯定并给予很大鼓励。他的态度是那样平易近人，慈祥可亲。我发现他讲话时有些气喘，好象呼吸都有些困难。他老人家那么大年纪了，身体又不大好，是忍着病痛来接见我的，我感到很不安，不敢多打搅他，就赶快告辞了。

有一次胡愈老给我打电话，介绍一位内蒙来的青年世界语者到我们这里来进修。原来是胡愈老去蒙古视察工作时，认识了这位青年世界语者，他是中学教师，想利用暑假到北京来多读些世界语书。胡愈老热爱青年，对他关怀备至，亲自打电话来为他安排。我受胡愈老的委托，给他安排了住处，借书给他看。他回去以后更加积极地投身于世界语运动。

刘铃，中国报道杂志社译审。曾任外文出版社世界语组组长、中国报道社图书部主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代秘书长。

1977年，外文局在友谊宾馆成立了毛选翻译室，进行《毛选》第五卷的翻译工作。我在那里主持世界语组的工作，我们组的成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世界语者。有一天突然胡愈老来到了我们中间。当时他已是81岁高龄，还亲自来看望我们，我们全组同志都深受感动。胡愈老走后，我们还长久地沉浸在幸福的欢乐中，都觉得必须以加倍努力工作来报答胡愈老的关怀。大家干劲十足，除了白天译毛选，又利用业余时间编了一本100多万字的《汉语世界语词典》。遗憾的是，这本词典直到最近才出版，已经来不及送给胡愈老看了。

胡愈老年事已高，他曾多次声明，对世界语工作已经无力过问，要“退休”了。但他是中国世界语运动最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大家都觉得离不开他，一直挽留他继续担任全国世协的理事长。实际上他对世界语工作一直是非常关心的。每次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他都亲自出席讲话，各世界语工作单位的若干周年的纪念活动他也参加，世界语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他都听取汇报给予指示。我印象最深的是，1979年全国世协划归外文局代管，当时外文局局长罗俊同志刚恢复工作不久，胡愈老亲自设宴招待罗俊同志，恳切地把协会的工作托付给罗俊同志，希望世界语工作在外文局领导下能顺利开展。胡愈老态度非常诚恳，罗俊同志也很尊重胡愈老。这几年世界语工作的进展，都是和胡愈老的关怀以及罗俊同志和外文局其他领导同志的支持分不开的。

几年前同志们在议论、酝酿在中国召开国际世界语大会的时候，都希望能早一点开，最好能在象胡愈老这样的老前辈健在的时候开。现在眼看这个愿望就要实现的时候，敬爱的胡愈老却已经离开了我们，这是多大的

憾事啊！胡愈老的去世是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巨大损失，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世界语者的心里。我们一定会继承他的遗志，把世界语工作做得更好。

安息吧，敬爱的胡愈老！

——原载《世界》1986年第6期

胡愈之和翻译工作

祝学礼

一个有多方面建树的人，主要的方面往往盖住了其他方面。作为我国老一辈的政治活动家，胡愈之在“五·四”运动、30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抗日救亡运动直至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同时又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对文化工作、出版工作以及文字改革、国际问题研究等都有卓越的贡献。这一切，在胡愈之生前和逝世以后，已有很多介绍。唯有在翻译工作方面，报刊资料却很少提到。其实，胡愈之与译事关系十分密切，他在翻译工作上也有不可磨灭的成就。现把胡愈之在翻译工作方面的二三事略述如下，以就正于读者。

一、把被压迫民族的声音传到中国

“五·四”前后，外国文学的译本陆续在中国出现，但大多来自英、法、德等西方列强。东欧等地的很多民族，在当时被称为“弱小民族”，他们的作家和作品，在中国鲜为人知。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曾经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胡愈之便是其中之一。他不仅是倡导呼吁，而且更身体力行。

1928年，胡愈之翻译的小说《星火》问世了。这是他散见于各种报刊

祝学礼（1927—1997），中国报道社副译审。曾长期从事世界语翻译和编辑工作。

译作的结集。这本书封面的肩题是“世界短篇杰作选”。胡愈之在“后记”里说：“本书所选的……大多数却全是‘弱小民族’的作品……。”

伐佐夫（Vazov）是保加利亚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因参加 1874 年的民族独立斗争，受土耳其政府迫害，数次流亡国外。他的代表作《轭下》及其它很多作品，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在艺术上也有很高的成就。作为《星火》开卷第一篇，胡愈之选译了他的《失去的晚间》。在篇末胡愈之还写了作者简介，称伐佐夫是“近代保加利亚最伟大的诗人及小说家”，“他对于保加利亚国民文学的建立，尽力最多，保加利亚之有伐佐夫，亦犹俄国之有普希金，德国之有歌德、席勒。”

另一位保加利亚作家埃林·彼林（Elin Pelin）的《在别一世界里》也被收入《星火》。埃林·彼林生于农民家庭，做过乡村教师，熟悉农村生活。他的作品描写了农民的贫苦，反映了农民对残酷剥削和暴力统治的愤怒。

在胡愈之的这部译著里，还可以看到波兰作家普鲁斯（Prus）的《她爱我吗？》。普鲁斯也因参加起义被沙皇政府逮捕。他的作品反映了波兰人民对异族侵略的斗争，揭露了波兰贵族的腐朽没落和资产阶级的贪婪无耻；他的历史小说《法老王》借用古代埃及历史资料反映了当时波兰农民的贫苦生活和教士的反动面目。

胡愈之还翻译了捷克作家捷赫（Čech）的《出了一册诗集的人》。捷赫也参加过民族独立运动，他的很多作品对人民的苦难寄予深厚的同情，歌颂了为祖国独立而进行的斗争。

这些作家本身都是革命志士。在当时，他们的国家民族和我们一样，都是饱经忧患，苦难深重。他们的作品具有革命的精神、进步的倾向和清

新的气息，一经译介和传播，立刻在中国引起广泛的注意。曾经和胡愈之共事多年的汪金丁教授在回忆胡愈之翻译“弱小民族”文学的时候说道：“30年代那时候我们搞文学的眼界很窄。多亏胡愈之把‘弱小民族’引进过来，使我们打开了眼界。”

直到今天，“弱小民族”中的作家和作品，对欧洲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仍有重要的影响。在《辞海·文学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欧洲文学史》等专著中，对伐佐夫、埃林·彼林、普鲁斯、捷赫等人都有介绍。此外，像籁诺甫、欧根·海尔泰、约里奥·库鲁迪等东欧作家，也都有胡愈之的译作。

二、胡愈之、爱罗先珂和鲁迅

俄国诗人和童话作家爱罗先珂于1921年来到上海。这年10月，胡愈之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文章：《介绍盲诗人爱罗先珂》。随后他又翻译了爱罗先珂的很多作品：

1921年11月21日，北京《晨报副刊》发表《我底学校生活一断片》。

1922年6月13日，《晨报副刊》登出了《大炮在远处轰鸣》。1923年，《为跌下而造的塔》和《春日小品》。

以上这些，都是爱罗先珂写的，由胡愈之译的。

在自己动手翻译爱罗先珂作品的同时，胡愈之又把他介绍给鲁迅。1921年11月4日，胡愈之致函鲁迅，谈鲁迅翻译爱罗先珂作品的事。鲁迅在11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得胡愈之信”。11月5日又写道：“上午复胡愈

之信”。由于胡愈之的介绍，鲁迅认识了爱罗先珂并开始了对爱罗先珂一系列著作的翻译。鲁迅在为爱罗先珂的《鱼的悲哀》写的译者附记里说：“……时近，胡愈之先生给我信，说著者（按：指爱罗先珂）自己说是《鱼的悲哀》最惬意，教我尽先译出来……”。

爱罗先珂从上海北上，就住在北京鲁迅的家里。

1922年，《爱罗先珂童话集》出版了。鲁迅为它写了序，其中说到：“爱罗先珂先生的童话，现在辑成一集，显现于住在中国的读者的眼前了。这原是我的希望，所以很使我感谢而且喜欢。本集的十二篇文章中，《自叙传》和《为跌下而造的塔》是胡愈之先生译的，《虹之国》是馥泉先生译的，其余是我译的。”

三、“媒婆”

胡愈之的译作绝大部分译自世界语。

1947年开明书店出版了胡愈之译的《寓言的寓言》。书中收入6篇作品，原作全都是世界语。

《星火》收有20篇小说，大部分原作也是世界语。胡愈之在这本书的后记里说道：书中的“20篇东西包含欧洲大陆及近东12个民族的作品，是用12种不同的文字写下的，大半是亏了柴门霍夫语的介绍，我们才得有机会领略这一些素不识面的作家和作品。我们如从本书里得到一点欣悦，那我们首先该感谢那位‘媒婆’——Esperanto”。

这里还应该补充的一点是爱罗先珂的创作生涯。爱罗先珂是俄国人，

写作却不用俄语而用世界语和日语。苏联在 1962 年开始根据世界语、日语和中文又把爱罗先珂的作品“译回”俄文，在苏联出版。1977 年，苏联还出版了爱罗先珂的《选集》。

胡愈之和爱罗先珂最初的结识，也是靠了世界语这个“媒婆”。戈宝权同志曾经回忆过这一段往事：“我请教过胡愈之同志。他说他最初在上海虹口的一家日本人开办的按摩院里见到爱罗先珂，发现他讲一口纯粹而又优美的世界语。由于爱罗先珂当时生活困难，胡愈之把他口述的诗文译成中文发表在报刊上……”。

四、注重译作的社会意义和战斗作用

“五·四”以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一些人躲在象牙之塔里，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为翻译而翻译。胡愈之反对这样的态度。正如鲁迅以杂文作为匕首和投枪，胡愈之置身于斗争的前哨，把介绍文学和革命的任务结合起来，译笔成为他冲锋陷阵的武器。

胡愈之在评介爱罗先珂的时候写道：“他向往自由，唾弃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文化。他对生活在底层的被屈辱被损害的普通人民充满了哀伤和叹息，对他们的遭遇表示愤怒。”爱罗先珂作为一位革命作家，为中外反动势力所不容。而胡愈之却和他成为挚友，给他译书、出书，和他患难与共，并肩作战。一憎一爱，态度何等分明！

胡愈之为什么要翻译《寓言的寓言》？他在“译者序”里有明确的回答。

关于这本书的原作者，俄国的陀罗雪维支（Vlas Mihalovič Doroževič），胡愈之写道：“他在报纸上所发表的文字，传诵很广，对于革命前的俄国社会生活，他是一个有伟大影响的人。他是惯用比喻的文体，指摘俄国政治社会各方面的种种罪恶和缺陷。他把当时的暴政和握权的人物都攻击得体无完肤，描写的淋漓尽致，却绝不显露出‘违碍’的字句。他所专长的，是借用了东方生活作题材，尽量地讽刺俄国政治社会的情状。”又说：“天下老鸦一般黑。走到无论什么地方，都不会容许你自由说话的。虽然有过‘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一句古话，但是古今中外的权力者似乎总想把天下人的嘴都封锁起来，全不想到这是一种不可能而且可笑的事呢。”《寓言的寓言》卷首有叶圣陶的序。叶老把这部寓言的寓意讲的同样是一针见血：“里面的几篇故事都是‘寓言’。什么是‘寓言’呢？看第一篇《寓言的寓言》就可以知道大概。真理最初想赤裸裸地走进皇宫；结果被赶走了。第2次去时，她自称为讲道，穿着粗硬的毛布衣服，但仍被拒却。第3次她再去，特意地打扮自己，从各地取来华美的衣料，又加上各种珍贵的装饰品，这时候她自称为寓言；果然，皇宫的门为着欢迎她而大开了。在这篇故事里，作者不是说‘寓言’就是真理的化身么？……愈之先生说，政治黑暗，不许人自由说话，就造成寓言一类东西风行的现象。这自是真切的观察。然而化妆的寓言具有特殊的魅力，是最巧妙的表达意思的工具，我想，就是在未来的自由社会里，仍旧会被一般聪明人所采用吧。”

至于《星火》，胡愈之写道：“本书对于文艺界，不会有毫末的贡献，所以所谓‘星火’当然不是指‘文艺之火’。只因为我个人心头近来时常感到一种微温……，正像这本书最后一篇中所暗示着的。所以我就随意拿这两个

字当作本书的标题了。”

胡愈之说的是“心头的微温”，实际上却仿佛使人感到了甚至看到了他那颗火一般炽热的心。胡愈之宣布无意使自己译的书成为“文艺之火”，是出于谦逊，还是基于当时的形势而采取的斗争艺术，有意寓褒于贬、欲扬故抑？他的译作，实际上不仅是“文艺之火”，说它们是“革命之火”也当之无愧。这革命之火的执炬人，是胡愈之，也是伐佐夫、普鲁斯和埃林·彼林，还有胡愈之翻译过的高尔基和柯罗连科，还有爱罗先珂。

柯罗连科（1852—1921），俄国作家，1876年参加学生运动被捕，一年后释放。1879年又一次被捕，流放西伯利亚。他的作品主要描写农民的苦难和觉醒，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有积极的贡献。1902年，当高尔基被选为俄国科学院名誉院士以后，沙皇却宣布选举无效。柯罗连科、契诃夫等作家立刻发表声明，放弃自己的院士称号，以抗议沙皇政府的无理决定。胡愈之用来作为书名的《这本书最后一篇》（即《星火》），原作者就是柯罗连科。

痛悼胡愈老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代主席、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胡愈之同志，因病于 1986 年 1 月 16 日在北京逝世。

我们谨代表我国各省世界语协会和全国世界语者表示十分沉痛的哀悼，同时向胡愈之同志的家属表示亲切的慰问。

胡愈之同志的逝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重大损失，而且也是我国世界语工作的十分重大的损失。

胡愈老是我国世界语工作的先驱。青年时代，他就致力于世界语的宣传和推广工作。他发起成立了革命的世界语组织，提出了“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的口号，把中国的世界语工作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胡愈老又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一直担任协会的理事长，创办了协会的机关刊《中国报道》杂志，开办世界语对外广播，建立了世界语之友会。几十年来，胡愈老为世界语在中国的发展运筹帷幄，呕心沥血，使中国世界语工作在国际世界语运动中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为促进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了解、增进国际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63 年，陈毅同志提出，要在中国召开一次国际世界语大会。胡愈老为此积极筹划，并于 1982 年作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定：1986 年 7、8

月在中国北京召开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他对这次大会的筹备工作始终十分关心。去年年底，胡愈老还亲自了解筹备工作的情况，指示我们一定要开好大会。

胡愈老为在中国和国际上推广世界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国际世界语界享有崇高的威望。1984 年，国际世界语协会推选他为国际世界语协会荣誉监护委员会委员。这是国际世界语界的最高荣誉职务。胡愈老的不幸逝世，也是国际世界语界的重大损失。

没有胡愈老，就没有中国世界语工作的今天。胡愈老的不幸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世界语工作中最受尊敬的、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全国世界语者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

我们一定化悲痛为力量，继承胡愈老的遗志，把他所开创的中国世界语工作进行下去，竭尽全力开好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

胡愈之同志永垂不朽！

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 中国报道杂志社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世界》杂志编辑部

世界语之友会

1986 年 1 月 17 日

——原载《中国报道》1986 年第 4 期

国际世界语协会主席的唁电

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获悉，中国卓越的革命家和领导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国际世界语协会荣誉监护委员会委员胡愈之先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不幸逝世使我们的世界语运动失去了中国世界语运动历史上一位最重要的先驱者。

在过去的 70 多年中，胡愈之不仅领导了贵国的世界语运动，而且在需要的时候英勇地捍卫了这一运动。我们谨向你们表示，国际世界语协会的全体会员与你们共同分担这一巨大损失，并将永远缅怀胡愈之先生的光辉业绩。

格·马尔滕斯

1986 年 1 月 21 日于鹿特丹

——原载《中国报道》1986 年第 4 期

国际世界语协会秘书长的唁电

我沉痛地从北京国际广播电台的广播中惊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国际世界语协会荣誉监护委员会委员胡愈之同志不幸逝世。他的逝世不仅是中国世界语者的损失，而且也是国际世界语运动的损失。请接受我衷心的哀悼。

芙洛拉·萨波—费尔索

——原载《中国报道》1986年第4期

日本世界语协会理事长的唁电

我怀着极大的悲哀与痛苦惊悉，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以来的理事长、《中国报道》杂志的创始人，我们最敬爱的胡愈之先生不幸逝世。

我们一直为我们能够亲切地称这样一位卓越的人为“我们敬爱的先驱”而感到荣幸与鼓舞。

他的逝世恰恰发生在即将于今年夏天在北京召开的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之前。这使我感到十分悲哀。我渴望再次见到他的炽热的希望成了泡影。

然而，他对世界语事业的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和他的光辉形象将永远活在我心中。

国际世界语界又陨落了一颗最灿烂的星。对此，我谨代表日本世界语学会和日本世界语者向你们表示最诚挚的哀悼。

我衷心地祈祷，愿他的英灵安息并永远指引我们前进。

矶部幸子

1986 年 1 月 20 日

——原载《中国报道》1986 年第 4 期

日本名古屋世界语中心的唁电

尊敬的中国世界语者：

我们怀着无比悲哀的心情惊悉，尊敬的胡愈之先生不幸逝世。

我们最伟大的几乎是传奇般的先驱、中立语理想的捍卫者离开了我们。

日本的一些大报在论述他对国家的功绩时，首先一致报道了他是“著名的世界语学家”。

我们向中国世界语者表示衷心的哀悼。他们值得骄傲的“世界语主义”将永垂不朽！

名古屋世界语中心

1986年1月18日

——原载《中国报道》1986年第4期

胡愈之逝世

U. Lins

Hujucz (1896-1986)

En septembro 1985, okaze de sia 35-jara jubileo, El Popola Ĉinio portis sur la titolpaĝo koloran portreton de Hu Yuzhi (Hujucz), la prezidanto de Ĉina Esperanto-Ligo. Ĵus venis la informo, ke li mortis la 16an de januaro en la aĝo de 89 jaroj. Fotoj de Hu Yuzhi estas raraj, faktoj pri lia vivo eĉ pli. Sed tio, kion ni scias, sufiĉas por permesi la juĝon, ke mortis la plej influa persono, kiun dum la daŭro de sia ekzisto havis la ĉina movado.

Studinte anglan literaturon en Hangzhou, Hu Yuzhi jam en 1919 kune kun Ba Jin (Bakin) kaj aliaj fondis Ŝanhajan Esperanto-Asocion, kiu fakte dum pluraj jaroj gvidis la ĉinan movadon. En 1928 li vojaĝis al Eŭropo kaj ekstudis internacian juron en Parizo. Li ĉeestis la Universalajn Kongresojn en Antverpeno (1928) kaj Budapeŝto (1929) kaj la SAT-Kongreson en Londono (1930). Revenvoje al Ŝanhajo, Hu pasigis semajnon en Moskvo, dum kiu lin prizorgis sovetaj esperantistoj. En aŭgusto 1931 li aperigis la libron *Impresoj pri Moskvo*, kiu tiris la atenton de multaj ĉinaj intelektuloj al Esperanto.

La profesia kariero de Hu estis impona. Ankoraŭ kiel junulo, li iĝis

乌·林斯，德国世界语者，曾在国际世界语协会担任领导职务，对中国世界语运动史有较深入的研究。
据巴金本人回忆，1919年未同胡愈之创建上海世界语协会。——编者注

ĉefredaktoro de *Orienta Revuo*, unu el la plej famaj kaj longvivaj periodaĵoj de Ĉinio. De 1937 ĝis 1940 li laboris sub Guo Moruo en la kontraŭjapana propaganda servo. Poste li restadis en Singapuro, kie li estis ĉefredaktoro de grava ĉinlingva ĵurnalo. Post la starigo de la Ĉina Popola Respubliko en oktobro 1949, Hu okupis gvidajn funkciojn en la socia kaj kultura vivo de la lando. Li estis interalie estro de la Eldona Administracio, vicministro pri kulturo, vicprezidanto de Komitato por Skriblingva Reformo kaj deputito (fine, vicprezidanto de la konstanta komitato) de Tutlanda Popola Kongreso.

Ne malpli okulfrapa estis la kontribuo de Hu al Esperanto. En la tridekaj jaroj li finance subtenis la Ŝanhajan Esperanto-organon *La Movado*. Sed plej multe li povis helpi la movadon de post 1949. Dank' al lia influo, jam en majo 1950 povis ekaperi la revuo *El Popola Ĉinio*, kaj estis ankaŭ la merito de Hu, ke Fremdlingva Eldonejo regule, eĉ dum la t.n. Kultura Revolucio, kiu malfavoris la disvastigon de Esperanto en Ĉinio, publikigis parte tre valorajn librojn en Esperanto.

Hu estis prezidanto de Ĉina Esperanto-Ligo ekde ĝia fondiĝo en marto 1951 ĝis sia morto. En 1984 Hu estis elektita membro de Honora Patrona Komitato de UEA. Li ne ĝisvivis la Universalan Kongreson en Pekino, kies okazigon li senbude konsideris krono de la pli ol 60-jara klopodado batalakiri por Esperanto agnoskitan lokon en Ĉinio.

附译文：

胡愈之逝世

乌·林斯

胡愈之（1896—1986）

1985年9月，在《中国报道》创刊35周年之际，在它的封面刊登了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胡愈之的彩色照片。刚刚传来消息，他于1月16日逝世，享年89岁。胡愈之的照片是珍贵的，他一生的事迹更珍贵，而我们所知道的事情就足以说明，在中国世界语运动中一个最有影响的人去逝了。

胡愈之在杭州结束了英国文学的学业后，于1919年和巴金等共同创建了上海世界语协会，事实上在很长时间里该会领导了中国世界语运动。1928年他去欧洲旅行，开始在巴黎学习法律。他分别参加了1928年在安特卫普和1929年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国际世界语大会，1930年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全世界无民族协会大会。回上海的途中，他在莫斯科度过了一周，他得到了苏联世界语者的关照。1931年8月他发表了《莫斯科印象记》一书，该书引起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语的关注。

他职业的生涯是令人敬佩的。还在青年时代，他已经成为《东方杂志》的总编，该杂志是中国最著名、出版时间最长的杂志之一。1937年至1940年他在郭沫若领导下的反日宣传部门工作。后来他在新加坡逗留，在那里他

任一份重要的中文报报纸的总编。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愈之在国家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中担任重要的职务。他担任过出版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最后是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胡愈之对世界语的贡献也同样显赫。在30年代他曾资助上海世协的机关刊《世界》。但1949年后他对世界语运动的帮助就更大了。由于他的影响，在1950年就已经出版了《中国报道》。甚至在对中国世界语运动发展不利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外文出版社还用世界语出版了一部分珍贵的书籍，这也应归功于胡愈之。

胡愈之从1951年3月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之日起，直到他逝世止，一直担任该会会长。1984年他当选为国际世界语协会荣誉监护委员会委员。他未能看到国际世界语大会在北京召开，毫无疑问，他把这次大会看作是为使世界语在中国获得认可地位而努力奋斗60多年所取得的最高成就。

——原载国际世协机关刊《世界语》1986年第2期

（肖平译）

编 后 记

80年代初，我们曾想编辑一本《胡愈之世界语论文集》，但胡愈老不同意，未能如愿。90年代中期，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了《巴金与世界语》、《叶籁士文集》后，我们又重提此事，立即得到陈原老的热情支持，并答应亲自为该书写序。在编书的两年间，他亲自审定编目和部分稿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并且多次激励我们要编好此书。

胡愈之是我国现代和近代史上文化界、出版界的巨人之一，他对我国文化、出版事业的卓越贡献是有口皆碑的，但是他对世界语运动的贡献，在非世界语界，却很少有人知道，正如陈原老所说，甚至连大部分胡愈老的传记作者，也“没有深入到这位智者的内心世界”，“没有理解更没有窥见世界语在胡愈老之身心中所起的作用”。事实上，他对国际语理想矢志不渝的坚定意志，对世界语运动自始至终的热情支持，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对世界语的理想、世界语运动的有关论述和亲身实践，教育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世界语者；他对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使之成为国内外世界语界公认的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执炬者和奠基人。

中国世界语者历来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他们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过去，为了祖国的民族解放，他们敢于赴汤蹈火；今天，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他们也乐于奉献。同时他们也心系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未来。他们愿意学习胡愈之，走胡愈之的道路，为祖国和人类作出贡献，这贡献当中，自然也包括世界语在内。我们相信此书的出版，将会鼓励更多的人，特别是

年轻人加入这一行列，在新的世纪，积极宣传、推广世界语，为世界语在中国和世界的普及贡献一份力量。

本书的内容包括四个部分：一是胡愈之写的有关世界语的论文、讲话和少部分论述文字改革的文章；二是胡愈之给世界语团体和世界语者的书信、贺词；三是部分著名的世界语之友会成员和世界语者的纪念文章；四是胡愈之的主要生平与世界语活动记事。

在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有幸得到许多团体和个人的热情帮助与支持。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同意我们选用《胡愈之文集》中有关世界语方面的文章；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机关的有关同志为我们提供了胡愈老的许多珍贵照片；还有世界语界的同志们和朋友们，都非常关心和支持这本书的编辑和出版，谭秀珠、赵慕英、殷秦、徐婉芬同志对该书进行了仔细的核校，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和感激！

编者 侯志平

1998年12月于北京

图书信息

《巴金与世界语》 本书分三部分：“著作篇”收录巴金关于世界语的论著和世界语原作 11 篇；“译作篇”收录巴金从世界语翻译的外国剧本、小说 7 部；“书信篇”收录巴金与国内外世界语组织和个人的通信 35 封，书后附有《巴金与世界语记事》。

850 × 1168mm 1/32 13.5 印张 定价：12.80 元

《叶籁士文集》 本书收集了叶籁士在各个时期有关世界语运动和文字改革工作的论文、译作、书信等共 69 篇。附录中包括他的年谱和各界有关人士对他的纪念文章。全国政协副主席胡绳同志为本书写了序言。

850 × 1168mm 1/32 16.5 印张 定价：16.00 元

ISBN 7-5052-0421-1



9 787505 204218 >

定价：28.00 元